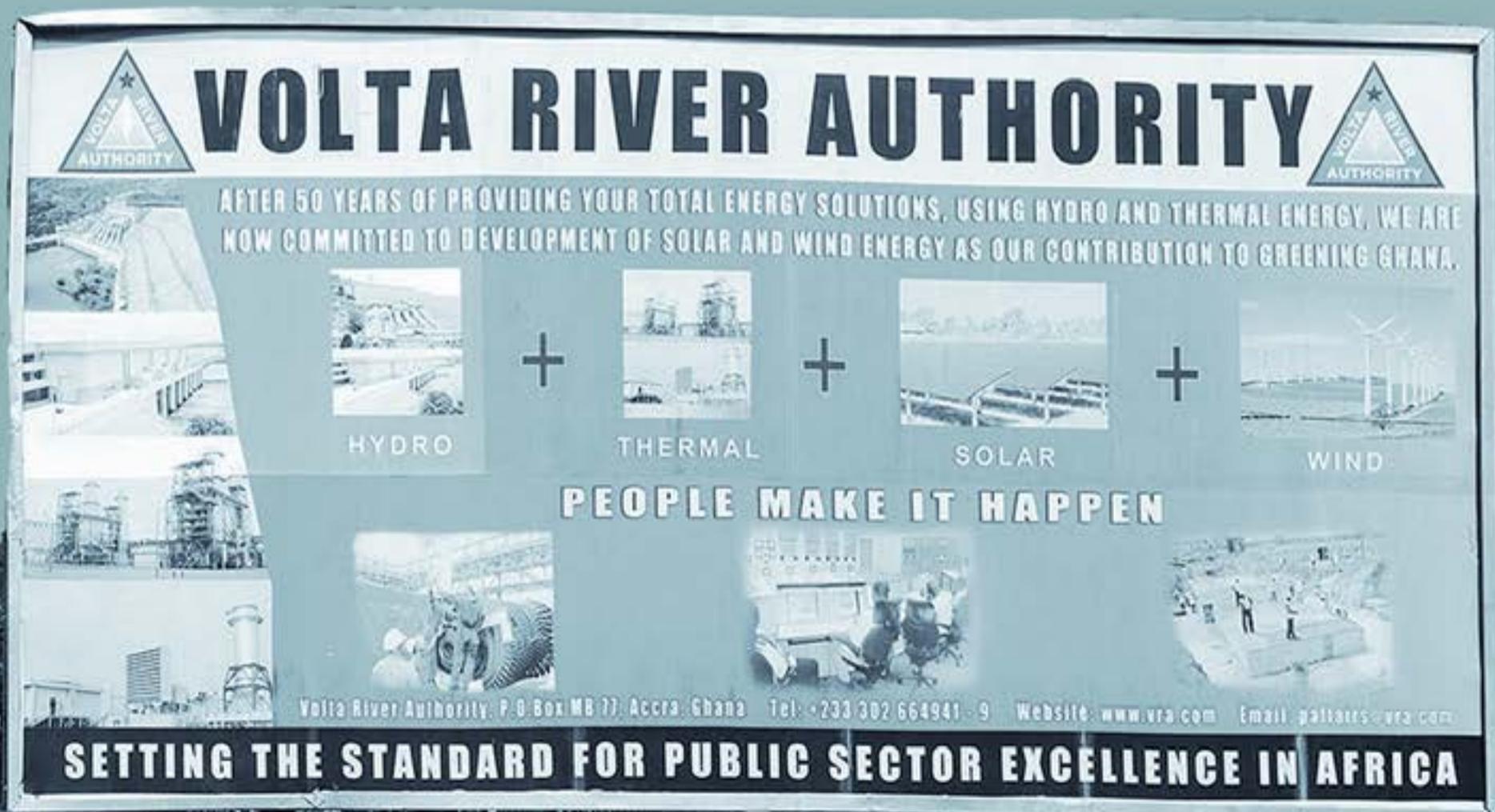


热风学术

秋季刊

网刊 2020年9月第18期

18



VOLTA RIVER AUTHORITY

AFTER 50 YEARS OF PROVIDING YOUR TOTAL ENERGY SOLUTIONS, USING HYDRO AND THERMAL ENERGY, WE ARE NOW COMMITTED TO DEVELOPMENT OF SOLAR AND WIND ENERGY AS OUR CONTRIBUTION TO GREENING GHANA.

HYDRO + THERMAL + SOLAR + WIND

PEOPLE MAKE IT HAPPEN

Volta River Authority, P.O. Box MB 77, Accra, Ghana Tel: +233 302 664941 - 9 Website: www.vra.com Email: gait@vra.com

SETTING THE STANDARD FOR PUBLIC SECTOR EXCELLENCE IN AFRICA



目录

- 4 **编辑手记**
- 7 **内容提要**
- 12 **专题一 _ 基础设施的文化研究**
- 13 **编者按**
刘杰尘
- 19 **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
布莱恩 · 拉金
许多译 | 刘杰尘校
- 48 **瘫痪的基础设施：断电时刻的阿克拉城市政治生态学**
乔纳森 · 西尔弗
梁成林译 | 高语晨校
- 83 **渗漏的国家：用水审计、“无知”和基础设施的政治**
尼基尔 · 阿南德
高语晨译 | 许多校
- 112 **技术的旅行：南非的基础设施、伦理模式与政治的物质性**
安蒂娜 · 冯 · 施尼茨勒
许诺译 | 梁成林校

142	专题二 _ 媒介中的数字劳工
143	编者按 马凌
146	从数字劳动探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变迁 贾文娟
159	灵活用工与平台责任：法学视角能为数字劳动研究贡献什么？ 胡凌
168	迈向传播社会主义 / 数字社会主义下的未来劳动 徐僣骅
181	特稿 _
181	民族主义都市主义何去何从？ ——苏迪雅梭市长主政下的雅加达的公共生活 阿比丁 · 库斯诺 李辉译 罗小茗校
213	殊音 _
213	看见那些青年人 黄灯
227	《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229	封面故事 & 网刊信息、下载方式



编辑 手记

一直以来，都想推出一辑事关基础设施的文化研究。

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基础设施，既是发展经济的硬道理和搁置意识形态争议的软道理融合得最为紧密，展开得最为充分的领域，也是最缺乏从社会的角度加以整理、分析、思考和研判的文化事实。

一方面，中国式的基建——高速运行的轨道交通、频频升空的卫星、无处不在的监控系统，似乎正遍地开花、高速重组¹，甚至于成为中国挺进世界，尤其是非洲和拉美的一大利器。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正面临的被迫出售、下架和断供之灾，又无一例外地说明，因运作良好而近乎隐形，或者说被视而不见的基础设施，从来也不只是跳动的“0”和“1”或者钢筋水泥之间的乏味组合。相反，在它们得以成型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文化或意识形态的作用乃至争夺，无处不在。而这样的缠绕与纷争，还只是针对人类世界内部而言。如果说过去，来自环保组织的频频预警，仍不足以撼动惯于自大的人类的话，那么，自2020年以来，诡异蔓延的新冠病毒、肆虐的洪水、持续的大火……，则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构想，显著的时效与可能的隐患，从来都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共存 / 斗争的关键场所。

然而，又何止于此。

在中国，势如破竹的“基础设施”，同样渗透在中国人的幻想能力之中。从大卖的《流浪地球》到最近颇为走红的《中国2098》，再再印证着这一点。

1 从基础设施的角度理解网红直播带货这一疫情之后的社会热点，便不难发现，既有的基础设施在社会情境变动下的迅速重组，是其得以成型的核心事实。这也就意味着，除却以其带来的令人欢喜的经济数据展开评价外，网红带货的新意或创造性，也应该在这一不同的标准或框架中被重新考量。

看起来，对那些站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当口、试图畅想未来的中国人来说，基础设施建设既构成了展开想象的前提条件，也成为了构想未来的关键内容。于是，一道《中国 2098》，被网友们欢乐地誉为“农耕文明 + 现代重工业的‘基建狂魔’大餐”。对于以“当代文化”为关注重心的文化研究来说，面对这一类的想象之作，提出“这样的想象有多少的新颖之处，它们与当代中国人的情感结构有着什么样的契合”这样的问题，是近乎本能的反应。然而，想要回答这样的提问，若缺失了对于当代社会中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文化事实的持续考察，缺失了对于由基建所重构的社会生活中的诗学思考，那么，仅仅在文本符号层面展开的分析，无论褒贬如何，恐怕都会显得过于苍白无力。

在此，特别感谢本期“基础设施的文化研究”的特约编辑刘杰尘博士。她编辑的这一专题，详细介绍了从文化的角度展开基础设施研究的基本状况和研究路径。专题中的三篇个案研究，从预付费仪表、电力和水力入手，将聚集于它们之上的种种冲突与矛盾——既包括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种族冲突，自然资源和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技术知识和社会生活之间永远无法严丝合缝的窘境，技术的铁面无私与社会等级的刻意区隔等等——呈现在读者面前。相信这样的研究和思考，将带来新鲜的动力，让我们加倍意识到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中这一刺目的空白，进而鼓励和推动此后的研究。

与这一专题相配合，本期特稿刊登库斯诺的《民族主义都市主义何去何从？》，旨在呈现由多方力量（政治制度、房地产、普通市民、金融危机等等）参与的市政建设的博弈，在雅加达这座大都市中如何开花结果。

本期另一个专题“媒介中的数字劳工”，是围绕“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的一组书评。分别从社会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讨论了由姚建华老师主编的这套丛书。和“基础设施”的讨论一样，既有的西方视角下展开的数字劳工研究，如何让中国学界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对比进而明确自身的问题框架，展开更加切实的思考，是这套丛书的

立意所在。在此，感谢《中国图书评论》与我们共享这一组稿件！

最后，特别推荐本期“殊音”——《看见那些青年人》（黄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刻意）不被看见的年轻人，就和极为重要却同样不被看见的“基础设施”一样，是他们构成了中国社会此后建设和发展的那一股股强大而平凡的力量。对于他们的“忽视”或“无知”，其后果已经在今天的网红、综艺和公共舆论中变得越发鲜明。这让人不由联想到拉金在《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一文中提及的论文《当水管不是水管》中的那些装模做样的水管们。它们明明没有连接下水道，无法出水，却依旧保持水管的模样，进而具有了象征和符号功能：

水管并没有连接到排水系统，而连接到监管、审计和行政管理等一整套治理技术中。水管的物质形式不再是空心管道，而转移到了预算表格上的数字，报告书上的一字一句。空心管道、数字、白纸黑字，所有这些形式都属于水管，都是水管的物质化身，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游走在系统中的各个环节。水管最后成了一堆堆文牍。²

6 也许，在中国大学入学率持续高昂的今天，无论对于大多数上了大学却前途迷茫的青年人来说，还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耗费巨资的大学都是一根根这样的水管。而当水管并不真的出水，或无法提供真正有质量的生产和生活用水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势必是在水管之外奔流汹涌的时代洪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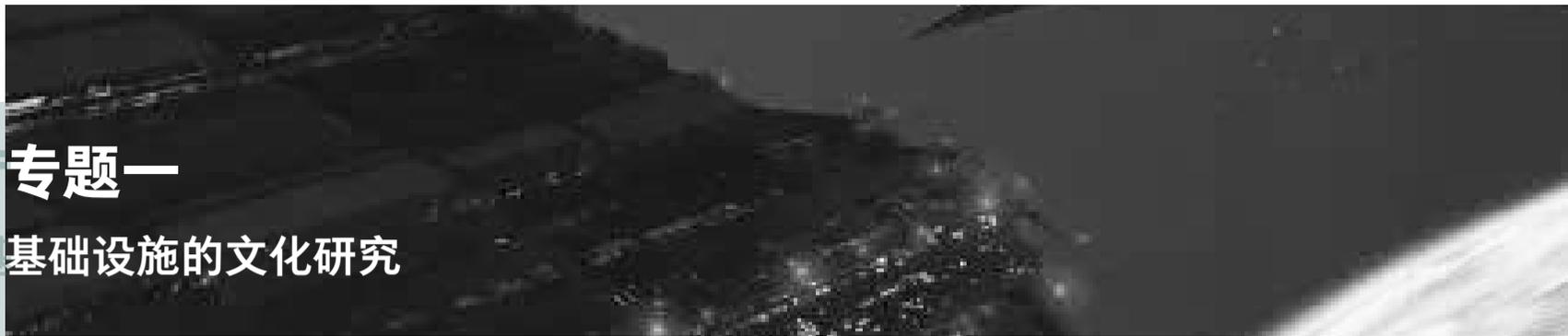
《热风学术（网刊）》

2020年9月12日

2 见本期布莱恩·拉金：《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第32页。

一 思考专题一

基础设施的文化研究



因为基础设施的基础实体是如此多样，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分析它，所以方法论的选择成为了一个理论问题。基础设施是技术系统吗？理解基础设施就相当于分析机器网络的运行过程吗？基础设施是金融工具，会计实务，预算安排，抑或管理结构和组织技术吗？基础设施如同人的肌体一样具有生物性吗？它们的体积、质量和态度是否被用来在芝加哥交易所里吸引买家呢？基础设施是社交性质的吗？包括互相拜访、喝茶、问候，乃至各种社交投资，通过建立可以依靠的人脉，用于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目的，取得回报？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抬高技术，即使此类研究把城市空间视作人和机器的混杂系统，通过基础设施网络绑定在一起。然而在近来对基础设施的人类学研究中，其中最有活力的一个方面表现在，理解和分析基础设施的方式变得极其丰富多样，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卓有成效地打破了稳固的研究的基本单位。

——布莱恩·拉金《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

7 仪表在自由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改善道德的工具被投入使用，但在进入种族隔离末期的南非时，它们却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平定反叛的手段。在这两个时刻，特定的伦理和政治计划委以技术重大的责任，技术本身则成为表达和协商相关问题的领域。将两个时刻联系在一起，伴随着仪表的“旅行”一同到来的，是一种将旷日持久的伦理-政治问题（包括公民归属、公民美德，以及公民权利边界的问题）委托给技术领域的本领。仪表作为政治社会的技术形式，借此创造了所谓的渐进式社会契约，通过这种契约，公民形象实际上是在行政领域中被形塑的。不过，即使在看似极端去政治化的背景下，这种技术手段也以各种方式构成了物质性的政治，人们可以在这些政治中主张各种各样的伦理，投入各种各样的情感。

——安蒂娜·冯·施尼茨勒《技术的旅行：南非的基础设施、伦理模式与政治的物质性》

图片来源: <https://mp.weixin.qq.com/s/cLosfdunLO-StD7tebIriw>



在孟买的水利设施中进进出出的未知水流，致使供水部门的政治主张和改革项目愈加千疮百孔。城市供水系统时不时就会发生故障，危机已成常态，工程师们在城市中四处奔波，像“救火队员”一样“扑灭”各种危机。面对城市居民差异化的诉求，以及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发起的改革倡议，漏水让供水部门变得软弱。随着水持续不断地悄悄渗漏，侵蚀着城市的管道和土地，毫不夸张的是，这种不为人知的，也很难获知真实情况的水流在城市中制造出巨大的塌陷坑。权力之大，控制效果之差，两者的裂隙如此惊人，暴露了城市之中水及其基础设施的顽固与力量。它们证明了渗漏对于政府架构意义非凡，也构成其施政抓手，但与此同时，正是渗漏，一点点腐蚀着这座城市筑立于其上的政府地基。

——尼基尔·阿南德《渗漏的国家：用水审计、“无知”和基础设施的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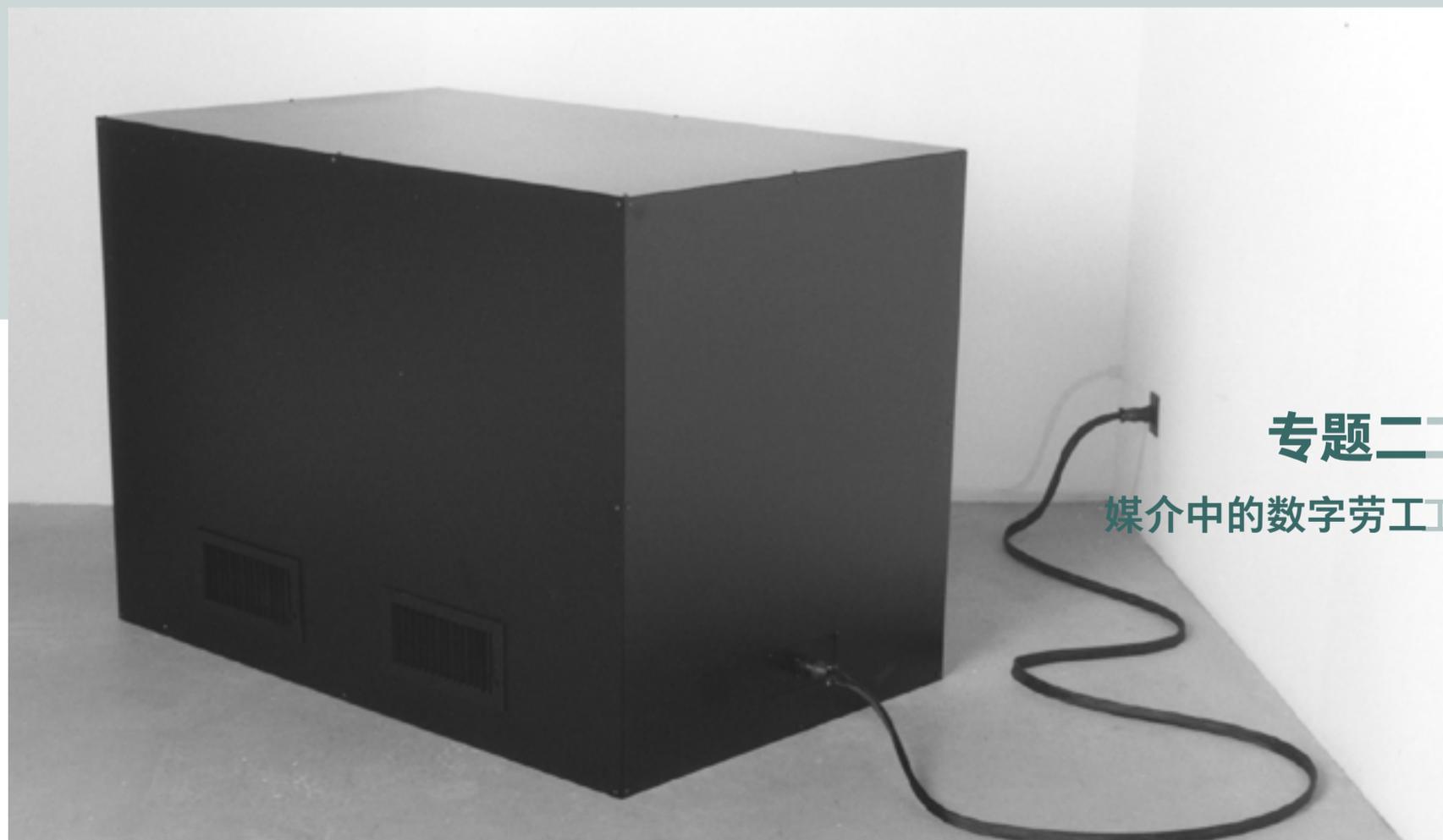
8

气候变化对能源生产和电网瘫痪的影响日益深远，也与由来已久的电力网络脆弱状况密切相关。这表明气候变化是具有政治性的：它在一系列尺度上使城市基础设施政治化。全球北方的工业化国家发起的人为进程、加纳政府对水电的依赖、VALCO 的电力需求、世界银行的政策以及 VRA 应对这些要紧事时的失职，共同揭示了诸多隐性和显性的决定因素如何在本地和更大范围内造成了电网瘫痪。另外，这些参与者的行动，与历史上对水力发电的投资相交织，导致了以阿科松博为中心，延伸至整个萨赫勒地区，并继而进入地球大气层的一系列代谢过程的瘫痪。

——乔纳森·西尔弗《瘫痪的基础设施：断电时刻的阿克拉城市政治生态学》

这个颇具冲击力的新时代先是在全球范围内高调亮出了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数据等招牌吸睛，然后在各种黑马、独角兽可想而知的衰退与破灭中使世人惊愕，最后在中美对峙、逆全球化的浪潮下给全球经济以重重一击，将就业水平带至冰点。你我都能体会到庚子年的这股戾气：数字识别等新技术为生活提供便利，但也带来隐私的丧失与监控手段的普遍化等焦虑；生物医学技术将人们带到了基因编辑的新时代，但却对新型冠状病毒一筹莫展……世纪之初的瑰丽泡沫眼看越飞越远。伫立在历史长河边，我们切切实实地见证“沉舟侧畔千帆过”：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归途仍未明确、制造企业中的技术升级尚未完成之际，大批劳动者已经撇下现代工厂这只“巨兽”，以网红、快递小哥等新身份、新面目，投入到“勇敢的新经济”中了。今时今日，学者们无疑又陷入一种对未来与未知的焦灼与不安之中。人当然“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后浪与前浪真的身处同一条奔涌的“河流”吗？世界到底变了吗？如果真如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或汉娜·阿伦特等先贤所揭示的，劳动不是明日黄花，而是人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人类社会存续的依托，我们又当如何把握历史的脉搏，理解令人炫目的“新工作”与那个似乎一直都在的“本质”之间的新关系呢？

——贾文娟《从数字劳动探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变迁》



图片来源: https://www.channelb.org/upload/file/20200304/2293/68705c5c01977f8ebd9032bcfacd0475_715__2.jpg



10 当我们似乎再次经历着一种过渡时刻，过渡到某种既充满希望又命运多舛的状况中。当城市居民目睹为更加绿色的城市腾出空间而把城市贫民驱逐出他们的“非法”住区的现象时，当人民听到市政厅中传出的根除腐败的声音，却迎来了市长与房地产开发商们为扩张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干着私下勾当的时候，当他们看到对政府官员的规训也同时规训着城市居民的时候，当他们看到市长在与诸种旧势力的卷土重来做斗争的同时也在为它们效力的时候，这是一种乌托邦与恶托邦的混合。各式矛盾都在雅加达上演。毋庸置疑，在关乎都市政治的诸种问题上，城市是存在分歧的。选择哪一方已经变得远没有那么容易，分析城市生活越来越难。

——阿比丁·库斯诺《民族主义都市主义何去何从？——苏迪雅梭市长主政下的雅加达的公共生活》

殊音

图片来源：《我的二本学生》封面 <https://img9.doubanio.com/view/subject/l/public/s33702245.jpg>



在这一漫长、复杂、看似温和实则惊心动魄的过程中，我作为高等教育市场化铺开前的最后一批见证者、亲历者，在这一呈现中，因为各类杂糅经验的冲撞，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参差、对照的个人视角，尽管因为对象的限定，在不少生命故事的展开中，我不得不承认阶层分化的趋势与命运，已经铁一般地砸中了一个群体，但正是个体丰富的突围，让我意识到教育的功能正是为了反抗这种铁定，并打开、提供新的命运方式。

从教育目标而言，将学生培养成为成功的人，还是完善的人，几乎所有的高校，没有任何差别。面对年轻个体的精神成长，近二三十年的高等教育，对“人”这个词，采取了不约而同地回避，密集的知识灌输，成为教育活动的常态，并以剥夺社会教育、生活教育为代价，从而使得学生的成长，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并直接导致学生的认知局限。

——黄灯《看见那些青年人》



基础设施的文化研究

编者按

刘杰尘*

与其说基础设施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购物、出行、通讯等方面的便利支持，不如说现代社会的运转本身就是建立在各种基础设施网络的基础之上的。基础设施无愧其名。本专辑收录自2013年以来的4篇从文化与人类学角度研究基础设施的文章，其中包括1篇理论研究和3篇个案研究。文章的作者来自城市研究、人文地理、传播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文章的理论话题涉及人类学、科学社会学，和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等。这些跨学科的讨论，对于我们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定义基础设施，寻找基础设施的研究路径，反思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Larkin(2013)的《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着重讨论如何从人文学科的角度，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重新认识在通常情况下以管道、物料和工程技术形式呈现在生活当中的基础设施。这是一篇理论性质较强的文章，系统地梳理了与基础设施这一话题相关的理论与方法论。作者认为，基础设施是一个庞大且混杂的系统性存在。将基础设施进行定义，就成为了一个分类行为：在你选择以何种角度讨论某些方面问题的时候，另一些无法被分割的问题则被忽略了。这个系统是一个异构性的网络：它既涉及对物料在物理和工程层面的处理，还涉及人对整体系统运行的设计与管理；它既包括具有相对稳定物理形态的管线和设备的架设，还包括能源和数据的无形的流动。这也许是因为为什么很多人文学科研究基础设施的文章，首先会援引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一方面，人类与非人类的“行动者”在理论假设之初被赋予了相同的地位和能动性，避开了决定论所带来的局限。同时，这也将研究重点指向追踪人与非人的行动者之间的紧密关联与相互转化。这一点在探讨基础设施的政治属性时表现得十分明显，成为了基础设施研究

* 刘杰尘，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的重要内容。Larkin 引用了三个研究来解读基础设施的政治性。“技术”是一种表面上呈现为中立的实践，然而在 Anand(2011) 和 von Schnitzler(2008) 的研究中，基础设施“技术”与宗教体系、政治领域产生纠缠，并成为检验和塑造公民身份的一种方式。这一思路在本专辑收录的这两位作者的另外两篇更近期的文章中也有所延续 (von Schnitzler, 2013; Anand, 2015)。

基础设施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是相伴而生的。例如，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现代交通、能源和物流网络，让人们尽可能地从地理束缚中解脱，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征服感”。这一变化是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的，即技术代表着现代和未来的可能性，而与之相反，没有技术，似乎注定会带有屈辱感地被时代抛弃。在纯粹的工程技术层面之外，基础设施也因此被赋予了深厚的情感认同，在象征层面与幻想，欲望以及自豪感紧密相关。于是拉金提出了文章标题里的第二个关键词，基础设施的“诗学”。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可以“从技术功能中脱离”，甚至“与其既定目标背道而驰”。这使我想起了另一项专注欧洲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建设的研究。结论中有一句是这样讲的：“参与网络项目的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种理想化的网络尚不存在或不完全存在。但是，这并没有使它变得不那么‘真实’：这是一个齐泽克所说的‘幻想’。如果有足够的官方支持和美学幻想，就会习惯性地在本体论上认为是真实的。” (Green, Harvey and Knox, 2005, p. 817) 这一论述再一次提醒我们思考，在钢铁和管道之外，基础设施还包含哪些要素，整个体系如何运作。在某种程度上，基础设施所代表的情感与幻想，对于它最终的实现至关重要。

回到 Larkin 的作品，在了解了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之后，还有一个更具体的话题可以关注，也就是基础设施的“可见性”问题。在 Larkin 的研究中，“可见性”对于基础设施来说，是其不断维持政治影响甚至是获得权力的必要条件。然而，基础设施也会以不可见的形态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只有当它崩溃或是非正常运作时，才变得可见 (Star, 1999; Graham,

2010)。这两点并非矛盾的论述，而是启发我们进一步发掘在隐形与可见之间，基础设施状态的变化，以及是什么愿景和什么力量推动这样的变化。

接下来三篇文章是个案研究，研究对象分别来自于加纳、印度和南非城市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那些“非正式”的，或者是“非常规”运行的基础设施。Silver(2016)的《瘫痪的基础设施：断电时刻的阿克拉城市政治生态学》讲述了加纳首都电力基础设施是如何脱胎于当地社会和历史结构，并且又如何影响了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的。文章的题目中就出现了“瘫痪”和“断电”的字眼。上一篇 Larkin 的研究便提到了基础设施的可见程度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在基础设施瘫痪的那一刹那它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现，否则将会在后台如基底一般安静运行。因此，基础设施不稳定的、非常规的，甚至是彻底瘫痪和崩溃的状态，往往成为研究者们抽丝剥茧的入口。此外，这篇文章将水电站和城市的电力运行放在了都市政治生态的大框架下探讨，试图通过观察基础设施的建造与运行，探索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纠缠，以及这一过程中的政治性¹。从作者的论述也可以看出，阿克拉的电力中断是在社会治理、温室气体排放、国际资本流动、水资源逐渐匮乏、城市不断扩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 自然”过程。

Anand(2015)的《渗漏的国家》一文，把视角放在了更加微观的层面，通过研究孟买大量自来水设施的渗漏，以及在管理和维护设施过程当中，当地工程师和国际银行顾问之间的微妙关系，揭示了一个围绕自来水而产生的政治形态。文章的前半部分着重分析为什么联合国顾问提出的渗漏测量和系统改造计划无法推进。这一计划试图通过精确的测量，将渗漏的水资源区分为“社会损失”和“物理损失”²。但作者认为，这两种损失之间的差异并非先验的，其界限是模棱两可的，在一定情况下还会相互转化。所以，不论是渗漏的分类，

1 作者在文中用“代谢”一词来描述基础设施所连接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市政治生态研究中，频繁出现的“代谢”与“循环”等术语，并非文学意义上的比喻意义。我们可以借助控制论的视角，看物理的基础设施将人的身体与大规模的技术网络及自然资源相连，进而将都市基础设施看作互相交错链接的生命支持系统，产生“代谢”与“循环”，形成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物 (Gandy, 2002; Swyngedouw, 2006)。

2 可以简单将“社会损失”理解为人为因素导致的水资源流失，比如因水表运行不稳定运行而不能如实计费的情况；将“物理损失”理解为大规模管线无法避免的渗漏。

还是水资源自身的特性，以及孟买数十年来基础设施的建造及运行积淀，都导致了该计划无法推行的结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国际银行顾问及当地水务部门的权威性。作者认为，应当将“漏水”理解为孟买供水系统的境况，而不是将它看作需要被精准监控和严厉杜绝的例外情况。这对新自由主义式政府的精确计算及自上而下的管理手段提出了质疑。

计划中的改造无法实施，那么整个市政供水系统日常又是如何运行和维护的呢？维修管道需要大量的实践知识（*métis*）或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而选择“无知（*ignorance*）”则是这类知识的一种表现。将无知理解为一种知识并不常见，因为通常情况下我们会把它理解成为不愿意知道，或是与知识完全相反的东西。通过对当地工程师的观察和访谈，作者意识到，无知和无视，有时对于维持供水系统的流畅运行更加有效。“无知”像是一种无声的协商，这便与之前的“精确计算并管理一切”的思路有了本质的区别。以“无知”为例的地方性知识，并非某一个机构或某一类专家可以全部掌握。作者希望通过展示这些地方性知识和无知的重要性，反思普世知识的产生方式和国家官僚机构的工作方式，同时也是对机械自然观和极端科学主义的批判。

最后一篇文章是来自 von Schnitzler (2013) 的《技术的旅行》。作者对预付费电表在英国的诞生，以及该设备漂洋过海来到南非后的应用进行了谱系学的探究，进而围绕着这一技术设备在南非电力基础设施中体现的政治性做了深入探讨。随着预付费电表这一技术设备一起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英国“旅行”到后种族隔离的南非的，是包括归属感和公民美德在内的一系列伦理和政治理念。尽管历史时期与政治背景不同，技术本身都被赋予了某种道德观念。这些观念通常不可见，而是通过技术的语言被绘制在管道上，电线中，以及设备的说明书里，在使用当中会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因此，基础设施不仅是政治的象征和权力的导管，基础设施本身已成为政治领域（*terrain*）。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基础设施的政治性，就代表着它具有一定的能力（capacity）来组织一场非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讨论呢？这个能力来源于何处？本文作者 von Schnitzler 认为，预付费电表这一技术设备，出现在自由主义的语境下，在电表及其用户之间重新划分责任与能动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模糊了机械与人之间的界限，这是人类历史在经历现代化的过程中最明显的伦理焦虑之一。在此基础上，作者考察了人们对于安装预付费电表的态度。在接纳、回避甚至抵制的行为背后，是居民、工程师、城市管理者，和电力事务管理者之间的微观政治。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诉求通过技术的语言进行表达和协商，最终以技术设备的重新组装得以呈现。

参考文献

- Anand, N. (2011) 'PRESSURE: The PoliTechnics of water supply in Mumbai', *Cultural Anthropology*, 26(4), pp. 542–64.
- Anand, N. (2015) 'Leaky States : Water Audits , Ignorance , and the Politics of Infrastructure', *Public Culture*, 27(2), pp. 305–330.
- Gandy, M. (2002) *Concrete and Clay: Reworking Nature in New York C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Graham, S. (2010) 'When Infrastructures Fail', in *Disrupted Cities: When Infrastructure Fail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pp. 1–26.
- Green, S., Harvey, P. and Knox, H. (2005) 'Scales of place and networks: An ethnography of the imperative to connect through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Current Anthropology*, 46(5), pp. 805–826.
- Larkin, B. (2013)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Infrastructur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2), pp. 327–43.
- von Schnitzler, A. (2008) 'Citizenship prepaid: Water, calculability, and techno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4(4), pp. 899–917.

- von Schnitzler, A. (2013) 'Traveling technologies: Infrastructure, ethical regimes, and the materiality of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Cultural Anthropology*, 28(4), pp. 670–693.
- Silver, J. (2016) 'Disrupted Infrastructures: An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of Interrupted Electricity in Acc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39(5), pp. 984–1003.
- Star, S. L.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 p. 377.
- Swyngedouw, E. (2006) 'Circulations and metabolisms : (Hybrid) Natures and (Cyborg) cities', *Science as Culture*, 15(2), pp. 105–121.



基础设施的政治与诗学

布莱恩·拉金*

许多**译 刘杰尘***校

导言

基础设施是一些促进商品、人员和思想流通的，让它们跨越空间进行交换的，建造成形的网络。它的物理形态塑造了网络的性质，包括网络运动的速度和方向，它的时间性，以及它易崩溃的弱点。基础设施构成了流通的体系结构，提供了现代社会的基石，还创造了日常生活的氛围和环境。一直以来，人类学都很少论及基础设施，但是近十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取向，开始把基础设施当做核心问题。我将在本文评估一下对基础设施的分析可以为人类学提供哪些帮助，以及人类学如何增益对基础设施的研究。

多年来，尽管人类学一直在比喻的层面探索基础设施，例如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关系的分析角度，索绪尔对语言/言语之区别的界定角度，乃至任何构成现象世界之基础的系统（如文化、知识型和社会结构）角度，人类学仍然很难对技术系统本身展开民族志研究。人类学也许更愿意考察公路对秘鲁（Harvey 2012）或尼日利亚（Masquelier 2002）的某片区域造成的影响，而不会将道路建设作为网络来分析。¹ 在

* 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哥伦比亚大学伯纳德学院。

** 许多，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 刘杰尘，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1 尽管直到最近，人类学才开始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概念来分析（Anand 2011, 2012; Appel 2012a,b; Carse 2012; Chalfin 2010; Collier 2011; Collier & Lakoff 2008; Dalakoglou & Harvey 2012; Elyachar 2010, 2011; Harvey 2012; Harvey & Knox 2012; Humphrey 2005; Mains 2012; Pedersen 2011; Sneath 2009; Sneath et al. 2009; Von Schnitzler 2008; Winther 2008），然而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对于具体技术进行分析的文献。这些技术包括水坝（Campregher 2010, Ghosh 2008, Mains 2012），汽车（Chalfin 2008, Sanders 2008, Verrips & Meyer 2001），研究公路的文献都非常优秀（Dalakoglou 2010, 2012; Dalakoglou & Harvey 2012; Harvey 2010; Harvey & Knox 2012; Kernaghan 2012; Khan 2006; Knox & Harvey 2011; Mains 2012; Manning 2012; Masquelier 1992, 2002, 2008; Morris 2010; Roseman 1996）。研究成果参见近期出版的关于基础设施项目的著作（Bear 2007, Limbert 2010, Winther 2008）。

这个意义上做系统分析，就需要调整民族志调查的工具和方法，需要调查的场所不是实际建造公路的地方，而是与之相距遥远的政府核心部门，还需要把政客、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工程师、修路工人乃至使用公路的普通人都纳入调查范围。但是正如拉图尔（Latour 1993）早就说过的，这种方法对人类学来说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因为它突出了基础设施所涉及的其他领域。它为理解基础设施的崩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导致崩溃的生活形式提供了空间（Kockelman 2010, Larkin 2008）。显然人类学应该掌握系统思维，以此建立对基础设施的民族志研究。我会在这个方向上评述一些优秀成果（Appel 2012b, Anand 2011, Bear 2007, Collier 2011, Von Schnizler 2008）。同时，人类学还应该持续关注基础设施的偶然性，即各种形式的基础设施能帮助我们洞察包括政府治理、宗教活动和社会关系在内的其他领域。

也许在当下人类学对基础设施的研究中，最有活力的方法都采用了技术政治学（technopolitics）的概念。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自由主义否认政府形式，反而通过一些看起来与正式的政治机构相去甚远的技术领域的手段来管理人口和领土（Barry 2001; Joyce 2003; Mitchell 2002,2011）。商品自由流通是自由放任经济的基础，但这甚至也要依靠基础设施来组织市场和社会。研究者试图利用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来追溯技术在物质层面的运作，以及物质性给政治进程造成的影响（Bennett 2010, Callon 1998, Latour 2007, Mitchell 2011）。从这个视角看基础设施会非常有趣，因为它们能够揭示潜藏在技术项目下的政治理性，以及政治理性带来的“治理术的装置”（Foucault 2010,p.70）。

然而，在具有纯粹的技术运作功能之外，基础设施还是实实在在的符号和美学载体，具有传达意义的功能。基础设施从各种欲望和幻想中创生，并保存了欲望和幻想，有时候以类似拜物教的方式，从它们的技术功能中完全独立出来了。关注形式的问题（issue of form）或者说基础设施的诗学，

使我们理解政治性如何通过不同手段构成。它指向了欲望和可能性，本雅明（Benjamin 1999）称之为社会的集体幻想（De Boeck 2011, Humphrey 2005, Khan 2006, Larkin 2008, Mrazek 2002, Sneath et al.2009）。它也意味着认识基础设施的形式维度，理解它们是什么样的符号对象，弄清它们如何表达和构成主体，以及它们的技术操作。

基础设施的本体论

基础设施是能够驱动其他物质运动的物质。基础设施本体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既是事物，又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基础设施作为事物为人所见，然而，它们又常常因为人们关注运行其上的事物而被无视其本身。我们常常能看到电脑，而不见电缆；感觉到电灯，而意识不到电力；打开水龙头用自来水，却看不到水管和下水道。基础设施属于技术性实体，需要被放在漫长的技术理论传统中加以考察（Giedion 1969, Heidegger 1977, Marx 1990, Mumford 2010, Simondon 1980 [1958], Stiegler 1998）。然而，此基础设施的双重特性（duality）表明，基础设施的运行是系统性的，不能孤立考察单个实体。基础设施与技术的区别在于，它们既是实体，也为其他实体创造了运行的基础，因此基础设施是作为系统在运行。

或许正因为基础设施有上述双重特性，所以难以在概念上界定。一种主流观点把基础设施看做“基底系统”（system of substrates），构成了现象世界的基底，典型的基底包括管道、电缆、下水道和电线。这类看法预设了基础系统（underlying system）和现象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清晰、线性的，而两者关系往往更复杂，更难界定。以我写这篇论文所使用的电脑为例。电脑的基础设施包括哪些？最显而易见的基底就是电力，没有电，电脑就无法运转。但是正如爱德华（Edward 1998）所说，虽然电力是电脑的基础设施，但是电脑也是供电系统的基础设施，因为电力输送全靠电脑调节。

反过来，电力还需要其他基础设施支持，比如发电站需要石油，金融解除管制后，新的金融机制使得电力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生产和传输电力必需招募和雇佣劳动力的网络。

因此我们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可能集中关注建造成形的物体、知识或人。我们不妨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把单个系统中各类不同的要素合在一起分析，但问题关键还是哪些要素组成了系统，哪些要素被排除了。毕竟电力只是潜藏在电脑下的诸多基础设施之一，其他还有接受和发送信息的远程处理系统（Graham & Marvin 1996）、规定电脑操作方法的软件协议（Chun 2008, Galloway 2006）、理解电脑原理和操作方法所必需的培训和文化素养。所有这些基底都是电脑顺利运行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可见实体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线性的关系，而是实体下面有基底，基底下面还有别的基底，基底之间还是分散的。由于越来越多的网络可以用来理解基础设施，我们明白了，讨论基础设施就意味着分类。分类就意味着穿透异质性的网络，区分网络中哪些部分需要考察，哪些部分要被忽略。基础设施在不同层面同时运作，产生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任何对基础设施的学术研究都要先确定自己考察的是哪个层面。基础设施并不是在实证主义意义上就“在那里”（out there）的。界定基础设施就是一个进行划分的时刻。进一步思考，分类就是一种文化分析，当我们把某些东西当作基础设施（有因果关系），忽略另一些东西时，选择行为就具有很强的认识论意义和政治效果。

系统思维和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

一段时间以来，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地理学家都已经在分析基础设施如何协调远距离交换，如何让不同的人、物品和空间互动起来，如何为现代经济和社会制度奠定运作基础（Graham & Marvin 1996, 2001; Lefebvre

1991)。斯蒂夫·格拉汉姆和西蒙·马尔文 (Graham & Marvin 1996) 的一系列著述颇有影响力, 考察了新的通讯系统如何重新配置都市空间, 基础设施如何把水、能源、人力和街道联系在一起, 连成基础设施网, 形成现代生活的根基 (2001)。这里重点是托马斯·P·休斯 (Hughes 1987.1993) 所说的大规模技术系统, 即巨型的基础设施网, 起到了组织日常生活的作用。休斯 (1987, 1993) 及其追随者 (Bijker 1997; Bijker et al. 1987; Bowker & Star 2000; Edwards 1997, 2003; Edwards et al. 2009; Hecht 2011; Jackson et al. 2007; Star & Ruhleder 1996; Yates 1993) 认为, 典型的基础设施发端于一系列小型的、独立的技术, 各自的技术标准差别很大。当其中一种技术系统成为主导, 压倒了其他系统, 或者各自独立的系统聚合成一个网络之时, 基础设施就诞生了。休斯认为应该从系统的角度思考基础设施, 技术的本体论是由物体内在的元素组成的, 但同时, 技术却是作为系统的一部分才存在的。比如爱迪生发明电灯的同时, 还发明了爱迪生大型发电机和爱迪生主馈线。这几项发明激发了金融工具的出现和管理结构的革新, 以便与快速扩张的集团公司相适应。与一些技术理论的说法不同, 在这个意义上, 电灯并不是从技术内在的元素中逐步衍生出来的, 就是说, 并不是玻璃、灯丝和抽真空的简单组装。相反, 电灯是一种基础设施, 是技术、行政和金融手段的融合体。

从上述案例中可以生发出两个重要洞见, 都对人类学至关重要。第一, 应该把系统放在分析的核心, 这可以帮助我们破除对技术的执念, 带来更全面、更综合的视角, 把所有跟技术无关的要素都纳入对机器的理解中。休斯认为, 控股公司或会计事务也属于技术发明, 跟发电机或电话一样, 所有这一切都对建造基础设施网不可或缺。第二, 应该关注系统的建构过程。一项技术系统发源于一个特定地点, 在发展过程中与当地特殊的生态、法律、政治和工业技术产生关系。然而一旦一项技术系统发展成基础设施网, 就一定会转移到其他地方, 遭遇不同的状况、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

需要对技术进行调试和翻译。这种对基础设施的理解，要点在于把技术系统变成一般的流程，并不断扩展，同时就需要对各个环节进行翻译（既发生在技术层面，也存在于管理和金融层面），翻译是系统构建的内在过程。完全可以想见，受休斯启发的研究者（Bowker & Star 2000, Edwards et al. 2009）特别倚重“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把研究重点放在追溯各种异质网络间的联系（Latour 1996, 2007），认为必须描绘翻译过程是如何发生的（Callon 1986, 1998; Latour 1993）。这条思路对于最近的人类学研究非常有成效（Appel 2012a,b; Anand 2011, 2012; Carse 2012; Collier 2011; Collier & Lakoff 2008; Von Schnitzler 2008），从最近对孟买（Anand 2011, 2012）和索韦托（Von Schnitzler 2008）供水系统的两项出色研究可以看出。

尼基尔·阿南德（Anand）的民族志研究聚焦供水的技术运作，把工程师、政治操盘手、贫民窟居民、政客、社会活动分子和官员聚拢在同一个系统中展开研究（参见 Gandy 2008, Graham et al. 2013）。孟买的人口密度很大，导致水资源稀缺，供水时断时续。市政工程从技术角度解释这一缺陷（贫民窟坐落在山顶，需要很高的水压才能将水运往目的地），贫民窟居民却把供水看作政治动员的问题。缺水的贫民窟雇佣了长者（dadas），他们有权有势，给贫民窟提供庇护，利用人脉，给民选官员施压，迫使官员为贫民窟提供基础设施。反过来，长者利用贫民窟的选票，在下一场选举中回报帮忙办事的官员。

阿南德的研究发现，两种根本的基础设施系统在相互作用：第一种是水资源的输送，包括管网系统、工程师和官僚组织，这些组成了供水系统的技术端（如休斯等研究者所说的大规模系统）；第二种是社会关系网，庇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forms of patron-clientship），以及“应酬劳动”（phatic labor）（Elyachar 2010），这些与水泵和管道一样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基础设施是一种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Hansen & Verkaik

2009, Simmel 1972, Simone 2001)。阿南德(2011)把两种对基础设施的不同理解结合起来,最终目的不是分析供水,而是揭示他所谓“水力公民(hydraulic citizenship)的塑造过程,城市供水基础设施创造了社会和物质条件,让人产生对城市的归属感”(p.545)。

安缇娜·冯·施尼茨勒(Von Schnitzler)的观点与阿南德的类似,南非在废除种族隔离后,她可以通过供水系统管窥更广泛的公民权逻辑。但是她的方法与阿南德的不同,她聚焦一项特定的技术,即水表。水表是一种技术设备,可以监控用水量,解决乡镇地区浪费水的弊病。冯·施尼茨勒追溯了水表的技术史,水表起源于英国,但是南非引进水表的目的是不仅是规划用水量,而且要创造一种新型的公民。这种公民有责任心,会自己监督自己的行为,会权衡算计自己的行为。冯·施尼茨勒采用了生命政治学的视角,认为水表不仅调控供水;还揭示了政府的治理策略,最终要产生一种伦理。市政官员“操弄一套道德训诫的话术”(Von Schnitzler 2008, p. 906),旨在改变乡镇居民浪费水的习惯,创造出“会计算的主体”,懂得刷牙时关掉水龙头,或者利用洗澡水冲厕所(参见Fennell 2011)。冯·施尼茨勒认为,水表不仅标示用水量,而且示范合乎道德的行为。阿南德和冯·施尼茨勒的研究都证明了,虽然表面上看技术运作是中性的,但是为特定类型的公民概念创造了基础,技术系统与其他宗教和政治领域纠缠在一起。

斯蒂芬·J·科利尔(Collier 2011)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完全围绕生命政治的问题展开(Foucault 2010, 2011)。在科利尔看来,政治理性、行政管理手段和物质系统混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基础设施。科利尔的兴趣不在基础设施本身,而在于通过基础设施了解政府治理的实践。从这个视角出发观察苏联的供电系统,就不应该关注电力供应对用户的影响,而应该把供电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总体规划的一部分。苏联的电力供应与西方国家不同,不是由居民用电需求决定的,而是技术专家在总体电力规划下,

事先安排好某个地区的供电量。苏联解体后的转轨致力于铲除计划式的治理思路，要求重新想象社会，即社会是由个体消费者以及他们的需求组织起来的，而不是遵循一定单位分配固定供电量的集体组织原则。

科利尔再把分析视角向上延伸，不再关注基础设施的社会效果，转而关注概念的生成过程，概念在系统本身建成之前就出现了，并被贯彻到系统中。他对基础设施终极兴趣是，基础设施可以帮助他考察，在苏联解体后的改革时期，美国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俄罗斯引进、传播和运行的过程。基础设施就成为了这一转折的物质见证。科利尔对基础设施做的民族志研究，把经济理论也当做调研的物质对象，跟管道和社会关系同等对待。科利尔的民族志创造了不同的基础设施实体，例如预算是正式的、理性化的制度，与技术系统硬邦邦的物质属性一样重要。科利尔认为，两者都可以帮他看清生命政治的理性和变化。

基础设施之不能承受的现代性

基础设施在概念上的根源来自启蒙时代的思想，即世界是不断运动的、不断变化的，物品、思想和人力的自由流通会促进世界的进步（Mattelart 1996, 2000）。这种思维模式就能解释，为什么提供基础设施与塑造现代社会、实现人类未来之类的情感紧密结合。格拉汉姆和马尔文（1996）说，基础设施是“控制时间的机制”，“推动社会进步的浪潮”（p. 42; Edwards 2003），拥有电力、铁路和自来水，就是对文明本身的一种证明。在这个意义上，基础设施很难与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划清界限，进步正是让基础设施显得有魅力的原因。马克思（1990）认为，基础设施技术不仅是物质的东西，而且推动了历史本身的演进，因为工业是一种机器的系统，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扫除“继承的邪恶”（*inherited evils*）和“被动的幸存者”（*passive survivals*）（p. 91）。市场经济的组织和进步的概念是自

由主义的核心，而基础设施对两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Foucault 2010）。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如此美丽，如此动人，以至于弗洛伊德（1989）会说，它表现了人类掌控自然的根本欲望。

人类每使用一种工具，他的运动器官或感觉器官就得到改进，或者说，这些器官功能上的限制就得到了消除。马达动力使人拥有可供支配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就如同肌肉一样，人们可以随时使用；由于有了船和飞机，无论是水还是空气都不能阻碍人的运动；通过眼镜，人纠正了自己眼球的缺陷；通过望远镜，人能看到遥远的地方……在电话的帮助下，人们可以听到远方的人说话，而即使在童话中，这种事也被认为是不可实现的……实际上，人类已经变成了一个装着假肢的上帝。当他配备所有辅助器官时，的确气势宏伟。²

弗洛伊德展望的前景令人向往，导致我们对基础设施的分析，很难与历史的积淀和人们的信仰分开。人们坚信，基础设施会促进流通，并带来变化；通过变化，会推动进步；随着不断进步，人们终将获得自由。这种对未来的想象或许能解释，基础设施作为实体，怎么能激起人们如此强烈的感情和执念，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虽然这种现象不是发展中国家独有的。捷克历史学家米拉泽克（Mrázek 2002）将此类对基础设施的体验称为“想象力的热情”（p. 166），即认为基础设施等技术设施会刺激对进步的想象。公路的技术功能即是把车辆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促进物品的运动，实现启蒙主义对社会经济的设想，即物品应该在空间中无障碍地流通。但是公路除了本身的技术功能，还会制造过剩的幻想，创造欲望和敬畏。很多基础设施工程都由城市或国家出资建设，复制其他地方已有的基础设施，套用代表着现代的视觉范式和观念类型，表示与其他地方处于同一个现代性中。米特里斯·达拉寇格罗（Dalakoglou 2010）称

2 译文引自《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之为基础设施拜物教。他说在阿尔巴尼亚，虽然社会主义政府极力限制私家车，但即使公路上没有汽车行驶，政府仍然修建了几英里公路。莫顿·阿克塞尔·佩德森（Pedersen 2011）的观点与这相似，俄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前提，是物质丰裕和意识形态进步的保障。“单从经济收益的标准衡量，基础设施投资并不划算；相反‘建造微型都市’相当于塑造新人、新人类和新宇宙。（p.45）”烂尾的基础设施项目只剩下废墟，见证了后殖民国家的一种感觉结构，即后殖民国家对技术的投资充满了想象性的元素。

公路和铁路不仅是技术性实体，而且在幻想和欲望的层面运转。公路和铁路负载着个人和社会的梦想，有了道路，幻想才有驰骋的空间，情感才会显得真实。本雅明的观点类似，伴随铁路长大的人，完全无法分析事物本身，而一定会遭遇自身的过去、欲望和幻想，这些因素像过滤器一样横亘在它们与具体事物之间。本雅明认为，商品、建筑和街道蕴含了历史运动：就是客观历史动力的化身，却同时进入人们的无意识，掌控着人们的想象力。商品、建筑和街道把人们塑造成主体，这个过程不仅发生在技术政治的层面，而且通过调动感情，激发欲望、自豪和沮丧来实现，这些感觉都极富政治含义。

这种运作模式是基础设施的政治含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发生在个人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层面。技术代表了走向现代以及拥有未来的可能，不掌握技术，就不能走向现代，就没有未来，会造成悲惨的后果（Archambault 2012, Ferguson 1999）。约书亚·巴克（Barker 2005）的研究强有力地体现了这一点。他分析印度尼西亚参与建造帕拉帕卫星（Palapa）的工程师们，帕拉帕是发展中国家发射成功的最早一批卫星之一。巴克观察到，这批新锐工程师都毕业于万隆理工学院，为了一个共同的使命，“齐心协力，团结一心”。“同学之间不存在竞争，因为当年我们一心想着研发卫星（p.712）。”杰拉德·隆巴迪（Lombardi 1999）采访巴西第一批通讯工程师时也发现

了类似的情况。这批工程师“用非常虔诚的口吻讲述自己的故事，毫不利己，全心奉献，与同志们一起奋斗，让巴西的通信事业位列世界先进水平”（p.21）。笔者研究尼日利亚的媒体系统发展史后也发现，对早年民族主义元老一代来说，现代化代表了与当下截然不同的时代，这批专家觉得自己从事的领域就是工业前沿，业务能力也处在职业生涯巅峰，因此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迈向未来。他们从奋斗中体会到了深深的满足，所以当回忆参与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的岁月，都满怀深情。³

尽管国家可以利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向公民彰显国家权力（Chalfin 2001, 2008, 2010; Harvey 2012; Limbert 2010; Mains 2012），但是基础设施项目的政治效果并不简单地体现在事物的表面。基础设施项目激发的情感非常复杂，有时候人们的回应看起来有悖直觉，但是情感又异常显豁，即使转瞬即逝。纳薇妲·卡恩（Khan 2006）讨论了巴基斯坦第一条多车道付费高速公路的修建过程，这条公路直抵首都伊斯兰堡，在巴基斯坦人心中激起了一种分裂的感觉。卡恩认为，“高速公路和巴基斯坦之间不协调”，因为高速公路太笔直，太平滑，以至于“高速公路的现代化程度远超巴基斯坦这个国家（Khan 2006, p. 88）。”高速公路体现的这个状况非常复杂，既代表了现代化的成功，同时也预示了失败。⁴ 菲利普·德·波克（De Boeck 2011）叙述了一个不同的情景，但同样复杂。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城市居民区被拆除，就为了腾出地盘，建造高级小区。德·波克（2011）认为，国家向贫民窟居民“发动了一场战争”（p.272），将他们的房子暴力拆除，称得上国家向最无助的公民施暴的典型案列。德·

3 艺术家 Joana Hadjithomas 和 Khalil Joreige 合作完成了名叫黎巴嫩火箭社会的作品，是另一个极好的案例。这件作品创作于 1960 年代，当时正值美国阿波罗登月和苏联第一艘航空飞船，黎巴嫩也努力研发自己的火箭（参见 Hadjithomas & Joreige 2013）。Hadjithomas 和 Joreige 认为，这是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充满幻想的努力，但是投入的科研努力值得严肃对待的（参见 Redfield 2000 for a related project）。Redfield 认为，模仿别国科技项目的欲望，显示自己国家也走在现代化的前沿，是所有太空项目的共性。只有程度区别，一个国家要么觉得已经“位居前列”，要么还在“超英赶美”（P. Redfield, 私下交流）。

4 林波特（Limbert 2010）也讨论了现代基础设施造成的动荡和不协调。她认为，石油大资本创造的基础设施导致了一种特别的时代感受，即在石油枯竭前，现代化必须完成。

波克同时发现，很多被驱逐的贫民窟居民很乐意拆迁到其他地方，对此感到很自豪，尽管他们自己正是政府眼中脏乱差的化身，正是要被清除的对象。一位渔民对德·波克说：“对啊，我们的确受损了，但新房子会很漂亮的（p.278）”。这个状况值得我们细思，渔民的说法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成立，一般的说法是现代化的同时会创造一批受害者，渔民的说法却与这一普遍看法背道而驰。民族志研究正可以生动再现欲望、幻想和自豪如何复杂地搅合在一起（另见 Humphrey 2005, Sneath et al. 2009）。这些状况迫使我们关注人们与基础设施之间深深的感情纽带，基础设施引发人们的惊奇和迷恋，而这正是基础设施产生政治效果的重要方面。

基础设施的双重效果（doubling）和表达的美学

对非洲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已经细致分析过双重效果产生的过程，揭示了系统和实践如何与其宣称的目标不吻合。阿希尔·姆边贝（Mbembe 2001）认为，许多非洲国家在军事统治下，发展出一种私人化的间接治理风格，政府实际做的却远远超出间接治理的范围。国家正式的治理技术不断扩张，例如预算、项目合同、公务员招聘和证书体系等，人们也明白这些东西和现实完全没有关系，所谓的间接治理就这么运转着（见 Hull 2012 on documents）。国家还声称建造了不少项目，如公路、工厂和桥梁，这些项目自称发挥着技术性的功能，然而实际上在完全不同的层面同时运行着。姆边贝指出，有利可图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起到的技术层面的作用，还远远赶不上帮助承包商拿到政府合同来盈利，以及让有势力的人脉网络吃回扣。所以公路莫名消失，工厂建成了却从不开工，桥梁搭成了却不知通向何方，都不难理解了。

雅各布森（Jakobson）认为，任何言语行为都有六种功能，诗学功能是其中之一（还有情感功能、指示功能、寒暄功能等）。诗学区别于其他

功能的要点在于，言语行为是围绕能指的物质性质组织起来的，而不指示别的含义。当“符号的可触可感”成为特定言语行为“主导的、决定性的功能”时，诗就诞生了（Jakobson 1985）。⁵ 因此诗学就是将言语行为内的功能进行重新排序，重新决定什么功能是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同时在多个层面运作，但是言语行为的诗学功能具有不同的意义，与指示功能和情感功能都不同。

在基础设施这个领域，诗学模式意味着，形式从技术功能中脱离出来了。国家把基础设施作为表征塞给公众，要求公众把这些表征当做社会事实接受。国家的所作所为创造了一种“貌似”（as if）的政治（Wedeen 1999; 另见 Apter 2005）。预算必须貌似自己在反映现实，发布预算、审核预算产生的文件堆必须貌似真的在起作用一样。预算以诗学模式在运作，变成了“肆意妄为的符号行为”（Mbembe & Roitman 1995, p. 337），同时也是一种政府的治理技术。这种现象任何地方都存在，只不过在非洲很多地区尤其严重，相当多非洲人都相信，政府发布的各种统计数据（人口，国内生产总值等）与现实状态相去甚远，政府的统计工作执行地随心所欲。姆边贝观察到，政府公示中的职位信息与该职位实际拥有的权力不是一回事，设置一些岗位的原因很多，但跟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资质无关，政府也在发布预算，但是执行过程跟预算没有任何关系。

在这些情况下，国家权力既在场，又不在场。苔丝·李和保罗·彭勒若斯（Lea and Pholeros）2010年的论文《当水管不是水管》，通过讨论为原住民修建住房（aboriginal housing），正好展现了这个过程。这些房子看起来像住宅，实际上不能住人。房屋里的水管并没有连接下水道，室内房间也尚未竣工，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组合骗局”（p.191）制造出来的“美学秩序”。水管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水管本身了，而是一种表

5 雅各布森（1985）用诗歌的韵律作为例子。雅各布森认为，当某个词语入诗是由于它的音律，这个词语与其他词语在声音上的协调（它听起来怎样），就比它的指示功能（它是什么意思）更重要。因此诗关注能指本身的物质性。

征形式，在不断生产着，有了水管，报告就有了填充的内容，预算表格就有了开销项目，投资人的怒火就能被平息下去。水管并没有连接到排水系统，而连接到监管、审计和行政管理等一整套治理技术中。水管的物质形式不再是空心管道，而转移到了预算表格上的数字，报告书上的一字一句。空心管道、数字、白纸黑字，所有这些形式都属于水管，都是水管的物质化身，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游走在系统中的各个环节。水管最后成了一堆堆文牍。

近来对苏联统治模式的研究发现，苏联的治理正好既有美学功能，又有政治功能，苏联通过表达的模式（modes of address）塑造公民（Groys 2011）。艺术史家弗拉基米尔·托多罗夫（Vladimir Todorov 1994；另见Humphrey 2005）认为：“共产主义最终创造出来的美学结构卓有成效，经济结构却周转不灵。”他揭示苏联的现实，苏联工厂生产物品的产能不足，但是创造了主体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特殊关系，有效地把管理结构组织起来，支持着国家权力，通过工厂的存在本身，向人们展示国家权力。苏联在后面这些方面都颇为成功。托多罗夫（1994）认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建设工厂不是为了生产商品，而是为了生产符号意义……以至于产品严重不足，但是创造出来的符号意义大大过剩”（p.10）。

托多罗夫抓住了有待阐释的关键问题。基础设施在多个层面同时运行。基础设施发挥着技术性的功能（比如输送人力、货物、水、电力），促进跨地域的交流，把人和物品联结到复杂的、多种多样的系统中，另外还以数字和文字的形式留存下来，完全独立于它的技术功能。利用雅各布森的视角，将基础设施的运作看做一种诗学形式，就要重新划定基础设施不同功能之间的重要程度，所以基础设施的美学维度才是占主导地位的（而不是技术功能）。

很多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出发点往往是基础设施是不可见的，直到它崩溃的时候才为人所见。这个前提根本上说是不准确的。基础设施作为元

语用实体 (Metapragmatic objects)，自身的符号在特定流通领域中建立并产生各种效果。几乎所有对基础设施的研究都在复述苏珊·利·斯塔尔 (Star 1999) 的论断，这个现象如此普遍，似乎有某种强力推动人们这么想，即认为基础设施理所当然“从本质上看就是不可见的”，只有“崩溃时才会现身” (p.380; see also Collier 2011, Elyachar 2010, Graham & Marvin 2001, Larkin 2008)。然而这个论断只说对了一部分，而且如果把基础设施看做一个整体，这个论断就更站不住脚了。不可见当然是基础设施的一个方面，但还有别的方面。不可见只是基础设施的一个极端现象，基础设施在可见性方面的范围很广，有完全不可见的，也有宏伟的奇观，以及不可见和奇观之间的所有程度。

人类学研究成果揭示了，基础设施可以呈现出的形态差异极大，唯独不会是不可见的。大卫·斯尼思 (Sneath 2009) 观察到，在蒙古，电力是代表国家现代化的标志性符号，所以被称为“列宁之光”。斯尼思的观点与阿南德的观点区别不大。孟买一位贫民窟社会活动家向阿南德讲述当地贫民窟供水系统的历史，与强势的技术知识大相径庭；实际上，两组政治势力给贫民窟提供了两套供水管道，因此水管（和管道的规格）也被分别冠以政治势力的名头（国大党直径两英寸的水管，湿婆军⁶直径九英寸的水管）。无论是为了庇护人系统能够发挥作用，还是为了让列宁期望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取得成效，基础设施都需要被人看见，才能不断产生政治效应。塔尼亚·温特 (Winther 2008) 指出，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岛 (Zanzibari) 的农民拥有一套高度复杂的知识，对每台家用电器的用电量了如指掌。冯·施尼茨勒援引索韦托市政工程师的话说，当地居民都算得上技术专家，因为他们有本事将水表拆卸、重新组装，毁掉。技术知识之深奥，之精密，已经广为人知，因此这些技术绝不可能隐没到背景中去；正如阿什利·卡尔斯 (Carse 2012) 发现的，一切基础设施都有自己可见的部分，对于一

6 ShivSena, 印度民族主义政党——译者注。

个人是背景的东西，正是其他人日常接触到的实体。重点不在于指明基础设施的内在状况或这或那的属性，而在于探究可见或不可见是怎么形成的。流俗的看法认为基础设施是不可见的，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巴克(2005)描述过苏哈托主持的帕拉帕卫星发射典礼，基础设施之巨大，让人无法避开视线，最强有力的例子莫过于此。苏哈托手持一把克丽丝匕首(kris)，爪哇国王曾在仪式上使用这把匕首，作为自己统治权力的象征。匕首镶嵌着17颗珠宝(17代表印度尼西亚的独立日)，发射卫星的按钮就嵌在其中一颗宝石上。巴克(2005)认为，苏哈托“把卫星当做现代的克丽丝匕首……群岛在他的统治下，统一成一个国家”(p.706)。我们很难找到更生动，更有象征意义的基础设施了。

基础设施的物质材料和环境体验的生产

另一个看上去相反的审美维度，对于思考基础设施非常有助益，借鉴了古老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概念 aisthesis (感性) (Buck-Morss 1992, Meyer 2009, Verrips 2006)。aisthesis 不是指从精神上鉴赏艺术作品，而是指对活生生的现实的身体反应；巴克莫斯(Buck-Morss 1992, p.6)认为：

“Aisthesis 是一种知觉的形式，包括味觉、触觉、听觉、视觉和嗅觉。”在这个意义上，审美不是一种再现，而是具体的体验。基础设施创造着日常生活的环境，控制着我们的具体感觉：对温度、速度、花开花落的感觉，以及与这些感觉相关而产生的理念。基础设施创造了一种对现代性的感知 (Mrázek 2002)，身体和心灵一道，通过这个感知过程，理解了什么东西代表现代、变动和进步。

米拉泽克 (Mrázek 2002) 讨论荷兰殖民时期的印度尼西亚，发现基础设施不仅是技术性的实体，而且是一种需要学习掌握的语言，基础设施的物质材料似乎诉说着欲望和未来的无限可能。米拉泽克大体上赞同安德鲁·

巴里 (Barry 2001) 的观点, 技术社会培养民众的技能和知识, 正是其作为现代世界运转的条件。⁷ 但是米拉泽克 (2002) 的分析术语完全来自美学, 他关注基础设施的物质材料如何制造感官体验和政治含义, 如公路路面之坚硬、颜色之黑、表面之平滑。他认为, “公路的平滑洁净代表了时代的纯净, 甚至代表了民主” (p.8)。在殖民时期的印度尼西亚, 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用坚硬的路面覆盖住肮脏、泥泞、松软的老路, 修建铁路用的是钢铁材料, 建造公路用柏油和碎石。这些材料的物质属性之新颖, 之特别, 令人惊叹, 它们有自身的产生事故的模式, 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关系。其他人必需学习基础设施这门语言。

米拉泽克的分析核心是基础设施的物质材料。洁净的公路象征着荷兰特色, 但是始终有可能被尘土玷污。马粪和牛粪掉在马路上, 被烈日烤干, 当地行人脚上粘着泥巴, 行走时把泥巴粘在公路上, 使坚实的路面变软, 这些现象使洁净灰飞烟灭。荷兰人面临更多复杂问题, 上述现象只是其中之一: 印尼所有东西都是软软的, 甚至空气仿佛都能挤出水。热带降雨浸湿、软化、腐蚀着公路。“无论当地人走到哪里, 尤其当他们胆敢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时, 荷兰人都觉得他们身上沾满了软黏黏的东西, 舌头上、脚上、车轮上尽是” (Mrazek 2002, p. 27)。

基础设施在身体表面运转, 如皮肤、鼻子、眼睛和耳朵, 而不是在心灵深处 (Buck-Morss 1992)。柔软、坚硬、城市的喧哗、城市的光亮、人们对冷热的感觉, 所有这些感官体验都受基础设施的调控, 而且与概念有远为复杂的纠缠。

刘易斯·芒福德 (Mumford 2010) 将历史划分成不同的技术时代, 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占主导地位的标志性技术。工业时代的标志是钢铁。

⁷ 基础设施是一种语言, 或者是一套更普遍的文化能力, 是可以学习的, 不少著作都考察过这种观念 (Harvey 2010, Khan 2006, Lea & Pholerus 2010, von Schnitzler 2008, Winther 2008)。通常这种观念关注那些失败的人们, 没有“学会这门语言”, 以至于没有进入现代生活 (Lea & Pholerus 2010), 政府官僚和工程技术人员谴责人们, 嫌弃人们不知道怎么操作他们引进的技术。与巴里的观点相似, 技术性包括能力和性情, 远远不止是技术本身。

钢铁淘汰了木材，连同有机乡村生活的一切残余都被扫除了。钢铁是第一代人造建筑材料。“人们在钢铁制造的床上睡觉，在钢铁做的脸盆里洗脸；坐在钢铁制造的火车车厢里，通往城市的铁轨是用钢铁制造的，途经的桥梁是钢铁造的，旅途终点火车站也是钢铁建筑”（Mumford 2010, p. 164）。钢铁有着特殊的材料属性。石头能够抗压，可以被码成排，制造出封闭空间；钢铁可以被拉伸和塑形，承重量惊人，可以制造出高耸的开放空间（Giedion 1995）。钢铁制成的纤细立柱，可以建造开阔的新空间，用来展示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巨大的人流量，由此出现了新的资本空间：火车站、百货商场和会展中心（Giedion 1995, Benjamin 1999）。生产钢铁的工业体系，钢材创造的美学空间，以及消费主义带来的新型展示模式，三者关系密切。人们穿行在火车站，或乘坐百货商场的自动扶梯，都是在被工业主义完全掌控和塑造的空间中移动（Benjamin 1999, Giedion 1995, Marx 1990）。

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Schivelbusch 1995）指出，白炽灯取代明火的过程，相当于用坚硬的、没有实体的稳定光源淘汰闪烁的、变幻不定的动态光源。他认为，这个转变在日常感知世界产生了细微却彻底的变化。克里斯·奥托（Otto 2008）记述了1869年伦敦第一条柏油马路的铺设过程，以及公众的反应，呼应了希弗尔布施描述的情感变化。当时的伦敦人觉得，车辆在柏油路上行驶却不发出声音，特别怪异，似乎城市被隔音了，再也听不到钢铁马车的车轮在鹅卵石地面嘎嘎作响的声音。混凝土也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建筑材料，其特殊的触感质地塑造了生活环境。佩妮·哈维（Harvey 2010）研究了秘鲁的公路建设，发现安第斯地区对脱水和生命力有自己的理解，与混凝土的材料特性相冲突。混凝土之所以特别，在于它的形状是可变的，但是一旦风干变硬，就不能还原了（Taussig 2004），在安第斯地区，干燥技术（制造木乃伊）是储存死者生命活力的核心（Harvey 2010, p. 38）。哈维认为，混凝土的硬度问题挑战了安第斯人根本的宇宙观，

挑战了石头、泥土、岩石和山脉在宇宙中的确定性。

建材代表了一个时代，如钢铁、水泥、混凝土、光缆、塑料，钢铁最能代表十九世纪。建材还产生了对存在的感官体验。基础设施物质材料的美学维度就在于此。朗西埃（Ranciere 2006, 2009）认为，美学是艺术的一种属性，艺术具有重新配置共有领域的可观潜力，新的声音可以通过艺术表达闯进政治空间。然而早在近一个世纪前，吉迪翁（Giedion 1995）就认为，艺术没有朗西埃所说的潜力，在下面支撑着艺术的基础设施才拥有这个潜力。在吉迪翁看来，钢铁和混凝土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一场建材革命，意味着钢铁“突破”（breaks through）了建筑。基础设施建材及其代表的生产力，超越了建筑，揭示出建筑的基础在于自然，揭示了事物的本相，塑造了新的现代主体。“十九世纪的建筑工程扮演着潜意识的角色。表面上看，建筑工程还沉醉在古老的悲情中：往下面看，我们现实存在的根基隐藏在表面背后，正在形成”（Giedion 1995, p. 87; see also Benjamin 1999）。芬内尔（Fennell 2011）考察芝加哥公共住房供暖系统的不同情况，将它看做“感官政治”（sensory politics）。公共住房的居民把供暖系统称为“高温工程”，在公共住房被拆毁，居民搬迁至别的地方之前，居民一直享受着供暖服务。一位老人告诉芬内尔：“在冬天，我们过得像在夏天”（2011, p.50），“高温工程”象征一种供暖系统的柏拉图式本质。芬内尔认为，供暖系统成了衡量自由主义时代公共住房的拆除和建设工程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取得了什么收益，产生了多少风险以及带来了什么后果。暖气属于一种感官的、情感的经验。通过这种经验，政治主体性得以构型，政治认同得以表达。

结论

因为基础设施的基础实体是如此多样，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分析它，所以方法论的选择成为了一个理论问题。基础设施是技术系统吗？理解基础设施就相当于分析机器网络的运行过程吗？基础设施是金融工具，会计实务，预算安排，抑或管理结构和组织技术吗？基础设施如同人的肌体一样具有生物性吗？它们的体积、质量和态度是否被用来在芝加哥交易所里吸引买家（Zaloom 2003, 2006）呢？基础设施是社交性质的吗？包括互相拜访、喝茶、问候，乃至各种社交投资，通过建立可以依靠的人脉，用于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目的，取得回报（Elyachar 2010, 2011; Simone 1998, 2001, 2004）？对基础设施的研究往往倾向于抬高技术，即使此类研究把城市空间视作人和机器的混杂系统，通过基础设施网络绑定在一起。然而在近来对基础设施的人类学研究中，其中最有活力的一个方面表现在，理解和分析基础设施的方式变得极其丰富多样，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卓有成效地打破了稳固的研究的基本单位。

我只能勉力讨论一下其他研究方法。德勒兹（1992）的观点与芒福德类似，机器的类型是与社会的类型相匹配的；如果说十九世纪建立在用于圈地的工业技术之上，那么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则建立在由计算机调节的控制结构之上。这一控制论转型具有决定性意义，直到最近芬奇（Fisch 2013）对东京地铁系统的研究，才将这个转型纳入人类学的视野。在控制社会中，生产已经被外包，价值是虚拟产生的，基础设施就位于计算机操作协议中，脸书和谷歌等社交媒体平台植入了捕捉用户注意力的机制。在这种经济制度中，创造价值的核心在于对注意力的调控（Chun 2008, Galloway 2006）。另一项研究关注媒体行动主义（activism）的基础设施，行动主义得以发生的架构和表现形式，政治理念被编码成可在媒体传播的形式，嵌入到运动中，传达到公众眼中（Keenan & Weizman 2012; Latour & Weibel 2005; McLagan 2006, 2008; McLagan & McKee 2012）。关注规

划和空间的研究著作不胜枚举，但是媒体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媒体对于新出现的价值生产方式至关重要。

乔纳森·贝勒（Beller 2006）认为，电影的兴起标志着价值生产的转型，从工业生产转向了创造欲望的机制；透过这场转型，还出现了大众消费。“福特汽车公司曾经向国家游说，要求修建公路，促进物流发展，与之相反，电影创造的流通渠道直抵观众的眼球和各个感官。正是观众的劳动在为新的商品开道”（Beller 2006, p. 209）。如果这就是现代社会的现实，在我们身处的社会媒体时代，这种现象可谓大大加剧了，互相配合的机器组成了当代数字基础设施，控制和价值与基础设施密不可分。对此，人类学尚未涌现一批新的民族志，还没有发展出新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 Anand N. 2011. PRESSURE: The PoliTechnics of water supply in Mumbai. *Cult. Anthropol.* 26(4):542–64
Anand N. 2012. Municipal disconnect: on abject water and its urban infrastructures. *Ethnography* 13(4):487–509
Appel H. 2012a. Offshore work: oil, modularity, and the how of capi-talism in Equatorial Guinea. *Am. Ethnol.* 39(4):692–709
Appel HC. 2012b. Walls and white elephants: oil extraction, responsibility, and infrastructural vio-lence in Equatorial Guinea. *Ethnography* 13:439–65
Apter A. 2005. *The Pan-African Nation: Oil and the Spectacle of Culture in Nigeria*.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Archambault JS. 2012. “Travelling while sitting down”: mobile phones, mobility and the communi-cation landscape in Inhambane, Mozambique. *Africa* 82(3):393–412
Barker J. 2005. Engineers and political dreams: Indonesia in the satellite age. *Curr. Anthropol.* 46(5):703–27
Barry A. 2001. *Political Machines: Governing*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London: Continuum

Bear L. 2007. *Lines of the Nation: Indian Railway Workers, Bureaucracy, and the Intimate Historical Self*.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Beller J. 2006. *The Cinematic Mode of Production: Attention Economy and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Lebanon, NH: Dartmouth Univ. Press

Benjamin W. 1999. *The Arcades Project*, ed. R Tiedeman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Bennett J. 2010.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 Press

Bijker WE. 1997. *Of Bicycles, Bakelites, and Bulbs: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ijker WE, Hughes TP, Pinch TJ.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owker GC, Star SL. 2000.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uck-Morss S. 1992. Aesthetics and anaesthetics: Walter Benjamin's artwork essay reconsidered. *October* 62:3–41

Callon M. 1986.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In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ed. J Law, pp. 67–83.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Callon M, ed. 1998. *Laws of the Markets*. Oxford: Wiley-Blackwell

Campregher C. 2010. *Shifting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an actor-network study of a dam in Costa Rica*.

Anthropol. Q. 83(4):783–804

Carse A. 2012. Nature as infrastructure: making and managing the Panama Canal watershed. *Soc. Stud. Sci.* 42(4):539–63

Chalfin B. 2001. Border zon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boundaries of the state in north-east Ghana. *Africa* 71(2):202–24

- Chalfin B. 2008. Cars, the customs service, and sumptuary rule in neoliberal Ghana. *Comp. Stud. Soc. Hist.* 50(2):424–53
- Chalfin B. 2010. *Neoliberal Frontiers: An Ethnography of Sovereignty in West Africa*.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 Chun WHK. 2008. *Control and Freedom: Power and Paranoia in the Age of Fiber Op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ollier S, Lakoff A. 2008. The vulnerability of vital systems: how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became a security problem. In *The Politics of Securing the Homel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Risk and Securitisation*, ed. MD Caverty, KS Kristensen, pp. 40–62. New York: Routledge
- Collier SJ. 2011. *Post-Soviet Social: Neoliberalism, Social Modernity, Bio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Dalakoglou D. 2010. The road: an ethnography of the Albanian–Greek cross-border motorway. *Am. Ethnol.* 37(1):132–49
- Dalakoglou D. 2012. “The road from capitalism to capitalism”: infrastructures of (post)socialism in Albania. *Mobilities* 7(4):571–86
- Dalakoglou D, Harvey P. 2012. Roads and anthropology: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on space, time and (im)mobility. *Mobilities* 7(4):459–65
- De Boeck F. 2011. Inhabiting ocular ground: Kinshasa’s future in the light of Congo’s spectral ur-ban politics. *Cult. Anthropol.* 26(2):263–86
- Deleuze G. 1992.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59:3–7
- Edwards PN. 1997. *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Cold War Americ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Edwards PN. 1998. Y2K: 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computers as infrastructure. *Hist. Tech.* 15(1–2):7–29
- Edwards PN. 2003. Infrastructure and modernity: force, tim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otechnical systems. In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ed. TJ Misa, P Brey, pp. 185–22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Edwards PN, Bowker GC, Jackson SJ, Williams R. 2009. Introduction: an agenda for infrastructure studies. *J. Assoc. Inf. Syst.* 10(5):364–74
- Elyachar J. 2010. Phatic labor, infrastructure, and the question of empowerment

- in Cairo. *Am. Eth-nol.* 37(3):452–64
- Elyachar J. 201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vement and gesture in Cairo. *J. R. Anthropol. Inst.* 17(1):82–99
- Fennell C. 2011. “Project heat” and sensory politics in redeveloping Chicago public housing. *Ethnography* 12(1):40–64
- Ferguson J. 1999. *Expectations of Modernity: Myths and Meanings of Urban Life on the Zambian Copperbelt*. Berkeley: Univ. Calif. Press
- Fisch M. 2013. Tokyo’s commuter train suicides and the society of emergence. *Cult. Anthropol.* 28(12):320–43
- Foucault M. 2010.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8–1979*. New York: Picador
- Foucault M. 2011. *The Government of Self and Others: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82–1983*, ed. AII Davidson. Transl. G Burchell. New York: Picador
- Freud S. 1989.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l./ed. J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Reprint ed. Galloway A. 2006.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andy M. 2008. Landscapes of disaster: water, modernity and urban fragmentation in Mumbai. *Environ. Plann.* 40:108–30
- Ghosh K. 2008. Between global flows and local dams: indigenoussness, locality, and the transnational sphere in Jharkhand, India. *Cult. Anthropol.* 21(4):501–34
- Giedion S. 1969. *Mechanization Takes Command: A Contribution to Anonymous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 Giedion S. 1995. *Building in France, building in iron, building in ferroconcrete*. Los Angeles: Getty Cent. Hist. Art Humanit.
- Graham S, Desai R, McFarlane C. 2013. Water wars in Mumbai. *Public Cult.* 25(1):115–41
- Graham S, Marvin S. 1996.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City: Electronic Spaces, Urban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 Graham S, Marvin S. 2001.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London: Routledge
- Groys B. 2011. *The Total Art of Stalinism: Avant-Garde, Aesthetic Dictatorship, and Beyond*. Transl. C Rougle. New York: Verso
- Hadjithomas J, Joreige K. 2013. On the Lebanese Rocket Society. *e-flux.* 43(3): <http://www.e-flux.com/journal/on-the-lebanese-rocket-society-2/>

- Hansen TB, Verkaaik O. 2009. Introduction—Urban charisma on everyday mythologies in the city. *Crit. Anthropol.* 29(1):5–26
- Harvey P. 2010. Cementing relations: the materiality of roads and public spaces in provincial Peru. *Soc. Anal.* 54(2):28–46
- Harvey P. 2012. The topological quality of infrastructural relation: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Theory Cult. Soc.* 29(4–5):76–92
- Harvey P, Knox H. 2012. The enchantments of infrastructure. *Mobilities* 7(4):521–36
- Hecht G, ed. 2011. *Entangled Geographies: Empire and Technopolitic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eidegger M.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 W Lovitt.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 Hughes TP. 1987. The evolution of large technological systems. See Bijker et al. 1987, pp. 51–82
- Hughes TP. 1993. *Networks of Power: Electrification in Western Society, 1880–1930.*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 Hull MS. 2012. Documents and bureaucracy. *Annu. Rev. Anthropol.* 41:251–67
- Humphrey C. 2005. Ideology in infrastructure: architecture and Soviet imagination. *J. R. Anthropol. Inst.* 11(1):39–58
- Jackson SJ, Edwards PN, Bowker GC, Knobel CP. 2007. Understanding infrastructure: history, heuristics, and cyberinfrastructure policy. *First Monday* 12(6): <http://www.firstmonday.org/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904/1786>
- Jakobson R. 1985. Closing statements: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Semiotics: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ed. RE Innis, pp. 145–75.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 Joyce P. 2003. *The Rule of Freedom: Liberalism and the Modern City.* London: Verso
- Keenan T, Weizman E. 2012. Mengele's Skull: The Advent of Forensic Aesthetics. New York: Sternberg Kernaghan R. 2012. Furrows and walls, or the legal topography of a frontier road in Peru. *Mobilities* 7(4):501–20
- Khan N. 2006. Flaws in the flow: roads and their modernity in Pakistan. *Soc. Text* 24(89):87–113

- Knox H, Harvey P. 2011. Anticipating harm: regulation and irregularity on a road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the Peruvian Andes. *Theory Cult. Soc.* 28(6):142–63
- Kockelman P. 2010. Enemies, parasites, and noise: how to take up residence in a system without becoming a term in it. *J. Ling. Anthropol.* 20(2):406–21
- Larkin B. 2008. *Signal and Noise: Media,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 Durham, NC: Duke Univ. Press
- Latour B.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l. C Por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 Latour B. 1996. *Ara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 Latour B. 2007.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UK: Oxford Univ. Press
- Latour B, Weibel P, eds. 2005. *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Lea T, Pholeros P. 2010. This is not a pipe: the treacheries of indigenous housing. *Public Cult.* 22(1):187–209
- Lefebvre H. 1991.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UK: Blackwell
- Limbert M. 2010. *In the Time of Oil: Piety, Memory, and Social Life in an Omani Tow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 Lombardi G. 1999. *Computer networks,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future of Brazil*. PhD Diss. N.Y. Univ.
- Mains D. 2012. Blackouts and progress: privatiz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a developmentalist state in Jimma, Ethiopia. *Cult. Anthropol.* 27(1):3–27
- Manning P. 2012. *Strangers in a Strange Land: Occidental Publics and Orientalist Geographi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orgian Imaginaries*. Boston, MA: Acad. Stud. Press
- Marx K. 1990.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l. B Fowke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New ed.
- Masquelier A. 1992. Encounter with a road siren: machines, bodies and commodities in the imagination of a Mawri healer. *Vis. Anthropol. Rev.* 8(1):56–69
- Masquelier A. 2002. Road mythographies: space, mobilit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post-colonial Niger. *Am. Ethnol.* 29(4):829–56
- Masquelier A. 2008. Of headhunters and cannibals: migrancy, labor, and consumption in the Mawri imagination. *Cult. Anthropol.* 15(1):84–126

- Mattelart A. 1996. *The Invention of Communication*. Transl. S Emanuel. Minneapolis: Univ. Minn. Press
- Mattelart A. 2000. *Networking the World, 1794–2000*. Minneapolis: Univ. Minn. Press
- Mbembe A. 2001. *On the Postcolony*. Berkeley: Univ. Calif. Press
- Mbembe A, Roitman J. 1995. Figures of the subject in times of crisis. *Public Cult.* 7(2):323–52
- McLagan M. 2006. Introduction: Making human rights claims public. *Am. Anthropol.* 108(1):191–95
- McLagan M. 2008. Principles, publicity, and politics: notes on human rights media. *Am. Anthropol.* 105(3):605–12
- McLagan M, McKee Y, ed. 2012. *Sensible Politics: The Visual Culture of Nongovernmental Activism*. New York: Zone Books
- Meyer B. 2009. *Aesthetic Formations: Media, Religion, and the Senses*. New York: Palgrave
- Mitchell T. 2002.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Berkeley: Univ. Calif. Press
- Mitchell T. 2011.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New York: Verso
- Morris RC. 2010. Accidental histories, post-historical practice?: re-reading *Body of Power, Spirit of Resistance* in the actuarial age. *Anthropol. Q.* 83(3):581–624
- Mrazek R. 2002. *Engineers of Happy Land: Technology and Nationalism in a Colon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 Press
- Mumford L. 2010.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 Otter C. 2008. *The Victorian Ey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Light and Vision in Britain, 1800–1910*.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 Pedersen MA. 2011. *Not Quite Shamans: Spirit Worlds and Political Lives in Northern Mongol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 Press
- Ranciere J. 2006.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nsible*. Transl. G Rockhill. London: Continuum
- Ranciere J. 2009. *Aesthetics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l. S Corcoran. London: Polity
- Redfield P. 2000. *Space in the Tropics: From Convicts to Rockets in French Guiana*. Berkeley: Univ. Calif. Press
- Roseman SR. 1996. “How we built the roa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rural Galicia. *Am. Ethnol.* 23(4):836–60

- Sanders T. 2008. Buses in Bongoland: seductive analytics and the occult. *Anthropol. Theory* 8(2):107–32
- Schivelbusch W. 1995. *Disenchanted Nigh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Ligh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ansl. A Davies. Berkeley: Univ. Calif. Press
- Simmel G. 1972. *Georg Simmel on Individuality and Social Forms*, ed. DN Levine.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 Simondon G. 1980 [1958].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ological Objects*. Transl. N Mellam-phy London, ON: Univ. West. Ont. (From French). http://english.duke.edu/uploads/assets/Simondon_MEOT_part_1.pdf
- Simone A. 1998. Globalization and the identity of African urban practices. In *Blank—Architecture, Apartheid and After*, ed. H Judic, I Vladisavic', pp. 173–87. Rotterdam, The Neth.: NAI
- Simone A. 2001. On the worlding of African cities. *Afr. Stud. Rev.* 44:15–41
- Simone A. 2004. People as infrastructure: intersecting fragments in Johannesburg. *Public Cult.* 16(3):407–29
- Sneath D. 2009. Reading the signs by Lenin's light: development, divination and metonymic fields in Mongolia. *Ethnos* 74(1):72–90
- Sneath D, Holbraad M, Pedersen MA. 2009. Technologies of the imagination: an introduction. *Ethnos* 74(1):5–30
- Star SL.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 Behav. Sci.* 43(3):377–91
- Star SL, Ruhleder K. 1996. Steps toward an ecology of infrastructure: design and access for large information spaces. *Inf. Syst. Res.* 7(1):111–34
- Stiegler B. 1998 [1994].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l. R Beardsworth, G Colli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 Press (From French)
- Taussig M. 2004. *My Cocaine Museum*.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 Todorov V. 1994. *Red Square, Black Square: Organon for Revolutionary Imagination*. Albany: State Univ. New York Press
- Verrips J. 2006. Aisthesis and an-aesthesia. In *Off the Edge: Experiments in Cultural Analysis*, ed. O Lovgren, R Wilk, pp. 29–36. Copenhagen: Mus. Tusculanem
- Verrips J, Meyer B. 2001. Kwaku's car: the struggles and stories of a Ghanaian long-distance taxi-driver. In *Car Cultures*, ed. D Miller, pp. 153–84. Oxford: Berg

- Von Schnitzler A. 2008. Citizenship prepaid: water, calculability, and techno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J. South. Afr. Stud.* 34(4):899–917
- Wedeen L. 1999.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Politics, Rhetoric, and Symbols in Contemporary Syria*.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 Winther T. 2008. *The Impact of Electricity: Development, Desires and Dilemmas*. New York: Berghahn
- Yates J. 1993. *Control Through Communication: The Rise of System in American Management*.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 Zaloom C. 2003. Ambiguous numbers: trading technologies and interpretation in financial markets. *Am. Ethnol.* 30(2):258–72
- Zaloom C. 2006. *Out of the Pits: Traders and Technology from Chicago to London*. Chicago: Univ. Chicago Press.



瘫痪的基础设施： 断电时刻的阿克拉城市政治生态学¹

乔纳森·西尔弗*

梁成林**译 高语晨***校

摘要

全球南方城市通常都被认为是深陷在运作不畅的基础设施之中，它们要么缺乏系统性的基础设施服务，要么常常遭遇持续性的中断和故障。本文聚焦于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电力网络，以考察造成这种持续性断电的一系列社会-自然过程，并探究城市网络系统当中的权力关系。文章主要透过城市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来分析电网的持续瘫痪，借此说明如何利用这一研究框架来审视能源的地理状况。文章首先描述了当阿克拉全城熄灯和断电之后发生了哪些事情，将它们与造成这种持续性系统瘫痪的社会-自然过程联系起来。文章还考察了基础设施的治理历史、温室气体的排放、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加纳北部的水源与干旱情况以及城市扩张、贫民窟的都市化与城市能源需求的增长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以阐释基础设施瘫痪背后根本性的不平等与政治化的社会-自然过程。

引言

阿克拉是西非发展最快的大都市圈之一，它的城市电力网络能为本市居民的大部分日常活动供电。错综复杂的电线、发电厂、变电站和输电塔共同组成了阿克拉基础设施的关键部分，通过社会-自然的转换过程，维持着加纳首都的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系统相当重要，不仅因为

* 乔纳森·西尔弗 (Jonathan Silver)，杜伦大学科学院地理学系。

** 梁成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 高语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1 原文刊于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ume 39, Number 5, 1 September 2015, pp. 984-1003(20)

它们如 Graham(2010: 1) 所言, 是“现代日常生活的基本背景”, 也如 Gandy(2005:28) 所说, 它们持续提供着基本的都市服务, “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系列相互联结的生命维持系统”。然而, 阿克拉的电网经常发生故障, 有时没有预警, 更多时候则以加纳电力公司 (Electric Company of Ghana, 下称 ECG) 宣布进行用电限制的形式出现。类似的基础设施故障在整个城市中的影响各不相同, 给城市居民带来了诸多困难, 他们往往会基于各自的社会经济地位作出种种反应。由频繁的停电事件引发的一系列持续的混乱, 揭示出城市基础设施重要的历史和当代地理状况。

本文试图将城市的电力网络政治化, 并通过分析阿克拉电力网络瘫痪的成因和居民对此的反应, 来揭示基础设施系统当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关系。文章提出, 阿克拉地区旷日持久的电力瘫痪, 产生于城市内外电力网络的发展历史, 正是它导致了基础设施的割裂, 并加剧了城市中的不平等。这表明城市的能源历史使得阿克拉在其电力网络与新兴的多重的社会 - 自然过程的交互中变得更加脆弱。首先, 文章考量了建设在阿科松博坝上的水力发电设施, 以及它与萨赫勒地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相互作用所带来的影响; 它们导致了河水流量的明显减少。其次, 本文还讨论了城市土地的新自由主义治理、城市的日益欣荣与新型城市化模式之间的联系; 这导致了城市的不断扩张与能源需求的日益增长。不过, 文章对这两个过程的关注, 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形塑阿克拉城市电力政策的唯一方面。与之相反, 它们只是被选中来展示电力网络背后的社会 - 自然状况, 帮助我们指出与电力瘫痪相关的城市内外的多重参与者。

综合来看, 参与到能源网络建设历史当中的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行动和 (社会 - 自然) 城市化进程的新形式, 有助于勾勒出阿克拉电力瘫痪的政治特征。此外, 研究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对城市电力瘫痪作出的反应, 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阐明这种政治化过程。文章认为, 城市中上阶层 / 精英们可以采用各种形式的技术或选择新的能源安全型的城市生活方式, 有效应对电力瘫痪, 这既反映又强化了他们与贫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对电力瘫

痪的分析，有助于指认当下阿克拉的权力关系以及新近形成的城市能源地理状况。因此，本文着重研究了一系列导致电力瘫痪的多重社会-自然过程，关注它们如何在城市这一尺度上和不同的参与者发生关系，从而理解它们如何以多种方式将阿克拉的电力网络政治化。

本文参考了诸多考察基础设施的代谢特性（*metabolic natures*）的城市政治生态学（*urban political ecology*，以下简称 UPE）研究（Swyngedouw, 2004; Loftus, 2006; Lawhon, 2013）。该领域的文献认为，是基础设施的代谢流（*metabolic flows*）生产并形塑了城市化进程，反映和再生产了权力的配置，并且居间调节着社会-环境关系。这种研究方法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条进路，通过梳理存在争议的、不平等的基础设施状况将城市网络政治化。本文评估了运用代谢的概念来理解基础设施瘫痪的可行性，并反思了该概念在哪些方面更有益于我们理解阿克拉基础设施的动态状况。借鉴相关文献，我考察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如何实现城市化进程的社会-自然过程，在考察城市得以形成的背景的同时，分析了这些空间、资源流和物质配置的政治性和争议性。此外，文章力图解释，电力供应如何对城市的现在与未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还另外借鉴了社会技术转型方面的文献，评估了城市政治生态学如何促进对城市能源地理学的批判性理解。最后，对电力基础设施瘫痪的分析，将深化我们对于整个地区的城市不平等生产的理解，文章希望据此对目前正在发展、但仍有颇多不足的非洲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以及更大范围的基础设施研究有所贡献。

在文章的下一部分，我对城市政治生态学做了一个概述，为的是说明该领域，尤其是代谢这一概念的使用，如何为城市电力网络的政治化提供重要基础。第三部分对阿克拉内外的电力网络发展进行了历史分析，这部分说明了不同时期的（城市）能源治理如何形塑了特定的基础设施地理状况，令这一系统容易发生故障。第四部分指出，气候变化影响了水流量，并与城市形态的变化、某些社会阶层的财富增长一同促成了能源密集型的新型城市化。对水力发电的过度依赖，最终导致了电力供应的频繁中断以

及电网的历史生成。第五部分试图研究阿克拉的贫民与中上阶层 / 精英阶层对电力瘫痪所作出的反应，我认为这些表现乃是社会分裂和不平等的新形式。最终，文章揭示了令基础设施瘫痪的社会 - 自然过程，指认了这种动态过程中的参与者们，并以反思电力城市化的政治特性作结。

基础设施瘫痪的研究

城市政治生态学

尽管日益增多的城市基础设施研究文献为探究城市系统提供了诸多进路，但在城市政治生态学的领域当中，人们还是着重于对社会 - 自然权力关系的研究。这种权力关系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进程中完成了（再）配置，能够帮助指认出这一动态状况中的不同社会利益群体。Swyngedouw(2004: 4) 在研究瓜亚基尔地区的水的新陈代谢时指出，代谢过程是“政治经济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了城市网络以结构和连贯性”，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有关能源的研究。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分析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聚焦于社会 - 自然环境的代谢生产 (Smith, 1984; Castree, 2001)，许多有关城市基础设施的该领域研究都受到了社会 - 物质流动 (socio-material flows) 这一概念的影响 (Keil, 2003;2005;Swyngedouw, 2004;2006)。在该领域当中，城市化被理解为通过资本积累进行的自然改造，它也可以被统摄在城市代谢这一概念下，Swyngedouw 认为，后者实际上就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异质性(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动态的，但也相互角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量变和质变不断地发生，总是以新鲜而出人意料的方式重新安置人类与非人类”。

一系列社会 - 自然过程构成了城市的物质（再）生产，它们是社会生产关系与自然改造活动结合的产物，也与从本地到跨国的资本流动相关 (Swyngedouw, 2004)。没有什么东西外在于这种改造活动，乃至这座城市

也只是其庞大网络的一部分，这网络横跨本地、遍及全球，融合了人类与非人类的行为体，包罗了从资本到电线，再到电力以及能源政策通讯的一切。以城市政治生态学的角度对社会 - 自然城市化进行理解，能够凸显基础设施系统在研究城市以及内嵌于变动空间中的社会 - 环境关系时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待城市，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认识到，无论是在资本积累的循环过程，还是在作为代谢过程组成部分的自然改造当中，基础设施系统都是核心关切，而不仅仅是某种静态的系统或者技术层面的“器物”。

因此，许多城市政治生态学的文献都从城市基础设施出发，试图理解资本积累如何形塑城市，并且创造、反映和强化了社会关系 (Zimmer, 2010; Lawhon et al., 2014; cf. Gandy, 2004; Heynen, 2006; Loftus, 2006)。这也意味着城市基础设施充当了社会 - 自然改造过程中的渠道、回路和场所 (Heynen et al., 2006)。阿克拉的城市电网应该像 Loftus (2007: 49) 笔下的水景一样，“被理解为一种建构出来的社会 - 自然实体，它是在自然城市化的过程中直接生产出来的。”以此观之，电力网络不仅是一系列的社会 - 自然循环，也促成了其他代谢流的出现，诸如此类的网络系统影响并塑造着城市。这样的双重作用，在我们思考基础设施以及这种隔离开来的、割裂式的网络可以怎样反映和加强权力的配置时，显得尤其重要。

上述的社会 - 自然框架也影响了我们对基础设施瘫痪的分析思路。将电力瘫痪作为切入点，意味着我们不仅需要追踪和揭示它，更重要的是要以基础设施系统的争议性和政治性作为分析的核心 (Swyngedouw, 2004)。因此，当务之急在于思考城市中的种种流动如何形塑城市和它的网络系统，并考察该过程在连接、构成、割裂、延伸和重启更为广泛的城市化进程时所起到的重要的结构性作用 (Kaika, 2005)。

目前，城市政治生态学还缺乏对能源，尤其是城市电力网络的研究。水的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的发展核心 (Swyngedouw, 2004; Loftus, 2006)，而有关城市能源基础设施，尤其是电力的研究，常常会因为使用社会 -

技术变革的研究方法而遭受质疑 (Rohracher, 2009; Jaglin, 2014; Mouton, 2014)。但是，在形塑城市化进程时，电和水起到的作用同样重要，因此我们需要更关注城市政治生态学对城市内外资源流动的分析。将水力研究的见解借用到电力研究的领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有所裨益的视角，帮助我们更好地将城市的社会 - 自然生产理解为一系列充满争议的过程。此外，尽管我们已经围绕着全球南方做了大量工作，但有关非洲城市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与此相关的文献既能推动我们思考城市政治生态学在探究本地区新近出现的城市化动态状况时所具备的潜力，也能告诉我们这一路径如何助力于诸如阿克拉这样的城市的研究。

电力瘫痪下的城市政治生态

电网供给不足、电力服务中断和潜在的割裂趋势，这些因素构成了一系列司空见惯的城市能源问题，影响着电力系统的用户和城市居民。基础设施的故障、瘫痪和年久失修是被普遍证实的状况 (Graham, 2010)，在全球南方尤其如此 (Davis, 2006; Pieterse, 2008; McFarlane, 2010)。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分析能够将这样的故障串联起来，形成一种更广泛的多维度理解，重要的是，它还能揭示城市资源的循环过程中，出现在电网瘫痪下的不平等现象 (McFarlane, 2010)。正如 Graham (2010: 3) 所言，“基础设施的瘫痪能提供重要的启示性方法和学习机会，借助它们，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可以能够发掘出城市生活、技术与基础设施的政治。”

本文借助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就电力瘫痪问题延伸出三个关键的研究领域。首先，它能帮助我们理解造成了电力瘫痪的基础设施 (Kooy and Bakker, 2008) 与网络条件的治理历史。其次，它追踪电力瘫痪背后的代谢过程，梳理这类基础设施事故背后的多重社会 - 自然进程。再次，它考察了诸多参与者应对和解决旷日持久的电力瘫痪的方式；这种观察基于 McFarlane 和 Rutherford(2008: 368) 的论断，即“在危机时刻，支撑着城

市基础设施改造的政治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可见”。因此，我们要把关注点放在电力瘫痪上，将其视为一个窗口，来追踪和揭示不平等能源格局背后的多维度进程，审视与这不平等状况相关的不同参与者的角色。

方法论

2010年至2011年间，我在阿克拉进行了民族志研究。为了对电力基础设施的故障进行多维度的分析，研究使用了诸多不同的方法，其中包括25次半结构式访谈，受访者是一群能源和城市治理工作的参与者，包括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制定者，公共事业公司的代表、建筑环境工程的专业人士，以及民间的参与者等等。我对这些参与者所提出的问题各不相同，而访谈最终是为了建立一种有关代谢过程的叙事，揭示个人、组织及其关系，在多大程度上结构了能源供给的瘫痪以及对它的反应。除访谈之外，我还主持了一系列参与式观察的工作坊，并对Ga Mashie的低收入社区的35户居民进行了调查，以了解电网的动态状况是如何在城市的贫困地带辩证地展开的（见Silver, 2014）。此外，我也走访了很多地点，包括阿科松博坝、安置村、新的中产阶级住宅开发区和干旱的萨赫勒地区。本文利用这些通过不同方式收集而来的数据，展示了分析基础设施所要涉及到的多种范畴和空间。该研究还得到了正在进行的SAMSET项目的支持，这是一项开始于2014年的针对城市能源问题的调查，旨在支持加纳市政局制定可持续的能源转型计划。

电力网络的生产历史

阿克拉的电力网络，以及与城市能源相关的更大范围的地理结构，形成自于阿克拉基础设施的多重历史当中(Chalfin, 2010)。在基础设施治理的全球模式下，这些历史形塑了一个高度本地化的能源格局，其中容纳了许多参与者，包括殖民当局、独立后的加纳政府行政部门，参与发电、配

电和供电的公共事业公司，还有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

殖民时期的基础设施

殖民时期的阿克拉克基础设施系统与非洲的其他城市有很多共同点，它是在资源开采、奴隶制以及对人口、贵重金属、可可等社会 - 自然流的管理需求等一系列更大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这也就是说，在全球帝国主义剥削与征服的基础设施中，阿克拉克是作为一个资本聚集的殖民据点发展壮大的。阿克拉克的历史建立在一系列自然改造的基础上，在此过程中，殖民当局动用其权力，将资金流中的一部分再投资到逐渐发展的建筑环境中，使得资本通过租金、服务和关税完成二次积累。但与此同时，英国殖民者也忽视了非欧居民的基础设施需求。Myers (2006: 294) 曾在谈论卢萨卡²时说道，“在多数情况下，当地政府和欧洲居民完全忽视了城市非洲部分的发展”，而这种忽视的理由常常是一些帝国主义或是种族至上的论调，阿克拉克也不例外。因此，这座城市可谓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非洲城市普遍而又有所差异的殖民统治遭遇的缩影。例如，1878年的《黄金海岸城镇警察与卫生条例》曾给当局创造了一种新式的立法工具，授权当地的行政长官处理垃圾和卫生设施等新的城市流动(Hess, 2000)。当局还曾通过《市议会条例》，试图引入道路照明系统（石蜡灯）作为当地的首批能源基础设施，来发展新的城市系统；并在1885年开始建设水库，搭建了水力资源的综合网络。

通过设立委员会，一系列城市基础设施在此后继续得以发展，包括供水、卫生和照明等(Dickson, 1969)。到1885年，越发恐慌的殖民当局明显把他们对城市社会 - 环境状况的担忧通约成了种族问题。特别是疾病的蔓延，促使他们规划建设了一个名为维多利亚堡（Victoriaborg）的欧洲人开发区。殖民者认为只要远离了狭窄肮脏的老阿克拉克，新的隔离居住区就能

2 卢卡萨，赞比亚的首都和第一大城市。——译者注

提供给他们一个安全的环境，一大批商人、行政人员和其他定居者也受此吸引，搬离了被认为是危险地带的老阿克拉。从1914年起，塞康第³地区开始限量供电；1922年起，公共工程部开始向阿克拉供电，以满足帝国工业和殖民地精英住宅的用电需求。因此，到20世纪初期，法律所规制的空间隔离不仅给人划分等级，也将电力这样的城市服务分出了三六九等。隔离开始成为分裂的城市空间形式与不同市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这样的隔离并不完全，也不总是强制性的，这表明控制城市的殖民计划还够不完整。但正如Graham和Marvin (2001: 82)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基础设施的局部建成乃是刻意为之，它象征着殖民地的掌权者相对于被殖民文明的优越性”。

到1947年，殖民者仍然控制着电力资源的管理权，他们在工程与住宅部当中设立了专门的电力部门，监督阿克拉以及全国各地逐步发展但却仍然维持着种族隔离状态的电力网络。二战之后，随着当地独立愿景的出现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殖民当局由于担心民众动乱，以一种特殊的基础设施发展方式，与城市居民建立了父子式的关系，这段时期被称为“恩怜时期（compassionate period）”（Iliffe, 1987）。虽然这个相当成问题的说法体现不了帝国主义统治的延续性，但它能够说明殖民当局政策重点的部分转变，他们试图向阿克拉人提供生活必需的资源，这也表明了殖民逻辑在这一时期城市治理方面的性质转变。

独立之后

在1957年宣布独立之后，加纳的第一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开始着手依照自己的愿景建设阿克拉，他希望能在未来建设起一个（非洲）社会主义的现代加纳（Demissie, 2007），电力则是独立之后加纳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部分。1961年，沃尔特河管理局（Volta River

3 塞康第，加纳西南海港城市。——译者注

Authority, 下称 VRA) 在《沃尔特河发展法案》的支持下建立, 负责根据计划建设水力发电; 1963 年, 加纳电力公司 (Electric Company of Ghana, 下称 ECG) 成立, 负责供电和配电, 它们共同组成了加纳独立之后的主要电力事业。由这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时代所成就的这一切, 突破了殖民统治的逻辑, 但与此同时, 以往治理模式中遗留下来的割裂而破碎的基础设施及其城市治理方式仍然持续地产生着影响。Otiso 和 Owusu (2008: 150) 在评论加纳和肯尼亚时说道, “由于两国继续依赖着殖民时期的城市规划、法律细则、建筑风格 and 住房标准, 它们的住房、基本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状况也深受其害”。这样的城市地理状况还部分地取决于新的城市精英的利益诉求, 他们攫取可可和黄金之类的加纳自然资源, 将所得资金再投入到建筑环境中来赚取私利, 却不愿投资改善亟需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

尽管这一时期, 恩克鲁玛的统治有着内在的矛盾, 殖民逻辑也依然发挥其影响, 并且还在后来被排拒的情况下, 形成了一种低调的唯发展论, 但阿科松博坝的建设还是为这一时期留下了基础设施的遗产。这个大坝是一个生动的象征, 它体现了加纳乃至更大范围的泛非愿景, 这些愿景基于现代化、对自然的驯化与经济增长的信念, 但也导致了对水力发电和对支持该项目的外国资本的依赖。恩克鲁玛在任期间, 许多社区, 尤其是阿克拉的新精英居住区都接通了电力网络, 整个城市的能源服务也因此扩展。但是, 1966 年的军事政变结束了恩克鲁玛政权的统治, 导致阿克拉乃至全国的社会主义愿景走向衰落 (Fitch and Oppenheimer, 1966), 也在很大程度上令短暂的后独立时期引导政府前行的“基础设施之梦”开始消亡。

在公民与军方交替统治的时期 (1966 年至 1992 年), 阿克拉的基础设施受到了多种治理模式的复合影响, 此时的能源格局乃是构筑起基础设施的那些远近历史的共同产物, 而持续未变的是城市的分裂状况。Konadu-Agyemang (2002, quoted in Davis, 2006: 96) 坚持认为, “当地精

英接替了欧洲人的位置及其附带的所有利益，不仅维持了现状，还通过分区和其他规划机制，建成了其他几个中上阶层居住区，能否入住其中取决于个人的收入、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在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国家债务压力不断增加的背景下，随着新的精英阶层取代了殖民地官员并优先发展城市服务，上述的动态状况便成形了。因此，在独立后的政府向阿克拉居民承诺城市的现代（与基础设施）未来之后，虽然曾一度出现过 Chalfin (2010: 197) 口中的“复制版的阿奇姆彭计划”⁴，但政府对基础设施网络的关注度明显下降了。这一时期，政府与入不敷出的公共事业公司未能对国内的电力需求做出有力的回应，这其中就包括未能在阿科松博坝之外发展多元化的电力来源。基础设施的遗留问题由此产生，并一直延续至今。此外，恩克鲁玛总统所建的电力基础设施，在受到临时政府的干预，卷入了不断发展的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还导致了电力需求的持续增长。在 1967 至 1976 年之间，加纳国内的电力消耗翻了一倍，达到了 1300 千兆瓦时 (RCEER, 2005)，这清晰地表明电力资源在这个西非国家的未来发展中，将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新自由主义式的基础设施

19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剧了电力网络的历史性分裂和投资短缺问题。正当 Chalfin (2010: 195) 将加纳视为“非洲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排头兵”时，由世界银行牵头、加纳政府支持的结构性调整计划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下称 SAP) 使得阿克拉更加容易遭受电网故障的打击。由于世界银行 (1994:2) 的目的是希望“像企业而非像官僚机构那样管理基础设施”，SAP 下的电力服务改为了按量收费的模式 (Peck and Tickell, 2002)。在此期间，国家在城市和更大范围的能源网络上的投资缩水，实际上呼应了一种被整个大陆称为“失去的十年”的更广泛的重构逻辑。在这

4 阿奇姆彭是 1972 至 1978 年间的加纳国家军事首脑，曾经计划大规模翻修改造现有城市。1978 年在政变中被免职并处决。——译者注

一时期，私营部门在提供和管理服务的方面，愈发具有话语权 (Otiso and Owusu, 2008)。自 1982 年 SAP 及其改革出现以来，它们就对阿克拉的电力网络产生了重大影响，到 1993 年，世界银行对于火力发电厂的投资数额，都要取决于 SAP 拆分综合电网的全面改革的具体情况。这一改革依然是立足于全面供电的目标，不过却提升了收费标准，并且鼓励私有化经营 (Williams and Ghanadan, 2006)。虽然改革只是局部实施，但也足以揭示新自由主义逻辑与当地的地理结构互相影响、随其变化的灵活方式 (Chalfin, 2010)。1990 年代，对电力部门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仍在继续，这让城市中的许多地区失去了供电，电力网络进一步割裂，能源成本也不断上升，这样的治理方式对加纳现在的能源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90 年代中期起，世界银行开始执行电力部门改革计划，在该部门中确立了牢固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并且试图将投资重点从政府和捐款的来源机构，转向为私营部门的入场营造有利条件，从而推动了新的独立能源生产商 (independent power producers, 简称 IPPs) 进入市场。这样的动力从 1980 年代开始就在将加纳缓缓地推向能源行业的自由化，2015 年初，当政府考虑将 ECG 私有化时，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达到了顶峰 (Ghanaweb, 2015)。激进的改革彻底改变了“国家控制”这一电力行业的历史特征，展示出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参与如何形塑电力的政治经济学。诸种改革，再加上历任政府缺乏将国家资金投入当地能源的政治意愿，导致电力部门走向解体，电力网络的越发脆弱为电力瘫痪埋下了伏笔。此外，一直以来对电力网络的投资短缺导致了许多问题，其中就包括高额的输电损耗与基础设施的愈发老化；政府向 VRA 提供了高达 9 亿美元的燃料补贴，但许多公共事业公司仍然运营艰难。电力部门的财政状况危如累卵，ECG 和 VRA 在本世纪初的债务总计就已超过 2 亿美金 (World Bank, 2004)，各种能源政策也都宣告破产，试图解决国内电力问题的能源部门发展计划 (1996–2000) 也不例外。

向阿克拉供电的过程有着固有的紧张关系，几个主要的职能部门——VRA、ECG 和 GRIDCO 因为持续的竞争、重要的供电付款项争端⁵以及基础设施的日益老化而决裂：ECG 如今每年需要 2 亿美元来维持运营⁶。公共事业公司间的权力博弈，在媒体就发电厂减少供电负荷一项的公开追责中表现得最为明显，GRIDCO 因供电不足而遭批评，VRA 因没法满足用电需求而被指责，加纳政府则因为没有投资基础设施而遭控诉。虽然如今的加纳被人描述为“正在升起的新星，非洲近来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 (Breisinger et al., 2009: 3)，但很显然，电力网络的建成并不仅仅取决于国家与公共事业公司之间的治理关系，还受制于国际机构，特别是世界银行带来的持续影响 (Honkaniemi, 2010)。

回顾阿克拉基础设施的治理历史，我们能够发现被不同参与者所形塑的城市，乃至更大范围内的能源格局的割裂特征，也能看到电力网络的政治化特性。这样的历史生产出了特殊的（城市）能源地理状况，为基础设施的瘫痪埋下了祸根。本文的分析不仅显示了电力瘫痪的状况是怎样历史地生成的，也指认出了这一进程的各种参与者。这些参与者，既包括殖民统治者——他们实施种族隔离，创造了割裂式城市化的历史模式，也包括独立后的精英人物——他们没有全面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因此维持了这种割裂的局面。恩克鲁玛政权在国际投资的驱使下，建成了阿科松博的水力发电设施，也使自己深陷于对它的依赖之中。他之后的政权则没能推动能源生产的多元化，也没能清除（阿克拉内外）电力网络日益老化的痼疾。最终，在世界银行的影响下，如今的加纳政府正走在自由化的道路上。支持这一道路的，是基础设施背后的国际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如今，它已经渗透进了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

5 ECG 拖欠了 VRA 约 7.67 亿美元，加纳政府也拖欠管理当局 2.5 亿美元。

6 见 http://article.wn.com/view/2015/01/09/ECG_Needs_200m_Yearly_To_Meet_Demand_For_Power_Supply/ (accessed 17 May 2015).

社会 - 自然生成的阿克拉电力瘫痪

阿克拉的能源网络历来都是割裂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下的国家政策加剧了持续的资金短缺，使得城市的供电极易中断。本文认为，阿克拉电力网络的瘫痪是由气候变化与城市扩张的历史过程联袂导致的，其中许多参与者都被牵涉进一种不平等能源结构的生产当中。

阿科松博坝，水力发电依赖症和气候变化的影响

阿科松博坝见证了恩克鲁玛政府的现代主义基础设施之梦，它试图通过大规模的水力发电，实现加纳能源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和普及化 (Moxon, 1969)。与此同时，大坝也证明了世界银行资助南方（发展中国家）此类大规模能源项目的逻辑。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占地面积超过 8000 平方公里 (Fobil et al., 2003)，与之类似的项目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 - 环境影响，这其中就包括迫使沃尔特河流域内的 8 万多人搬离他们的家园 (Gyau-Boakye, 2001)。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附近的村庄重新安顿下来，却还在持续遭受着健康、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侵扰。另外，由于将大坝作为加纳的重要发电设施，阿克拉依赖日趋干旱的萨赫勒地区的持续水流，也就很容易受到新近出现的气候变化的影响。

修建阿科松博坝、利用自然能的计划，最初是由殖民当局制定的，但直到加纳独立之后，这个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才由政府接手建设。该项目也反映出世界银行的能源政策对全球南方各国政府的主导性影响 (Goldman, 2005)。囿于融资渠道有限，加纳政府需要国际资本和专业技术来支持该项目的具体执行，总部设在美国的凯撒铝业与化工集团 (Kaiser Aluminum and Chemical Company) 便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成立了沃尔特河铝业公司 (the Volta Aluminium Company, 下称 VALCO)。这种安排的前提是新独立国家与外国资本之间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它也堵死了建设其他发电

设施的可能。作为融资的条件，加纳政府需要出资一半，还要让 VRA 在阿科松博为 VALCO 的炼铝厂优先供电，之后才轮到加纳居民。因此，阿科松博坝的融资，依赖全球北方公司对能源开采的持续需求，这也反映出新独立国家在为基础设施建设筹款时遇到的困难。2006 年，在成本危机达到顶峰后，VALCO 变成了国有企业，然而这些不平等现象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该公司一直是加纳最大的电力消费者，据 VRA 的代表估算，该公司的消耗占全国的 40%，而相较其他消费者，所缴的电费却要低 25%。这对加纳的电力基础设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暴露了供电方和使用方的不平等关系。此外，和其他政府部门一样，VALCO 没有向 VRA 和 GRIDCO 支付费用，令两家运营商无力投资改造他们老旧的基础设施，从而导致了更多潜在的电力故障，高达 20% 的传输损耗难题也因此无法得到解决。

由于（外国资本的）铝生产的需求，外加世界银行对于大型水坝工程的偏爱，阿科松博坝令加纳的电力生产、水文动态以及近来的气候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一名在阿科松博坝工作的 VRA 工人所说的那样，水的自然 - 社会关系对加纳至关重要：“在加纳，水是生命，不仅是因为它解口渴，还因为它是人们日常生活的能源”。

向阿科松博坝提供所需水流的水文区，一直向北延伸到萨赫勒地区。这些脆弱的地带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Tacko Kandji et al., 2006)。在过往的 20 年中，加纳北部和沃尔特河流域的其他西非国家的萨赫勒部分的降雨量减少了 20% (CARE, 2007)。降雨量的减少和干旱的增加，部分是因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加纳北部的森林滥伐和荒漠化，也与该地区城市人口的能源需求（木炭）密切相关。此外，预计阿科松博坝的水源供给地区将会变得更为干旱干燥 (Gyau-Boakye, 2001)，这可能导致降水量继续减少 27% (CARE, 2007)。因此，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阿科松博坝的水源供给地的预计流量将减少 30% 至 40% (EPA, 2000: 6)，这将导致

水力发电量减少多达 59% (Government of Ghana, 2000), 迫使已经很成问题的能源生产形势进一步恶化。

在过往的很多时期, 水流量都在大幅减少, 现在和未来的困难可见一斑。2008 年, 阿科松博坝的水流量降至 30000 立方米 / 秒以下, 使发电量减少了 60%, 加剧了影响广泛而持久的电厂减少供电负荷的问题。由于加纳超过 55% 的电力来源于阿科松博坝 (RCEER, 2005), 萨赫勒地区近来的气候变化可能继续激化阿克拉能源流的不稳定状况, 继而导致基础设施频繁故障。因为加纳政府对水力发电的长期依赖, 再加上 VRA 内部的体制问题, 该地区日益严重的气候变化, 使得已陷入重重问题的阿克拉电力网络更难以自拔。

由于用作发电的水量减少, 政府自 21 世纪初开始, 愈发依赖新接通的天然气, 以帮助 ECG 克服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但是, 一方面, VRA 没法维持对发电厂的电力输送, 另一方面, 即使西非的天然气管道已在运营 (这本身就不能保证), 但能源需求量至少是其供应量的两倍。供给不足是加纳政府与尼日利亚、科特迪瓦等国地缘政治合作失败的结果, 而西非天然气管道公司供应的不稳定, 则部分因为尼日利亚正深陷泥淖。此外, 过去 20 年间, 政府在新能源 (如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方面始终投入有限; 随着气候变化持续影响阿科松博的电力生产, 政府及其公共事业公司无力实现能源部门多元化的问题也表现得愈发明显。

全球人为活动导致的变化, 以及相关的水文动态是至关重要的代谢过程, 它将城市与最先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加纳北部和更广的萨赫勒地区的社会 - 自然过程联系起来。阿克拉的能源瘫痪, 也正是在这一代谢过程中出现。气候变化显然与加纳能源生产的不稳定有关 (Owusu et al., 2008), 也是阿克拉能源瘫痪的重要动因。这表明能源格局是怎样通过自然的城市化而产生, 并且受它影响, 又与资本积累的进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这些进程同时也与一大批致使加纳内外电网瘫痪的参与者们有关。全球北

方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严重的影响，诸如萨赫勒地区的气候变化就是其一。此外，加纳能源生产的融资途径还加剧了这些气候变化的影响。加纳对 VALCO 模式的国际资本的需求，再加上世界银行的基础设施政策、恩克鲁玛政府投资水电的决定以及加纳政府与公共事业公司在过往 20 年中未能实现能源多元化发展的恶果，合力造成了加纳对于水力发电的过度依赖，这种依赖为气候变化最终导致能源瘫痪埋下了伏笔。

扩张的城市

阿克拉断电事件频发的原因在于，城市的不断扩张、以城市土地资本化为特征的住房体系以及日趋新自由主义化的城市环境。如今的阿克拉是西非最大的城市之一，其人口增长率高达 4.4%，2006 年，该城人口约为 370 万，现在则可能超过 400 万 (UN-Habitat, 2009)，由此产生的能源密集型城市扩张，揭示了电网瘫痪的政治特性。

这样的城市化动态是 1980 年代 SAP 的直接结果。在此过程中，自由市场肆意扩张，在建筑环境中引进了新的私营参与者，也创造了买房的意愿和城市土地投资的资本变现可能。通过在郊区推行城市化，上述进程对阿克拉及其周边地区产生了直接影响 (Yeboah, 2000; Grant, 2009)。至于城市扩张本身，则因阿克拉市议会和政府，尤其是城乡规划部未能针对阿克拉进行有效的规划而被加快了。SAP 的存在极大地阻碍了政府有效地应对城市扩张。现行的规划制度不仅助力了 SAP 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还使得精英能够无视规划条例，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来对付种种标准和法规的限制。正如 Hanson (2010: 31) 所说，“如今人们只要有钱就可以随时随地盖房”。

住房与基础设施系统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它们共同造就了城市的发展与扩张的基本框架。城市中产阶级 / 精英住房和相应配套设施数量增多，发展扩张的趋势还在 1980 年代末和整个 1990 年代加速了。与此

同时，在为加纳社会新兴的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建造住房的过程中，房地产繁荣和土地金融化开始出现，继而催生了以城市增长与无序扩张为特征的网络系统。占加纳人口约 2%（或者 45 万名该国居民）的精英阶层（据非洲发展银行 2011 年的数据，精英阶层的标准是每天支出 20 美元以上）推动了加纳，尤其是首都地区新的消费模式的出现；城市街道上价格不菲的汽车与拔地而起的购物中心，日益彰显出精英阶层的富有。他们的购买力在在建的房屋——从独栋别墅（像“营地”那样的“理想”社区中的三居室房子，价格高达 45 万美元以上）到新公寓楼（如大西洋大厦和机场城，价格 25 万美元以上），再到不断增多的住宅区——中得到了进一步体现，而这种程度的大兴土木也是大多数新建城市的特征 (Grant, 2009)。

新兴的中产阶级得以加入到加纳精英阶层当中，反映出该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在加纳和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产阶级”的定义仍有争议：某些估算表明，中产阶级包括大约 500 万人或加纳 20% 的居民。然而，这种人均日消费在 4 到 20 美元之间的“中产阶级”并不能用以解释新的（郊区）住房类型的发展。在衡量加纳社会的财富增长对住房和空间形态的影响时，“中上阶层”无疑是更为准确的度量单位。非洲发展银行（2011）指出，该群体的人均日消费在 10 到 20 美元之间，占该国人口的 13%。他们在非必需品，例如汽车、家庭用品、航班以及房屋上的支出明显增多（超过 6 万美元）。加纳社会的中产阶级和中上阶层共同刺激了住房需求 (Bank of Ghana, 2007)，并且催生了为 8% 的人口服务的抵押贷款部门 (Oxford Business Group, 2012)。这最终导致了阿克拉的社会 - 物质环境，包括其能源地理结构的转型。

阿克拉的房盘外观，因精英阶层和中上阶层需求而迅速变化，越来越多地由价格高昂的独栋住宅组成，它们模仿了欧美的郊区房型，一排接一排地延伸到郊区尽头，Trasaco Valley 这种起价 100 万美元的大型开发项目就是一例。在这些新的开发项目中，全球资本的运作是显见的，包括英联

投资这样的私募股权集团与好莱坞国际发展公司这样的房地产集团在内的一批金融参与者，都在投资西非的房地产市场。郊区城市化借助城市土地融资，完成了进一步市场化，推动了阿克拉的一系列重要变化，这也关系到我们对电力网络瘫痪及其政治化的理解。

上述这些新的住房开发与由此展开的新的消费模式，导致了阿克拉的能源及其循环的持续瘫痪。新的中产阶级住房，以及超过84%的正规住房，都在大量使用进口的混凝土砖和砂砖 (AMA, 2006)，它们已经成为了阿克拉城市扩张的标志性材料。这部分是因为是混凝土相对便宜且容易获得，部分是因为该材质方便构画建筑细节，以展示新兴的（进口）中产阶级/精英审美（如古典圆柱和拱门等）。此外，混凝土有很明显的能源密集特性，不仅是因为它产量很高，还因为它散热效率极低。混凝土建筑物往往需要配备大型的空调系统，从而导致电力需求的不断增长。一位阿克拉建筑师解释道，“大多数中产阶级新房都装了空调，能源需求因此不断增长，家庭和国家都需要为此掏钱”（对该建筑师的访谈，Accra, 2010.11）。住房系统的材料和设计继续抬升了城市化下的能源需求，家庭用户的总用电量也明显变多：其需求量从2000年的1319千兆瓦时增长至2009年的2172千兆瓦时，增加量为853千兆瓦时，增幅约65%(Ghana Energy Commission, 2011: 13)。

阿克拉的电力瘫痪，是由阿科松博的气候变化危机所激化的，后者与一系列参与者主导城市扩张并从中获利的行为密切相关。这样的城市化正在重塑城市能源的社会-自然动态，向电力网络持续施压。阿克拉向能源密集型城市转变的过程，受到了加纳政府和世界银行的影响，他们支持SAP，从而为加速土地市场化创造了条件，也削弱了规划部门调节城市发展的能力。全球投资涌入房地产，表明本地与国际房地产开发商也参与了能源密集型的改造。随后，城市中大量的资本积累机会加速了城市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问題则被抛之脑后，这种转变便是阿克拉（郊区）城市化的

特征。最终，某些社会经济群体的日益繁荣、他们在购房和家庭用品（如空调设备）上的消费选择，再加上他们对规划的不屑一顾，无不导致对电力网络需求的增加。参与者们推动这些进程，跻身其中并获利，这一事实意味着电力瘫痪的现象是可以被政治化的，并且还能用来解释割裂式城市化的新状况 (Graham and Marvin, 2001)。当细究阿克拉的哪个区域因其应对电力瘫痪的能力不足而遭受最严重的损失时，这种政治化就变得相当重要。

阿克拉电力瘫痪下的不同反应

城市贫民

当电力网络在城市代谢过程中宣告瘫痪时，城市贫民的处境总是最糟糕的。一位 ECG 员工曾谈及 Ga Mashie 社区在面临电力中断时的状况：“停电影响了很多居民和企业，让他们遭受了许多损失，不仅打断了日常生活，还毁掉了家电和生意”（访谈，November 2010）。另一种形式的电力瘫痪加剧了影响的严重程度：因为预付电费没法保证供电，电费还一直上涨，供电中断就像家常便饭。过去十年里，电价已经从 1.94 塞地 / 千瓦时飙升至 6.92 塞地 / 千瓦时 (Energy Commission of Ghana, 2013)，76% 的家庭在接受调查时表示，他们偶尔乃至经常无力支付电费。在 Ga Mashie 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由于上述两种电力瘫痪，仅 2010 年期间，就有 94% 的家庭遭受了超过 20 次供电中断。一位居民表示，这给条件已经很艰苦的居民们带来了严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光，如果没有光和电，大家不管是出去赚钱，还是在家生活都有很多难处”（访谈，December 2010）。

许多生活在供电不稳的社区中的城市贫民，被迫尝试种种低成本策略，以应对家庭和社区中临时性的或是变本加厉的断电事件 (Silver, 2014)。Ga Mashie 等社区的电力中断催生了各种应对手法的出现。这些应对手段

包括，绕过预付费电表，偷偷直连电网来解决断电问题；多备蜡烛或者在断电期间和邻居一起保护财产安全，以及购买做生意时所需的共用发电机。城市贫民常常被迫走到一起，携手应对最严重的后果。当用电限制之类的电力故障发生之时，低收入家庭不得不采取种种替代方案解决断电引起的问题，而遭受黑暗对重要的家庭活动，比如挣钱或者写家庭作业的影响，有时也是没法避免的。

尽管技术可以帮助解决问题，但其售价有时令人难以负担。例如，一台 4.5 千伏安的柴油发电机能够在电力中断时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有限的电力，但它 4000 塞地（1000 美元）的价格高得吓人。对于很多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城市居民来说，这种辅助性的基础设施还遥不可及。Ga Mashie 社区的人们意识到了太阳能光伏系统等离网技术的潜力所在，超过 80% 的调查参与者表示，该技术可以帮助他们的家庭更好地应对电力瘫痪。但是，这些在市场机制下出现的技术主要是供中上阶层 / 精英购买的，而非城市贫民。一位在 Ga Mashie 工作的 ECG 员工（访谈，December 2010）坦言：“只有富人能用太阳能，但穷人也应该有资格使用它。”此外，低科技的解决方案也面临着重重困难：在 Ga Mashie 的调查显示，64% 的调查参与者发现石蜡和蜡烛等电力替代品成本更高，电力瘫痪也因此给家庭带来了更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Quartey (2010) 的研究支持了此观点，文章表明 2007 年电力危机期间，城市贫民损失了多达 10% 的月收入。由于需要购买替代性燃料，再加上无力负担发电机等技术，低收入社区中的许多居民在电力中断时深陷生存困境。

城市贫民面对基础设施瘫痪时逐渐成熟的应对措施往往也是暂时性的，但它们能够对城市居民与基础设施网络之间的代谢交互产生微弱的影响。这些应对措施包括用简易材料来改善与电力网络的连接 (McFarlane, 2011; Silver, 2014)，以及在断电期间团结邻里，保护赖以生存的城市空间。城市贫民针对这种渐进的基础设施动态尝试了各种实践，这帮助他们弥合

了城市基础设施中的不平衡投资，以及割裂的城市化现状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鸿沟。长期贫困已经令城市贫民们很难维持日常用电的稳定，但想要继续他们在 Ga Mashie 等地区的日常经济活动，贫民们还需面临更多的困难。和其他贫困的城市社区一样，在 Ga Mashie 获得优质的电网空间、技术和生态创新发明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由于城市贫民缺乏为太阳能等新技术筹措大量资金的能力，他们也就无从缓和来自电网瘫痪的最恶劣影响，只能用手中有有限的资金、资源或者政治关系，寻找与他人的共同利益，保留应对电网瘫痪的一线希望。与之截然相反，对阿克拉中上阶层与精英来说，选择是多样的，他们既可以使用传统的发电机维持电力，也能够使用新的优质电网空间、技术和生态创新发明。

中上阶层与精英空间

当电网瘫痪时，电网之外的辅助性基础设施将为中上阶层与精英家庭提供额外的能源安全保障，柴油发电机的轰鸣声出现在城市的许多社区里。这种对断电的反应，至少部分建立在新式住宅的设计和建成之上，揭示了城市中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可用手段的差别。此外，当城市贫民还难以克服断电造成的日常生活困难时，阿克拉的能源网络已经围绕着新的私人网络空间重新配置了，有能力担负这种开发费用的人能够享受更高的能源安全系数。随着实验性的生态住宅和潜在的大型住宅开发项目的实施，新式住房 / 能源基础设施应运而生。

城市中一些在建的生态住宅最先为生态创新提供了优质空间，新兴技术与材料则能保障基础设施的安全性。但目前为止，它们仅仅出现在少数几个地方，并通常为建筑师开发和所有。其中一个例子是 Addo 的实践，该工程避免使用水泥，转而采用雨水收集和太阳能光伏等技术帮助应对断电问题，并通过被动式设计、大型悬挂房顶和木质隔断来自自然制冷，以此降低能耗。此外，诸如泥浆这种在西非使用了几个世纪的本土材料，已经

证明通过降低能耗来节省资金是可行的。然而，目前的阿克拉只有不到10%的（正规）住宅外墙使用泥浆，本国其他地方，尤其是加纳北部干旱的萨赫勒地区的泥浆使用率却超过50%(AMA, 2006)。这也验证了过去几十年间可能已经出现的“文化分裂”现象，城市居民显然已经抛弃了适应该地区气候的传统建筑方法。

与新式非洲核心建筑风格相符，并以环保材料作为基础的生态创新实验仍然是潜在的商机。不过它现在还只出现在阿克拉的偏僻地带，没有渗透到醉心于提高生活质量，且数量不断增多的城市中上阶层和精英的想象之中。这些生态住宅之所以在建，有赖于国际开发商近来在可持续发展和能源效率方面借鉴外国的直觉。因此，在为新的中产阶级和精英住宅区制定“可持续总体规划”，并通过大规模的住房升级给阿克拉居民提供不同级别的能源安全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商机集中到了如何提升私人生态住宅应对基础设施瘫痪的安全性问题上。住房系统的建设以及随后出现的优质网络空间，主要是由掌握大量资金的国际开发商一手促成的。这些系统通常在其治理原则上具备一定程度的可持续性，也为阿克拉新的住房系统勾勒了美妙愿景，它旨在超越遍布城市的混凝土郊区，使居民摆脱对电力等城市基本服务瘫痪的担忧。

随着阿克拉的城市空间成为国际资本流通和循环的重要场所，诸多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项目将在这里大规模展开，耗资60亿美元的大型科技园“希望之城”便是其明证。而在住宅方面，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恰如其名的“阿波洛尼亚-光之城”项目，它由全球供应商Renaissance Group出资，通过其非洲地产商Rendeavor Ltd.交付。开发商已经提供了1亿美元的启动资金，用于项目的总体规划、土地规划、基础设施系统和管理框架。“阿波洛尼亚”项目只是Rendeavor Ltd.在非洲各地房地产项目的一部分，他们在内罗毕⁷郊区还有一个与此愿景相似的项目，该项目在2012年就已开

7 内罗毕，肯尼亚首都。——译者注

始建设，只不过一直受到各种问题和延期的困扰。一批类似的开发项目表明，全球流动资本正在汇集到快速发展的非洲城市当中，人们也愈发重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障问题。“阿波洛尼娅”作为阿克拉大都市圈郊区的一座新城，预计未来十年内将在 800 公顷的土地上建成，并计划最终容纳超过 85000 名居民。据开发者称，它将达到“世界级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可能改变整个阿克拉的住宅发展前景。此类阿克拉中上阶层 / 精英的住宅工程，部分考虑到了为潜在客户提供基础设施安全保障的问题，因此可以抵消一些当前在建的能源密集型住房体系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因此，新的开发项目可能会帮助阿克拉降低对电力系统的需求，但也暴露了城市能源瘫痪下的技术不平等。

新的城市化进程孕育了诸多潜在的阿克拉电力系统的地理结构变化。显而易见，它们可能有助于减少能源需求，降低电力中断和瘫痪的频率。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上阶层 / 精英家庭选择脱离大型电网基础设施，将会导致 ECG 的收入减少，让 ECG 难以继续维持“生命线电价”⁸，并继续削减本就已经捉襟见肘的升级与维护投入，继而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电网瘫痪。另外，这些动态过程将会固化基础设施的历史性割裂，赋予其新的当代形式，并揭露电网瘫痪的应对手段的政治化特性，正如前所述，有能力进入优质网络空间的人与无法负担它们的人，往往有着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那些能够负担得起发电机和光伏板等技术，或者能源安全型以及可持续发展型住宅的人，可以使用不同类型的优质网络空间，来增强应付电力瘫痪的（不平等）能力。这些空间不受城市的资金短缺、割裂的电力网络的限制，为中上阶层 / 精英提供了额外的家庭能源安全保障。这些不平等现象表明，社会经济状况以及为优质网络空间付费的能力，导致了电力循环和电流的多样化，并将使阿克拉已然割裂的基础设施进一步解体和重组。

8 生命线电价是指，每月用电在 50 千瓦 / 时以下的用户可以享受到的低税率电价。

结论

本文展示了阿克拉电力网络的生成历史，特别是两个新近出现的社会 - 自然过程。这两个过程引发了电力中断事件的激增，也蕴生了整个城市对这种基础设施事件的不同应对措施。借此，关于电力瘫痪的城市政治生态学得以被阐明。电力瘫痪的发生提供给我们一种启发性的实用方法，以理解城市的基础设施地理结构。这非常重要，因为它揭示了电力网络的政治化特性。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往往聚焦于水利基础设施，但这篇文章展示了如何运用这种分析方法理解城市能源地理结构，从而将研究对象扩展到新的基础设施体系和能源流。它表明，通过分析水文动态、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住宅建设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我们对阿克拉电网的理解可以与自然城市化的过程产生内在的联系。最重要的是，这其中融入了权力关系。Kaika (2005: 75) 评论道，我们对代谢过程的关注帮助阐明了电力网络的社会 - 自然生产：“透过无形的自然代谢或是技术网络，探索‘他者’难以言明的物质性，其矛头直指自然与社会、私人与公共相分离的社会建构方式。它表明个人、社会与自然，乃是一种社会 - 自然连续体，上述社会建构出的类别之间的界限并不存在。”这种洞见开辟了探寻城市电力基础设施的新途径，这些途径或许是这项研究最重要的思想收获。它们指明，未来的分析需要结合多维度和社会 - 自然的代谢过程，正是在该过程中，城市化进程辩证地形塑了城市内部空间以及更大范围的地理环境，继而影响了城市的电力基础设施 (Angelo and Wachsmuth, 2015)。

另外，本文还为非洲城市政治生态学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文章说明了社会 - 自然过程如何成为该地区城市化的组成部分。这相当重要，因为它表明，有关非洲城市的基础设施地理结构、社会关系、以及相关的政治和资本流动的讨论，需要超越城市的规模、对网络系统的技术性理解，以及限制加纳等国的主流认知、政策与讨论的规范性解释等尺度。对城市

的政治生态学理解意味着上述的多维度和社会 - 自然过程参与进来；它有助于推动对非洲城市化的批判性研究。人们日趋认识到，我们需要对当下非洲城市基础设施的研究文献中，一些技术中心论和管理主义的主流说法作出回应 (Lawhon et al., 2013)。这篇文章提供了一种方式，“深入肌理地理解和评估城市及其可能的未来，借以重审和重写对发展政策的实用性观点” (Pieterse, 2010: 208)。

其次，文章对电网瘫痪的考察提供了重要的见解，说明了学者如何将阿克拉的城市环境政治化。在此过程中，不同领域的参与者卷入了城市电网瘫痪的生产过程，后者又反映、强化并重塑了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一，不同的参与者被卷入了城市电力网络的历史进程当中，而这一进程本身可能是割裂的 (Graham and Marvin, 2001)，并且容易受到新近出现的气候变化与城市扩张的代谢过程的影响。殖民者的角色当然也与此相关，他们形塑了电力网络的基础设施地理结构，其中仍内蕴着遗留已久的殖民时期治理问题，需要我们跟进思考。不过，自独立以来，殖民历史显然已被重塑：世界银行更倾向于投资阿科松博的水力发电站，水坝则需以优惠价将能源提供给由国际资本控制的 VALCO，再加上从恩克鲁玛政权开始，将电力生产多元化的尝试就屡屡宣告失败，以上所有的因素都使得电力网络极易受到气候变化和能源密集型城市扩张的影响。电力部门日趋自由化，令问题雪上加霜。其中，最为严重的状况无疑是加纳政府无力负担日益老化的基础设施的换新费用。ECG 和 VRA 等公共事业公司的举措进一步加剧了网络的脆弱程度：无力偿还款项、持续的争端和债务，使得公共事业公司没法为加纳未来的能源需求做出适当规划。一大批参与者牵涉进了能源循环的生产历史（本文主要考察电力），而要理解这些与电力相关的组织和机构，就要对当下基础设施的配置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既需要关注在全球语境下生成的、复合的阿克拉治理史，也要关注在这些历史中生成的本地格局 (Chalfin, 2010)。

其二，气候变化对能源生产和电网瘫痪的影响日益深远，也与由来已久的电力网络脆弱状况密切相关。这表明气候变化是具有政治性的：它在一系列尺度上使城市基础设施政治化。全球北方的工业化国家发起的人为进程、加纳政府对水电的依赖、VALCO的电力需求、世界银行的政策以及VRA应对这些要紧事时的失职，共同揭示了诸多隐性和显性的决定因素如何在本地和更大范围内造成了电网瘫痪。另外，这些参与者的行动，与历史上对水力发电的投资相交织，导致了以阿科松博为中心，延伸至整个萨赫勒地区，并继而进入地球大气层的一系列代谢过程的瘫痪。随着气候变化愈发明显，上述的发现还需要进一步的深究，帮助我们理解人为进程如何与基础设施的生产历史交织在一起，它们如何重新配置社会 - 自然关系，以及这些动态过程对政治、政策和社会公正的影响。

其三，本文的分析还与阿克拉城市化进程当中的一批当代参与者有关。借助或隐或显的消费选择、政策导向和逐利动机，他们推动了能源需求的增长。在建筑环境的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的历史与当代进程为一系列参与者创造了利润，他们从殖民当局到后殖民精英，囊括了本国的房地产开发商，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国际房地产投资人。此外，世界银行在制定结构调整方案时对整个城市的影响也有目共睹，该方案得到了加纳政府的部分支持，严重削弱了城市与国家规划部门的能力。阿克拉市议会与城乡规划部要么因为欠缺能力，要么因为难以追究精英和开发商的责任，最终未能有效地应对城市的无序扩张，这进一步加剧了能源密集型城市化的趋势。在此情形下，精英阶层与房地产开发商建成了更多的中上阶层住房系统，使得城市能源需求剧增。而这些住房系统的设计与能源使用，则恰恰与日益壮大的中上阶层的消费选择相合。这样的分析提醒人们关注，城市基础设施的研究需要如何指认空间与社会不平等的持续性重构。这种重构建立在割裂的城市化的基础之上，后者正是城市化的当代形式与这种地理结构中的社会利益结成的产物 (Graham and Marvin, 2001)。

最后，面对能源网络持续性瘫痪时的不同反应表明，城市贫民与中上阶层/精英在应对断电时的能力差距悬殊，穷人遭受的影响往往十分严重。正如 Ga Mashie 的一位社区领袖所言，“这会阻碍社区的经济发展”。穷人无法负担昂贵的技术费用，被迫使用一些需要摸索的或是临时性的策略，试图减少频繁的断电事件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去的损失。但这又使得穷人的遭遇变得更糟。相比之下，中上阶层/精英却可以便捷地使用发电机之类的技术。此外，可持续技术和不同形式的能源安全保障的相互结合，催生了新形式的（分裂）城市主义，这可能导致进一步的城市分裂和能源网络不平等，但同时却可能为中上阶层/精英开辟能源的安全岛。虽然更大范围内的城市能源网络会继续运转，但 Coutard 和 Rutherford (2011:107) 指出，“‘小规模’‘去中心’‘分散’或者其他‘替代性’技术的发展，显然在环境、空间、社会和政治等层面，挑战着城市固有的网络化特性，而这些层面恰恰是技术基础设施运转并发挥影响的地方。”虽然这种后网络化的城市化目前还只是初露苗头，但随着不断增长的中上阶层/精英试图避免遭遇更大范围内的基础设施瘫痪，它有可能在阿克拉各地开枝散叶。这种网络化的地理结构要求我们进一步探问以能源安全为要的新型城市化形式 (Hodson and Marvin, 2009)，进一步探究这些形式如何重塑了城市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低收入家庭和社区面对（不平等）状况的应对手段 (Silver, 2014)。

本文聚焦于电力瘫痪，揭示了形塑阿克拉电力网络的社会 - 自然过程的重要性。关键在于，文章探究了卷入这种新兴的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地理结构的参与者们，试图将这种动态过程政治化。文章发现并找出了分布在基础设施系统当中，并与其相关的权力关系，正是这种权力关系要求重新配置电力网络、新的城市化形式以及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代理机构，以便最终在阿克拉地区催生一种更加公平的能源格局。

参考文献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2011)

The middle of the pyramid: dynamics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WWW document]. URL http://www.afdb.org/fileadmin/uploads/afdb/Documents/Publications/The%20Middle%20of%20the%20Pyramid_The%20Middle%20of%20the%20Pyramid.pdf (accessed 12 January 2015).

AMA (Accra Metropolitan Assembly) (2006)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ensus 2000 [WWW document]. URL http://ama.ghanadistricts.gov.gh/?arrow=atd&_=3&sa=3004 (accessed 13 August 2012).

Angelo, H. and D. Wachsmuth (2015)

Urbanizing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 critique of methodological cityis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9.1, 16–27.

Bank of Ghana (2007)

The housing market in Ghana.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Bank of Ghana, Accra.

Breisinger, C., X. Diao, R. Schweickert and M. Wiebelt (2009)

Managing future oil revenues in Ghana—an assessment of alternative allocation options, Kiel Working Papers 1518 [WWW document]. URL <http://www.ifpri.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ifpridp00893.pdf> (accessed 5 January 2013).

CARE (2007) Climate change and poverty in Ghana. CARE, Accra.

Castree, N. (2001)

Marxism, capitalism, and the production of nature. In N. Castree and B. Braun (eds.), *Social nature: theory, practice, and politics*, Blackwell, Oxford.

Chalfin, B. (2010)

Neoliberal frontiers: an ethnography of sovereignty in West Af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

Coutard, O. and J. Rutherford (2011)

Post-networked cities: recombining infrastructural, ecological and urban transitions. In H. Bulkeley, V. Castan Broto, M. Hodson and S. Marvin (eds.), *Cities and low carbon transitions*, Routledge, London.

- Davis, M. (2006) *Planet of slums*. Verso, London.
- Demissie, F. (2007)
Imperial legacies and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 introduction. *African Identities* 5.2 155–65.
- Dickson, K. (1969)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Gha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Energy Commission of Ghana (2013)
National energy statistics 2000–2013 [WWW document]. URL http://www.energycom.gov.gh/files/ENERGY%20STATISTICS_2014_FINAL.pdf (accessed 12 March 2015).
- EPA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2000)
Ghana national submission to UNFCCC. Ghana National Government, Accra.
- Fitch, B. and M. Oppenheimer (1966)
Ghana: end of an illusion.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NY.
- Fobil, J.N., D.K. Attaquayefio and Volta Basin Research Project (VBRP) (2003)
Remedi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Akosombo and Kpong dams. HORIZON Solutions Site: Public Health, Yale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Biology, HORIZON International, New Haven, CT.
- Gandy, M. (2004)
Rethinking urban metabolism: water, space and the modern city. *City* 8.3, 363–79.
- Gandy, M. (2005)
Cyborg urbanization: complexity and monstrosity in the contemporary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9.1, 26–49.
- Ghana Energy Commission (2012)
Energy statistics 2000–2012 [WWW document]. URL http://www.energycom.gov.gh/files/Ghana_Energy_Statistics_2012_AUG.pdf (accessed 2 March 2015).
- Ghanaweb (2015)
ECG privatisation: top management summoned over leaked report [WWW

document].URL <http://www.ghanaweb.com/GhanaHomePage/NewsArchive/artikel.php?ID=345280> (accessed 23 February 2015).

Goldman, M. (2005)

Imperial nature: the World Bank and struggles for social justic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

Government of Ghana (2000)

Climate change submission to UNFCCC. Government of Ghana, Accra.

Graham, S. (ed.) (2010)

Disrupted cities: when infrastructure fails. Routledge, London.

Graham, S. and S. Marvin (2001)

Splintered urbanism. Routledge, New York, NY.

Grant, R. (2009)

Globalizing city: the urba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Accra.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NY.

Gyau-Boakye, P. (2001)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Akosombo Dam and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the lake level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3.1, 17–29.

Hanson, A.E. (2010)

Failure to plan means planning to fail. *Daily Graphic* 29 November, 31.

Hess, J. (2000)

The structure of nationalism in Accra, Ghana. *Africa Today* 47.2, 35–58.

Heynen, N. (2006)

Justice of eating in the city: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urban hunger. In N. Heynen, M. Kaika and E. Swyngedouw (eds.), *In the nature of citi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Routledge, London.

Heynen, N., M. Kaika and E. Swyngedouw (2006)

In the nature of citi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Routledge, London.

Hodson, M. and S. Marvin (2009)

‘Urban ecological security’: a new urban paradig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3.1, 193–215.

Honkaniemi, N. (2010)

Conditionality in World Bank crisislending to Ghana [WWW document]. URL <http://eurodad.org/4211/> (accessed 12 April 2015).

Iiffe, J. (1987)

The African poor: a history. African Studies Series, no. 5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Jaglin, S. (2014)

Urban energy policies and the governance of multilevel issues in Cape Town. *Urban Studies* 51.7, 1394–414.

Kaika, M. (2005) *City of flows*. Routledge, London.

Keil, R. (2003)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a progress report. *Urban Geography* 24.2, 723–38.

Keil, R. (2005)

Progress report: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Urban Geography* 26.4, 640–51.

Konadu-Agyemang, K. (2002)

The best of times and the worst of times: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and uneven development in Africa—the case of Ghana.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2.3, 469–81.

Kooy, M. and K. Bakker (2008)

Splintered networks: the colonial and contemporary waters of Jakarta. *Geoforum* 39.6, 1843–58.

Lawhon, M. (2013)

Flows, friction and the sociomaterial metabolization of alcohol. *Antipode* 45.3, 681–701.

Lawhon, M., H. Ernstson and J. Silver (2014)

Provincialising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expanding UPE through African urbanism. *Antipode* 46.2, 497–516.

Loftus, A. (2006)

The metabolic processes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in Durban's waterscape. In N. Heynen,

M. Kaika and E. Swyngedouw (eds.),

In the Nature of Citi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politics of urban metabolism, Routledge, London.

Loftus, A. (2007)

Working the socio-natural relations of the urban watersca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1.1, 41–59.

McFarlane, C. (2010)

Infrastructure, interruption, and inequality: urban life in the global South. In S. Graham (ed.), *Disrupted cities: when infrastructure fails*, Routledge, Oxford.

McFarlane, C. (2011)

Learning the city: knowledge and translocal assemblage. Wiley Blackwell, Oxford.

McFarlane, C. and J. Rutherford (2008)

Political infrastructures: governing and experiencing the fabric of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2.2, 363–74.

Mouton, M. (2014)

The Philippine electricity sector reform and the urban question: how metro Manila's utility is tackling urban poverty. *Energy Policy* 78 (March), 225–34.

Moxon, J. (1969)

Volta: man's greatest lake—the story of Ghana's Akosombo Dam. André Deutsch, London.

Myers, G. (2006)

The unauthorised city: late colonial Lusaka and postcolonial geography. *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27.3, 289–308.

Njeru, J. (2006)

The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of plastic bag waste problem in Nairobi, Kenya. *Geoforum* 37.6, 1046–58.

Otiso, K. and G. Owusu (2008)

Comparative urbanization in Ghana and Kenya in time and space. *GeoJournal* 71.2, 143–57.

Owusu, K., P. Waylen and Y. Qiu (2008)

Changing rainfall inputs in the Volta basin: implications for water sharing in Ghana. *GeoJournal* 71.4, 201–10.

Oxford Business Group (2012)

The Ghana report [WWW document]. URL http://www.accraexpat.com/real_estate/news_article.php?news_id=1 (accessed 12 January 2015).

Peck, J. and A. Tickell (2002) Neoliberalizing space. *Antipode* 34.2, 380–404.

Pieterse, E. (2008)

City futures: confronting the crisis of urban development. Zed Press, London.

Pieterse, E. (2010)

Cityness and African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Forum* 21.3, 205–19.

Quartey, J. (2010)

The demand for energy and economic welfare in Ghan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Kwame Nkrum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masi.

RCEER (Resource Centre 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Regulation) (2005)

Guide to electric power in Ghana,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WWW document]. URL http://www.beg.utexas.edu/energyecon/IDA/USAID/RC/Guide_to_Electric%20Power_in_Ghana.pdf (accessed 2 June 2012).

Rohracher, H. (2009)

Intermediaries and the governance of choice: the case of green electricity labell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1.8, 2014–28.

Silver, J. (2014)

Incremental infrastructures: social collaboration and material improvisation in

post-colonial Accra. *Urban Geography* 35.6, 788–804.

Smith, N. (1984)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Basil Blackwell, London.

Swyngedouw, E. (2004)

Social power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wat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Swyngedouw, E. (2006)

Circulations and metabolisms: (hybrid) natures and (cyborg) cities. *Science and Culture* 15.2, 105–21.

Tacko Kandji, S., L. Verchot and J. Mackensen (2006)

Climate change and variability in the Sahel region: impacts and adaptation strategie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WWW document]. URL <http://www.unep.org/ecosystemmanagement/Portals/7/Documents/ClimateChangeSahelCombine.pdf> (accessed 21 November 2012).

UN-Habitat (2009) *Ghana Accra urban profile*. UN-Habitat, Nairobi.

Williams, J. and J. Ghanadan (2006)

Electricity reform in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a reappraisal. *Energy* 31.6, 815–44.

World Bank (2004)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Guarantee Agency (MIGA) annual report.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Yeboah, I. (2000)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merging urban form in Accra, Ghana. *Africa Today* 47.2, 60–89.

Zimmer, A. (2010)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theoretical concepts, challenges, and suggested future directions. *Erdkunde* 64.4, 343–54.



渗漏的国家： 用水审计、“无知”和基础设施的政治¹

尼基尔·阿南德*

高语晨**译

许多***校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供水是很难理解的，” Haresh 对我如是说。Haresh 是一位颇具魅力的水利工程师，2007 年末，我同他讨论了孟买的供水系统及其正在推行的私有化举措。他认为，测量城市管道的水量的尝试往往很难奏效。他解释道：“当你同水打交道的时候，你处理的是一个近似值。由于管理顾问们不理解这个事关水的最基本的事实，他们的所有项目都失败了。管理顾问们只关注财务方面，而忽视了水的技术限制。这就是 K-East 项目失败的原因……如果你再看看私有化改革……管理顾问们所到之处，项目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政府是另一个罪魁祸首，政府根本无意解决供水难题，因为这与它的利益无关。”

Haresh 对管理顾问的工作大加鞭挞，听闻他说只能用近似值来测量水量时，我还是有点吃惊。水作为一种基本物质，形态变化极小。在我的想

* 尼基尔·阿南德 (Nikhil Anand) 是明尼苏达大学地理、环境与社会系的助理教授。他的研究聚焦于全球南方城市基础设施维护的生态学和政治技术。他目前正在完成他的第一本书：《水利城市》(The Hydraulic City)，该书考察了水利公民和国家是如何在城市中被制造和管理的。他最近的文章包括《压力：供水的政治技术》(Pressure: The PoliTechnics of Water Supply)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11) 和《城市时代的住房：孟买的不平等与渴望》(Housing in the Urban Age: Inequality and Aspiration in Mumbai) (Antipode, 2011)。

** 高语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 许多，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研究生。

1 原文刊于 *Public Culture* (2015) 27 (2 (76)): 305–330. Duke University Press.

象中，水量特别方便测量，供水模型也容易建立，水的特性有利于远程管理 (Scott 1998; Rose and Miller 1992)。事实上，在研究孟买供水网络的过程中，面对供水网络产生的巨量数据，我有些不知所措。每天都会产生日需求量、管道直径、水位、供水区间和水压等数据，使水得以流向千家万户。虽然这些计算都是城市供水系统和市民用水的必要条件，但 Haresh 也告诉我，关键在于，水的各种数据并不反映确凿的数量，而只是近似值。Haresh 认为，正是因为管理顾问们假定通过查水表测流量就能轻易摸清管网渗漏现象，并加以整治，他们改造城市供水网络的项目才会失败。

和其他许多超大城市一样，孟买这座城市的贫富差距极大，触目惊心。公共供水系统的规则、实践和政治再生产着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 (Anand 2011b; Graham, Desai, and McFarlane 2013; Gandy 2014; Ranganathan 2014)。一方面，政府专营的城市供水规则剥夺了某些定居者合法获取水源的权利。² 大约一百万定居者因无法证明他们自 1995 年以来就居住在自己的住房里而没有申请供水的资格，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改观。另一方面，即使证明了自己资质的定居者可以合法地要求政府供水，与居住在城市规划住宅中的居民相比，他们所获得的供水配额也更少。供水部门制定供水方案，按照时间表将每天固定的供水量分配给不同居民，所以城市中的一些社区每天只能获得几个小时的供水。在这里，时间表也制造出差异。中产和上流阶层的住宅配有储水箱，储水箱会自动取水和储水。然而，定居者的水源则不确定，这给他们带来相当大的压力。他们每天都需要和其他共用水龙头的人商量，在断水前，谁负责给水桶灌水，按什么顺序灌，每只水桶应该装多少水等等问题。由于需要有人到场取水，所以供水时间（无论凌晨 4 点还是下午 4 点“来水”）决定了家庭成员的作息，谁可以在什么时候睡觉、工作或上学。

2 我希望自己与某种卖惨话术划清界限，比如“贫民窟”和“贫民窟居民”等标签。我将居住在未经市政府批准的住房中的居民称作“定居者”（居住在定居点的人）。

世界银行认为，间歇式的供水系统危害居民的健康，为此一直敦促孟买政府转而开发全天候、不间断的供水分配制度。³这一转变会导致监管重心的转移，不再由工程师通过控制供水时间段来管理自来水分配，而是由用户根据水价自行调整用水量。因为全天候供水系统尤其需要配备更少漏水、密封性更好的输水管道，所以世界银行在2004年资助了配水改善项目（WDIP），认为“改善”孟买供水现状的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⁴该项目的当务之急是，由顾问团领头，对K-East选区（孟买市24个选区之一）进行一项调研，并对用水进行核查。2004年至2007年期间，包括Haresh在内的世界银行顾问团对该选区的输水管道容量和渗漏情况进行了测量和核实。调研结论反映出来的数据令市政供水部门的工程师们感到不快，顿时感觉脸上无光，他们开始质疑调研程序和结论，企图推翻顾问团给出渗水数据。因此，虽然人们希望用核查水量的方式，得出清晰的渗水数据，从而帮助人们诊断供水系统存在的弊病，让人们明白改革已刻不容缓。但是在孟买，这些数据都不可靠，以至于没有任何技术政治的改革能介入供水管网。相反，这些不可靠的数据恰恰表明了：对渗漏问题的无知在多大程度上构造着这座城市的政治、本质和技术。

我在本文探讨了在孟买测量渗漏所面临的政治风波和技术争议，可以看出，正是技术、物质和社会生活深厚的历史积淀，形塑着孟买的水利基础设施，也挑战着新自由主义治理的审计文化。虽然“查水表”这样的形式要求世界银行的顾问假定：社会关系和造成损失的物质管道之间没有关系，但我认为管道、工程师和居民共同塑造了城市的面貌，三者之间存在隐蔽关联，使得顾问团的努力付之东流，得出的漏水数据显得既不可靠，

3 在间歇式的供水系统中，自来水管道只在一天中的特定时段注入加压的水，因此污水会在没有高压水注入的时候从周围的地表渗透到供水管网中。官员们建议，在全天候、不间断的系统中，管网将一直处在加压状态，未经净化的水就不会渗入管道，不会造成污染。

4 在德里和班加罗尔，世界银行支持的供水私有化项目遭到了公众的强烈反对，随后便宣告失败了，世界银行及其顾问团仍没有从这两场失败中恢复元气。在孟买，他们一再向公众保证，项目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而不是私有化。尽管该项目的官方名称就是配水改善项目（WDIP），但政府官员、工程师、居民，甚至古怪的人类学家都被告知，“不要把这称为私有化”（笔者的田野笔记）。

又不令人信服。

在我提出这个论点时，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我并不试图测量城市中有多少水“真的”在渗漏。事实上我认为，孟买水利基础设施是由各种社会和物质关系塑造的，我们不可能确知具体的漏水量。其次，我并不想暗示大规模的漏水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所独有的。漏水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城市基础设施的病状，也不是政府官员渎职或无能的结果。年久失修的基础设施漏水严重，在全世界各大城市都存在（Bornstein 2014）。每个地方供水系统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早就对无处不在的漏水见怪不怪，也深知修补漏洞会难上加难。例如，据估计，纽约市大约有30%的供水管网存在渗漏（Murley 2011）。由于下文描述的种种原因，纽约供水系统中存在的渗漏，早在20年前就被发现了。尽管事实上这些隧道漏得和“筛子”一样，但直到2008年，市政才开展修补工作（Belson 2008）。在世界各地的供水系统中，漏水都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需要大量努力才能找到漏水的具体位置，并开展修复工作。

相反，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市政部门设计和管理着供水系统，但渗漏（以及关于渗漏的知识）往往超出了它们的制度掌控范围。城市的水利工程师经常忽视漏水问题，并且对供水系统中各种程度的渗漏视而不见。他们的忽视永远不会削弱他们的权威。事实上，城市中漏水管道始终需要（并产生出）权威，以及各种都市专业人士的工作，如水管工、政客和城市水利工程师。孟买有超过100万居民一直没有合法获取自来水的资格，漏水管道使他们能够获得这一生存必需的物质，而避免了缺水引发的暴动。因此，漏水不仅仅意味着损失。它们是不受控制的、不为人知的水流，形构着城市供水基础设施所组织的生活和状态。

在本文中，通过对城市渗漏情况的描述，我提请大家注意：这些无法计算的水流不仅受制于人类的政治制度，也受制于受城市供水基础设施的材质和历史所影响的政治（Braun and Whatmore 2010; Bennett 2010）。

在这个动态的、充满偶然性的系统中，渗漏在孟买的表现形式使漏水很难被测量、统计和管理。各类渗漏在城市中产生出有所区别的妥协形式，或干脆被“坐视不理”。⁵ 国家工程师力图控制水的各种渗漏，这让我想起 Haresh 的观点，即通过近似值和估算量来更有效地管理水。的确，当我跟随城市水利工程师进行日常的供水基础设施维修工作时，我观察到他们的效率是如何较少地依赖于基于测量的干预措施，而更多地取决于积极协商的、非正式的维修技术。他们对水利管网的权威，来自于他们既知道如何修补渗漏，又明白何时该对此“坐视不理”。

“无知”的国家

在过去 20 多年里，研究政治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国家采用现代的测量技术，使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和自然景观变成可读取的数据，从而构建起自身的权威（Scott 1998）。人口普查、地籍图、财产登记和申请表等实践形成了各种文书（Anderson 1983; Appadurai 1993; Hull 2012b; McKay 2012），凭借白纸黑字的文牒，权力当局在复杂空间中对特定事物的位置和流通，予以官僚化的管理（Poovey 1998; Hull 2012a; Sharma and Gupta 2006）。不少著作已经研究过国家的形成过程，发现权力关系既是知识生产实践的产物，也是知识生产的构成要素，但是我将在本文探讨“无知”在维持国家机构运转上起到的作用（Mathews 2008; McGoey 2012）。

在流行用语中，无知具有负面意涵。无知通常被定义为某种缺乏，牛津英语词典对无知的释意是“知识的匮乏”。在启蒙传统中，无知是一个贬义词，它经常指向知识创造脱颖于的那一重黑暗而愚昧的底色。因此，知识是实现美好生活和良善社会的关键，而无知者则是不受欢迎的，既因为他/她没有知识，也因为他/她缺少求知欲（Bishop and Phillips

5 由于漏水数据首先促使国家启动改革项目，随后又摧毁了这项改革，我们或许可以将漏水视为外部非构成性因素——这是城市水利状况形成和改革的另一重“历史”（参见 Chakrabarty, 2000）。

2006)。然而，近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无知并非知识创造工程的残留物，也不是由于人们无力看到真相（High, Kelly, and Mair 2012）。正如研究社会灾难和自然灾害的学者所说，在人、技术和话语之间的权力关系领域，无知往往是伴随着知识而产生的（Foucault 1982; Perrow 1982; Klinenberg 2002; Fortun 2001）。

例如，在 Adriana Petryna(2002) 关于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件的民族志研究中，她展示了负责救灾的官员如何拒绝承认灾情，并混淆视听，他们并不创造事故的相关知识，反而蓄意制造无知，蒙蔽灾情的真实情况以及后果（另见 Proctor and Schiebinger 2008）。Petryna (2002: 29) 援引 Hans Blumenbur 的著作，认为无知“指的是‘形成某种特定态度的实践，方法和路径。’”无知的力量非常强大，“与知识一样有力、复杂”（Sedgwick 1988, 引自 Bishop and Phillips 2006: 181）。无知是一种实践，需要人们付出努力，保持审慎的态度，同时积极参与了知识、权力和真理的生产。因此，无知与其说是缺乏知识，不如说是不去致知的一种形式，它和求知一样，也参与了意义、物质、人和制度的生产（McGoey 2012）。

因此我在本文描述的无知的世界，并不是指城市供水部门的工程师或顾问缺乏业务能力。相反，我希望探讨无知的政治效应，因为它凝结在不同的专家位置，使特定类型的机构和主体得以形成。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设想的官僚体制不同，没有一个政府机关或水利专家能全方位掌握孟买供水系统的实际运作情况。在孟买供水部门工作的工程师们，面对不同地方、不同形式的漏水，显得既无知，又略知一二。与此同时，我想强调的是，无知作为一种政治的技艺（a technology of politics），不仅产生于（人类）求知意愿的匮乏（Bourdieu 1977）。通过提醒人们关注集结在地下管道及其渗漏周围的无知，我认为无知也是由构成城市基础设施的技术的政治效应所带来的。⁶ 我将表明，这些无知有时符合（sometimes

6 近年来，科学家和地理学家已经注意到基础设施系统的物质性及其政治含义非常重要，并敦促我们也将非人类的要素视为我们政治文化的参与者（Haraway 1991; Braun and Whatmore 2010）。例如，Jane Bennett 在她关于电力的研究中主张：不仅要关注社会因素，还要关注构成基础设施的物质行动者（material actants）。她认为，电网在人类和非人类之间架起了“活生生的、跳动的联盟”（Bennett 2010: 24）。

articulate with) 人类的目的性行动, 但同时又超越了这些行动。它们暴露出在管理、规范和控制构造城市的固有物质基础设施时人力的限度(另见 Collier 2011)。

围绕测量的争议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 随着人们对水资源短缺的担忧日益加重, 孟买的供水系统得到了扩展和管理。在孟买的私下谈话和公共讨论中, 人们认为缺水是对城市的极大束缚,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未来的发展。据说正是因为缺水, 城市才无法全天候供水。我们还知道, 正是因为缺水, 市政府才需要制定、管理并实施一项供水时间表, 让城市中不同社区的居民在每天的固定时段获得几小时的供水。事关缺水的话语使孟买的水利基础设施得以持续修建和扩张。而在我查阅政府文件, 采访高级水利工程师后却发现, 流入孟买的水资源已经足够满足所有居民的用水需求了。⁷ 我的观点与 Haresh 的判断一致, “缺水”问题与这座城市鲜为人知、未纳入计量的供水管道渗漏关系更大, 这些供水管道连接着水库和居民住房。

孟买市政公司(俗称 BMC)假定渗漏率为 25%(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 1994)。然而, 由于全市一半以上的水表无法正常计数, 尚不清楚该数字是如何计算出来的。此外, 城市中许多老旧的出水管道根本没有安装水表。我在当地开展了近两年的实地调查, 从来不知道, 供水部门是如何统计用水量或漏水量的, 因为测量工具和水表往往缺少记录, 而且不可靠。在水表运转不灵, 或压根没有启用的情况下, 城市供水部门是怎么知道工业用水、企业用水和居民用水各自的消耗量的? 如果相关部门连

⁷ 根据水利工程部在 2007 年印度城市空间会议上公布的数据, 该市每天 33.5 亿升的供水量中, 有 92% 分配给了家庭消费者(水利工程部, MCGM 2008)。考虑到存在 25% 的渗漏率, 该市 1250 万居民每人每天的可用水量应为 188 升。这一数字明显高于香港(112 升)、上海(143 升)和伦敦(146 升)的人均日用水量, 与新加坡(183 升)的人均日用水量相当(Gulyani, Talukdar, and Kariuki 2005; Castalia Strategic Advisors 2007)。

城市的总用水量都不知道，又怎么能知道渗漏了多少水呢？可以想象，孟买相当多的自来水，似乎应该是去向不明的。如果说市政部门给出的耗水量和漏水量的数据仍不清不楚，那么很明显，这些数据经常在谈话、新闻报道和规划文件中发挥作用，以表明供水部门是高效的、有能力的、能胜任此职的公用事业部门，无需接受多边发展机构，比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的“援助”。⁸ 这些数据可以标榜供水部门的实力和管理有序，使得多边机构发起和推动的一揽子结构调整、改善和私有化计划，在工程师的阻挠下，一拖再拖。

然而在2004年，世界银行与联邦城市发展部联合发布了一项计划，旨在“改善水资源的管理与分配”，首先要在孟买北部的K-East选区开展一项试点研究（Castalia Strategic Advisors 2007）。顾问团核查了该选区的用水状况，发现该区近40%的供水都漏走了。这个数据在高级工程师圈子内不胫而走，他们立马怒火中烧。他们多年来精心打造的光辉形象，可能会被这个数据毁于一旦。高级工程师们旋即对这些数据表示怀疑，公开诋毁顾问团的工作，质疑他们的研究动机。例如一位高级工程师与我谈起这项研究时说，“世界银行企图编造故事……炮制出40%的漏水率，这样他们就可以将供水系统卖给私人公司了。”他为了让自己的说法更可信，还说在研究开展之前，顾问团就已经把私有化所需的合同文件起草完毕了，挑明隐藏在漏水数据背后的目的，正是要证明私有化倡议的正当性。供水部门对数据表示怀疑后，开始公开质疑顾问团的方法论和研究动机。供水部门的工程师将内部备忘录提供给活动人士和记者，以证明WDIP为了把供水系统私有化而炮制数据的居心已昭然若揭。本地记者开始报道市政工程工程师和顾问团之间的纠纷时，直指顾问团测量渗漏时存在各种困难。以2007年6月2日《午间新闻报》（the news daily Mid-Day）的一篇报道为例：

8 因此，该市供水部门为亚洲开发银行（印度城市发展部和亚洲开发银行2007）编写的一份关于印度城市供水状况的报告提供了数据，这些数据表明该市的供水网络覆盖了100%的人口，而未被计入的水占供水总量的13.6%。结合供水部门的运营利润，这些数据展示了一个强大的、运作良好的供水公司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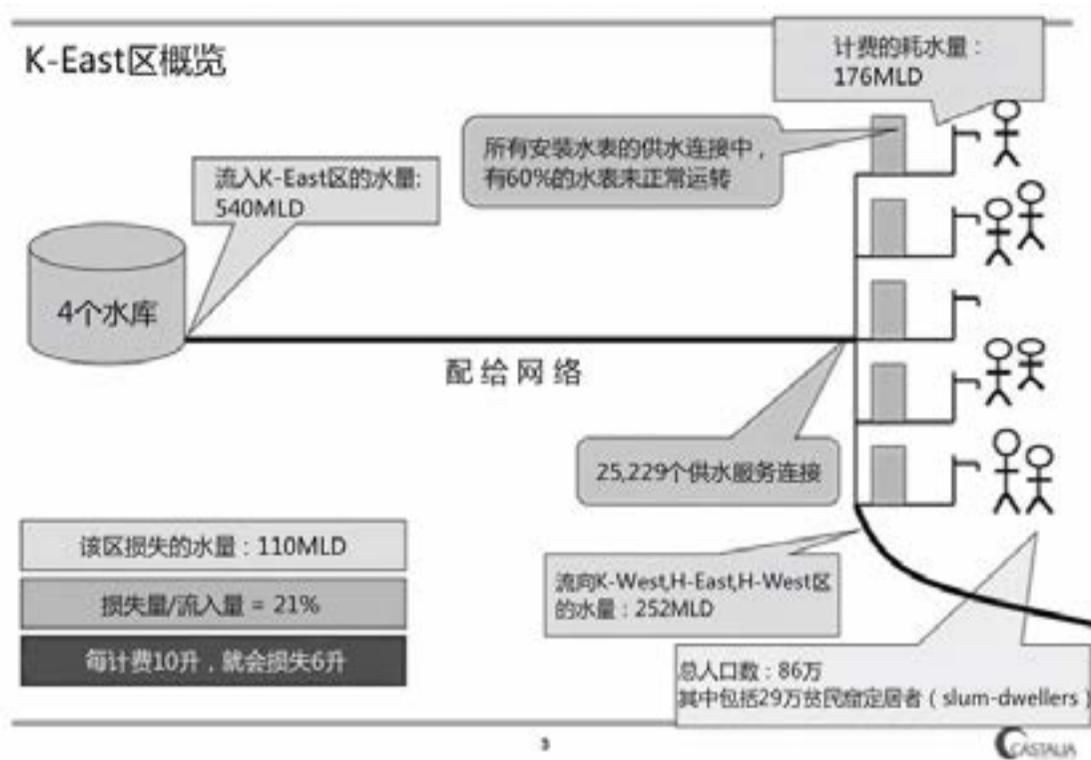


图 1: K-East 区供水预算。2007 年 6 月 3 日在第二次利益相关者磋商会议上展示的幻灯片。MLD (million liters a day) : 百万升 / 日——译者注。

新西兰的水务咨询公司 Castilas[原文如此] 在 Andheri(E) 的 K-east 选区实施一个试点项目，却一直无法计算出该区因漏水而损失的水量。该项目的目的是论证以 BMC 的名义将分配权授予私人机构是否可行，并于 2003 年提交了它的第一份报告。

报告称，由于渗漏，K-east 区的供水损失了 40%，BMC 驳斥了这一报告。在 2005 年提交的第二份报告中，Castalia 将损失率定为 14% (Rao 2007)。随后双方陷入僵局，世界银行的官员来到孟买，以挽救 WDIP 及其改革计划。我在僵局缓和几个月后，访问了顾问团和市政水利工程师，他们回忆了市政工程师、世界银行官员和顾问团之间的紧张谈判和激烈争论。城市供水部门随时有可能拒绝接受这项研究报告，管理顾问团在压力之下，同意向供水部门做出小小的让步。他们决定不用标准水平衡公式来测算漏水量（见下文），转而采用另一个公式来计算漏水量，使数据与市供水部门的期待不至于相差太远。他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上展示的一张幻灯片，图解了围绕漏水数据的冲突（图 1）。在左下角，就在修正后的 21% 的“损耗”率下面，还躺着另一个与之相矛盾的数字：“每计费 10 升，就会损失 6 升。”

也就是说，在 16 升水中，有 6 升（即 K-East 地区 37% 的水）正在渗漏——要么流到了地下，要么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被人擅自使用。

通过测量城市水流量的项目，顾问团和市政工程工程师都企图使城市的水变成可治理的对象。然而，测量漏水的努力在该市不断面临妥协、质疑和挑战。这并不是因为市政工程工程师或世界银行的顾问团玩世不恭或腐败。漏水量是极难测量的，并且身处政治争议中，无论是世界银行还是城市水利工程师都无法获知确切的漏水量，即使他们的初衷是好的。尽管新自由主义的审计技术使得如此多的地方和事物变成可治理的对象（Strathern 2000; Hetherington 2011），但在孟买，供水基础设施在物质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积淀，则挑战了这种政治技术在管理城市用水时的稳定性。为了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水是如此难以测量，我首先介绍了在孟买及其他地区水流量计算中盛行的具体审计方法。随后，我密切关注城市供水基础设施的物质政治，在一个饱受争议的改革项目中，这种物质政治的运作方式使审计的结果变得不稳定且不可靠。

核算渗漏

审计已成为一项关键技术，用来评估、比较和“改善”机构运作的成效，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国家机关和其他服务供应方都采纳了这项技术（Strathern 2000）。虽然各地供水工程先前用来计算漏水量的公式和程序各有区别，但是国际水协会（IWA）在 2000 年发布了“标准水平衡规程”，试图打造计算水量的统一标准，从而使世界不同地区的城市供水系统具有可比性（Lambert and Hirner 2000）。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随即开办了讲习班，印度的城市管理者和水利工程师前来参加培训，学习使用“标准水平衡”对水量进行核查，以便他们能够“对标”各地供水公司的绩效（见印度城市发展部和亚洲开发银行 2007；世界银行 2006）。因此世界银行

派遣顾问团来到孟买，研究当地供水网络，测量水流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表 1 是标准水平衡表最基本的形式，试图衡量和说明城市水网中的耗水和漏水情况。消耗和损失被解析为不同的、分开的、可测量的各种水流，散布在表格的不同位置上。其中，未经批准的用户的用水量被定义为“表面损失（apparent loss）”（有时也被描述为“社会损失”[Anand 2011a]）。表面上的损失，意味着损失的不是水本身，而是城市供水部门的收入。相比之下，“实际损失（real loss）”（或物理损失）被认为是水白白渗漏到地下。水流量被货币化时，水平衡表就应运而生了，其核心是掌握未付费水（NRW）的数据——也就是没有被城市公共事业部门计入账单的用水。IWA 的水务专家编制无收入水这一类别，是为了确认供水的这一部分损耗，并加强管理力度，尽量减少这部分损耗，可以采用的一系列策略包括漏水检测、统一安装水表和客户服务。顾问团设想，如果该市测量和减少无收入水的努力持续下去，供水基础设施将得到改善。

表 1: 标准水平衡表

国际水协会标准水平衡表					
系统输入量	经授权耗水量	计费的经授权耗水量	经计费且按水表计量的耗水量	有收入水	
			经计费且未按水表计量的耗水量		
		未计费的授权耗水量	未计费且按水表计量的耗水量	无收入水	
			未计费且未按水表计量的耗水量		
	未经授权耗水量	表面损失			未经授权的耗水量
					用户计量不准确
		实际损失		输水或配水主管道上的漏水	
				公用储水箱的漏水和溢出 取决于用户计量点的服务连接漏水	

虽然从形式上看，表格整齐有序，分类清晰，但是水的形态很难严格吻合表格中体现的类型。当顾问团试图按照表格的要求来测量各种用水量 and 漏水量时，遭遇了挑战。例如，由于用户水表没有正常运转，顾问无法核实居民的用水量。顾问团试图自己获取用水数据，来取代市政工程师给

出的数据，但是两者面临的局面差不多。顾问团遇到运行不灵的水表，仍要计算出用水总量时，只能估算这些用户的实际用水量，用户收到的账单上也只有估算出来的数额（Castalia Strategic Advisors 2007）。测量管网中的漏水量更为困难，因为无论漏水的数量还是类型（表面损失或实际损失），都没有人知道，城市供水部门也没有相关记录。在地面上开展的实地考察也无济于事。事实上，只要顾问团去贫民窟小规模巡视一番，就会承认他们找不到任何一个未经批准的出水口。因此，顾问们无法就地测量表面的和实际的漏水情况，而只能用推测的方式大致导出一个漏水数据，而这种推理是水平衡表的假设所允许的。⁹

因此，实际损失和表面损失的数据是根据上述表格推导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独立测量得出的。这一流程本身并不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会计或审计实践。会计系统很少收集准确反映事物性质和数量的表述，而是往往依赖政治权威、可重复的程序和深文周纳，把不准确的表述当成稳定的事实接受（Poovey 1998）。¹⁰然而在孟买，无论是审计的程序，还是审计的结果，都是不稳定、不可重复、不可验证的。测量程序和以数据的形式呈现的漏水事实，都来源于不完备的知识，在整个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城市工程师和其他专家不断地质疑并改变着这些知识。

例如，市政工程师质疑了为审计而安装的超声波水表，认为磁力水表可能更为准确，因为孟买的自来水供应很特殊，是分时段输送的。他们还

9 例如，他们将实际损失和表面损失相加等于总损失，这就预设了实际损失和表面损失是不搭界的，可以分别计算。为了得出表面损失（未经授权的用水量）的数据，顾问们先是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对商业设施的随机调查推测出用水量的数据，再减去（估计的）经授权用水量。虽然他们承认人口普查数据并不可靠（Castalia Strategic Advisors 2007；另见 Bhan and Jana 2013），而且未经授权的商业偷水数额实际上可能被低估了，但他们仍然从这些数据中推导出结论，认为该区每天损失的 1.1 亿升水中，有 3300 万升是由非法的商业和住宅出水口造成的。为了计算城市水管漏水带来的“实际损失”，他们推断“实际损失”将是在扣除他们估计的“表面损失”（即每天 7700 万升）之后剩余的损失。

10 Mary Poovey (1998) 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可靠而稳定的表征系统，数据才能够站得住脚，就好像它们是独立的事实一样。Poovey 证明，会计是一种对知识进行排序的方法，它之所以产生可靠性，并不是因为生成的数据代表了足够的、可重复检验的结果，而是因为测量的协议——象征着不确定性和无知的协议，通过任意但已标准化的规则约束程序得以稳定。我要感谢 Joseph Masco 和 Joseph Hankins，他们让我注意到数据的不稳定性是如此平常。

挑战了审计的核算方法，追问非供水时段，流经城市管道的无人知晓，也不可能有人知道的水量。顾问团面对接二连三的炮轰，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来回答问题。由于间歇式供水系统产生的模糊和无知，顾问们无力回应城市工程师。

对损失的无知

因此，尽管工程师和顾问团各自给出了数据，以此突显他们的能力，但没有人能够清楚了解孟买有多少水在渗漏，水流向了何方，或者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减少漏水。在孟买，测量用水状况的过程之所以支离破碎，并不仅仅由于世界银行的顾问团和市政工程工程师之间存在政治利益冲突（和分歧）。Shaylih Muehlmann (2012: 348) 在一项关于科罗拉多河三角洲的研究中指出，在任何地方，测量水流量都相当困难，因为“水会不断流动，毫无规律，因而极难量化”（另见 Von Schnitzler 2013）。水具有动态的势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出口和入口”，所以很难计量流水的体量（Muehlmann 2012; 另见 Coelho 2006）。例如在孟买，在某个选区的非供水时段，超出该辖区管理范围，未被检测到的水量有多少？工程师和顾问们在这一问题上分歧严重，互不妥协。

这些不确定性不仅是由水产生的，也是由测量水的技术产生的。工程师们也都知道水表是靠不住的。国际水协会的报告开篇就在强调需要靠谱的水表，指出水表本身“需要谨慎管理”（Lambert and Hirner 2000: 3）。水表很容易出现一系列问题，包括水垢、老化导致的功能退化和流量不稳定（同上）。有时颗粒物堵塞会增加通过水表的水压，导致读数升高（Castalia Strategic Advisors 2007）。在间歇式供水系统中，水表的可靠程度会进一步打折扣。顾问们告诉我，由于每两分钟水就会被重新输送到城市其他地方，时刻变化的水压意味着管道中的水流总是在“发疯”，使得专业人员很难测算水流量。在间歇式供水系统中，每日份的供水流经水管之前，水

管里会残留一些空气柱，而最后这截空气的体量也会被记入水表的读数。¹¹ 在这些不稳定的状况下，国际水协会用来测量和量化不同类型漏水的协议只能是模糊的和临时性的。协议规定了一些笼统的程序，如使用“可用的最佳方法”（Lambert and Hirner 2000: 5）来测量耗水量和漏水量，却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是最佳方法。

尽管 Lambert 和 Hirner 在谈到漏水测量时仍然含糊不清，但他们的《水平衡规程》要求工程师不仅要对漏水量进行分类和测量，还要区分漏水的不同性质，即“表面”或“实际”损失（见表 1）。人们投入很多精力，对损耗进行想象和分类，就是为了清晰区分实际损失和表面损失，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可说的。这种区分如同所有现代主义的区分，为人类在供水系统中发挥能动性和施加干预提供了途径。然而，实际的和表面的损失并不是先验地存在的，而是水平衡规程的一个假设，即表面漏水和实际漏水是不搭界的两件事，不管从基础设施的政治“软件”（法律、政策、操作规则等）来看，还是从管网系统的技术性、无涉政治的“硬件”（管道、阀门等；见 Latour 1996）来看，都应如此。¹²

然而漏水每天都在发生，“实际”损失和“表面”损失只存在模糊的区别。例如，有人非法接入水管偷水，会造成表面损失（当这些水被他们用掉）和实际损失（当未被使用的水也流入地下时）。反过来，随着水渗漏至城市地下，城市居民们随后也可能从井水和泉水中发现并取用这些地下水。事实上，城市居民们推测，漏水的城市管道会定期补充这些“自然”水源（Gudilu 2008; 另见 Belson 2008）。

因此，当工程师和顾问们试图管理、计算和控制孟买的水资源时，他们在确定漏水的数量和性质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们面临的挑战是：

11 最后，即使这些水表准确无误，它们的读数也常常被城市中的抄表员所歪曲，这些抄表员往往故意抄错或者不小心抄错读数。

12 世界银行供水和公共卫生项目的供水改革专家经常谈到供水基础设施的软件和硬件，就好像它们是互不相关的（pers. comm., February 15, 2008）。

既要了解漏水的数量，又要了解这种损失有多少是“表面的”或社会的，又有多少是“实际的”或物理的。尽管供水部门和咨询机构的工程师们积极编制漏水数据，以证明他们的专业资质，但供水网络中未知的水流也使这些数据（以及工程师们的权威）在该市遭遇挑战和质疑。

维修渗漏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供水系统都存在漏水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例如，在人们每天都需要从水管中取水的情况下，很难关闭水管进行维修。供水管网通常深埋于地下，漏水维修是一项艰难、必要且耗时的工作。虽然近年来设计和安装新的水利基础设施的技术有些许进步，但漏水维修仍然是单调乏味的工作，考验着维修技术的极限（Bornstein 2014）。

例如，尽管纽约市供水部门得知输水隧道漏水已达几十年，但直到最近才投入资金，通力协作来修补管网。《纽约时报》详细报道了维修工程的困难之处（Belson 2008）。由于这些输水管道深埋地下，无法关闭，纽约市招募了深海潜水员，让他们一个 24 英尺深的加压水箱中训练一个月。然后，他们定期乘坐钟形潜水器下降 70 层至输水隧道中，轮班工作 12 小时，修理漏水的阀门。与纽约的漏水一样，其他城市供水系统的漏水也经常处于人类责任、维修知识和控制的范围之外。忽视它们往往比修复它们要容易得多。

由于城市水利工程师的维修工作扎根于矛盾深重的社会-技术环境中，工程师们施展着他们的管理技能的方式，与其说像独断专权者，不如说是不得不向城市水利基础设施的政治、劳动和物质材料妥协的专家。维修远非机械的过程，它使社会的和技术的工作变得清晰可见：工程师们需要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即兴才能，以管理维修工作的不同效果。为了确保供水系统持续运转，工程师们需要与城市的管道、水管工、居民以及日常生活

中围绕供水而动员起来的一系列行动者（actors）合作。因此，工程师们不仅需要知道，也需要不知道问题的某些方面，才能开展工作。由于漏水是供水的一个条件，哪些漏水会被修复（以及何时修复）是工程师们在日常工作中不断加以协商的问题。

例如，仅孟买 24 个区之一的 K-East 区，一年就报告了近 3000 起漏水事故。¹³ 其中有 600 多处——几乎每天两处——在 Castalia 的研究中被归类为“主接口漏水和破裂”。由于清楚漏水是供水过程中的正常事件，孟买的工程师们并不太关心它的测量。相反，他们必须决定哪些渗漏点要进行维修，哪些渗漏点要放任不管。由于他们每年要面对数以千计的漏水事故，工程师们说他们的工作模式是“救火”——只处理他们因社会、政治和物质原因而无法坐视不管的问题。¹⁴

为了了解工程师们的日常工作，我有时会同城市水利工程师 Patankar 一起“实地”考察。Patankar 毕业于附近城市的一所工程学院，过去 20 年里，他一直在同一个区生活和工作。因此，他很熟悉该区不同的小区、管道、领导和居民。许多人都认为 Patankar 是一位勤劳的公务员，他负责监管该区的水管和供水连接的维修。他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解决了许多供水设施漏水的问题。他非常谨慎地决定哪些漏水需要处理，哪些漏水需要不上报，这样他就能够继续留在该部门工作（如果上报他所知道的所有漏水情况，他在那里的处境可能会变得非常艰难）。

当我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上，从一个供水问题现场驶向另一个供水问题现场时，我被 Patankar 这位水务专家处理每个问题的方式所打动，他以一种即兴的眼光审视问题，以只有在工作中才能学到的 metis（实践性知识）来处理问题（见 Scott 1988）。2007 年 12 月，我们骑车穿过 K-East 区去

13 根据大孟买市政公司 (n.d.) 的资料，K-East 区的人口为 806,360 人，面积为 28 平方公里。

14 在每天的工作时间表被数以千计的漏水事故填满的过程中，就职于城市各区办公室的工程师们深知，管理供水之所以困难，正是因为表象与现实、物质性与社会性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未知和交替的关系。

检查一条漏水的总水管。我之前去看过那条管道，就在几周前，当时城市的工人们正在修补它。几天前的晚上，水管再次爆裂，邻近街区的居民已经停水两天了。Patankar 说，他花了好几个小时来确定爆裂的位置。管道位于街道表面下方约 10 米处，这给这一工作带来了重重障碍。Patankar 告诉我，每当他的团队试图挖开管道时，湿润的沼泽土壤就会再次坍塌，淹没管道。当我们从摩托车上下来，朝那条出故障的管道走去时，我们穿过了一座桥。我注意到有一条不同的管道顺着桥延伸。这根管子上有许多输水的接口，其中有一些看起来不太合法。这些接口中的一个正在漏高压水，水流入下面的 nalla(排水管) 中。Patankar 根本没看这条管道第二眼。他径直走向 61 厘米长的总水管，那里存在着更大的问题。为了完成他的工作，Patankar 需要一种经验性知识，即如何找到未被看见的问题。然而，要想做到这一点，他需要对某些漏水现象视而不见。

我们到达现场，发现供水部门的员工和重型机械已经开始作业。维修队正在开挖大管道的地方曾经有过一家商店。当我们驻足片刻观看施工的时候，有几个人走过来与我们交谈。“你们会不会又把我们的水给断了？”其中一个人问道，他指的是之前维修管道的时候，停了两天的水。Patankar 对此不置可否，向他们保证，如果要停水，他们会接到通知。另一个人就不高兴了。他反对这项维修作业，并咄咄逼人地抱怨，这家商店在被拆除给维修工作让道之前，在那里开了整整两年。Patankar 或许担心此人的强硬态度，但担心并没有写在脸上。相反，他面带微笑，追问土地用途的变化：“谁让他把商店建在水管上的？”Patankar 向那个(不在场的)店主隔空喊话。“是先有管道还是先有商店？”“当然是先有管道。”抱怨者说，Patankar 的质问多少堵上了他的嘴。

在我们说话的当儿，维修队正想找到连通破裂管道的阀门，把阀门关掉，检查工作就能更方便地进行。Patankar 走过另一座桥，注意到路边放着一块厚厚的金属板，他让四名手下把它移到一边。当他们哼哼唧唧着挪

开那块沉重的金属板时，发现地上有一个大洞。往下一看，大约三米深的地方，隐约可见一个窨井盖，下面有一层积水。Patankar 问维修人员，有没有办法进入窨井，去下面找到阀门。队员们对眼前的状况，各有各的理解。不难想象，他们对这一提议的反应并不热烈。他们建议将一个照相机伸下去，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Patankar 同意了，问维修人员能否在供水时间，即水流经管道的时候完成作业。基层工作人员再次表示不同意，理由是如果有水流过管道，就很难看清管道里的状况。好在他们答应明天带着照相机再来一趟。Patankar 眼看问题又拖延了一天，叮嘱了主管几句，我们就离开现场去处理另一个问题了。

供水管道的日常维修工作让我注意到，Patankar 为维持供水网络的正常运转，要采用各种应急措施，在很多时刻即兴发挥，依靠各种社会关系和物质中介。如然而就算修理、复原和维护水管需要的是 metis(实践性知识) (Scott 1998)，它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也一直在供水部门的员工中备受争议。管道维修也让水利工程师们意识到，由于城市水利基础设施浸泡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物质环境中，他们的权威性会大打折扣。当 Patankar 努力寻找漏水点时，他需要在躁动不安的政治主体与专业人士、水土的不透明性、以及管网的腐蚀、封闭和隐蔽性中，处理每一个供水问题所引发的独特事件。由于没有标准化的章程来指导人们该如何查明，又如何堵住这种漏水，在此情况下，国家权力是分散的，是在孟买水利基础设施的专家、情势与物之间的协商中浮现出来的。为了有效地维护和管理城市的供水网络，Patankar 需要了解这条管线的某些关键事实（例如，哪些地方漏水以及如何发现和修补漏水）。他还需要理解这个基础设施是如何居于劳动、自然、物和法律的关系之中。要修理一条充斥着偶然和顽疾的水管，既需要权力与知识，也离不开对人、事物及其政治处境的忽略。

我与 Patankar 的相处足以显示，他对漏水的知与不知是如何嵌置在物质、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多重形构之中的 (Haraway 1991)。这些知与

不知的结构超出了市政专家或其他主体的控制范围。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社区领导，都不可能掌握供水网络的一切事宜。有关水利基础设施的知识也不是完全由供水部门的工程师们掌控和管理的。相反，关于供水系统的知识和无知在各种机构、地方和政治组织中迂回穿梭（见 Hansen and Verkaaik 2009）。这些情境化的知和不知，使人们对知识是如何产生，国家官僚机构又如何运作的期盼化为泡影（Weber 2006; Hull 2012b）。

在供水部门担任不同职务的工程师，对供水的知与不知也迥然各异。¹⁵ 例如，该区的工程师们面对居民的用水需求，既不能提供法律上的支援，也无法根本解决缺水问题，所以许多没有合法水源的居民从供水系统偷水时，他们选择睁只眼闭只眼。工程师们有时会与当地的政治领导人合作，他们会默许边缘化群体建立不同的接水方式。这些“漏网之鱼”并没有被记录在案，也不会被总部的上级看到。这些知与不知的结构，使得对水的政治控制成为一个分散的、积极协商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给出以下例子。

有一天，我来到现场工程师的办公室，看到一名市议员和一位党务工作者也在那里。Patankar（工程师）的态度客气，接待周到。当我寻思眼前的状况，慢慢意识到他们正在就一处非法取水展开谈判。几个月前，新闻报道过几处公寓大楼。据称它们威胁到了一个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遗址的神圣性，法院已经下令切断这些公寓的供水接口。Patankar 被迫遵从法院的命令，切断了水管。现在，一位在该地区工作的党员前来申请重新连接管道的许可。Patankar 的回应是，（不置可否或虚与委蛇）既不批准也不拒绝他的请求：“我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我说我不得不切断供水连接。在我切断它之后，随便你怎么做。”

有了这一指令，Patankar 再一次履行了他作为公职人员的职责。他执

15 一方面，规划局的高级工程师有效地调用供求数据，不仅向媒体披露，而且还以此为依据裁定各区的供水配额。另一方面，与现场工程师不同，供水规划人员对城市漏水的政治地理实况所知甚少。

行了法院的命令，切断了水管，同时允许其矛盾面——供水——通过其他方式继续进行。他的指令迫使他放弃对该区水管的部分知识与控制权，将其让渡给无知的领地，也让渡给熟知这些水管的党务工作者、水管工和居民。这并不是一个特例。Patankar 之类的工程师常常领着市议员和水管工在供水部门的繁文缛节中兜圈子，如果他们觉得法规太严苛，就心照不宣地装作不知道法规的存在，或者干脆绕开规则自行其是。这种保持无知的行为——“随你怎么做”（但不要告诉我）——减轻了城市工程师的供水压力，点明了城市中确立国家权威的重要方式：策略性地调用不知情、漠不关心和强制执行（Gupta 2012; Herzfeld 1992; Holston and Appadurai 1996）。议员、党务工作者和管道工可以绕开供水部门的书面许可就取得水源，这类佯装不知情的行为既让定居者以各种方式享受到了公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又让市议员和市政水力工程师们巩固了政治权力。

我无法追踪调查这位党务工作者是否曾经建立过供水连接，我也不确定 Patankar 是否跟进过此事。如果这位党务工作者确实重新连接了供水管线，那么供水将以“漏水”的形式流回到他的选民家中。由于供水部门的区域工程师们参与了人为制造的漏水，供水部门或世界银行的高层领导无法计算出有多少水漏给了未经授权的群体，甚至无从得知这些连接点位于何处。漏水现象，以及枉顾漏水的现实，使公共系统的控制结构出现了松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缝隙，因为大量人口可以在法律法规的夹缝中在城市求生，同时又被推向了社会边缘，不再处于国家审计制度的控制范围内。

结论：漏水的难题

一天下午，我请 Patankar 出去吃午饭，这样我们就可以多聊聊供水系统。我们坐在安静的、开着空调的餐厅中，Patankar 回顾了自己的工作方法。他说，人们得不到水时，就会很生气。他简明扼要地说：“我们的职责就

是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Patankar 对一种流行看法表现怀疑，即认为私企的工程师工作效率更高，因为私企工程师们的业绩与薪水挂钩，再加上他们更专注于维护滴水不漏的管理制度。追求增加收入（或减少无收入水）往往伴随着对系统的物质属性和政治含义的漠视。Patankar 说：“几年前，就连供水部门的总工程师也说他搞不清楚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这些私营公司的工程师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Patankar 说，即使是资历最老、业务能力最强的工程师，也很难理解系统是如何运作的。Haresh 的告诫萦绕耳畔，即水务工作者在度量各种水量时会遇到许多困难。当水通过公共基础设施向四面八方输送时，其间差异化的社会、物质和政治关系，给市政工程师和世界银行顾问带来了麻烦——他们企图通过审计和测量程序来摸清孟买水流的数量和类型。事实上，当 Haresh 提醒我们水有“技术上的限制”时，他是在敦促我们认识到，水在城市基础设施中令人困惑难解的流动，暴露出的正是管理顾问在努力改善水的流动时所采用的审计文化的局限性，而不是水本身的局限性。同样地，当顾问们试图为水平衡规程的价值辩护时，他们需要假定造成损失的社会因素与物质因素之间毫无瓜葛。他们为测量程序的稳定性和可重复性所付出的努力，受到了不小的挑战，这一挑战源于管道渗漏的政治和城市供水部门工程师之间的历史关系。

这并不是说，凭借现有的技术无法诊断和解决渗漏问题。也不是说，那些被剥夺了正式供水连接的定居者，会为由社会和政治所致的漏水而欢欣鼓舞，即使这些漏水滋养了他们的生活。相反，我想说的是，法律、技术和政治累积叠加的历史——时断时续的供水、日渐老化的管道、禁止用水的法律、变化无常的水表、工程师的用水调配——使得顾问们极难统计、了解和改善城市渗漏的管道。作为物质和社会关系隐蔽的地下杂交物，供水基础设施的技术和政治对企图控制其流动的专家发出了挑战。由于他们的控制权既为城市供水基础设施渗漏的物质与政治所构成，又受其损害，

世界银行的顾问们至今无法对这座城市的供水系统进行结构性改革。他们的无能为力，不仅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审计文化在管理基本资源流动方面的局限性，而且也说明了孟买民主政治被削弱但仍不可小觑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它促生并推动了针对渗漏的统治技术。¹⁶ 在这种技术政治环境下，将漏水置之不顾往往比维修、封堵和阻止渗漏要容易得多。这不是例外状况，而是孟买供水基础设施得以存续的一个条件。

Michel Callon 在其关于工程的著作中提醒我们注意，基础设施和技术是如何不仅通过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大量沉默的他者”——人类和非人类——与其有利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他认为，工程师们非常清楚“技术、科学、社会、经济或政治方面的考量是密不可分的”（Callon 1989: 84）。由于这些关系总是既凌驾于知识生产的政体（regime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和审计、测量的实践，又使之趋于不稳定，国家官僚机构的工程师们被迫将混乱从他们的设计中剔除出去，以便完成工作（Scott 1998: 47; 另见 Barry 2001）。事实上，孟买供水部门的工程师们意识到，构成孟买水利基础设施渗漏的物质和政治，影响到他们对城市供水的控制与管理。相应地，部门工程师们对供水管网的要求也会有所降低。工程师们对供水网络的管理远非技术官僚式的，而是积极地进行协商，并忽略已被权力充分渗透的城市基础设施中由漏水和流动所提出的多重要求。他们力图使供水系统的不确定性变得可预测，但不是通过生产关于渗漏的知识，而是通过在可能的情况下忽略漏水。工程师们对渗漏现象视而不见，以至于国家权力在孟买既得以存续，又“漏洞百出”（porous）（Benjamin 2005）。

因此，无论是水、权力和知识，还是渗漏和对此视而不见，对于孟买水利工程的形成，以及这座城市的领导人和专家，都至关重要。在孟买的

16 在其他地方（Anand 2011b），我描述了供水系统的日常关系如何揭示出技术官僚和民主国家在城市中相对权力的关键性转变（另见 Chatterjee 2004; Chakrabarty 2007; Das 2011）。

供水系统中，国家权力通过操弄无知和忽视，塑造了自身，并不断自我生产。它既不是“总体权力”，因为它没能对管道、基础设施和水源地实行全面控制（Wittfogel 1957; Worster 1985）；也不仅仅是话语、意识形态和想象力的相互碰撞而形成的“效果”（effect）（Abrams 1988）。国家通过管理孟买的水利基础设施，造就并再生产了今天的水利状况。它是各种社会和物质材料的聚合，是由社会想象、机构部门、身体和各类物体之间的关系串联而成的不稳定的过程，总在汇聚成型之中，又时刻面临分崩离析。专家、工程师和居民要不断努力修补漏水的、破烂不堪的管网系统，力求减少水的损耗，就要处理系统复杂的历史；比如，对某些居民的排斥、变动的政治诉求和不断更新的技术手段，再生产出国家及其城市主体不稳定但持久的形式。通过对统计数据仔细甄别，采纳有助于巩固权势的数据（如人口、管道里程数、人均用水量 and 出水口总数），排除会挑战自身权威的数据（如渗漏数据），城市供水部门在过去 150 多年里一直在建设、维护和运营城市的水利基础设施，并使得水利状况的基本格局得以成型。

这并不是说，市政供水部门对该市水资源拥有稳定的仲裁权。在孟买的水利设施中进进出出的未知水流，致使供水部门的政治主张和改革项目愈加千疮百孔。城市供水系统时不时就会发生故障，危机已成常态，工程师们在城市中四处奔波，像“救火队员”一样“扑灭”各种危机。面对城市居民差异化的诉求，以及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发起的改革倡议，漏水让供水部门变得软弱。随着水持续不断地悄悄渗漏，侵蚀着城市的管道和土地，毫不夸张的是，这种不为人知的，也很难获知真实情况的水流在城市中制造出巨大的塌陷坑（sinkholes）。¹⁷ 权力之大，控制效果之差，两者的裂隙如此惊人，暴露了城市之中水及其基础设施的顽固与力量。它们证明了渗漏对于政府架构意义非凡，也构成其施政抓手，但与此同时，正是渗漏，一点点腐蚀着这座城市筑立于其上的政府地基。

17 据《午间日报》（*Mid-day*）报道，在 2008 年至 2010 年三年间，孟买出现了 9 个塌陷坑。该新闻日报称，塌陷坑是由暴雨、污水和水管渗漏造成的（Pal 2010）。

致谢

我要感谢Andrew Mathews, Shaila Seshia, Jesse Shipley, K. Sivaramakrishnan, Didier Fassin, Joseph Hankins, Joseph Masco, Ramah McKay, Anne Rademacher, Adriana Petryna, Austin Zeiderman, 以及《公共文化》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 感谢他们的洞察力和对这篇文章的仔细阅读。我要感谢我在纽约大学媒介、文化和传播系(2014)、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2013)、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香港举办的第三届亚际会议中的“亚洲城市的可持续性和公民身份”工作坊(2012)、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2012)和普林斯顿大学南亚研究研讨会(2011)上报告这篇文章的诸多版本时收到的参与者反馈。我还要感谢高等研究院、明尼苏达大学象限奖学金、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温纳-格伦基金会对这项研究的支持。

参考文献

- Abrams, Philip. 1988. "Notes on the Difficulty of Studying the Stat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1, no. 1: 58 – 89.
- Anand, Nikhil. 2011a. "Ignoring Power: Knowing Leakage in Mumbai's Water Supply." In *Urban Navigations: Politics, Space, and the City in South Asia*, edited by Jonathan Shapiro Anjaria and Colin McFarlane, 191 – 212. New Delhi: Routledge.
- . 2011b. "Pressure: The PoliTechnics of Water Supply in Mumbai." *Cultural Anthropology* 26, no. 4: 542 – 64.
- Anderson, Benedict. 1983.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ppadurai, Arjun. 1993. "Number in the Colonial Imagination." In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edited by Carol A. Breckenridge and Peter van der Veer, 314 – 39.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arry, Andrew. 2001. *Political Machines: Governing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London: Athlone.
- Belson, Ken. 2008. "Plumber's Job on a Giant's Scale: Fixing New York's Drinking Straw."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2. www.nytimes.com/2008/11/23/nyregion/23tunnel.html.
- Benjamin, Solomon. 2005. "Touts, Pirates, and Ghosts." In *Bare Acts, Sarai Reader 5*, edited by Monica Narula et al., 242 – 54. Delhi: Sarai Programm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 Bennett, Jane. 2010.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Bhan, Gautam, and Arimdan Jana. 2013. "Of Slums or Poverty? Notes of Caution from Census 2011."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8, no. 18: 14 – 16.
- Bishop, Ryan, and John Phillips. 2006. "Ignorance."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23, nos. 2 – 3: 180 – 82.
- Bombay Municipal Corporation. 1994. *Report of the Expert Committee (Water Planning) on Bombay's Future Water Resources and Improvement in Present Water Supply Scheme*. Executive Engineer, Water Works Planning and Research.
- Bornstein, David. 2014. "The Art of Water Recovery." *Opinionator* (blog), *New York Times*, July 10. opinionator.blogs.nytimes.com/2014/07/10/the-art-of-water-recovery/#more-153591.
- Bourdieu, Pierre.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un, Bruce, and Sarah Whatmore, eds. 2010. *Political Matter: Technoscience, Democracy, and Public Lif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allon, Michel. 1989. "Society in the Making: The Study of Technology as a Tool for Sociolog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edited by Wiebe E. Bijker,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Pinch, 83 – 106.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astalia Strategic Advisors. 2007. K- East Water Distribution Improvement Project: Customer Service and Technical Report. Wellington, New Zealand: Castalia Strategic Advisors.
- Chakrabarty, Dipesh. 2000.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7. “‘In the Name of Politics’: Democracy and the Power of the Multitude in India.” *Public Culture* 19, no. 1: 35 – 57.
- Chatterjee, Partha. 2004.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elho, Karen. 2006. “Tapping In: Leaky Sovereignties and Engineered Dis(Order) in an Urban Water System.” In *Turbulence*, Sarai Reader 6, edited by Monica Narula et al., 497 – 509. Delhi: Sarai Programm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 Collier, Stephen J. 2011. *Post-Soviet Social: Neoliberalism, Social Modernity, Bio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as, Veena. 2011. “State, Citizenship, and the Urban Poor.” *Citizenship Studies* 15, nos. 3 – 4: 319 – 33.
- Fortun, Kim. 2001. *Advocacy after Bhopal: Environmentalism, Disaster, New Global Order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oucault, Michel. 1982. “The Subject and Power.” *Critical Inquiry* 8, no. 4 (1982): 777 – 95.
- Gandy, Matthew. 2014. *The Fabric of Space: Water, Modernity, and the Urban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Graham, Stephen, Renu Desai, and Colin McFarlane. 2013. “Water Wars in Mumbai.” *Public Culture* 25, no. 1: 115 – 41.
- Gudilu, Durga. 2008. Yaadé. vimeo.com/30712979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4).
- Gulyani, Sumila, Debarata Talukdar, and R. Mukami Kariuki. 2005. *Water for the Urban Poor: Water Markets, Household Demand, and Service Preferences in Kenya*.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Sector Board, Discussion Paper 5.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Gupta, Akhil. 2012. *Red Tape: Bureaucracy, Structural Violence, and Poverty in Ind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ansen, Thomas Blom, and Oskar Verkaaik. 2009. "Introduction — Urban Charisma: On Everyday Mythologies in the City."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9, no. 1: 5 – 26.
- Haraway, Donna. 1991.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 Herzfeld, Michael. 1992. *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Indifference: Exploring the Symbolic Roots of Western Bureaucracy*. New York: Berg.
- Hetherington, Kregg. 2011. *Guerrilla Auditors: The Politics of Transparency in Neoliberal Paragua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High, Casey, Ann Kelly, and Jonathan Mair. 2012. *The Anthropology of Ignorance: An Ethnographic Approac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Holston, James, and Arjun Appadurai. 1996. "Cities and Citizenship." *Public Culture* 8, no. 2: 187 – 204.
- Hull, Matthew. 2012a. "Documents and Bureaucrac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1, no. 1: 251 – 67.
- . 2012b. *Government of Paper: The Materiality of Bureaucracy in Urban Pakist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linenberg, Eric. 2002. *Heat Wave: A Social Autopsy of Disaster 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mbert, Allan, and W. Hirner. 2000. "Losses from Water Supply Systems: Standard Terminology and Recommended Performance Measures." *The Blue Pages*.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London.
- Latour, Bruno. 1996. *Aramis, or, The Love of Technology*.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thews, Andrew. 2008. "State Making,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Translation and Concealment in Mexican Forestry Institution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0, no. 4: 484 – 94.
- McGoey, Linsey. 2012. "Strategic Unknown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Ignorance." *Economy and Society* 41, no. 1: 1 – 16.
- McKay, Ramah. 2012. "Documentary Disorders: Managing Medical Multiplicity in Maputo, Mozambique." *American Ethnologist* 39, no. 3: 545 – 61.
- Ministry of Urban Development, India, a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7. *2007 Benchmarking and Data Book of Water Utilities in India*.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uehlmann, Shaylih. 2012. "Rhizomes and Other Uncountables: The Malaise of Enumeration in Mexico's Colorado River Delta." *American Ethnologist* 39, no. 2: 339 – 53.

Municipal Corporation of Greater Mumbai. n.d. "'K/West' Ward at a Glance." www.mcgm.gov.in/irj/portal/anonymous/qlwardke (accessed November 9, 2014)

———. 2007. PowerPoint Presentation at the India Urban Space Conference. September 27.

Murley, Susanna. 2011. "Is NYC Losing 30 Percent of Its Water?" *Huffington Post*, June 22. www.huffingtonpost.com/susanna-murley/is-nyc-really-losing-30- o_b_882176.html.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www.oed.com. Accessed November 10, 2014.

Pal, Somita. 2010. "No Road Safe till 2010." *Mid-Day*, July 22. archive.midday.com/news/2010/jul/220710-worli-road-cave-in-storm-water-drain-bmc-warning.htm.

Perrow, Charles. 1984.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 Risk Technolog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Petryna, Adriana. 2002. *Life Exposed: Biological Citizens after Chernobyl*.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oovey, Mary. 1998.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Fact: Problems of Knowledge in the Sciences of Wealth and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roctor, Robert, and Londa Schiebinger. 2008. *Agnology: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anganathan, Malini. 2014. "'Mafias' in the Waterscape: Urban Informality and Everyday Public Authority in Bangalore." *Water Alternatives* 7, no. 1: 89–105.

Rao, Shashank. 2007. "Take a Leak: New Zealand Company's Pilot Report on Privatisation of Water Supply Is Rejected Twice because BMC Was Not Satisfied with Its Estimate of Water Leakages." *Mid- Day*, June 2.

Rose, Nikolas, and Peter Miller. 1992. "Political Power beyond the State: Problematics of Gover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43, no. 2: 173 – 205.

- Scott, James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dgwick, Eve Kosofsky. 1988. "Privilege of Unknowing." *Genders*, no. 1: 102 – 25.
- Sharma, Aradhana, and Akhil Gupta. 2006. "Introduction: Rethinking Theories of the Stat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A Reader*, edited by Aradhana Sharma and Akhil Gupta, 1 – 41. Malden, MA: Blackwell.
- Strathern, Marilyn, ed. 2000. *Audit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Accountability, Ethics, and the Academy*. New York: Routledge.
- Von Schnitzler, Antina. 2013. "Traveling Technologies: Infrastructure, Ethical Regimes, and the Materiality of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Cultural Anthropology* 28, no. 4: 670 – 93.
- Weber, Max. 2006. "Bureaucracy." In Sharma and Gupta,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 49 – 70.
- Wittfogel, Karl.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orld Bank. 2006. *Urban Water Sector in South Asia: Benchmarking Performance*. Water and Sanitation Program, Field Note, May.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Worster, Donald. 1985. *Rivers of Empire: Water, Aridity, an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West*.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技术的旅行： 南非的基础设施、伦理模式与政治的物质性¹

安蒂娜·冯·施尼茨勒 *

许诺 ** 译 梁成林 *** 校

摘要

在本文中，我以小型技术设备的“旅行”为重点，探讨了南非基础设施的政治。自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以来，为了遏制不支付服务费的情况，南非的黑人居住区中普遍安装了预付费仪表。然而，许多居民还是绕过了它们，非法获取水电。我追踪了糊弄技术设备的居民与试图保护它们的工程师之间的微观政治斗争，从中得出结论，认为基础设施本身已成为政治领域，人们在其中协商核心的伦理、政治问题，比如公民美德和公民身份。为了研究这一技术 - 政治领域，我追溯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英国仪表的谱系。最初，人们发明这种仪表，是要借助它“改善”工人阶级的道德，而后，在南非种族隔离的末期，人们再次启用这种仪表，把它作为针对反种族隔离的“抵制租金”运动的反制工具。我认为，仪表始终在为各种不同的伦理模式和政治计划提供动力。根据对当代南非工程师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我探索了使仪表在后种族隔离时期生效的符号 - 物质的操作。追踪这样一个小型技术设备在时空中流动与变化的轨迹，可以启发我们的观念，以便我们重新思考伦理、政治和技术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基础设施；技术；政治；伦理；公民身份；物质性；南非

2011年7月，南非正值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索韦托（Soweto）贫困地区基亚韦洛（Chiawelo）发生了一次暴力抗议。当地居民封锁了索韦

* 安蒂娜·冯·施尼茨勒（Antina Von Schnitzler），纽约新学院大学（The New School）。

** 许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 梁成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1 本文首发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Vol. 28, Issue 4, pp. 670-693。原标题为 TRAVELING TECHNOLOGIES: Infrastructure, Ethical Regimes, and the Materiality of Politics in South Africa，其中“traveling technologies”的表达或许借用了萨义德“理论旅行（traveling theories）”的表达方式，故作此译，但在本文中同时强调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流动和变化的场合，travel 一词也译作“流变”——译者注。

托的一条主干道，在地方政府办公室外进行抗议，抗议持续了几个小时，居民们点燃了一辆汽车，还烧毁了两名地方议员的办公室。在基亚韦洛的这场抗议中，人们大规模地在南非黑人居住区中使用暴力，这不仅与1980年代种族隔离时期的场景惊人地相似，也跟这些年来南非头条新闻的常客——许多所谓的“服务交付抗议”（service delivery protests）相像。为了遏制这种令人恐惧的群众集体行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的官员立刻谴责了抗议活动，称之为“暴民”“流氓分子”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媒体也争先恐后地试图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已经查到，抗议是由一批最近半国营性质的埃斯科姆公司（Eskom）安装的预付费电表引发的。这些预付费电表自动切断了居民的电力服务，使他们深陷寒冷和黑暗当中。

预付费仪表成为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焦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15年中，类似抗议总是定期出现。在索韦托和约翰内斯堡进行实地考察时，我经常看到仪表被人们从墙壁上、后院里拆下来，扔在当地政府办公室的大门前，成为示威活动的重头戏。预付费仪表是一种小型技术设备，可以计量用户的水电使用情况，如果用户没有付款，它还能自动断开用户与服务网络的连接。为了获取服务，用户必须提前购买并安装信用令牌，也就是输入数字代码或使用磁性钥匙与卡片。过去二十年来，新自由主义改革规定了“回收成本（cost recovery）”，但与此同时，人们普遍不愿意为水电等服务付费。这种状况下，预付费仪表在南非得到推广。此外，南非对预付费技术的开发和创新都已走在世界前列，也是此类仪表的主要出口商²。尽管中产家庭因不信任市政府开出的账单，越来越多地安装预付费电表，但到目前为止，这种电表还是主要安装在比较贫穷的、有一定历史的黑人居住区和棚户区内。继他们的手机有了新的预付费标准之后，索韦托等地的大多数居民现在也要通过预付费设备连接到水电网络。在这些规范之下，“过预付的生活（Living prepaid）”，以不稳定也不可靠的方式获

2 2007年，全球安装了1000万个单向预付费电表，其中有800万个产自南非。见J. S. Jones,《预付费研究21》（“Prepayment Reaches 21”），《国际仪表》（Metering International）4（1），2007年1月。

取水电，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

然而，与此同时，索韦托和其他城市中的许多居民已经绕开了仪表，使之形同虚设，从而为居民们提供实际上的免费水电。因此，糊弄(tinkering) 技术设备的居民和试图维护这一技术的公共服务部门官员之间，总是发生一些小摩擦。本文追踪了这种技术的微观政治，它将居民、工程师和公共服务部门官员卷入一个看起来始终存在的斗争：执行收款和逃避付款之间的拉锯。我认为这种政治并非公开示威、表达分歧或进行商讨之类的传统形式的政治，而是在技术层面上使用技术语言进行自我塑造的产物。在这里，原本对于解放斗争至关重要的问题——关于公民的界限，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有了新的形式、新的媒介和新的特点³。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与基础设施不仅仅是政治表达的符号或工具，更可以说，技术本身就是用来协商一系列伦理 - 政治问题的政治领域，这些问题是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核心问题，即使种族隔离已成历史，它们也能为受种族隔离影响的种种生活注入新的活力。

以科学研究、政治学和人类学领域近来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本文从当下预付费中的冲突出发，更广泛地反思伦理、政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在本文中，我以系谱学的方式探索了仪表在人们生活中的旅行，以民族志的方式叙述了南非当代仪表行业的情况，以此描绘仪表在各种伦理模式和技术 - 政治的组织状态下的政治生命。

技术-政治的旅行

我试图以人类学的角度介入基础设施问题，因为我要追踪这一小型技术设备，同时也要追踪与它互相影响的伦理 - 政治世界。我在这里关注的并非基础设施的现实含义，而是基础设施在现代性的多重建构中的重要意义，它塑造着人们的社交方式、主体性和情感能力 (Larkin 2008; 又见 Anand 2012; Chalfin 2010; Collier 2011; Elyachar 2012; Kockelman 2010;

3 参见 Stefan Helmreich (2007) 对“转导作用 (transduction)”这一概念的讨论。

Mains 2012; von Schnitzler 2008)。具体来讲，下文的重点在于追踪技术设备是如何被组装和再装配进各种特定的伦理模式和政治计划的⁴。我检视的是，这些专门设计的技术设备是如何为特定的伦理 - 政治计划、伦理 - 政治目标、伦理 - 政治诉求背书，并因此反映着这些内容的 (Redfield 2012)。如果像 Brian Larkin (2008) 所说，技术始终是“不稳定的对象”，那么我接下来的重点就在于，理解这种让技术进入新的语境的符号 - 物质的操作。我将 Susan Leigh Star (1999) 所说的“基础设施的民族志”与一种系谱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后者关注的是技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我认为这种方式能够让我们在考虑政治的形式时，在概念上和方法论上有更广阔的探索空间，而不是局限于“往往会出现政治”的场所和媒介。同时，技术总是已经被特定的伦理 - 政治组合所征用，我们要始终着眼于这种征用的特定方式。

社会科学对技术的研究已经打开了一扇门，让人们在对技术进行反思时能够摆脱决定论的逻辑，但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关注的是一处处具体的使用技术的案例，他们通常对案例背后值得加以理论化的政治并无兴趣⁵。相较之下，政治学研究则不太关注发生政治行动的物质性的、具象的或情感性的环境。的确，政治由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位置所定义，不受制于“生命过程的紧迫性 (urgency of the life process)” (Arendt 1990:60)⁶。不过，学者们最近在呼吁反思自由而世俗的政治观念，以探索更富情感、更具体的政治主体性，呼吁关注那些做着通常不被视为政治行动的事情的场域——这些“新”的场域同样塑造着伦理和政治 (Connolly 2002;

4 Collier 和 Ong (2005) 论述了“全球组合 (global assemblages)”是如何构成的。

5 关于“用户启发式”请参见 Fischer (1994) 和 Bijker、Hughes、Pinch (1987) 的研究。有关科学研究中的技术和政治，Akrich (1992)，De Laet 和 Mol (2000)，Hecht (2009、2012) 和 Winner (1980) 的研究很引人注目。最近，Callon、Lascoumes 和 Barthe (2009) 对“技术民主”的论述，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传统的研究与非专业人士的研究的之间的对称性。然而，他们所描述的政治参与的形式又回到了更为传统的政治观念，认为政治位于透明的、非物质的交流空间中，其中理性的、不受阻碍的个人行动者再次成为主角。

6 政治的这种定义是基于交流和公众性的，从 Arendt 到 Habermas 以至更激进的批评家如 Rancière，很多理论家都有这样的认识。

Hirschkind 2001; Mahmood 2005)。此外，学者们也共同指出，物质性因素对于促成政治参与、塑造参与政治的人，发挥了重要作用。（Barry 2001; Bennett 2010; Mitchell 2011; Whatmore 和 Braun 2009）。

正如 Partha Chatterjee (2004, 2011) 所说，在后殖民的语境下对这种标准的自由政治观念进行反思尤为重要，因为在此环境下，正式的政治渠道受制于殖民时期的影响，大部分人，比如贫民窟的居民、非正式劳工和原住民，都被排除在外。此时，政治问题通常是由表面上非政治性的行政部门来定夺的，例如提供土地，住房或基本服务的部门。在这种情况下，Chatterjee 认为，政治不会出现在通常意义上的政治领域内，而是存在于行政和人口登记簿上，在那里“规则能屈能伸” (Chatterjee 2004:60)，因此政治问题经常能得到事实上的协商和解决。

Chatterjee 的“政治社会”这一概念可以帮助我们对政治发生的场域进行反思，接下来，我会关注政治社会的技术 - 政治连结形式，以及这种连结的复杂样貌。我将探索一种不那么显见的物质性的微观政治，一种或可称之为由登记簿和技术语言所形塑的非公共的政治 (a politics of non-publics)，它塑造着人们的主体性、伦理倾向以及作为政治主体的能动性。我要研究的是，基础设施如何调解一些彼此矛盾的伦理计划、一些政治上的分歧以及其他潜在的冲突，这些冲突通常关乎公民道德、基本需求、公民权利与义务等重要的政治问题。在仪表的政治中，管道、线路等基础设施本身就是对上述问题展开协商或争论的政治领域。此处，政治活跃地以各种物质性的形式出现 (Gaonkar 和 Povinelli 2003)。

接下来，我会通过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检视这些物质形式。在第一部分，我追踪了这些预付费仪表作为一种技术 - 政治设备的系谱学。我并不是要提供面面俱到的社会史，而是想关注历史上的两个重要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预付费仪表的数量突然大幅增长，并卷入了不同的伦理 - 政治计划。首先是 19 世纪末，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道德改良计划之中，人们发

明了为工人阶级提供燃气的仪表。其次，是南非种族隔离的末期，人们改变了这种仪表背后的观念，将其引入南非，使之成为镇压和终结反种族隔离中抵制租金的运动的运动的手段。我认为在这两个时刻，仪表对于特定的技术 - 政治领域的塑造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第二部分，我以民族志的方式探索了这一技术 - 政治领域在当代南非的构造。通过对仪表行业工程师的民族志调查，我检视了预付费仪表在种族隔离的遗留影响和新自由主义转型的语境下被部署时，是如何被重新赋予意义的⁷。下文中，工程师会很自然地流露出创造更安全的仪表的追求，但这背后其实是一场技术上的阵地战，在工程师具有（知识上的）威信的解释之下，即使是细微的技术创新，也能成为他们的关键策略。

追踪预付费仪表的生命

我在索韦托的大部分田野工作都是在菲里（Phiri）进行的，菲里是索韦托较贫穷的地区，毗邻这项研究的起点基亚韦洛。2003年，菲里被选为“节水行动（Operation Gcin' amanzi）”的试点区域，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长期基础设施项目，旨在用预付费模式取代索韦托所有未流经仪表的家庭用水方式。这样，居民就不能只是每月支付固定的费用，而是要提前支付一定的预付金，不然就会被自动停水。多年来，该项目一直是许多抗议活动和媒体争论中首要的批评对象，还有五位来自菲里的居民对预付费水表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将它告上宪法法庭（constitutional court）。虽然他们最终未能胜诉，但也使其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案件⁸。来自多方的反对起到了一定作用，导致该项目尚未完成，不过，索韦托的大多数家庭现在都只能通过预付费模式用水。

2000年代，自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SECC）之类的社会运动开始对日益普遍的预付费电表展开抗议以来，预付电表就成为人们关注

7 参见 Madeleine Akrich (1992) 和 Bruno Latour (1992) 对这种符号 - 物质概念的研究。

8 Bond 和 Dugard 的研究 (2008) 是对一个类似案例的分析。

的问题，尽管那时其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的表现还不那么令人担忧。在“点亮（Khanyisa）”行动中，SECC内部的“斗争派电工（struggle electricians）”就会“帮助”那些被人为断电的居民，重新接上供电系统，并且绕开或拆除预付费电表⁹。他们因此将非法重连和绕过电表等操作带入了公众的视线，也使得这种操作成为一种动员大众的方式。近年来，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减少了，多数情况下，预付费电表只是索韦托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然而，在与社会运动组织或公共“政治”的语言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绕过或“桥接”仪表的行为还在悄然无声地大规模地进行。诚然，针对“节水行动”的抗议平息了，公共服务部门也声称，调查显示居民的满意度为98%，但在2011年，公共服务部门的人还是告诉我，居民们绕过了30%至40%的电表，以至于它们有必要被换成改善了安全功能的新仪表。

为了绕过电表，居民可以给精通此道的人（通常是想赚外快的公共服务部门雇员）付几百兰特，而同样熟于此道的家人亲戚或SECC的技术人员或许可以免费帮忙。绕过电表的决议中有多种考量，通常人们既会考虑实际利益，也会考虑道德问题，在家庭内部也会经常出现分歧。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对仪表的考量，是他们对新自由主义转型的观察中的一部分，但居民的关切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不那么明确，而且有很多矛盾。一方面，索韦托的大部分家庭因为多年没有支付服务费，积累起了债务，通常情况下，选择使用预付费电表可以收到对方抹除债务的承诺，还能防止再度债台高筑。然而同时，另一方面，电表经常引起人们对自己经济能力的更深一层的担忧。多年来，绝大多数索韦托居民都没有为基础服务付过费，人们考虑的家庭预算通常不包括水电费。加之索韦托贫困地区的失业率很高，

⁹ 南非有大量关于新的社会运动的文献（例如 Naidoo 2007）。有关电力的预付费的内容，请参见《电力资本主义》（Electric Capitalism, MacDonald 编，2009）一书，尤其是 Ahmed Veriava 和 Prishani Naidoo 以及 Peter van Heusden 的章节。关于“治疗行动运动（Treatment Action Campaign）”的政治观点，请参见 Robins（2008）和 Comaroff（2007）。

许多家庭靠他人的捐赠和养恤金维生，用电显得尤为困难¹⁰。如果冬天特别寒冷，花在充值预付金上的钱会多很多，断供、停电的情况也可能成倍地增长。重要的是，电表没有商量的余地，对它来说，人们的钱，不管多少，就是用来充预付金的。如果月账单尚未付清，电表并不会立即断开连接，居民们可以等到收入到账再付款；但是，预付费电表在自动切断连接时，却是不会考虑环境如何、有没有特殊状况的。

不过，有些人反对预付费仪表的理由并不简单。在南非，特别是在索韦托，基础设施从来就不只是中立的提供服务的渠道，它总是连带着公民身份和身份归属等问题（von Schnitzler 2008）。南非执政者在解放时的承诺之一，便是终结种族隔离中被日常化的暴力。与南非独立后的诸多项目类似，扩展和改善教育、卫生、电力和水这些基础服务成为国家重建过程的重点。因此，人们看起来是在忙着反对预付费电表，但这种反对可能连带着更大的关切：在种族隔离之后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悖论之中，最初承诺的服务经常是在进行扩展的同时施加更多的限制（参见 Mains 2012; Ferguson 2007）。总之，南非的预付费技术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编码而成的，这一点可能与最近才使用该技术的其他地方有很大差异。我的观点是，技术以它在历史上的特定方式被纳入伦理 - 政治的组织中，这些特定方式，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被借鉴”到其他地方，而它自己也可能随时间变化。

在菲里的第一轮研究即将结束时，我参加了南非第四届年度“预付费周”（South Africa's fourth annual Prepayment Week），这是一次大型的国际行业会议，不过这也是该行业唯一的会议。会议是在开普敦雄伟的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非洲公共服务周”（African Utilities Week）的一部分，该会议汇集了来自五大洲的近八百名代表，他们交流行业新闻，展示创新

10 尽管国家规定每月免费提供 50 千瓦时的电力，但在 2004 年，贫困的索韦托家庭通常要在基本服务上花掉每月收入的 37%（Nefale 2004）。

成果并销售他们的产品。在会议上，我们需要暂时转变对仪表的看法。展厅里的仪表，不再是令人愤怒和抱怨的东西，展出它们是为了提升潜在买家的欲望。离开了尘土飞扬的乡镇地面，也没有连着管道或电线，这些仪表根据功能和复杂程度，整整齐齐地排在同类设备中间，闪亮登场。在这里，预付费电表的社会生命显然处于商品化阶段（Appadurai 1986）。但是，这里正在销售的是什么样的商品？电表在制造商和潜在买家眼中的价值从哪里来？

我参加会议，目的之一是了解电表的更多历史，填补我的档案研究的空白。事实证明，许多最初的开发人员仍在从事相关业务，不过现在主要是为跨国公司工作。许多人在种族隔离时期曾是工程师，有些曾在军事领域和安全行业工作。在采访中，许多代表都向我介绍了 Peter Clark。人们满怀尊敬，把他说成是南非“预付费仪表的先驱”¹¹。这位六十多岁的电气工程师，在 1980 年代中期开发了第一批电表，接着成为该行业的核心人物。当我和他坐在长椅上俯瞰繁华的会议中心时，Clark 似乎很高兴谈到他最初的工作——南非预付费技术之成功享誉世界，他在其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Clark 说道，在 1980 年代的黑人居住区中人们展开了拒付租金行动，目的是反对种族隔离，但这种状况眼看就要导致财政问题，于是工程师们开始为这场“拒付危机”寻找“技术上的解决方案”，这段历史和我采访的许多工程师说的一模一样。Clark 在英国旅行期间第一次看到预付费电表，就带了一个回南非。他说那个电表是用“非常基础的技术”做的“巨大的金属盒”，它是投币式的，因此很容易被骗过。但他认为，这玩意就是在英国用的，“那里的人很有教养”；而在南非，“人们很容易就会做盗用能源之类的事”，这种电表没法用，必须从头开始，重新设计。

11 按照人类学研究的惯例，除公众人物外，本文中提到的所有个人都使用化名。

Peter Clark 随口说出了他眼中南非用户和英国用户的特征，这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要怎么做才能将技术转译、引入新环境，使其发挥作用？我将在下一节中对此进行讨论。更重要的是，他将预付费技术与“教养”联系在一起，这其中隐藏了一个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后续要进行探讨的那种技术 - 政治的核心。虽然技术 - 政治这一概念往往用于分析大型工程项目（Hecht 2009；Mitchell 2002），但我接下来追踪的是一种在更微观的政治领域中运作的技术 - 政治，这种政治的核心在于，它始终与主体性、伦理倾向和技艺（technical）相关联。

“投币式仪表的潜能”：追踪19世纪的自由主义技术（伦敦，1888年）

预付费仪表于1888年在英国投入使用。我们可以在关于公共卫生的记载中了解到，当时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之不堪，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人阶级的住房还从未接入电网，他们依靠蜡烛、油灯和煤炭来照明和取暖。人们越来越觉得，工人阶级住所的昏暗是个问题。一个特殊情况是，此时人们日益重视公共卫生，也担心工人们会在光线更好也更暖和的酒吧里浪费时间（Daunton 1983）。于是，接通基础设施以供应水、电力和天然气，被认为是在国内建立新的道德秩序的关键前提（Joyce 2003）。

正是在生命政治及相关技术兴起的背景下，“投币式仪表”（penny-in-the-slot meter）出现并极大地改变了基础设施的政治。十年之内，超过60%的伦敦人通过投币式仪表连接到了家用天然气网络，天然气用户从200万增加到800万。当时的一份工程报告指出，许多黑暗的工人阶级居住区因此“被投币式仪表的潜能照亮”¹²。投币式仪表使整个城市得以整合到系统网络中，仪表还将人口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大多是较富裕的家庭，公共服务部门相信他们每月或每季都能够支付账单，因此他们与公共服务

12 燃气工程与管理协会. 1895. UK, 《1895 进度报告》(Report of Proceedings 1895), p. 302.

部门之间是一种契约式的关系。另一部分主要是工人阶级家庭，他们在技术设备的控制之下与基础设施建立着联系，因而处于上述合同关系之外的一个不稳定的位置。只要仪表未激活，他们与城市供应的联系就会自动断开。

与 19 世纪的其他计量 / 自动化实践一样，预付费技术与现代人特有的伦理焦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担心人类与机器的能动性因此变得难以区分。一方面，仪表的自动化机制，让人们对机器的能动性产生了怀疑。当时有很多人认为自动化的机器是“不道德的”，认为机器会诱使用户做出欺骗的事，也会让欺骗用户变得更加容易。这暴露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令人感到不安的巧合——人类主体的自主性空前地增长，但人类对技术工具的隐性依赖也日益增加。

另一方面，就像 Daston 和 Galison (2007) 研究的其他具有科学客观性的设备一样，在投币式仪表的设计和使用中，人们也考虑到了人类的美德，比如耐心、正直和机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缺乏这些优点¹³。与其他家用计量设备（例如温度计，天平或时钟）一样，人们认为仪表能够引发并塑造某些习惯、主体性乃至气质。的确，仪表融入了一系列（可以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特有的）更宏大的伦理 - 政治关切。首先，投币式仪表输送了燃气，人们认为这可以改善家庭的卫生习惯、简化家常饭菜的烹饪方式，从而让男人们不愿意再去那些他们经常光顾的酒吧（Daunton 1983），以此提高工人阶级的“道德修养”。再者是，工人不仅要具备生产者的一面，他们还必须是明智的消费者，在信贷和消费对经济生活越来越重要的时代尤其如此。在当时的许多报道中，人们认为预付费电表能帮助人们以更理性的态度对待支出，使工人阶级熟习交换过程中的契约式关系。

13 关于道德的计量经济学，见 Gooday (2001) 和 Wise (1995)。

尽管当时的工程杂志广泛地宣传仪表的优点，但仪表的实际引入过程却遇到了问题。工程师坚持认为仪表是准确的，但是在用户一方，“煤气表会说谎”的观念却深入人心，并很快地流行开来。对工程师而言，更大的挑战可能是让用户以他们预期的方式对新设备做出反应。仪表被打碎，外国硬币、串在绳子上的硬币卡在仪表中，这些状况让一位工程师清醒地意识到，仪表只能部署在“人们格外诚实的地方”¹⁴。最初使用这一发明时，工程师只能将极大的信任寄托在检查员（penny collector）身上，但后者也很容易私吞他每天收来的硬币。最终，对于许多工程师而言，解决这些“人”的问题的，仍然只有技术。就像一则报道中说的：“检查员和户主可能都会不老实；但是，自动化设备的金属之躯和人类的心不一样，它不会腐化堕落。”¹⁵

因此，在早期，预付费技术在创新方面的问题在于，如何安排代理方（how to distribute agencies）。计量的任务可以由仪表完成吗？还是说检查员必须再检查一遍？他们会不会为自己谋私利？用户是否值得信赖，或者像 Clark 所说的那样，他们是否足够“有教养”，不会篡改电表？这些问题使得工程师需要同时塑造仪表和用户。重要的是，这种“同时塑造”的想法在根本上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计划，而且“塑造”的过程也逐渐与“计划”合为一体。我们确实可以说，工程师所担心的，是自由主义者面对的更大的难题——如何安排管理方式以及对应的责任，包括如何避免过多的监管，社会契约应该建立在哪些群体中，如何确定哪些群体需要被监管。这种代理方被不断重置，或者说布置（agencement）（Callon 2007），形成了一场持续的技术 - 政治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技术本身成为了商议此类伦理和政治问题的领域。自由主义思想一开始就假设了，有这样一类自

14 《投币式燃气表》（“Penny-in-the-slot gas meters”），《西方邮报》（*Western Mail*），威尔士卡迪夫，1898年11月8日周二；第9191期。

15 《投币式仪表》（“Penny-in-the-slot meters”），《利物浦水星报》（*Liverpool Mercury*），英格兰利物浦，1893年6月19日周一；第14183期第5版。

治而具有自发性的公民（autonomous self-governing citizen），然而在此我们看到的是，这种公民是社会 - 技术临时的不稳定的产物，如果没有对应的工具、设备和基础设施以及它们的操作，这种公民形象是无从想象的。

因此，Clark 认定的“英国人的教养”，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事实，“教养”是一种必须刻意制造的特性，制造的过程也很容易失败。但是，Clark 认为电表不能简单、顺畅地进入南非，这一点确实是正确的。正如 Richard Rottenburg（2009）所说，专业知识的转移依赖于转译的工作。因此，技术如何从一个语境转移到另一个语境，什么伴随着它转移，什么会滞后，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因为技术一旦离开了它的制造者，它就是“不稳定的对象”（Larkin 2008）。然而，技术一旦被转移到新环境中，被利用到新的项目中，被锚定在新的伦理模式中，它们又会逐渐稳定。我将在下面探讨的，正是这种使设备在特定的伦理 - 政治组合中生效的符号 - 物质的操作。

进行抗衡的设备：南非种族隔离末期的“能源预算控制器”（约翰内斯堡，1988年）

Clark 本人很清楚，在南非安装预付费电表的环境，与 19 世纪末的英国大不相同，他认为，1980 年代的南非由于“政治上的问题”，是“一片混乱”。和我之前采访的许多工程师一样，对 Clark 来说，谈论“政治”并不是工作必需的能力，他在谈到这些时，总是摆出皱眉或痛苦的表情。许多人早在种族隔离时期就开始从事这份工作，他们完全不知道，在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应该如何提及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那段历史。

反种族隔离斗争被世界所熟知，是因为它争取政治权利的行动——这是斗争最能联系到全国范围的一个角度。但反种族隔离斗争中也有很多局部斗争，比如，针对种族隔离政府对人们的管理方式的斗争。相对而言，这种斗争的对象不那么具体，但它的存在却容易感受得到。在 1980 年代，

整个南非黑人居住区的居民都拒绝支付租金和服务费，在一定程度上，这也使黑人居住区“难以被管理”。这种“财政抗拒”行为成为了叛乱的象征性和物质性的工具，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既使黑人居住区的行政管理无法运转，也将政治斗争的关注点转移到中断服务和驱逐居民之类的行径之上¹⁶。由于抵抗日益激化，甚至出现了武装斗争，工程师们开始寻找拒付款问题在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案。

与此同时，南非强大的半国营性质电力公司埃斯克姆，针对黑人居住区开展了电气化建设。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很明显，“大城市非洲人”没有像极端种族隔离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那样，“回到”班图斯坦曾经的那种穷困生活。这让城市中的黑人群体越来越受到经济上的关注，如果把他们看作潜在的电力和电器消费者，就能看到一個尚未开发的市场。正是在这种极为矛盾的背景下——政治化的拒付款行动和大规模的电气化计划同时进行，“改革”与反“改革”的行动并置——预付费电表出现了。

Peter Clark 在1986年开发了第一台南非的预付费电表。就像在英国一样，他的首要任务是构建设备、消费者和公共服务部门之间的有效结合。Clark 在两个方面上改变了原来的技术。首先，为了“保护”南非用户，他用磁卡和不可转让的“令牌”代替了硬币。因此，磁卡和令牌中的信用额度将与特定家庭相关联，现金交易只有在当地的付费点才能进行。其次，仪表周围的保护盒要用便宜又不失坚固的材料制成，这样居民们就不会把它当废品卖掉。但是，除了对技术进行改造，与19世纪的英格兰的公共服务部门一样，埃斯克姆公司也需要对用户进行安排¹⁷。比如，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创造人们对电力的需求。公用服务部门向居民提供免费的家用电器，例如电灯或电炉灶，以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几位工程师告诉我，当时他们到各个家庭中探访，常常会发现预付费电表箱被油烟熏

16 我从 Janet Roitman (2005) 那里借用了“财政不服从”一词。

17 参见 Woolgar (1991) 关于“用户结构 (configuration of the user)”的研究。

黑了，人们宁可使用电表下面烧木头的火炉，也不用电炉。

在 1980 年代末期，预付费电表被称做“能源预算控制器”，被誉为“计算机发明之后的另一个重大技术突破。”¹⁸ 很多时候，人们对它的政治意涵直言不讳。有一个制造商说，预付费“将有助于电力供应的去政治化，本国未来几年必将面临意识形态斗争，届时能源就不会成为战争筹码。”¹⁹

Clark 所描述的早期尝试，最为清楚地体现了这项发明的政治目的和政治影响。那时，工程师们与两类人同时进行商议：掌管市政的白人和邻近居住区里抵制租金的黑人。在 1980 年代末期，Clark 受雇于当时的电表制造商，开始将电表专门销售给各个自治市镇，把电表说成是“能结束抵制”、“不用进入黑人居住区就能断开他们的供电”的设备。同时，他也将电表出售给抵制运动的领导人，后者希望为黑人居住区提供电力，但不愿与白人掌管的市政当局进行谈判。正如 Clark 所说：

“我们意识到，要直接去社区。我们……接近 [公民组织]，然后说：‘您看，我们知道你们在进行斗争，但我们也知道你们需要电。有了 [预付费]，你们不用与政府签订合同，也能正常用电。再也没有人会到这儿来让您断电。’这里面涉及很多心理学的东西。”

尽管 Clark 希望向我描述他过往的成功，但这种与公民组织的谈判其实常常失败。一位来自 Planact（一个与公民组织联盟的非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在 1992 年指出，预付费电表“正在迅速而危险地败坏自己的名声”，它已经成为“在许多黑人居住区出现的争议的真正源头，而公民组织甚至拒绝讨论这件事”（Cobbett 1992: 5f）。

18 George Malan, 《能源预算控制器可以解决供水中的拒付款问题》（“Budget Energy Controllers Can Solve Non-Payment of Water Accounts”），《地方工程师》（Municipal Engineer），1989 年 10 月。

19 M. A. Stevenson, 《开发用于第一和第三世界环境的预付费电表系统》（“Development of Prepayment Electricity Metering Systems for Use in First and Third World Environments”），《第七届国际计量设备和电价会议》（Sev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tering Apparatus and Tariffs for Electricity Supply），格拉斯哥：能源部、电气工程师学会，1992。

总而言之，在 1980 年代期间，人们赋予预付费电表很多意义，借助它使付款、基础设施与更大的公民身份问题脱钩，重新建立并强化了行政和政治之间的区分。仪表在此被用于种族隔离末期的技术 - 政治，它给出的些微“改良”之下是对少数群体统治的强烈拥护²⁰。然而，这种政治遇到的种种矛盾和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许多项目仍处于试验阶段。实际上，在 1980 年代被安装的预付费电表并不多。

仪表在自由主义的维多利亚时代作为改善道德的工具被投入使用，但在进入种族隔离末期的南非时，它们却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平定反叛的手段。在这两个时刻，特定的伦理和政治计划委以技术重大的责任，技术本身则成为表达和协商相关问题的领域。将两个时刻联系在一起，伴随着仪表的“旅行”一同到来的，是一种将旷日持久的伦理 - 政治问题（包括公民归属、公民美德，以及公民权利边界的问题）委托给技术领域的本领。仪表作为政治社会的技术形式，借此创造了所谓的渐进式社会契约，通过这种契约，公民形象实际上是在行政领域中被形塑的。不过，即使在看似极端去政治化的背景下，这种技术手段也以各种方式构成了物质性的政治，人们可以在这些政治中主张各种各样的伦理，投入各种各样的情感。

在当代南非，这种物质性的政治采取了几种看似违反直觉的形式。在索韦托等乡镇，依然有大量居民拒绝付款，同时，新自由主义的“回收成本”又势在必行。因此，预付费技术已经成为将较贫困的黑人居住区接入服务系统的固定模式，这削减了居民此前不经仪表使用服务的权利。借此，这个渐渐成型的社会契约调用了种族隔离政策在处理种族问题时的遗留经验，演变成一种惩罚性的处理方式。因此，我在下一节中将要详细介绍，预付费成为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技术 - 政治斗争领域，其斗争发生在公民权利的边界上。同时，仪表有时会作为一种拓展服务被安装在一些非正式定

20 讽刺的是，当代南非在预付费技术方面成为“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与种族隔离时期技术 - 政治的遗产有关。

居点，管理者先让居民们通过仪表连接到电网，再让这种连接逐渐露出它不稳定的一面。最后，对预付费电表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这通常是因为富裕的居民不信任市政部门的记账工作，因此将电表视为从城市官员的手中夺取控制权的工具。这种预付费电表需求意味着，这些人希望能借此解除与地方政府的合同关系，他们认为这种关系是充满偏见、不可信任的。但讽刺的是，居民自己提出的这些需求，也会渐渐塑造新的社会契约。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仪表也还是信任、归属和公民义务这些伦理和政治问题的对象和展开这些问题的领域。既然预付费模式要成为标准，要逐渐将所有居民都连接到基础服务²¹，那么在连接的进程中，伦理、政治和技术或许还会以新的方式发生融合。

坏账、聪明的仪表和反对计划的市场：“技术”创新的政治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年度预付费奖”颁奖典礼，中断了我与 Peter Clark 的谈话。该奖项由南非最大的手机公司赞助，每年颁发给提出最具创新性的预付费概念的公司。今年获此殊荣的发明是一种叫做分配站信息链接的设备，简称 InfoPOD，由 Peter Clark 的雇主，跨国公司爱拓利仪表与系统公司（Actaris Metering Systems）开发。南非矿产和能源部长 Phumzile Mblambo-Ngcuka 受邀参加颁奖典礼，在致辞中，她感谢爱拓利为南非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的不懈努力。

颁奖典礼将预付费技术视为技术进步和南非创新精神自然而然的结果加以展示，在整个会议期间，这种线性叙事一直不断地重复。当天早些时候，一群示威者聚集在会议中心外，举着“停止预付费！（Down with Prepaids！）”的标语牌。而参会代表们对此已经见怪不怪，他们经历过无数次的示威和迫在眉睫的法律挑战，也很清楚针对预付费（特别是供水预付费）的各种反对意见。而此时，会议中心里出现了一种无形的政治，

21 2013年4月，约翰内斯堡的电力公司 City Power 宣布了为其所有用户安装预付费电表的计划。

它指向对技术本身的设计。看看那些正在演示的 PowerPoint，你立马就能明白，这是一个不断与“非技术”问题作斗争的行业——政府的干预（intrusions）、法律上的障碍、行业标准和融资问题——还有一个核心问题：各种不服从规范的消费者，似乎他们才是一直以来预付费冲突的源头。

尽管种族隔离制度已经于 1994 年结束，但许多黑人居住区的居民至今仍然没有为服务付过款。一些社会运动以民族重建的名义敦促居民支付服务费，但以惨败告终。在索韦托这样的地方，拒付费用的情况实际上还有所增加。手动切断服务再非法重连的做法很常见，通常是在居民组织（如索韦托电力危机委员会）的协助下进行。同时，许多市政府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回收成本”的压力急剧增加。因此，预付费技术被广泛地加以使用，也是为了解决民族主义的感召没能解决的问题。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的十年内，500 万个家庭装上了预付费电表。不过在短短几年内，又有许多居民又绕开了电表，使其失效进而非法用电。因此，埃斯科姆似乎只能人工检查进行非法操作的用户并断开他们的连接，但这显然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会议上的许多演讲都紧盯着这一问题。我将重点介绍人们提出的两个解决方案，以说明这种技术 - 政治的创新方式。

作为技术发展的舞台，市政工程不仅在面对个人用户时有其专长，在面对居民群体时更是在很多方面都无可替代。基础设施开发人员通常高度关注公共服务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构建和管理，尽管这些关系常常被视为行政性的而非政治性的。确实，在许多演讲中，最突出的是用户和技术之间可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又将如何在居民群体与公共服务或市政当局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仪表的价值取决于它建立和维持这种关系的能力。反过来说，这就要求工程师具备一定的解释能力，运用基本的人口统计学知识、社会学知识，展开他的论证。例如，工程师需要了解特定地区的历史付款情况，这种情况又常常与黑人居住区的政治历史联系在一起。他们需要展示仪表的测试情况，测试考虑了哪些潜在障碍，或者测试表明它们

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干预”才能保证得到“用户的接受”。因此，演讲中经常出现实地试验或试点项目的数据，以体现他们对当地的具体情况的了解。外国演讲者和本国演讲者掌握当地情况的能力有明显的差距。

一家全球大型基础设施技术公司的法国代表做了当天第一场演讲，他介绍了“自动电表管理”（AMM）的概念，这是预付费和“智能”电表技术的结合，可以实现电表与公共服务系统之间的远程通信。这项技术的新颖之处在于所谓广泛的通用性，用工程师的话说，它能灵活地应对“全球挑战”。在概述所有这些挑战时，他从全球基础设施技术贸易的角度，按照一系列独特的“客户面向”对整个世界进行了划分，划分的根据是人们不同的需求、不同程度的可信赖性和复杂性，以及工程师预测到的各种行为模式。这种划分绘制出了一张独特的世界地图。例如，工程师认为，在“第一世界”，电表需要与互联网服务兼容，以便在线计费或实行弹性税率（flexible tariffs），而在“第三世界”如南非等地，“自动电表管理”可以实现对消费的“持续监控”，从而有助于消除坏账、非法连接和盗用行为。

工程师认为，按照固定标准进行计量是不安全的，因此公共服务部门需要不断地进行检查。他在自己的幻灯片中这样描述前者导致的问题：

“1000个检查员，配1000条狗”能对所有用户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访问.....

- 他们是否清楚要去哪里检查.....而且不带政治偏见
- 人们能否让他们进入自己家.....
- 这会不会影响公共服务部门的政治形象.....
- 造访过后人们就能重新操弄仪表，进行欺诈.....
- 得到有关欺诈的证据，可能也无法弥补过去的损失

-抄表的工作人员此前为什么没有用这种方式消除掉欺诈行为？
-把旧的、笨拙的机电式仪表换成新的、仍然笨拙的、过不久还是要被破解的电动机械仪表，你们愿意吗？

又旧又“笨”的电表需要由市政官员进行检查和记录，这反倒导致了一系列问题。正如工程师所说，居民们可能不会让检查人员进入自己家，检查人员可能会成为“政治排斥”的目标，他也可能会渐渐变得不够可靠。而“自动电表管理”将检查仪表的责任从人这一边委托（delegate）给了技术²²。测量、抄表、监视、断开连接，这些操作现在都可以交由一种技术设备加以执行。因此，电表本身可以“提供一系列办法，使这些行为回到正轨、符合法律，同时对付这些客户的政治问题。”该技术不仅可以解决市政官员不够可靠的问题，关上他们违规操作的大门，还能取消因官员在场而伴生的那个谈判或抗议的空间。因此，工程师认为，该技术会执行“政治”的操作。采用“自动电表管理”也就成为一种将支付纠纷委托给技术的方式。

来自南非的代表似乎对这个演讲不太感兴趣。显然，这是一个昂贵的解决方案，没有考虑到南非公共服务部门所面临的财务限制。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实地试验的支持，这位工程师无从获得那种能说服其他代表的威信。一位南非代表指出：“消费者会在一个国家/地区接受一种类型的技术，但条件一变，他们可能就完全不接受。这谁也说不准，可一旦发生，您的企业和投资者就不会再信任您（的计划）。”换句话说，真正有用的是一种不让消费者作出难以预测的反应的机制。这就需要演讲者具备更多的社会学知识，此外，他还需要更详尽地演示社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相较之下，屡获殊荣的 InfoPOD 迅速抛弃了“全球/普适”的解决方案，

22 “委托（delegation）”这一概念参见 Latour (1992)。

这引起了其他参与者的关注。在演讲中，InfoPOD 的开发人员（埃斯科姆公司的国内代表）点明了问题。如果要把所有目前比较“笨”的预付费电表完全换掉，其成本将是埃斯科姆无法负担的天文数字。不仅如此，许多仪表即使装上了也能被绕过，无法正常工作。去年试行的 InfoPOD 将为此提供解决方案。InfoPOD 被开发人员称为“一种从预付费电表中收集信息的步入式、非侵入式、非接触式系统”，它是一种小型无线电设备，可以连接到现有的预付费电表上，这样官员不用亲自到居民家里去，就能够通过远程访问电表来追踪人们的违规操作。装有 InfoPOD 的旧电表将会“更智能”。现在，公共服务部门的员工不用进入人们的住所，只要在黑人居住区里走过或开着车经过，就能通过无线电信号接收器自动从电表中远程收集到需要的信息。

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演讲中也讨论了在引入新设备期间可能出现的潜在问题。当被问及“如何使人们同意这次安装”时，演讲者建议道：“您不能只是告诉居民们安装 [InfoPOD] 是为了检测违规操作，您要告诉他们一些正面的效果。这么说吧——你必须懂策略。”因此，这种“技术”创新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工程师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以及他们苦口婆心策略性干预的水平。

从这个角度来看，InfoPOD 仍然只是一种强制市民付款的策略——从呼吁公民美德转向使用带有强制性的技术设备——这样的措施在地方政府与其公民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用 Latour 的话说，这是一个“反计划（anti-program）”²³。该设备的价值就是它可以策略性地干预正在发生的付款冲突——只不过，（与“呼吁美德”相比）它是在一套技术之中运作的。这只是持续不断的技术 - 政治斗争的一种灵活变化。

23 Latour(1992)创造了“行动计划”和“反计划”这两个术语，并表示技术制品可以承载或借以预测人们的行动，然而承载或预测的活动可能又会被其他行动计划或反计划所阻碍。因此，一项技术制品可以反推与它有关的行动计划（或反计划）。

会议要结束时，来自约翰内斯堡的一位代表向我讲述了一系列史诗般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在南非预付费技术的发展历程中，工程师们不得不加以克服的各种障碍。最后，他略带暗示地说道：“您也知道，供应商觉得人们都没有头脑，但实际上，很多创新都要归功于他们。如果不是人们经常破坏仪表，我们也不可能有机会在这儿开会。”的确，尽管本文主要围绕会议上的专家代表，但“使用者”、“狡猾的偷水贼”、“破坏经济的人”、“不良付款者”、“篡改者”、“电力偷猎者”和面临“政治问题”的居民，他们才是缺席的主角。南非的预付费仪表行业需要不断创新，最新技术也很快就会过时——被淘汰、绕过或重新布线。因此，从业者总是需要新的“反计划”——“更智能的仪表”、“安全封条”、进行“审核”、“追踪”、“监控”并能“远程断开连接”的工具。也就是说，专业的技术知识就诞生于它与“外部的专业知识（*expertise in the wild*）”²⁴的冲突之中（Callon, Lascoumes and Barthe 2009）。

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在宣扬这些不起眼的行动背后有什么事迹，我不是说它们抵抗了合理化、新自由主义或现代性的进程；相反，我始终是为了描绘一个技术 - 政治领域，在我们分析公众、分析人们无关紧要的言论的时候，这一领域往往会被忽视。人们倾心地投入我所描绘的“技术”转型之中，作出一系列策略性的计划（*scripts*）和反计划，以此介入这种看似不起眼却使技术得到不断发展的冲突。这种微观技术 - 政治关注的是居于核心的伦理 - 政治问题（比如公民美德问题或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公民身份问题），而随着问题的不同，这种政治的形式也截然不同。至此，基础设施已经不仅是为政治提供的工具或符号，不仅是权力的载体；基础设施本身就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领域。的确，我们能经常看到的，是南非新闻头条报道的抗议活动，而本文描述的技术 - 政治是一种由管道、电线和技术设备承载的后台（*nonpublics*）政治。但这两者，或许同等重要。

24 Callon, Lascoumes 和 Barthe (2009) 使用“外部的研究（*research in the wild*）”一词来指实验室环境以外的非专业人员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通常会挑战专业人员的“封闭式的研究（*secluded research*）”。

结论

当然，在南非，预付费电表的故事与许多方面的具体情况有关。只要人们还在使用电表，就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故事。但是，我们可能会在很多地方，在各种形式的场景中发现一种相似的技术 - 政治。如今，针对穷人开发的新技术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巨额投资，而他们开发的依据则是对穷人的基本情况的揣测，其中有些揣测还相当“周到”²⁵。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这些技术设备在人们与国家或非政府组织之间，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中介作用。通常，这些技术被赋予不可思议的力量，“可以从根本上改善穷人的生活”，或被视为统治、监视的工具。我要说的是，此处，作为中介的技术看似是中立的，但其发挥作用的场所，却是那些它们根本不可能一板一眼（*apparent pragmatism*）加以处理的伦理 - 政治计划。追踪此类技术设备的旅行，以民族志的方式追踪其被赋予意义的过程，我们或许就能“反推（*de-scribe*）”在陌生的地点、以意外的形式出现的政治，也能拓宽我们研究和构思政治时使用的概念，拓宽我们对政治进行想象时的视野。

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场域似乎日渐式微，于是，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协商和辩论通常发生在物质性的节点。在这里，轻按开关、切断电线或安装“更智能的”电表等行为，或许就展现着有待讨论的公民身份、公民归属或公民美德的问题。这种政治与人们想象的现代政治相去甚远，后者假设政治是一个透明的、不受阻碍地进行公共协商的领域。当然，有时这种物质政治确实做到了“公开”，使技术变成了“令人关注的问题”（*Latour*

25 在这里，人们可能会想到美国的食品券/卡、面向南非农村人口的生物识别 ATM 机、非正式的银行系统，以及联合国难民营中对难民进行的生物识别登记，等等（参见 Breckenridge 2005；Elyachar 2012；Fassin 2011）。另请参见 Peter Redfield（2012）对于人道主义设计的研究。

2004) , 比如我最开始描述的基亚韦洛抗议活动。但即便如此, 进一步观察也能发现, “公开”的抗议通常也与我在本文中概述的容易被忽视的技术-政治密切相关。

说到基亚韦洛的抗议活动, 事后证明, 这次抗议活动与一项反计划(技术)有一定关系。基亚韦洛的居民使用预付费电表已经很久了, 但是, 与索韦托其他地区一样, 人们绕过了许多电表。现在可以确定, 抗议活动的源头是几年前开始的一个试点项目, 该项目计划安装一种新型“分装电表”, 这项发明将电表分为两部分: 用来输入信用代码的触摸板安装在住房内部, 而实际仪表放在坚固的、“防篡改”的绿色钢盒之中, 钢盒则安装在室外的道路上。这个新的反计划, 比 InfoPOD 还要安全。然而, 抗议活动过后三个月, 2011 年 10 月, 埃斯科姆公司在检查中发现, 居民们已经用角磨机割开了“牢不可破”的绿钢盒。也就是说, 仪表又一次被绕过了, 而“创新”和“颠覆”的循环看起来永无休止, 这次绕过, 又为工程师们开发下一个反计划打下了基础。

致谢

我要感谢工程师和索韦托当地居民慷慨地抽出时间与我谈话。在 2012 年的 AAA 会议上, 密歇根大学、康奈尔大学和哈勒市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的听众, 针对本文较早的版本提供了有用的反馈, 其中包括 Andrew Barry, James Ferguson, Gabrielle Hecht, Trevor Pinch, Peter Redfield, Richard Rottenburg 和 Suman Seth。感谢他们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帮助和深入的讨论——Partha Chatterjee, Stonie Clark, Julia Hornberger, Manjari Mahajan, Tim Mitchell, Jabulani Molobela, Suren Pillay 和 Ahmed Veriava。特别感谢 Mireille Abelin, Ruchi Chaturvedi, Thushara Hewage 和 Arafat Valiani, 以及编辑和两位审稿人的认真阅读和慷慨评论。本文对应的研究由 Wenner-Gren Foundation 和 The New School 提供部分资助。

参考文献

Akrich, Madeleine

1992 “The De-Description of Technical Objects.” In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Wiebe Bijker and John Law, eds. Pp. 205–224. Cambridge, MA: MIT Press.

Anand, Nikhil

2012 “Pressure: The Politechnics of Water Supply in Mumbai.” *Cultural Anthropology* 26(4):542–564.

Appadurai, Arjun, ed.

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rendt, Hannah

1990 *O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arry, Andrew

2001 *Political Machines: Governing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London: Athlone.

Bennett, Jane

2010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ijker, Wiebe,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Pinch, eds.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ond, Patrick, and Jackie Dugard

2008 “The Case of Johannesburg Water: What Really Happened at the Pre-Paid ‘Parish Pump.’” *Law, Democracy & Development* 12(1):1–28.

Braun, Bruce, and Susan Whatmore, eds.

2010 *Political Matter: Technoscience, Democracy, and Public Lif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reckenridge, Keith

2005 “The Biometric State: The Promise and Peril of Digital Government in the

New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1(2):267–282.

Callon, Michel

2007 “What Does It Mean to Say Economics Is Performative?” In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eds. Pp. 311–35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allon, Michel, Pierre Lascoumes, and Yannick Barthe

2009 *Acting in an Uncertain World: An Essay on Technical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halfin, Brenda

2010 *Neoliberal Frontiers: An Ethnography of Sovereignty in West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tterjee, Partha

2004 *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 Studies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bbett, William

1992 “Turning the Meters Back to Zero: Electricity Distribut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in Urban Area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National Meeting on Electrification*.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Collier, Stephen J.

2011 *Post-Soviet Social: Neoliberalism, Social Modernity, Bio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llier, Stephen J. and Aihwa Ong, eds.

2005 *Global Assemblages: Technology, Politics, and Ethics as Anthropological Problems*. Malden, MA: Blackwell.

Comaroff, Jean

2007 “Beyond the Politics of Bare Life: Aids and the Global Order.” *Public Culture* 19(1):197–219.

Connolly, William E.

■ 专题一 _ 基础设施的文化研究

2002 *Neuropolitics: Thinking, Culture, Spe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aston, Lorraine, and Peter Galison

2007 *Objectiv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Daunton, Martin

1983 *House and Home in the Victorian City: Working Class Housing, 1850–1914*. London: E. Arnold.

De Laet, Marianne, and Annemarie Mol

2000 “The Zimbabwe Bush Pump: Mechanics of a Fluid Technolog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0(2):225–263.

Elyachar, Julia

2012 *Next Practices: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Goods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Public Culture* 24(1):109–129.

Fassin, Didier

2011 “Policing Borders, Producing Boundaries: The Governmentality of Immigration in Dark Time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0(1):213–226.

Ferguson, James

2007 “Formalities of Poverty: Thinking about Social Assistance in Neoliberal South Afric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50(2):71–86.

Fischer, Claude S.

1994 *America Calli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 to 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aonkar, Dilip, and Elizabeth Povinelli

2003 “Technologies of Public Forms: Circulation, Transfiguration, Recognition.” *Public Culture* 15(3):385–397.

Gooday, Graeme

2004 *The Morals of Measurement: Accuracy, Irony, and Trust in Late Victorian Electrical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cht, Gabrielle

2009 *The Radiance of France: Nuclear Power and National Identity after World War II*.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Being Nuclear: Africans and the Global Uranium Trad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Helmreich, Stefan

2007 “An Anthropologist Underwater: Immersive Soundscapes, Submarine Cyborgs, and Transductive Ethnography.” *American Ethnologist* 34(4):621–641.

Hirschkind, Charles

2001 “Civic Virtue and Religious Reason: An Islamic Counterpublic.” *Cultural Anthropology* 16(1):3–34.

Joyce, Patrick

2003 *The Rule of Freedom: Liberalism and the Modern City*. London: Verso.

Kockelman, Paul

2010 “Enemies, Parasites, and Noise: How to Take Up Residence in a System without Becoming a Term in It.”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20(2):406–421.

Larkin, Brian

2008 *Signal and Noise: Media, Infrastructure, 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1992 “Where Are the Missing Masses? The Sociology of a Few Mundane Artifacts.” In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Wiebe Bijker and John Law, eds. Pp. 225–258.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Critical Inquiry* 30(2):225–248.

MacDonald, David, ed.

2009 *Electric Capitalism: Recolonising Africa on the Power Grid*. Cape Town: HSRC Press.

Mahmood, Saba

2005 *Politics of Piety: The Islamic Revival and the Feminist Subjec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ains, Daniel

2012 “Blackouts and Progress: Privatiz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a Developmentalist State in Jimma, Ethiopia.” *Cultural Anthropology* 27(1):3–27.

Mitchell, Timothy

2002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London: Verso.

Naidoo, Prishani

2007 “Struggles arou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Daily Life in South Africa.”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34(111):57–66.

Nefale, Michael

2004 *A Survey on Attitudes towards Prepaid Meters in Soweto*. Johannesburg: Centre for Applied Leg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Redfield, Peter

2012 “Bioexpectations: Life Technologies as Humanitarian Goods.” *Public Culture* 24(66):157–184.

Robins, Steven

2008 “From ‘Rights’ to ‘Ritual’: Aids Activism in South Afric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8(2):312–323.

Roitman, Janet

2005 *Fiscal Disobedience: An Anthropolog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in Central Af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ottenburg, Richard

2009 *Far-Fetched Facts: A Parable of Development Ai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chnitzler, Antina von

2008 “Citizenship Prepaid: Water, Calculability and Techno-Politics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Southern African Studies*, 34(4):899–917.

Star, Susan Leigh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377–391.

Winner, Langdon

1980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In *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 Pp. 19–39.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ise, M. Norton, ed.

1995 *The Values of Precis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oolgar, Steve

1991 “Configuring the User: The Case of Usability Trials.” In *A Sociology of Monsters: Essays on Power, Technology and Domination*. John Law, ed. Pp. 58–99. London: Routledge.



媒介中的数字劳工



编者按¹

马凌*

笔者至今仍记得 2016 年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与姚建华博士一起去商务印刷馆上海分公司洽谈出版事宜的情景。在当时，“数字劳工”尚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概念，需要学术组织的背书。好在，贺圣遂先生代表的出版方极有眼光，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童兵先生主持的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亦极有魄力，共同促成了本套丛书的出版。从 2017 年至 2020 年，“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四卷陆续推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渐成星火燎原之势，当毕业论文越来越多地以“产消合一”“网权制资本主义”“情感劳动”“游戏玩工”为关键词；当疫情之下全社会都在关注快递小哥、富士康复工、主播带货、灵活用工、粉丝经济，我终于确信，这套书的出版适逢其时。

19 世纪，马克思将“劳动”放置于全部学说的核心位置，“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的社会本性和社会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是人在社会中的基本实践形式。他的“劳动价值论”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角度，道出了资本的秘密。而向前展望，未来社会必然要将劳动者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技术变迁的世纪之交重新倡导“回归劳动”，丹·席勒（Dan Schiller）以此重新梳理了传播理论史，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等人，则将劳动方式、劳动关系、劳动者境况放在当今的数字时代进行理解。伴随着“马克思归来”的，是劳动的变与不变，是劳动者的痛苦与梦想。

* 马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主任。

1 本专题首发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 年 8 月。

“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丛书，将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研究成果编辑成卷，分别探讨信息时代的价值与积累、数字劳工的劳动方式与特征、产消合一状态下的玩工、信息产业的劳动关系四个重要议题。正如姚建华的博士导师、传播政治经济学大师莫斯可在序言中所指出的，（他）“对于数字劳工的西方研究视角有着广泛的涉猎且在加拿大接受过系统化的理论训练，建华本人对于中国媒介工作者的研究展现了该领域研究者所必需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策略”。由于编者长期深耕于这一领域，且对西方和中国的数字劳动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本套丛书有着开阔的交叉学科视阈，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传播学、媒介学、文化研究、技术哲学、法学和伦理学等无所不包；同时又有着一种世界眼光，在对西方数字 / 传播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思索着建设真正的数字 / 传播社会主义的可能路径。

这里所辑的三篇书评的作者，分别来自社会学、法学和传播学领域，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切进，超越了一般书评的高度，更像是与这套丛书的一种对话。贾文娟的《从数字劳动探索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变迁》高屋建瓴，将丛书主题归纳为积累模式、劳动控制、产消合一和组织抗争，有力地解释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劳动者的困境与出路。胡凌的《法学视角下的数字劳工权益保障》以法律学者的清晰洞见，条分缕析地梳理了当前模糊地带的权益保障问题，包括平台的权力、灵活用工的性质、产消者信息保护、数字关系、平台合作社、礼物经济等。徐偲骞的《迈向传播社会主义 / 数字社会主义下的未来劳动》立足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将丛书浓缩为：数字劳工“生产了互联网（第1卷），用互联网来生产（第2卷），为互联网而生产（第3卷），也在互联网中生产自己（第4卷）”，他指出当今西方的工团主义或工联主义、乃至“平台合作化”的“传播社会主义”，并不能解决技术垄断与数字生产资料私有化的根本问题，希望在中国，“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先天制度优势使得我们在面对同类问题时有更多的政策选项和治理工具”。

毋庸讳言，“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丛书主要还是“西方的视角”，但在这巨变的时代，它也启发了“中国的道路”。希望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这个交叉学科领域，因为——“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从数字劳动探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变迁¹

贾文娟*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锚点

距离沈原教授在新千禧伊始提出“中国正处于两次大转型的交汇点上”不过十余年，我们便切身体会到历史脚步的匆忙²。这个颇具冲击力的新时代先是在全球范围内高调亮出了平台经济、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大数据等招牌吸睛，然后在各种黑马、独角兽可想而知的衰退与破灭中使世人惊愕，最后在中美对峙、逆全球化的浪潮下给全球经济以重重一击，将就业水平带至冰点。你我都能体会到庚子年的这股戾气：数字识别等新技术为生活提供便利，但也带来隐私的丧失与监控手段的普遍化等焦虑；生物医学技术将人们带到了基因编辑的新时代，但却对新型冠状病毒一筹莫展……世纪之初的瑰丽泡沫眼看越飞越远。伫立在历史长河边，我们切切实实地见证“沉舟侧畔千帆过”：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归途仍未明确、制造企业中的技术升级尚未完成之际，大批劳动者已经撇下现代工厂这只“巨兽”，以网红、快递小哥等新身份、新面目，投入到“勇敢的新经济”中了。今时今日，学者们无疑又陷入一种对未来与未知的焦灼与不安之中。人当然“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是，后浪与前浪真的身处同一条奔涌的“河流”吗？世界到底变了吗？如果真如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或汉娜阿伦特等先贤所揭示的，劳动不是明日黄花，而是人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人类社会存续的依托，我们又当如何把握历史的脉搏，理解令人炫目的“新工作”与那个似乎一直都在的“本质”之间的新关系呢？

* 贾文娟，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1 基金项目：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产业转型下国企劳资矛盾协调机制研究”（编号：2017ESH004）、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项目“工厂政体与国企劳资矛盾协调机制研究”（编号：16CG48）成果之一。

2 沈原.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 [J]. 社会学研究, 2006 (02) : 13-36.

19世纪早期，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提出了对现代社会本质的精辟见解，为世人拨开历史的迷雾、树立光明的灯塔。但我们不能“刻舟求剑”，变迁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锚点”：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等³学者在二战后革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制造剩余”和“吸收剩余”的角度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滞涨现象；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等⁴学者在冷战结束后提出了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为理解资本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的跨国流动与弹性积累提供了可能。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时代，移动互联等新技术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工作与交往方式，带来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模式的翻新。在这种情况下，以文森特·莫斯科（Vincent Mosco）、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等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从数字时代的劳动、劳动者与劳动关系特征入手，揭示了资本增殖的隐秘“新”逻辑，为我们理解人类在数字时代的境况设立了一个新的“锚点”。

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于理解数字时代的劳动状况提供了哪些新认识？我们又如何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分析当今世界的变迁呢？在2017年到2020年四年间，姚建华副教授将该领域的代表文献引介到国内并编纂成册，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在这个困惑、彷徨的庚子年，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赋予人们洞察资本主义世界变迁的智慧与勇气。

二、数字时代的积累、劳动、支配与抗争

劳动与工作构成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解人类存在状态的重要视角之一，而技术则是其探寻社会变迁的首选切入点。莫斯科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写

3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 垄断资本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4 大卫·哈维. 后现代的状况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道：“数字世界的下一步革命可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要远远大于之前的互联网。这是因为新的技术带来了三个强有力且相互联系的系统：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⁵ 数字技术将数据存储和服务集中于数字化工厂，用以处理由网络传感器收集的来自生产部门、受众、消费者，乃至身体的海量信息，打破并改变了曾经的商业模式和组织模式。那么数字技术时代的资本积累模式是怎样的呢？技术变迁对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又产生了怎样的新影响？这便是这套丛书所要回答的问题。笔者则将其归纳为积累模式、劳动控制、产消合一、组织抗争这“起、承、转、合”四个议题。

（一）“起”：积累模式的转变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今天的人们与其前辈仍在同一条历史之河中踏浪淘金。资本积累仍然源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三种途径：贸易、租金与劳动。但是，在当下这个被网友称为“羊毛出在狗身上，猪买单”的时代，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转变：贸易不再是依托远洋航海的殖民贸易，而是通过对他人知识产权进行占有与销售、或通过售卖互联网中免费内容而获益的信息贸易；租金亦不仅来自土地或房产，而且源于网上空间——广告代理商支付给社交媒体、企业支付给搜索引擎、店家支付给平台、用户支付给媒体网站等；随着生产与消费界限的模糊、劳动与娱乐边界的打破、雇员与雇主身份的消弭，信息时代的人类劳动亦嬗变为生产出“数据”、“内容”与“信息”的数字劳动与无酬劳动，这些“无形产品的生产者”便是“数字劳工”。

当然，数字劳工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就像物质生产者能够分为技术专家、技术工人与非技术工人一样，数字劳工既包括控制了创新过程的特权精英，也涵盖在“众包”这种新型组织方式进行着自我控制、自我商品化、自我理性化的IT工程师等中层软件开发者，还囊括大量在诸如富士康等电子制造企业或在呼叫中心提供售后服务的非技术工人。与工业

5 文森特·莫斯科·总序 [A]. 姚建华. 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

劳动不同的是，不同等级的数字劳动之间，因物质收入与劳动强度的极化状态，存在着一个结构化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技术、性别与劳动关系的问题在数字时代变得更为错综复杂。知识经济与数字劳动虽为女性提供了终身学习的机会和更多的职业选择，但她们在工作生活中仍受制于一个脱胎于现代工业社会的性别秩序。

综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们在剩余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提出了理解数字劳动的三个奠基性主张：资本积累与工作岗位的分散化；劳动产品无形化与劳动无薪化、数字化；基于“数字鸿沟”与性别秩序的劳动极化。这为我们理解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现象提供了理论根基。

（二）“承”：劳动控制的翻新

在撒切尔与里根携手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下，欧美政府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推行去管制化政策：放松对私有领域、市场和劳动的监管，不断推进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改革，减少对社会福利、公益事业的投资与关注；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实施新保守主义政策，对进步工会进行压制与打击，并借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以离境外包工人替代本国正式雇员。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带来了文化领域的重大变化：媒介传播模式从社区服务模式转向了资本主义商业模式；媒体关注点从监督利益集团、提升社区能力等公共议题转变到天气、运动、娱乐等内容；文化产品则从严肃的深度调查转化为琐碎的趣事报道。

在媒介产业发展模式与技术手段的转变下，新闻生产中的劳动控制亦发生了新变化：其一，基于关系与责任的控制、面向独立生产者的市场控制等新策略开始被媒介资本家们用来获取剩余劳动；其二，在反思哈里·布雷弗曼 (Harry Braverman) “概念与执行分离”下的“去技术化”命题的基础上，马特卡尔森 (Matt Carlson) 指出，新技术对媒体劳动的影响是复杂的，数字化的人机交互虽加大了劳动者的工作量与压力，但也推动了个性化表

达、削弱了新闻权威⁶；第三，“剥削是一个动力学的概念，它将敌对与抵抗联接在了一起”⁷，虽然文化公司试图通过控制文化产品的发行、流通、占有作者版权而获取利润，但劳动者也会主张更大的自主权与创造性，劳动者抵制形式也会更加多样化。

可见，工作与劳动显然是一个在数字技术加持下，段位不断提升的斗争场域。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剥削—积累”、“控制—反抗”辩证关系的新变化呈于世人面前，并强调数字劳动的变动性与复杂性：反抗与自主性有可能巩固既有秩序；而特定的支配手段亦为劳动者的解放提供了可能。

（三）“转”：产消合一的出现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产和消费就藉由“自助”的概念而捆绑在了一起：那些在麦当劳自取食物与酱料、在加油站自助加油、自己动手组装宜家家具的消费者都是“产消合一”的“生产性消费”者。而在数字传播时代，游戏模组爱好者、粉丝、玩家、乐高数字设计师、脸书用户等在线消费者也成为了重要的劳动者，为增添网络内容、创新游戏设计动脑出力。他们在兴趣、社交、合作、自我表达等闲暇娱乐名义下，成为新型产消合一者。

需要注意的是，传播生产领域的资本积累逻辑完全不同于工业领域，而“受众劳动”是理解该逻辑的核心。媒介企业、广告公司乃至工业企业的盈利与收视率紧密关联，传媒企业的交换价值的实现则依赖于“无偿占用”受众的空闲时间，使其观看额外广告。在这个意义上，受众收看节目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受众劳动”。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成为了网络内容的生产者、大数据所需信息的提供者、在线社区建设者等，人类的创造力被彻底地商品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时

6 马特·卡尔森. 机器人记者：自动化新闻与劳工、写作形式和新闻权威的重新定义 [A]. 姚建华. 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 [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7 Wright E.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5

间与休闲时间、生产与消费、工作与闲暇的边界消失了，传统生产者、传播资本、广告商、消费者、受众劳动者集中到了同一个网络平台。受众劳动的异化程度因其创造性、自主性的增加下降了，剥削率则因受众范围扩大而得到了显著提升。此时，传播资本的剩余价值变现能力与资本积累速率也是前所未有的。

（四）“合”：组织抗争的转变

劳动关系的核心在于劳动协商、利益协调与权力博弈，新的劳动方式和劳动群体呼唤着新的协调策略。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劳动群体是如何维护自身利益的？数字劳工的组织方式又遭遇了什么新挑战？这套丛书的最后一册《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通过对“全球南方”ICT代工厂劳工与数字产业中高技能不稳定劳动者两个群体利益组织化策略的分析，回答了上述问题。

支撑着ICT产业大厦的是位于印度的班加罗尔等“全球南方”地区的低薪劳工。为了将分散于全球各处的产业链底端工人组织起来，以集体谈判的方式改善其雇佣条件，美国、荷兰、瑞士、墨西哥、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劳工组织进行了跨国联合，通过会议、共同科研项目、社会运动、案例合作等不同方式，发起了“全球电子业劳工及环境倡议运动”。而“世界工会联合会”、“马奎拉团结网络”等跨国劳工组织则通过动员消费者、组织物流行业工人、与社区组织或者环保运动联手、制订《电子产业行为准则》等策略，改善全球电子业工人的工作生活环境。

此外，北美地区自由撰稿人、视觉特效师、电子游戏开发者等高技能劳动者则通过更灵活的方式表达自身诉求。其中，行业协会、职业协会、代理机构等自组织，因为更强调与出版商、编辑、工作室等雇主方的合作，致力于帮助劳雇双方搭建沟通桥梁，且更符合推崇独立性、灵活性与自我激励等价值观的高技能劳动者的精英特质，而成为了更受欢迎的组织模式。

但是，从美国视觉特效师的抗议活动看，这种以平台为依托的行动模式虽然有助于表达不满、赢得关注、获得同情，但很难从根源上改变相关行业从业者作为不稳定劳动者的结构性的劣势地位。在当下，传统福特主义下的工会组织方式已然无法适应新变化，职业组织又过于保守而难以解决劳资关系中的本质性问题，但符合技术精英特质的行会化工会组织尚未发展起来。欧美数字劳工面对“下一代互联网”的冲击的办法仍不甚清晰。

今天，笼罩在全球劳动者头上的阴云愈加沉重。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第四次工业革命领先地位和新世纪领导权的重要筹码，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阻止全球经济衰退、解决全球就业危机呢？丛书带来的回答并不乐观。换个角度看，各方资本在挖掘智能财富上的眼光相当一致，但吃相并不好看。西方国家为了在瓜分“全球数字产业剩余”的蛋糕时获得更有利的位置而大打出手，不惜点燃了政治经济逆全球化的导火索。正如书中所言，新技术既能作用于全球政治经济关系的再生产，也为开辟全球新秩序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实际中，它带来的主要是争端、摩擦与混乱。全球资本主义的革新往往以改善工作状况为名，但承受着革新之痛的，却依然是普通劳动者。

三、从社会学角度入手深化数字劳工研究的三个方向

传播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的积累、剥削、劳动、抗争等概念出发为我们深入理解中国情境下的数字劳工问题提供了一个参照。但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主义取向较强，在分析上呈现出强纲领性的特质。直接将西方理论置于中国实践之上可能有失妥当。那么，社会学能为我们在中国情境下深化数字劳工研究提供什么可能呢？接下来，笔者将从“支配—反抗”、“社会整合”与“技术与解放”这三个问题意识出发，探索深化数字劳工研究的路径。

（一）在社会嵌入性中探索多元化的“支配—反抗”逻辑

虽然支配与反抗关系是劳动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但将二者看作不证自明的“社会事实”是不够的。那么，我们如何洞悉中国数字产业中更多样化、隐秘化的支配与反抗关系呢？“嵌入性”是一个不错的着眼点。社会学者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在本地社会生活与社会结构之中的，因此我们往往需要借助社会文化才能理解经济行为。从这个意义上看，“支配—反抗”关系亦不仅为抽象资本对剩余的欲求所影响，而且嵌入在中国的社会文化、政治机会结构与历史传统之中。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建筑业中的欠薪现象时就发现，包工制与传统社区的人情法则⁸、计划经济时期公社大队兑现工分的历史习惯结合在一起后⁹，才形成了对工人的强大支配力。

关系的嵌入性、政治嵌入性、社群嵌入性是分析中国数字劳动中的“支配—反抗”关系的三个入手点。首先，所有的经济活动必然嵌入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之中，但数字传媒业中“关系”的使用策略与建筑行业是完全不同的。“人们与同事在一起工作，与工友在一起劳动，与朋友在一起娱乐。形塑合适的关系是正确劳动的前提与必要条件”。¹⁰笔者在对媒体实习生的研究中发现，在不存在血缘、亲缘、地缘等初级社会关系的情况下，综艺娱乐节目管理者能够通过日常关心、礼物交换、聚餐等“关系工作”方式，打造出符合娱乐性劳动需要的“老师”、“朋友”或“战友”关系，继而构成对媒体实习生的文化性支配；第二，经济活动还嵌入在由国家政治体制所决定的政治机会结构中，中国数字劳工的支配模式亦因此呈现出与欧美国家不同的特征。以服务人工智能的数据标注劳动为例，在劳动者组织化程度高、劳工运动压力较大的西方国家，数字企业往往使用诸如亚

8 蔡禾，贾文娟. 路桥建筑业中包工头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关系”降低了谁的市场风险[J]. 社会，2009（05）：1-20.

9 元昕. 建筑业欠薪机制的形成与再生产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11（05）：55-79.

10 贾文娟，钟凯鸥. 另一种娱乐至死？——体验、幻象与综艺娱乐节目制作过程中的劳动控制[J]. 社会学研究，2018（06）：159-185.

马逊土耳其人（Amazon Mechanical Truck）等平台以众包的方式将标注工作分散到各处，以降低劳工组织化的潜能。¹¹而在强调社会治理的中国，数字企业则在产业扶贫、社区扶贫政策下，与地方政府、工会、学校、社区组织等进行合作，构建起将闲散劳动力组织起来的工厂化数据标注模式；第三，经济活动还嵌入在社会群体的交往、互动与文化之中，这使中国数字劳工的“支配—反抗”关系具有了更隐秘的逻辑与多元的面向。比如，中国的游戏私服提升用户体验的方式与欧美正版游戏公司不同。前者的策略主要是提升游戏人气、增加玩家数量。这时，私服老板往往通过“利诱”的方式将部分玩家发展成家族管理者，使后者在“内部人”特权身份与公司绩效考核的双重激励下，努力投入到游戏中。¹²同样是“玩工”，如果支配了欧美游戏开发者的机制是“工作的游戏化”，引诱了中国“家族管理人”的机制却是“游戏的工作化”。

综上，如果将劳动过程看作一种形塑了劳动主体的操演，不同的社会情境便有不同的话语逻辑与询唤方式，“支配—反抗”关系则会被折射出不同的颜色。面对着五光十色的数字劳动状况，社会学者还需要践行扎根理论的要求，暂时悬置已然发展成型的理论或盘踞在脑海中的假设，并采取过程性与历史性的分析视角，以否定之否定的精神，探查人们在不同政治、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性劳动实践。最后，在将实践知识与既有理论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推进并深化已有理论的分析逻辑。

（二）从生产关系再生产角度探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未来

迈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生产的政治》中写到，“我们以生产开始，但必须以政治结束”¹³。劳动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科学的研

11 姚建华. 人工智能中的“人工”：众包平台的实践与反思[J]. 新闻战线, 2020(07): 75-76.

12 曹思洁. 游戏玩家工作过程中的劳动控制——以《传奇》游戏为例. 中国社会学 2019 学术年会“劳动社会学——中国与世界”分论坛参会论文.

13 Burawoy M.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M]. London: Verso Press, 1985. 253

究对象，不仅是因为它受到了国家、市场、社会等因素的直接影响，而且还因为它是政治经济体制的核心环节。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数字劳工的研究来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逻辑，并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挑战进行判断。而以下两个研究议题值得研究者继续探讨：

第一，如果说在欧美国家，人们以创新且更难觉察的方式掩盖并获得剩余价值，不断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那么在中国情境下，人们经由数字劳动，再生产出怎样的生产关系呢？笔者发现，在市场领域，“娱乐至死”的逻辑在不断蔓延，媒体实习生、自由撰稿人和受众劳动者的实际境遇与他国差异不大，资本逻辑藉此得到了强化；但在体制内，地方政府将数字技术用于社会治理中、事业单位将“掌握数字技术”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多面手”的重要方法。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劳工再生产出的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双轨”体制。那么，在数字时代，如何提升劳动者在经济与社会领域中的主体地位，是极为重要的议题。

第二，从不稳定无产者的劳动状况反思中国社会整合面临的巨大挑战。欧美学者曾围绕中国不稳定无产者的社会影响进行过一次争论。有人指出，不稳定无产者的概念，不仅意味着劳动者丧失了正式的工作、稳定的收入，而且意味着其社会安全感与社会政治能力的丧失，成为三和大神似的寄生虫¹⁴；有人指出，中国不稳定无产者之所以难以汇聚成为“阶级”，是因为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是分割的。所以，简单认为中国的劳动者缺乏社会参与能力是不甚合适的¹⁵。上述看似相左的观点实则提出了一个共同的议题：中国的社会建设尚未充分回应该群体的实际需要，社会发展速度还没有跟上时代前行的脚步。那么，我们如何通过技能培训、社会赋权、

14 Lee C.K. Precarization or Empowerment? Reflections on Recent Labor Unrest in China[J].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16, 75(2): 317-333.

15 Smith C. and Pun N. Class and Precarity--An Unhappy Coupling in China's Working Class Formation. *Work, Employment and Society*, 2018, 32(3): 599-615.

文化赋能提升其能动性，又如何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劳动关系革新、劳动法规升级，构建出涵盖数字劳工群体的社会整合新模式呢？这显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三）在人机交互的数字技术下探寻劳动者的解放

技术哲学研究者强调，我们不应再采用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来理解技术，而应将技术看作人类本身的特性。¹⁶“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则指出，技术本身亦是由行动主体所建构的，符合社会需要的技术才能获得更好的应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不应仅将劳动者看作被技术操控的对象物，还应从变迁的视角出发，将其看作不断认识、习得技术，并与技术进行持续互动的主体。这时，我们能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继续推进数字劳工的研究：

其一，从个体工作历程的视角切入，探寻劳动者在其生命历程、劳动历程的不同阶段，与数字技术存在的不同关系。技术和管理方式在不断变迁，但随着时间的推进与阅历的增加，劳动者也在告别曾经的自己，重塑着自身与数字技术的关系。在 ICT 代工厂有过不幸遭遇的工人，在其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虽在日复一日的流水线工作中被技术支配，也曾借助微博的力量、通过在互联网上出售手工拖鞋努力重建生活，还通过数字技术与障碍者构筑起彼此支持的网上社群，共同探寻生活的方向。那些经受过洗礼的工人，并不会放弃劳动，而是成长为积极向上的劳动主体。

其二，从群体行动逻辑入手，探索劳动者作为技术应用者，是如何改变数字技术发展趋势的。管理学者与数字技术的开发者往往在“产校融合”和“纸变钱”的项目中，发现五花八门的数字程控或管理系统因与“实际需要”不相符合，而无法得到应用。当然，做出否定姿态的往往是普通劳动者——他们根据自身物质与非物质利益的变化、技术与制度、文化的关

16 贝尔纳·斯蒂格勒著，裴程译. 技术与时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

系，以及技术对其劳动带来的改变等要素进行判断，决定是为新技术的使用提供方便还是设立障碍。在一些国有工业企业，具有较高技能的劳动者不会被动地服从“机器”。他们在使用数控机床进行生产时，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学习核心技能与工资制度上，以提升自身在数字技术情况下的讨价还价能力。

解放，意味着将社会行动主体从任何物质性、制度性、文化性、感知性的异化与桎梏中释放出来，使其恢复觉知与主动性，并在将自我命运与他人命运乃至社会命运紧密关联之时，迸发出自己的力量。但解放也并非永恒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生过程，劳动者可以通过个体性、群体性和社会性的行动，在各种情境下、以相异的方式破除束缚。

余论

二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全球政治经济态势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学者如何像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所呼唤的那样，将个体漂泊不安的处境、焦虑迷茫的感受与宏观的时代变迁联系起来进行理解呢？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了一条从技术变迁至资本积累、再到劳动境遇和组织博弈的分析路径，以探讨个体劳动与资本主义发展间的复杂关系。“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收录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文献，探讨了信息时代的价值与积累、数字劳工的劳动方式与特征、产消合一状态下的玩工、信息产业的劳动关系四个理论议题。同时，它通过对数字劳工、创造性劳动、无薪劳动、受众劳动等概念的使用，重新对劳动剩余、资本积累、社会不平等议题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资本的剥削性与全球劳动分工并未因数字时代的到来而被颠覆，而是以新的方式得到了再次巩固。技术与劳动之间存在着复杂交错的关系，与新支配模式相生相伴的是劳动者的新行动模式。

展望未来，在中国情境下，研究者或许可以从三个方向入手，继续深化数字劳工研究：第一，打开数字工厂的黑箱，从数字资本主义的隐秘核心——劳动过程中，洞悉更多样化、隐秘化的支配与反抗关系。第二，从中国数字劳工的实际处境出发，探讨不稳定无产者未来会走向整体堕落还是阶级团结，并在此基础之上思考我们如何通过劳动关系的革新，形塑新的社会整合模式。第三，从技术与劳动者交互关系对传统劳动关系的挑战出发，探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情境下，如何消除劳动异化，使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解放。



灵活用工与平台责任： 法学视角能为数字劳动研究贡献什么？

胡凌*

一、引子

这套“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数字劳动这一话题在西方研究中的基本脉络和主要问题意识。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人们较早触及了“非物质劳动”及其各类形态，并探索其对社会生产、劳工组织、劳动状态等问题的影响，其分析对象也从传统媒体的作为“商品”的受众转向互联网时代作为“产消者”（prosumer）的用户，无论是博主、网红还是游戏玩家。随着“分享经济”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以网络平台为媒介的线下劳动也被纳入数字劳动研究视野，如网约车、外卖快递和各类形态的“网约工”。从广义而言，如果按照互联网分层的角度看，正如本套丛书所选文章清楚展示的，从底层的 ICT 硬件到上层的操作系统和软件再到更上层的不同行业，你可以把这一切和网络有关的活动都纳入数字劳动范畴进行讨论，并使得“数字劳动”这一概念变得泛化。这主要是因为，首先，网络平台自称是一种“无组织的组织”，将传统劳动组织瓦解，将劳动力更加灵活自由地解放出来，从而将看上去和传统雇佣劳动无异的劳动行为背后的力量悄悄换掉，但仍保持着既有的服务水平；其次，“非物质劳动”和“物质劳动”的界限逐渐模糊，且易于分割、打碎、颗粒化，并突破了传统上礼物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边界，即由于免费商业模式的存在，互惠互利型的同侪生产同样可以被解读为以盈利为目的的网络平台的生产策略；第三，数字经济也正在影响和改造传统工业组织，

* 胡凌，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并延伸至诸如制造业等领域。由此，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来，有差别的似乎仅仅是生产活动的类型化以及人们付出的劳动价值要素（注意力、情感、数据等），无论技术和商业模式如何变化，用户行为都可以纳入一个相对完整的数字劳动讨论脉络。更重要的是，这一研究脉络发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生产方式，它一旦和当下的人工智能与自动化生产结合起来，就更显示出其现实和积极的批判意义；同时也具有面向未来的建设性：生产和分配是在妥善使用一种新技术时不可或缺的环节，有必要增加全体人民从信息技术中获利的机会（弥合“数字鸿沟”），并在分配环节进行制度性的大胆尝试（如平台合作社或劳工组织）。

上述宏大方案要实际落实，需要国家强制力的参与和推动，这就涉及到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与公共政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讨论不多，特别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如何反映和塑造新经济的生产方式，后者要求并推动前者发生何种变化？抽象来说，法律只有反映新的生产方式，调整生产关系，才能推动信息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而这就需要理解互联网新经济想要什么。¹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称之为“非法兴起”²，即反映新型生产方式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因其对生产资料的创造性使用而突破了既有法律规定，在法律未能做出系统性回应的时候，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资本积累，创设有竞争力的平台模式，并要求上层建筑（法律）确立其合法性；第二个阶段则更为具体，由于互联网不断向更多领域扩展，推动该领域的创造性破坏，新旧利益群体必然发生冲突，需要法律进行协调和解决，并逐渐帮助传统行业最终向数字化方向转变。

1 在美国类似的讨论，见 Julie E. Cohen, *Between Truth and Power: The Legal Constructions of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同时参见，蓝江. 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04）：37-44.

2 胡凌. “非法兴起”：理解中国互联网演进的一个视角 [J]. 文化纵横，2016（05）：120-125.

从这个角度观察，数字劳动的出现可以看成是一个典型的“非法兴起”的过程。新技术及其服务应用努力将全部社会关系（无论是商业生产还是社会生产）都转化为某种商业生产关系，并最终体现为法律关系。由于网络平台以低成本调动各类劳动和生产要素，使其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流动匹配，实现交易与合作，这不仅对既有工业时代生产组织及其法律关系造成了冲击，也影响了劳动者和网络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概括说来，平台利用信息技术使劳动变得更加灵活（“灵活用工”），在对用户/劳工保持较强控制力的同时，在法律关系上反而变得更加松散，并要求在整体上承担更少的责任和义务，当平台变得更加自动化与智能化的时候尤其如此。因此，仍在传统法律框架下活动的生产组织与劳动者的利益，都会受到新经济的波及。目前看来，我们正处于数字经济向纵深领域延伸的过程中，与劳动权益直接相关的纠纷难以避免地增多，部分利益攸关者则会寻求法律救济。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才开始较为严肃和系统地介入数字劳动研究，我认为这对传播政治经济学而言也是十分有益的补充。

二、法学如何介入数字劳动？

如前所述，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将相当多的人类活动都纳入数字劳动范畴加以讨论，但法学视角较少聚焦特定行业（如新闻、文艺创作、直播行业等）并进行描述，而是会将不同行业的行为抽象为若干法律概念和问题，从而置于不同的法律部门中加以解决。例如，涉及网络作家权益的，会放在著作权法上讨论，尽管在线文学创作是一种劳动；涉及游戏玩家权益纠纷，更多和民法合同问题有关，尽管玩家在玩的过程中也付出了时间和精力；而只有符合较为狭义的劳动法问题才可能被劳动法学者关注到。

这种思维方式是法学的优势，也是其缺陷。其优势在于，能够迅速定

位某个争议焦点，并通过对法律规范的分析给出至少是一定程度上可操作的相应解决方案，在实践中通过个案进行推进，逐渐影响行业的预期，调整自身行为，因此是以渐进、动态的姿态参与到社会—技术互动的过程中，对其加以平衡，而非寻求某种极端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其缺陷在于，法律部门的专业分割使得研究者或实务工作者难以跳出本专业的思维以更加综合的角度理解信息技术想要什么，因此变相地与无处不在的网络平台行为相脱节，缺乏对劳动者权益进行保护的长远视野。这恰好是法学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值得相互补充的地方。

因此就不难发现，传播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广义劳动在法律领域会被限缩至狭义劳动。如果说在传播政治学中，游戏玩家、抖音网红、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快递小哥都可以被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中认识的话，那么在法律上则没那么简单。首先，目前出现的围绕数字劳动争议的案件中，涉及到的劳动争议在形态上和传统雇佣劳动过程很类似（基本集中在网约车/代驾平台、网络直播平台、快递平台和其他网约工平台，并体现为人在物理世界中的实际劳动）。因此专业人士可能在潜在社会认知上（包括法官），不会觉得网约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在行为本身上有什么差异，仍是将传统线下雇佣劳动行为扩展到线上进行思考，在逻辑和直觉上就会自然将一名网红博主或游戏玩家和网约车司机或快递员的行为区分开来，认为前者更接近某种“礼物经济”或纯粹的娱乐/消费，而后者更接近“商品经济”或生产/工作。但这一直缺乏严格的来自法院的解释：同样是数字劳动，进行区分的标准究竟在哪里？³只是因为发生纠纷的场合大多和传统领域类似，就可以简单地在概念框架上将普通的日常网络使用行为排除在劳动法保护之外吗？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看来，这种逻辑无法自恰，所有行为共同构成了一个平滑衔接的数字劳动光谱；但从法律角度看，个案中没有必要

3 我曾经试图给出一个理论完备的证明，提出区分可通过法院进行纠纷解决的劳动行为，需要以劳动者自身的“劳动预期”为充分条件，见胡凌. 分享经济中的数字劳动：从生产到分配 [J]. 经贸法律评论, 2019 (02): 33-51.

给出一般性的、完全自恰的数字劳动标准，前提是不证自明的，这种不完全理论在个案中并不影响纠纷的解决。

其次，在法律看来，一切可供分析的人类行为都需要纳入特定法律关系中。如果想成为劳动法讨论的对象，就需要满足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从形式上说，需要有完备的劳动合同，即双方达成合意确认形成一种雇主和雇员的特殊关系；从实质上说，这种关系以管理与被管理、监督与被监督、指挥与被指挥的隶属关系为核心。签署劳动合同意味着雇员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预期，而雇主有权对其行使指挥管理权力，并要为其承担社会保障费用。不难看出，劳动法律关系的出现本身是由于社会经济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生产组织需要稳定预期扩大生产，因此使用法律将生产关系加以固化。但随着劳动力成本提升，更多雇主开始采用灵活用工方式（如劳务派遣），以降低劳动法上的用工成本，同时也意味着工作过程本身逐渐变得更加模块化和非人格化，组织和信息费用降低，以抵消劳动者的流动带来的新增管理成本。这一逻辑在网络平台发展过程中被推到了极致，信息技术最大限度地将服务提供者和消费者匹配在一起，但在法律关系上只表现为一般的软件使用合同或居间合同关系，网络平台就可以避免围绕劳动关系展开的一系列雇主责任。因此围绕网络平台灵活用工的争议，主要体现为法院能否事后判断一个形式上并非劳动关系的普通民事合同，在实质上具有劳动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受到了平台的管理指挥和命令，像雇员一样工作并收取劳动报酬——从而将传统劳动法上关于“从属性”和“控制力”的标准纳入平台灵活用工过程中加以审视。

实际上，平台企业（特别是成熟的大型平台）已经具有了相当水平的生产组织能力，否则无法从高度流动性中稳定获益。简单说来，其行为模式至少包括：（1）提供生产工具。软件开发者平台、程序语言提供了中心化的基础服务，即使劳动者被允许自行使用他们自己的工具，也要受到统一标准的限制（如车辆）。（2）设计交易架构和流程。平台深度介入

生产和交易环节，不断将生产过程流程化和自动化，并提供便捷的支付手段，甚至出现完全自动化的组织形态。（3）声誉、评分机制。平台以“账户—数据—算法—评分”机制为基础，并通过外部声誉机制和自身搜集数据的方式为劳动者提供激励和行为方式规范指引，客观上便利了生产。（4）制定平台上的行为规范和交易规则，提供奖惩机制和多元救济、纠纷解决方式。（5）对平台劳动者和交易参与者加强管理和监控，进行身份认证和追踪等。（6）控制交易价格水平和工资发放方式。网约车一类的平台采用统一按月结算的方式，并有能力以中心化的定价算法确定服务价格，减少缔约和管理成本。（7）控制劳动者多属行为，强化锁定措施。为防止劳动者流失，除了正面发放补贴外，平台还会采取措施锁定消费者和服务商，例如收取押金、约定不得跨平台工作等。（8）自动化推荐、匹配和派单。通常假定分享经济劳动者有极大的自主性选择平台、工作时间和地点，自主接单提供服务，实际上他们缺乏真正自主的选择权，因为平台采取自动化推荐、匹配和派单等方式将真正把平台当成分享工具的业余玩家清除出去，而留下那些更加愿意追求赚取收入的“准全职”劳动者，但在形式上却表现为劳动者自愿选择的结果。（9）强化人格从属性，为劳动者提供工牌、标识或统一的制服等。⁴

一旦被确认为与劳动者具有实质劳动关系，平台企业就需要至少在个案中承担一定的雇主责任。但由于平台的业务类型、规模、运营成本、竞争状况都十分不同，目前现有司法案例未能就是否需要对劳动关系进行实质性审查达成共识，相当多的法院倾向于仅根据形式上合同的性质加以处理，不愿意就实质要件进行过多讨论，即使有讨论，也缺乏深入而有操作性的共识。

第三，即使将灵活用工认定为实质性劳动关系，法院也几乎是小心翼翼地对平台企业的责任进行论证，避免形成溢出效应。首先是仅限于个案

4 胡凌. 分享经济中的数字劳动：从生产到分配 [J]. 经贸法律评论, 2019 (02) : 33-51.

当事人，不会扩大到所有灵活劳动者，对其他没有提起诉讼的劳动者来说，用户协议仍然有效。其次是仅限于事后补偿（如交通事故造成的工伤），不涉及其他社会保障的缴纳。第三是就事论事，事后解决，不会建议上升为事前的统一国家制度或者抬高补偿标准。法院的逻辑总体的感觉便是尊重平台和用户之间的协议效力，即使认为构成了实质劳动关系，也仅仅要求公平补偿，不挑战平台的既有模式。

如果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仅仅是经济基础的被动反映，那无非是一种机械唯物论，并不反映真实世界状况，事实上法律有时候不仅不能直接反映新经济的要求，也会回过头来成为一种阻碍。既有案件恰好表明，法院在灵活用工权益纠纷案件中的立场基本上尊重新经济商业模式，不轻易介入对模式和格式合同的审查，就算介入也会把对平台企业的影响降到最低。这种态度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是否进行实质性判断最终要取决于法官的良心和对弱者的同情；司法仅仅关注个案中的短期利益平衡，却容易忽视劳动者的长远利益。有趣的是，在另一些网红主播跳槽的纠纷中，法院多倾向于认为跳槽的主播不能轻易地离开原直播平台，否则将给平台带来巨大损失，而开始适用只有在劳动关系中才出现的竞业限制规则。这意味着形式上是否是劳动关系并不真的重要，关键是受损主体的社会影响以及可能引起的仿效作用。在这些案件中，法院偏向平台企业的立场更加明显，希望用户协议限制劳动者的自由流动，确保市场中的有序竞争。

有更多研究主张在立法上应于事前确立灵活用工的法律地位，例如借鉴欧洲国家的“准雇佣”模式，对达到某些标准的劳动者适用，既明确了平台的准雇主一揽子责任，又不至于增加太多成本，为数字劳动者提供一张较为稳固的安全保障网。但这种统一制度究竟会对数字经济平台造成何种影响，尚缺乏更为科学的评估，这不仅是因为数字经济本身就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也因为一项具体政策的做出需要平衡各方长远利益，以及对特定行业市场结构的影响。例如，如果准雇佣劳动的监管标准过高，则会

直接影响中小平台的利益，使其因无力承担较高的合规成本而解散，全部生产性资源都将流向少数能负担合规成本的巨头平台，最终促成难以预料的市场垄断格局。

三、法律之外的多元规制

上文简要揭示出法律解决灵活用工纠纷的两条思路：一是事后在个案中依据公平补偿原则承认劳动关系，二是事前在立法中确立统一的新型劳动关系。两种方式实际上都需要考虑到社会后果，也不是万能的。我们仍需要综合借助社会规范、技术和市场的力量共同帮助塑造一个多层次、多属性的数字劳动生态，这也是本套丛书中不少文章讨论的焦点。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社会中的交换和生产活动都是具有金钱收益的商品经济活动，相当多的在线文化生产事实上属于礼物经济，用户参与其中，获得满足感和非金钱收益，并创造出繁荣的互联网文化和数字公共领域。有必要通过强有力的社会规范和自主社会组织来保护这一领域的持续生产和活力，避免商业平台打着共享免费的旗号使礼物经济发生异化，成为收割流量和注意力策略的一部分。

其次，一旦承认用户具有某种明确的劳动预期，平台企业应当尽可能满足他们通过劳动自主获得报酬的权利，这种权利未必需要单纯依赖法律进行规定和支持，而是要综合依托多种渠道拓宽数字劳动的价值实现，这至少包括：（1）允许用户自由跨平台流动，从而推动平台间竞争，使劳动力价值在流动中得以提升；（2）特别地，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型劳动和生产要素，法律需要逐渐探索数据流动和转移的规则，例如向拥有大量数据的平台征收“哈博格税”（Harberger Tax）；⁵（3）推动有序的市场竞争，约束诸如“二选一”等不规范的市场控制力，确保一个竞争性的动态

5 Eric A. Posner and E. Glen Weyl, “Data as Labor”, in *Radical Markets: Uprooting Capitalism and Democracy for a Just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市场结构；（4）推动开发多元化的获取报酬的技术方式，例如第三方支付、打赏和广告分成；（5）推动平台上二级组织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党组织），使之成为事实上帮助劳动者谈判、维权、推广、团结的组织，发挥其稳定生产的作用。

最后，如果说前文探讨的都是生产问题，那么还需要为数字劳动者设计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平台合作主义常常被描述为现有平台企业的替代性方案，其合作方式也并非难以设想，例如劳动者根据条件参股分红、民主管理或有效维护公共资源池等等。合作主义在中国乡村有较为深厚的土壤，但能否转化并应用在由大量陌生人用户组成的分享经济平台中，需要持续观察。根据经验，一些分享经济平台为获得垄断地位付出了巨大成本，甚至在很多年内仍然靠投资维持，未能盈利，而这也常常成为平台企业回应反垄断、拒绝成本更高的雇佣劳动模式的惯常理由。我们需要进一步反思这种习以为常的、建立在脆弱而灵活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商业模式是否可持续。



迈向传播社会主义 / 数字社会主义下的未来劳动¹

徐偲骅*

作为“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最早的读者之一，我全程见证了它从姚建华博士脑海中闪过的一个念头，到一篇篇精挑细选的论文、字斟句琢的导读，再到一套齐齐整整、色彩绚烂的成书摆在了我的案头。当最后一本《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付梓之际，连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到如释重负。当然，丛书的主题可能没有这么色彩斑斓、河清海晏，也许还有些许的沉重。在这四卷本的内容里，我们看到了电子制造业中的“打工仔”，呼叫中心的女员工，优步（Uber）的司机，爱彼迎（Airbnb）的房主，传统媒体的新闻记者，在线接受众包任务的零工，自由作家、音乐家、电影制片人、动画设计师、软件开发者和翻译在内的创意劳工，以及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中快乐、活跃而又无薪的用户/玩家们，林林总总，模糊又清晰，陌生却熟悉。我不自量力地尝试用一句话来浓缩整套书的精华：他们生产了互联网（第1卷），用互联网来生产（第2卷），为互联网而生产（第3卷），也在互联网中生产自己（第4卷）。

论文的作者们使用了“步履维艰”“处境堪忧”“朝不保夕”“不稳定”“痛苦和绝望”“饱受折磨”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们，刺眼而又准确。所有的文章都在提示我们，其一：今日引以为豪的互联网技术座架，包括物质基础，软硬件生产，乃至其中所流淌的文化内容，所提供的便捷服务，无一不是仍然建立在活劳动链之上的。² 当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数字生活是非物质的，

* 徐偲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

1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发【2017】3019，编号：201706100024）成果之一。

2 格雷厄姆·默多克著，刘宣伯，芮钰雅，曹书乐译。媒介物质性：机器的道德经济[J]. 全球传媒学刊，2019，6（02）：93-102.

一切皆可通过点击而唾手可得时，是物联网的“肉身”承载者——物流运输工人和外卖从业人员托起了防疫期间我们得以“躲”在家里的安全生活。而他们却还要承受来自实际上并不提供多少财富增量，只是在盘活资源存量的数字架桥人（digital bridge builders）——平台的盘剥，缴纳水涨船高的“信息服务”提成，却缺少必要的正规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变成“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的互联网企业得以“轻装上阵”并实现成本外部化时的承担者。

其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劳动体制在新技术条件下得以延续而不是受到挑战，这种延续借助技术在时空上的能供性（affordance）和资本对于技术开发的垄断，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个过程不仅催生了凌驾于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上的掌握资源配置大权的新贵族——数字资本³，还发明了新的劳动控制手段，开辟了新的价值积累场所，孕育了新的行业。创造性地将消费领域亦纳入价值生产的轨道，消泯了雇佣和非雇佣，稳定和灵活，必要和剩余，消费和生产，工厂和卧室，工作和休闲，睡眠和清醒之间的多重实在和虚拟的界限，愈发迈向“生命政治劳动”的范畴。如韩国学者李光锡所言：企业让个体处于“线下丧尸劳动、线上剩余劳动以及移动断续劳动的夹缝中”，“用尖端移动技术平滑地连接它们”，“并把它们粗暴地合并于市场价值”。⁴

不过，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简单梳理四本书的内容，而在于借此发问：怎么办？带着这个问题来重新审视这些论文，自会格外关注其中各行各业，它们是如何来启动社会的自我保护的？劳动者是如何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巩固旧团结，创造新联结的？以及当我们在玩乐而企业在进行资本积累时，是否有某种方式将经济补偿和回报作为问题来提出并解决？当我们在理论

3 蓝江. 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 [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04）：37-44.

4 李光锡. 东亚青年与高科技文化：青年难民的劳动地牢摆脱记 [J]. 热风学术网刊，2017（01）：97-111.

上把雇佣劳动和玩乐劳动“捏”在一起的时候，现实中二者有没有可能被纳入到同一套劳资关系的处理框架中来？而后，这些行动和因素，是传播资本主义 / 数字资本主义结构穹顶之下的“小修小补”，还是已经微微泛出某些社会主义的曙光？更进一步，扬弃了资本主义因素后，传播社会主义 / 数字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未来劳动应该是什么样的呢？中国特色的传播社会主义 / 数字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又在哪里？

一、怎么办？来自丛书的答案

可以说，这套丛书关于“怎么办”的答案是建立在工团主义或工联主义之上（syndicalism）的，工会化（unionization）一词贯穿始终。作者们孜孜不倦地讨论在工厂式微，工人年轻化，创意劳动者原子化，中层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自我认同更靠近雇主而非工人等挑战面前，如何保持工会组织在传统制造业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努力提高新兴的不稳定行业中的工会化水平，从而将各类劳动者团结起来。

应当承认，这种努力还是蔚为大观，给人以希望的。我们看到，“全球南方”电子产业中的各类劳工组织非但没有消亡，反而日益壮大，它们就产业工人的工作 / 生活环境、劳动安全、薪酬水平、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等诸多议题与雇主进行集体协商，同时也没有忘记改善临时兼职人员和外包工的生存境遇。不仅如此，它们还鼓励“全球北方”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组织通过会议、科研项目、辩护与游说、社会运动、案例合作等不同方式声援上述“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中的工人运动，推动劳工运动的国际化水平。此外，这些跨国、跨区域和跨行业的运动日益“破圈”，除了保障劳动权益，它们还广泛涉及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生产所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人权和妇女权益问题等等。它们打通了整个产业的上下游与内外部，从提供物流的运输工人、安保人员，到高科技电子产品消费者，再到为工人提供完善的医疗服务，以及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程度的社

区组织，努力构建起一个社会自我保护的“安全网”。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手机在内的信息与通信设备不再只是工人劳动的产品，而是将自己组织起来可资利用之物。他们通过互联网分享关于企业侵权的信息，发出声音，寻求帮助，让自己被看见，也看见他人。他们通过视频、博客、诗歌和短信等途径来进行法律普及、文化表达和政治赋权，电子设备成为新的团结动力的物质载体。而这几乎成了信息技术部门、新闻业和其他文化行业这些工会化程度历来较低的部门中主要的团结和凝聚方式，因为这些行业的从业者在新技术中工作，网络是他们的生产工具，也是日常生活和娱乐工具，自然也会溢出“生产”这一狭窄的目的，发挥出别的功用。既然以此为业并乐在其中，必然精于此道。

于是我们看到，印度的信息技术人员创设了各类线上论坛，涵盖了从软件工程师到呼叫中心人员的各种职业。他们关注信息与通信技术和社会发展的议题：如弥合“数字鸿沟”、分享工资信息、建立一种关注劳动不公平的机制、实现成员的专业利益诉求。不过他们有意与传统策略和政治导向保持距离，通过创造性的途径在专业人员之间培养乐观的情绪，这些论坛往往根据社团法案（The Societies Act）而不是工会法案（The Trade Union Act）来注册成立，且习惯于自称为“行会/协会”（guild）而非“工会”。一方面是为了寻求某种政治安全性，另一方面也避免了青年技术人员对于工会的刻板印象和畏惧，这种印象往往与“斗争”联系在一起。类似的，北美的新闻工作者、自由撰稿人、新媒体行业的摄影师、编辑、在线作家网络设计师、视觉特效师、电子游戏开发者等职业也都有自己的在线组织。这些网站为会员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除了关于职业发展和技能提升的信息，它们有效地传递和共享着关于抵制的信息，成功地唤起了公众对他们的关注，在基本劳动权益保障、福利待遇、社会保障方面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不过，这些线上行动仍然有着浓厚的新自由主义色彩，相信很多问

题可以通过个体来解决，并不需要诉诸于集体动员。个体主义、企业家精神和自给自足的理念深深影响着“新脑力工人阶级”（new cognitive working class）的思维和认识，他们推崇独立性、灵活性、努力工作和自我激励，而这些价值与集体组织之间存在着明显张力。无怪乎，在工厂大门口集结的传统策略已经不再实用，这些由同侪所组成的虚拟数字共同体被打造成一个个会员分享经历、汲取教育和自我赋能的平台，聚焦于个体竞争力、专业化能力和独立性的提升，他们可以安全地在这种虚拟的数字共同体中讨论自己的问题并寻找解决的方法、交换思想、形成观点、甚至是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不过，他们在集体行动上“裹足不前”，也很少能代表劳方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对“网权制资本主义”（netriarchal capitalism）形成的制约实在有限。

不得不说，坚持和推广工会化是思路之一，但并不是“一抓就灵”的万能药。上述原因当然是因素之一，知识和创意行业的组织化是一个难题，至于组织起来之后做了什么，这种组织还是不是工会，能否实现和发挥与传统工人组织同样的功能就是另一件事了。此外，各国的劳动法和工会法案赋予工会化的组织活动强大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但是，在劳动关系本身晦暗不明的众包和零工经济领域（横跨了制造、服务、创意等诸多领域），推行工会化还将面对哪些阻力？网络用户和玩工的无酬劳动该如何被安放进现有的司法实践中？在尚且对自身使用和玩乐的生产性一无所感，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且并不认为自己是“劳工”的人们中间，如何开展这些联合行动？

最为关键的是，工会化和工会运动只是社会主义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其一，不难看到，当今世界最发达和最活跃的工会体系，存在于劳资矛盾严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会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支已经被很好地吸纳进资本主义现有的制度轨道，成为常规化和制度化的现象。⁵ 在保护劳

5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5.

动者的同时，它确实起到了推动资本主义向人道化方向改良的作用，但并不可能撼动其基本结构，也不可能从总体上将社会导向社会主义轨道。其二，从这套丛书来看，工会的主要诉求无外乎就劳动条件、薪资水平、社会福利等工人待遇问题与资方进行集体协商，尽管偶尔跨出自己的领域，关照性别平等和环境保护等议题，联合其他社会群体，但总的来看，依然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面之下做修补性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一部分并持续确认和再生产这一制度。即便在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加持下，电子化的行会 / 协会，也只是多了一个“表达和发声的渠道”“让相互之间变得可见”“使得联系和协调变得容易”，但我们很难说，这些新的“功能”是社会主义的，也很难说它们带有某种社会主义的因素。批判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团结是开始，而非结束，如何通过这种批判和团结抵达另一种替代性可能，是本文关心的问题。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因素反倒是在最不像标准劳动关系的零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那里露出了一些端倪。

二、传播社会主义 / 数字社会主义与劳动

在批判性互联网研究中，我们对一些有着细微差别的近义概念并不感到陌生，比如：信息资本主义、交往 / 传播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大数据与监视型资本主义等等。学者们的阐释各放异彩，从不同角度深入思考资本主义与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之间的互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不过，批判之后是什么？2020年春天，英国著名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批判传播研究重镇《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组织了一期名为“传播社会主义 / 数字社会主义”⁶的专刊，十多位学者就什么是传播和数字社会主义，如何来建设这种新的社会主义各抒己见。他们有的在

6 Fuchs C. Communicative Socialism/Digital Socialism[J].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2020, 18(1): 1-31.

经典作家的文本中寻章摘句，有的从规制新媒体产业的政策选项中思索制衡之术，想象力十足又扎根现实。

在这一组文章中，除了扭转公共领域由大资本和私人公司提供的现状，建设国家和公民社会共同支持的公共媒体之外（这当然是一种传播的社会主义），本文更关心的是当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成为生产工具和积累场所之时，社会主义该从何入手的问题。毕竟，社会主义不只是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政治经济运动，其目标是废除阶级社会，发展生产领域的参与民主和工人控制的经济，由社会来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可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共同决策的民主经济生产才是核心问题，且二者互为倚仗，以往数字劳工研究中所忽略的这一点，在这期专刊中得以提出。

我们看到，学者们呼吁，在数字经济中实行所有生产工具的共同使用和所有产品的共同协议，或在分配上形成财产共同体，这些对象包括所有的计算机、应用程序、软件、硬件、数据和内容。社会主义沟通手段和传播业的组织不仅应由其工人所有，而且还应具有集体控制和民主的决策结构。具体的措施和建议，包括：制定限制数字寡头力量以支持非商业替代品的法规，必要时可根据反垄断法拆分平台巨头，或者国有化；通过对大型跨国数字公司征收平台税来补贴和重新分配基本收入以照顾到无酬劳动者的利益；恢复知识和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礼物经济，创造团结，对所有人的尊重以及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统一；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媒体和传播 / 平台合作社来建设网络空间的公地，摆脱广告业对于公共传播的挟持；发展“隐私友好型”社会主义，将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存储最小化为绝对必要的的数据，这种社会主义隐私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减少数据收集，以隐私友好的方式设计信息和通信系统，并针对强大的公司进行监管，以提高其经济和金融运营的透明度等等。根据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说法，这种公地或曰“共同性”，不仅

仅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也不只是被房地产市场所圈占的城市空间，更有我们的观念、智识、情感、交流、语言和文化，这些非物质劳动如今以“数据挖掘/数据提取”的形式被全天候地商品化和私有化，并反过来控制劳动/玩乐过程，现在到了讨论集体所有和集体控制并以此来迈向社会主义的时候了。

学者们并未止步于重夺传播/数字生产资料和建立新的数字生产政体，而是更进一步继续畅想，通过对数据和算法应用的限制和控制，改变技术的设计原则和目标导向，在高水平生产力的前提下，对抗社会加速主义，构建一种“减速”的社会主义政治。这不仅意味着要破坏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逻辑，更包括扭转电子媒介给网络用户带来的令人迷惑的体验和焦虑情绪，避免劳动、交往与生活的过度中介化。这也意味着减少痛苦的必要劳动/快乐的成瘾玩乐（这里就打通了受平台严密控制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和被社交软件与游戏垄断了全部生命时间的“从未离线”者），使他们免于焦虑和紧张，实现自主劳动、自主生产和无关交换价值的真正的休闲。

最后，可能是一个计算机辅助下的数字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后稀缺社会，其效率将大大超越曾经由几个人闭门开会所主导的计划经济。因为巨大的分布式超级计算机和全民所有的大数据可以帮助最大限度地模拟市场交换的机制，并实现更为精准的信息反馈机制，用于“非市场形式的社会协调”和生产资源的配置。生产模型和消费模型都可以通过程序包来构建，并自动快速计算劳动价值。计算机将比我们更能预测我们的偏好，基于需求的生产和经济令订单“弹无虚发”，生产“有的放矢”，过剩和浪费将被遏制。劳动的取代速度和规模也将被科学规划，机器学习将接过那些危险、疲惫、单调、平凡、无聊和不愉快的必要劳动和工资劳动，为人类留下具有艺术性和创造力的工作领地，实现亚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的“全自动豪华共产主义”（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任由资本出于节约劳动力成本的目的，

开发人工智能以大面积、无阻碍地消灭各行各业的劳动岗位。

三、颠倒权力批判：从媒介技术本身入手

经过这一场头脑风暴，当我再来看这套丛书时，发现吸引我的首先是游戏玩工，这几篇文章大胆抛出了所有权的问题，认为玩家对于游戏的创新和活化（activation），对于视觉效果、游戏内容、游戏引擎、源程序等设计的改进，开发的游戏模组，与其他玩家分享游戏经验和剧情的发展，在游戏中投入的大量社会性和情感性精力，使他们很大程度上扮演了生产性角色，足以支撑这些玩家对游戏产品提出知识产权的要求。虽然作为最终产品，游戏本身不太像是生产资料，玩家也无法藉此来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但通过比照文艺创作的知识产权处理经验，我们至少可以部分解决无法被现有法律框架认定为劳动的游戏玩乐该如何实现公平分配的问题。

而后，特雷伯尔·肖尔茨（Trebor Scholz）关于平台合作社的讨论为新的传播 / 数字社会主义勾勒了最为清晰的途径。以优步为代表的商业平台通过精益管理模式和彻底的外包，将核心数据加工以外的劳动彻底推向外部劳动力市场，利用劳动者的竞争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用机制实现有效管理，他们自己的工作只剩下对数据进行抓取、分析和加工，却要收取高额的信息服务提成；并依靠不间断的数字监控，自动化的算法管理来协调劳动者使用其个人设备提供各类服务。数据的使用，客户的打分和评级，工作任务的分派，报酬的计算，都处在黑箱之中。每一次运营都被隔绝在信息技术的帷幕之外，算法越精密和复杂，自雇劳动者就越难以理解这个过程，而只能被动接受接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疲于奔命。⁷ 这一点，在平台家政工、维修工、外卖员、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等职业中表现地淋漓尽致，构成了郑广怀等学者所言的“下载劳动”。平

7 杜鹃，张锋，刘上，裴逸礼. 从有产者游戏到互联网劳工——一项关于共享经济与劳动形式变迁的定性研究 [J]. 社会学评论，2018，6（03）：39-49.

台作为巨大的有机体，将一套精密且动态调整的劳动控制模式“下载”到工人身上，全面塑造乃至取代工人原有的主体性，“下载即监控，行为即数据”。劳动者在平台“他者”的调控下，进行行为修正与行为学习。前者的权力正是来自于前所未有的被私有化的信息和数据池，从而可以取代契约、法治和社会信任，来任意制定劳动规则、劳动条件和分配标准，甚至塑造工人的心智。⁸

因此，肖尔茨笔下平台合作化的概念强调改造所有权结构，由劳动者掌握后台核心技术，并运用这些核心技术惠及自身，避免只为少数人服务；强调数据处理过程处于共同控制下，公开透明，特别是对客户数据的处理；共同决定工作，劳工有权参与平台程序的设计过程，并自主决定收入分配；拒绝雇主在工作场所中对工人的过度监视；引入注销权，平台合作社应留出一定的时间，保证劳工的休息权、参加终身学习和政治参与的权利；鼓励有利于劳工团结的平台设计，控制规模，摆脱以增长为中心的思维。

于是，传播 / 数字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生产者的自由协会”，群体通过互惠合作来实现共同的福祉。其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平台架构、数据池和算法不再是私有的，而是社区和合作者集体持有的。且平台合作社作为一种通向公平工作的技术—政治解决方案，比传统工厂合作社更容易实现，因为不需要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仅需要搭建和运营一个应用程序，司机和快递小哥们有自己的运输工具，民宿的主人有自己的产权房。作为零工经济剥削的替代方案，合作经营的平台合作社在全世界方兴未艾，在美国，我们看到了丹佛的出租车司机合作社、加州的 App 司机协会正在挑战优步和来福车（Lyft）；德国出现了流媒体音乐系统合作社“共鸣”（Resonate），由所有用户兼生产者共同拥有；加拿大维多利亚出现了联合摄影合作社（Stocksy）；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诞生了“公彼迎”（FairBnB），

8 郑广怀等。“平台工人”与“下载劳动”：武汉市快递员和送餐员的群体特征与劳动过程（预印本），来源：中国集刊网（www.jikan.com.cn），2020年3月30日/2020年5月7日。

用来取代完全以盈利模式为基础的短期租赁公司爱彼迎，因为当局希望创建一个基于公平经济模式的公共系统和真正的共享经济。当然，这条路也并非一帆风顺，要以数字化方式过渡到“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最大的障碍便是这些在线合作社如何与已经成熟的现有商业平台竞争，后者享有巨大的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优势，精于宣传和营销，且更受风险资本的青睐，路漫漫其修远兮。一些渐进的所有权集体化路径正在浮现，比如在现有平台巨头中建立“包容性所有权基金”（Inclusive Ownership Funds）的构想，规定公司的一小部分股份定期转让给工人，直至达到设定的上限（例如10%）。这些资金很快将使工人成为最大的单一股东，能够选举自己的受托人并直接影响公司的决策。英国工党部分人士和美国民主党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是这种“基金社会主义”（funds socialism）的支持者。⁹

将目光移到社交网络用户的“永远在线”中，会发现这一思路依然适用，甚至更为贴切。因为普通用户提供的，既不是平台经济以前就存在的各类服务，也不是可以被纳入版权体系的知识产品（比如小说、音乐和游戏模组）；大多数用户生成内容（user generate content, UGC），不过是生活记录，喃喃自语，自拍照，频繁打卡的位置，付费和支付记录，无任何评论的转发等异质化、非结构化的内容。但当这些信息被汇入社交后台的企业数据池之后，各类商业化开发便接踵而至，从数据画像，到精确定向广告和各类面向企业的收费增值服务，再到和第三方开发者通过API接口的共享，甚至直接将其当作标的物形成了大数据交易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聚焦于UGC的批判研究并没有打到要害，社交平台资本实现的“惊险一跃”是从流量和用户生成数据（user generate data）开始的。因此，从数据生产资料所有权改革的视角来思考用户在线劳动的“去异化”，或许才是一条可能的路径。当然，和零工经济的平台合作社一样，仅是所有

9 Dyer-Witthford N. Left Populism and Platform Capitalism [J].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2020, 18(1): 116-131.

权变革可能不够。正如《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所确定的知情同意、禁止画像、限制传输等规定，即是授予了用户有限的所有权，但实际上，“反馈基础架构”仍牢牢掌握在平台资本主义手中。企业依然在利用所谓“匿名化”后的数据，开发令人网络成瘾的算法，制造“猜你喜欢”的回音壁和信息茧房，窥探我们的政治态度，威胁个人自由，操纵消费行为，根据自己的利益来设定价格、引导市场投资和资源配置。这些社交平台巨头的数据及其黑箱算法同样应当置于由政府、专业人士和用户组成的公共信托机构的监管和控制之下，或者整个转变为用户合作社，以阻止其继续鲸吞“数据化”的人类日常生活和整体社会关系，并设计出某种基于数据的经济和社会补偿方案。当然，这种方案并不一定是基于劳动关系的。¹⁰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edrich Kittler）提示我们，数字平台的监控层与用户层的相互区隔，可能恰恰隐喻着一种“密不透风的双阶级系统”。因此，当下的权力批判可能应该颠倒过来，想象一种有别于非物质性的传统社会学 / 文化研究式的批判路径，从芯片设计和结构中重构社会学，破解其隐藏在微型处理器中的“密码学特征”和“官僚机制”，也就是对媒介技术的批判必须先于对社会的批判。¹¹ 此话甚为精彩，应用到数字劳动问题上，我们会发现这套丛书的大部分文章可能还在传统工厂工运的框架下来争取更高的工资、更人道的劳动条件、更全面的社会保障，这些诉求在当下并不过时，但失于觉察无薪、低工资、高强度、下载即劳动、原子化的状态、永远在线这些现象实际上皆和某种技术垄断和数字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状态息息相关。从改革平台架构、软硬件部署、算法伦理和数据权属的角度来注入传播社会主义 / 数字社会主义的因素，似乎比单纯求助于提高工会化水平来得有效果。

10 胡凌. 分享经济中的数字劳动：从生产到分配 [J]. 经贸法律评论, 2019 (03) : 33-51.

11 车致新. 软件不存在——基特勒论软件的物质性 [J]. 中国图书评论, 2019 (05) : 70-76.

结语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曾言：“中国有着惊人的活力，既有技术的活力，也有社会的活力，我认为它有能力应对技术加速的挑战。因为这里有公共权力，但是在西方，公共权力被市场破坏了，市场摧毁了西方的一切。”¹² 这套丛书中数字劳动各个领域中的困境和问题，在转型中国亦能发现端倪，但中国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一先天制度优势使得我们在面对同类问题时有更多的政策选项和治理工具，且名正言顺而无需面临意识形态阻力。比如对数字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与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无缝衔接，合作经济组织迄今仍广泛存在于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中，“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也是最高领导人的殷切期望。在大型互联网企业广泛承担国家治理任务并日渐基础设施化的情况下，走技术的“群众路线”，转换唯利是图和流量至上的商业模式和评价标准，在政治立场站位上坚持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人民性，使之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基层治理的基本目标，将是迈向传播社会主义 / 数字社会主义并克服异化的数字劳动的必然要求。

12 管鹏鹏. “我们现在已经是古人了”——专访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 [EB/OL]. 南方周末网站: <http://www.infzm.com/content/136381>, 2018年6月7日/2020年5月6日.



■ 特稿

民族主义都市主义何去何从？ ——苏迪雅梭市长主政下的雅加达的公共生活¹

阿比丁·库斯诺*

李辉**译 罗小茗***校

《民族主义都市主义何去何从？》这篇文章写于苏哈托总统在1998年倒台之后的几年。作为这座城市的居民，我在雅加达这座城市四处驻足察看，这篇文章正是基于这段时期所做的一些笔记之上。因此，这篇文章所提供的是一番街道的混合场景，彼时的街道已经成为诸多商贩、中产阶级与政府之间彼此较量的地方，各方都竭力为各自生存而争夺空间。街道既是反抗威权的示威和集会的场所，反过来，也成了权威试图通过建造种种民族主义遗迹的方式来规训公众的场所。“民主的过渡”的时期，正时值形势分崩离析的时期，也正是中心再无力遏制任何引发众多城市运动的事物的时候，这些运动的范围从进步主义和个人主义到保守主义与偏狭主义（the intolerance）都有。通过分析城市空间，这篇文章想要理解的是这个国家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刻，即这个国家在迈向新的时代，但对于走向何方，无论是走向民主还是回到旧的独裁式领导，都尚不明确。

雅加达步入后苏哈托权力分散的时代，至今也近乎20年。随着地区自治，国家很大程度上从城市事务中退出，市政府正在获得越来越大的权

* 阿比丁·库斯诺（Abidin Kusno），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学院。

** 李辉，厦门大学博士，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2010-2012）。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研究兴趣主要在传播思想史、媒介社会学与文化研究领域。

***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1 本文来源：Urban Studies, Vol.41, No.12, 2377-2394, November 2004，中文版首发于《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

■ 特稿

力。市长不再是任命的，而是雅加达居民民选出来的。总之，权力已经集中在市政厅（city hall），而不像过去那样，权威都在总统府。随着国家与地方政府，公民社会与城市贫民，本地商业与全球资本既在市政机关也在城市的都市空间中交错，权力从国家到城市的这一转移复兴了都市政治。资本寻求空间，人民要求对城市的权利，政府寻求合法性，所有的这一切都能在雅加达的都市空间中表现出来。

我们似乎再次经历着一种过渡时刻，过渡到某种既充满希望又命运多舛的状况中。当城市居民目睹为更加绿色的城市腾出空间而把城市贫民驱逐出他们的“非法”住区的现象时，当人民听到市政厅中传出的根除腐败的声音，却迎来了市长与房地产开发商们为扩张基础设施和公共空间干着私下勾当的时候，当他们看到对政府官员的规训也同时规训着城市居民的时候，当他们看到市长在与诸种旧势力的卷土重来做斗争的同时也在为它们效力的时候，这是一种乌托邦与恶托邦的混合。各式矛盾都在雅加达上演。毋庸置疑，在关乎都市政治的诸种问题上，城市是存在分歧的。选择哪一方已经变得远没有那么容易，分析城市生活越来越难。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这篇关于“民族主义何去何从？”的早期论文，与我们对于当下的重新思考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在国家霸权终结之后，这篇文章最先注意到既是冲突的场所也是希望的空间的城市的出现。

引言

自独立以来，雅加达作为一个强大的地方赫然耸立在印度尼西亚的想象中。这一城市的重要性来自于这一事实，即就资本交流、政治权威与文化资产的集中化方面而言，它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家政策被逐渐生产和再生产为一个权力的空间²。然而，这一城市实力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国家威望（national prestige）的话语，这个国家的政治精

2 雅加达的中心性源自于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在独立初期的话语，也源自于荷兰殖民时期的城市的历史。中心这一概念也来自于传统的爪哇政治模式（polity）（Kusno,2000）。

英们通过这一话语把雅加达生产为一个有影响的都市³。但是，因为他们执意认为国家在一个地方需要所有种类的“发展”、基础设施与遗迹（monuments），从而改造了城市的实体空间（physical space）。如果必须要拆除某个甘榜（Kampung）⁴和改变总体规划，那么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就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这种东西——我将称之为“民族主义都市主义”（nationalist urbanism）——旨在为雅加达提供一种作为中心的统一形象，对所有生活在这个城市（以及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的公众而言，这一中心就代表了国家。由于这一意识形态，看似矛盾的两套关系的共存就出现在苏哈托总统执政时期（1966-1998）。一方面，存在通过“发展”的话语而实施的那种常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配的）西方经济自由化；另一方面，存在以雅加达的权威为中心的这种权力的民族主义话语。这两套话语之间的差异并不意味着经济与文化之间，或者是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对立。相反，它们的共存使得雅加达成为了一个富有实力（power）和影响力的城市。从而，作为首都城市的常住居民，雅加达的居民所过的城市生活就如同国家生活一样。在雅加达生活，让人觉得自己在体验一种世界性的全球尺度（globalscape），然而作为印度尼西亚的公民而言，他/她因此也生活在对国家话语的权威的顺从之中。

1998年5月这场推翻苏哈托总统统治的骚乱，已经改变了众多雅加达人的生活。让很多人倍感震惊的是，曾经强大、相对稳固与专制的政权仅仅在数天之内就被看似是来自底层的力量所瓦解。对这座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终身都从未理解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以

3 在论文中，作者使用了 city 与 urban 这两个概念。按照译者的理解，city 指的是地理概念和行政单位概念上的城市，而 urban 指的是市区，代表人口密度和生活方式意义上的城市。译者在文章中将把前者译为“城市”，后者译为“都市”——译者注。

4 *Kampung* 的音译，村庄。作者意谓城市贫民社区——译者注。

■ 特稿

及建成环境 (built environment) 的实体的拆除怎么会带来威权主义政权的覆灭。然而，骚乱期间对这座城市及其居民所带来的破坏，也有深重和旷日持久的影响。这些骚乱以及“烈火莫熄” (reformasi, 随着苏哈托被颠覆而来的一个号召语) 的场景，深刻地改变了雅加达居民对于国家以及城市治理的敏感性。他们也展示出了人们拥有这个城市的权利，展示出了正如一名居民所说的“人们抵制这个城市已经被创造出的空间。” (Bisnis Indonesia, 1999)。

苏哈托的“新秩序” (New Order) 的倒台，最终打破了“民族主义都市主义”的框架，这一框架曾经是这个国家的精英们自独立以来就一直在捣鼓的东西。来自不同阶层的雅加达居民们，发现在对这一企图代表国家形象的城市发展规划进行批评时，他们处于有利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雅加达的居民们知道，他们对于城市管理与规划的抗议将不再会因为暴力机器的使用而被轻易地压制。

这篇文章所要讲述的就是在苏哈托政权倒台之后的数年间雅加达所展开的故事。它所要论述的就是，当这个城市见证了其政治与经济力量的式微的时候，雅加达当局想要重新创造新一轮的“民族主义都市主义”的企图。市政府想通过启动前朝的“民族主义都市主义”来复兴这一城市的形象，这篇文章思考了这一企图所带来的空间效应 (spatial effects)，并审视了公众的批判性回应。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篇文章论述的是记忆的政治。它要展示的是雅加达如何致力于一种前所未有的记忆的政治。这种政治一方面要人们记住，这座城市曾是国家的旗帜；另一方面，在创造新的城市实力之时，它又让人们遗忘了国族意识。因此，这篇文章中的“记忆”不只是在具体层面上指代人们的思维状态，如记住或遗忘；相反，从更抽象的层面而言，“记忆”也指代着历史 (the past) 在有意或无意地结构着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时，所采用的手段。这篇文章要思考的是：某种特殊的历史 (past) 是如

■ 特稿

何作为一种“常规化的”当下所构成的遗迹 (traces of “normalised “present) 而继续存在，而同时其他的记忆会被遗忘或者只是偶尔重来困扰当下。因此，重要的不是遗忘和记住了什么，而是为了规训 (discipline) 公众，特定的记忆为何以及如何被制度化 (institutionalized)、被改造并被投注 (invested) 某种特定的意义。然而，反过来，这些公众同样可以开启这些同样的记忆，用以挪用、对抗和干预。为了解释雅加达当前城市变迁中的根本状况及特征，城市记忆与空间效应在冲突中共存，我将梳理它们结合而成的种种网络并分析其运作方式。我认为，虽然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危机时刻以及伴随而来的对城市重塑，为更负责的和民主的生活开启了可能性，但是它们也为极度自私自利的 (egoistic) 和充满暴力的新的都市政治创造了空间。然而，中心的“松弛性”是短暂性的。2002年10月的巴厘岛爆炸案之后⁵，新“反恐怖主义”这一强大现象已经在这个城市开始蔓延。通过在有限的时间框架内，即这一城市变成斗争场所的期间，对一个后殖民国家的政权变迁所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后果进行考察，我转而希望鼓励其他地方以比较性和批判性路向，来研究政权变更下的城市记忆、社会运动以及建成环境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built environment) 的相关问题，尤其是在后殖民国家中所开展的这种研究。

这篇文章所用的材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我从1999年到2002年期间(巴厘岛爆炸案之前)对雅加达的都市话语所做的观察，这些话语既有呈现在城市空间中的，也有在报纸上报道的。我以“中产阶级”报纸为焦点来支撑我对这座城市的观察，因为我认为这一阶层的公开主张对于理解(“中产阶级”一直隶属的)政治精英们的心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对理解诸种未被呈现的 (unrepresented) 的声音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未被

⁵ 到2003年初期，这一城市见证了对非法移民、棚户区住民和街头小贩的全面暴力驱逐。与市政当局的这一宣耀行为形成配合的是：巴厘岛爆炸案后的反恐话语、往亚齐省派遣部队、军人地位在民选政府中的增强，以及担心国家权力分散而进行的政策制定。虽然这些后来的现象对于理解雅加达的节奏 (rhythm) 是重要的，但是它们不在这篇文章的概念范围之内。

■ 特稿

呈现出来的声音，其自我表现往往还不足以让它呈现在众人面前，而掌握霸权的中产阶级通过十分含糊的接合却能让这些声音得以流露。

记住和忘记雅加达

将近 1990 年代中期，也就是当雅加达正在以高楼大厦、购物广场、立交桥和房地产住宅为中产阶级构筑城市景观的时候，印尼当代著名作家古纳汪·穆罕默德 (Goenawan Mohamad) 写了一篇关于这个城市的反思性文章 (1994)。这篇名为《城市》的文章是关于雅加达的商品化以及身居其中的中产阶级们的心态的。然而，雅加达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其经济实力。相反，古纳汪·穆罕默德把雅加达视为“国家”实力的来源，正是这点吸引来自全国各省的人来到这座城市，这让人想起 30 多年前普拉姆迪亚 (Pramoedy) 的那篇讽刺文章里所说的“风，吹遍各省，低语诉说着，直到你见过雅加达你才能完全成为印尼人” (Toer, 1955、1966)。然而，奔向首都城市，不仅意味着追寻被定义的更好的生活。它也包括一种向上流动的感觉，以及变成完全的“印尼人”的那种感觉，成为印尼人就等于给了你“做伟大的事，并且在思想上和身体上都可以平等地寻求自己的机会”的许诺 (1955/1976)。然而，穆罕默德 (Mohamad, 1994) 通过显示城市与国家之间的差距，暧昧地对雅加达的这一平等的“国家的”神话做出了反对。他展现的城市既不是被“荷兰风格的堡垒”所控制，也不是被古代爪哇的“马打兰王国” (Mataram Kingdom, 苏哈托经常与之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王朝) 的指导精神所控制，而是被“某种其他的东西，某种更强的东西，即围绕它的经济与政治力量”所控制，这些力量使得“我们所有人都成了这里的外来人” (Mohamad, 1994, p.29)。也许，苏哈托统治下的经济阴谋和政治手段，使得穆罕默德以他的透彻看清了被想象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整全 (imagined fullness) 和城市里真切的活生生的经验之间的差距。穆罕默德写道，首都城市的确给人们提供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接入 (register)

与他们之间的任何关联。但是，人们依然来到这个城市并待了下来，因为对那些“家乡的爱还不足以让他待在那里，却也无法把他的心与他的新的地方联系起来”的人来说，雅加达还是中心。（Mohmad,1994,p.28）

虽然雅加达居民或者客居者们渴望把他们自己看得要比那些身居他们想象的故乡或者村庄中的同胞们，在阶层上要更高（以及更强），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他们对这个城市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在反思这一模糊感时，古纳汪穆罕默德解释道，虽然这个城市试图吸引人并让人留下来，但是后者（即留下来的人）把他们自身展示为被疏离的灵魂，他们在买卖一切——“我们的东西、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精神”（Mohamad,1994）——中参与到这座城市。但是古纳汪·穆罕默德所描述的这些人没有离开这座城市（除了可能在开斋节期间⁶），而是在这座城市，“他们的第二故乡”里生活和工作。⁷用默罕默德的话来说，生存（being）于这座城市并没有“国家的”荣耀，倒是依然有这种感觉：即便它自知这种生活的疏离感，但城市依然是人们生活的中心。恰恰是这种模糊性——这一与城市依恋又疏远（attachment-and-detachment）的感觉——产生了“民族主义都市主义”这一官方话语，这一话语旨在控制人与城之间的游散关联（discursive link），用以推进特定国家利益，并为城市居民提供一种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忠诚（attachment）。

让城市里的人民与国家理念相一致，这种企图正是来自于政治精英们的自觉意识，即“雅加达市民不够爱雅加达，因为他们缺乏把自己与他们的城市连接起来的情感关联”（萨尔沃诺·库苏马阿马查 (Sarwono Kusumaatmadja) 部长所言，引自 Heuken,2000,p.17）。正如印尼作家赛诺古

6 开斋节 (Idul Fitri) 即伊斯兰新年期间——译者注。

7 印尼作家阿伊普·罗西迪 (Ajip Rosidi) 记得他第一次来雅加达这个城市时的失望。但是他也发现在自己的家乡的村庄找不到慰藉，并最终坦诚，“我爱你雅加达，因为你是我重生的城市”（转引自 Abeyasekere,1987,p.195）。这一城市的中心性可以在开斋节期间每年数百万人离开雅加达的壮观，以及节后返程高峰中的同样的不可思议的壮观中，看得再清楚不过了。

■ 特稿

米拉·阿吉达玛 (Seno Gumira Ajidarama 2002, p.19) 所说, 在一个“所有人似乎都被视为在别的地方有其出生地 (a place of origin)”的城市, “国家”就变成了所有人想象自身归属于这一城市的一种强大的粘合性隐喻 (binding trope)。正如我在别的文章里所详细阐述过的 (Kusno,2000), 旨在把城市转变为国家的受体 (subject) 的苏加诺, 与苏哈托的不同的民族主义都市主义, 从本质上来说是在按照当权的政权形象来改造城市这一基础上。但是,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古纳汪·穆罕默德对这座城市所做的描述, 雅加达的“国家的”和“世界主义的” (cosmopolitan) 居民同时被雅加达的权 (实) 力 (power) 所疏远。

在古纳汪·穆罕默德完成《城市》之后大约 10 年, 赛诺·古米拉·阿吉达玛 (Seno Gumira Ajidarma) 这位高产的年轻作家, 写过一篇名为《来自雅加达》的文章 (Ajidarma,2002)。这篇文章源自于后苏哈托时代的雅加达的社会运动, 并且解释了城市现状 (status) 中所发生的变化。乍看起来, 这篇文章似乎依然是关于雅加达的中心性, 让人回想起古纳汪·穆罕默德和普拉姆迪亚的类似的立场。但赛诺 (Ajidarma,2002,p.19) 写道: “来自雅加达”意味着“来自一个优越的地方……它意味着过剩 (excess)、更富有、更有知识和更为现代, 并且这具有一种变得更为强大的效果”。

但是, 赛诺的故事显示了对雅加达的感知上的一种重要变化。正如在古纳汪·穆罕默德的《城市》中, 这一城市里并不存在的“国家的”荣耀。然而, 如果说穆罕默德显示了在雅加达生活的中心性, 那么赛诺则强调了把自己从这个城市中超脱出来的重要性。《来自雅加达》这篇文章承认了这个城市的实力, 但这篇文章中有一种雅加达的驱逐感 (a displacement of Jakarta)。“如果你来到雅加达, 那么你就将成为优越性 (superiority) 的象征的一部分, 然而, 这一优越性也将被人们 (雅加达之外的) 理解为一种欺凌 (pemmiasa)” (Ajidaram,2002,p.19)。在赛诺的著作中, 有一种对来自雅加达的一切的怀疑态度, 并且如果雅加达之外的人要接近这一“热

■ 特稿

点”（骚乱区域），那么建议就是：

不要冷酷地说你来自雅加达，因为雅加达的形象已经变了。现在这一想象被视为是一个‘肮脏的地方’，一个人们之间为了维护权力而相互倾轧的地方（Ajidarma,2002,p.19）

在我看来，这一对雅加达的明确失望感，仅仅是1998年5月骚乱之后才出现的，一种与普拉姆迪亚讽刺地写下“风，吹遍各省，低语诉说着，直到你见过雅加达你才能完全成为印尼人”这句话时已不可同日而语的景象。赛诺问道，“现在雅加达怎么样啊？”，“它过去是优越的，但现在它是低人一等的”（Ajidarama,2002,p.19）。这两种雅加达的想象，一种由内而外（默罕默德），一种由外而内（赛诺），两者都可以被视为与那些对国家施加的“民族主义都市主义”进行批判的诸多话语具有一致性。

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我将探究“民族主义都市主义”的瓦解。“民族主义都市主义”多年以来一直为城市的实体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变革提供支撑的意识形态。可能展示这一点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阐明雅加达居民中间的敏感性的变化，以及雅加达人民如何回应现任雅加达市长苏迪雅梭中将（Lieutenant General Sutiyoso）的政策与实践。

苏迪雅梭市长，经济危机与无法度的城市环境

苏迪雅梭于1997年接掌市长一职，适逢该城市历史上的一大紧要关头：在苏哈托政权终结后接手“后1998”的印尼社会环境⁸；在做市长之前，他是特种部队的副总司令，该部队是军队里负责处理东帝汶和亚齐省

⁸ 掌权之后，市长就面临着非常棘手的政治与管理任务。他必须与众多经济利益和政治意愿协商，并且因为要支持商业地产商的欲望，还包括大型企业以及包括那些小贩和从乡下来城里务工的大量民众在内的小经营业主们的需要，市长也要处于各种压力之中。然而，从历史上来说，雅加达的市长们从来没有思考过推出连贯性的长期政策，或者没有萧规曹随，延续前任启动的项目。而相反，雅加达总是按照现任市长的规划来改变。按照某位政客的看法，“雅加达的城市项目可以按照市长的口味而随意更改”（Kompas,2002a,p.17）。

(Aceh) 的战争冲突和暴行的特别行动部队。作为前朝余部，苏迪雅梭继承了很多与苏哈托的新秩序 (New Order) 有关的城市治理策略。下面我们将要阐明，很多这些技巧，都是些“民族主义都市主义”的技术。在其执政期间，他通过很多载有民族情绪的都市项目来给雅加达居民吹鼓国家意识。与其前任们的都市范例一致，他也在很多前朝所熟悉的基本议题上投入了很多精力：拆毁甘榜、禁黄包车、限摩的、抓摊贩、街头卖唱的、叫花子、拾破烂的和性工作者⁹。当然，他同样也对公款管理不善。然而，先前的民族主义都市主义形式是在国家权威的层面上自上而下官方性地实施的，苏迪雅梭的形式与此不同，他的这些形式是从中心权力的“松弛”中产生的，因而也就呈现出了这一范例的危机。假设苏哈托的政权没倒，我认为即便他的民族主义都市主义不为公众所“接受”，它所遭到的来自公众的反抗也将只会是较小而已。

然而，后 1998 年代的雅加达的情绪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人们似乎创立了他们自己的批判声音。他们对试图呈现国家形象的城市规划是怀疑的、质疑的并且通常是愤怒的。一方面，在对那些“国家发展”的城市项目进行抵制时，他们过去是“被动的”（除少数例子以外¹⁰），但是他们现在以明确的抗议、集会和罢工来取代了过往的“被动”抵抗。这一积极的抵抗来自于民众对他们的国家精英的不信任，以及对民族 - 国家的力量 (power) 和首都城市的权威形象的抛弃 (displacement)。“雅加达作为人们生活的中心”这一与国家意识形态关联在一起的一致形象，现如今成了一种暗淡的想象。对城市与国家之间关联进行批判的新意识已经从暴力的残迹 (remnants) 中生发出来，这一暴力是与民族主义都市主义关联在

9 针对“底层”的遗风至少可以追溯到阿里·沙迪金 (Ali Sadikin) (1966-1975) 那里，他把“那些从乡下来的没文化、没技术的廉价劳工、三轮车夫、建筑工、小贩、流浪汉、叫花子和妓女”划为潜在威胁公共秩序的一类人。他们都是属于雅加达人口中百分之六十的穷人那一部分，这些人生活在一些叫甘榜的地方，这一称呼被视为“与这个城市的秩序不再相称，因为这个称呼提醒人们这是一个落后的社会” (Sadikin, 1977, p.160, 168, 112)。关于印尼诸多城市里的都市贫民生活的历史和故事，可以参见包括 Murray (1991) 和 Jellinek (1991) 在内的很多人的著作。

10 一些异常情况包括 1970 年代早期对“缩影中的魅力印尼”即广为人知的“迷你花园”这一工程的大规模抗议。

■ 特稿

一起的。由于过去 5 年的动荡已经强有力地塑造和限制了市长的城市愿景，在我们对苏迪雅梭的都市话语进行讨论之前，来了解下后 1998 时代印尼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可能会有所帮助。

苏迪雅梭的都市话语，是为了保存城市和国家的权威而启动的，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 1998 年的政治与经济危机。与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相比，印尼在 1990 年代行将结束之时，遭遇了深刻的经济衰退。按照约翰·布列思南（John Bresnan）的看法：

世界银行所估算的印尼增长的转变，是 1930 年代大萧条以来世界上最为恶劣的。从 1997 年的 7% 的增长率到 1998 年估测为 15% 的负增长率，印尼整整下跌了 22%（Bresnan, 1999, 99）。

因此，自 1998 年以来，失业率、贫困率与城市犯罪率激增¹¹。外来投资急剧下跌，印尼的投资者们抱怨国家在执法上的能力不足，也纷纷开始闪退。

2002 年，《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 2002i）所发布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印尼为 1998 年以来东亚唯一遭遇了资本外逃的国家”。在雅加达，大量专业人士（所谓的经理阶层）随着很多金融与其他服务业的倒闭而纷纷被辞退。相当大数量的这些中产和高收入经理们转换职业或者成为个体经营户。很多人无法在萎缩的正式部门谋得差事，把他们的房子和人行道（pavements）变为谋生之所。他们开办家庭经济，半永久的商店和小旅馆。这一现象最为明显地表现在雅加达各种地区的居民区中。这些区域突然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大排档、广告牌、帐篷、停车场，尤其是垃圾。看到这座城市的居民区中过度的私营业务，有报纸报道说：

11 虽然据官方估计 2001 年失业人口达到 10 万，而城市贫民联盟这一非政府性组织认为，总失业率达到了 40 万人。按照警方数据显示：每周平均发生 21 起武装抢劫案……每周平均有 12 辆轿车和逃脱车被盗，平均每周有两起刀伤的命案发生。绝大部分犯罪是发生在公共场所，比如街道、公交车上、公交车站、十字路口和购物广场……爆炸案也时有发生。”（Jakarta Post, 2002i, p.1）

尤其是在1998年5月的骚乱之后，很多街道被诸多门户所堵死，这一堵塞背后所反映的则是私人生意在住宅区的显著增长”（Matin,2000,p.18）。

与此同时，中产阶级以前工作的摩天大楼所在的核心商业区，在过去5年都没有开建新的写字楼；相反，越来越多的社会底层的小贩们越来越向雅加达的天际线集中。

小贩、街道与驱逐的记忆

经济危机带给都市贫民所带来的效果尤甚¹²。随着诸如电子、机械、纺织、制鞋和建筑这些制造业纷纷倒闭或者压缩生产，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失业，从而导致底层的都市世界中的失业人群的激增。失业人数的激增对于都市环境具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与中产阶级没有什么不同）通过改变城市的空间来适应他们的生存策略。如果说中产阶级在他们的车库里制造假古董和在公园、停车场里和他们家庭住处附近的人行道上开起了咖啡棚和馆子店，那么在工厂里失业的工人阶级就干起了街头贩子、开三轮黄包车、捡破烂、做叫花子和都市抢劫犯这类活儿。他们在城市里的所有公共空间和几乎每一条街道上讨生活：在交通灯下，在天桥上，在立交桥下，在公路收费站边，在公园里和私人与公共建筑的人行道上。《Kompas》这份报纸，对城市每一个角落都有小贩出没这一1998年之后的现象感到震惊，并报道说：

首都城市里有小贩存在这并不奇怪。然而，如今他们的存在被极端激起。他们不只是在他们的手推车、在塑料或帆布棚子下搞他们的买

12 在这篇文章中，“都市贫民”（urban poor）和“底层”（underclass）这一概念是可以互换使用的。关于诸如“中产阶级”、“底层”这些社会类型的系谱，可以参见 Siegel(1998)。

卖。而是，他们用永久摊位搭起他们的场所，他们也把这些场所用作他们的住所（*Kompas*,2000,p.29）。

从而，城市贫民与中产阶级之间展开了对城市公共空间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经营户已经使得“雅加达像小贩组成的城市”，招致了市政当局对他们的活动加以控制的反应，这一反应不是通过驱逐他们，因为“城市官员们惧怕骚乱”，而是通过改变城市的实体空间：在公共场所建起围栏，在街道两侧排起铁丝网以阻止小贩占道经营（*Kompas*,2000,p.29）。从而，城市管理部门、中产阶级与城市贫民三者之间就上演了不同的违法形式。他们把空间实践扩展到任何城市设计范例都无法想象的范围。最为重要的是，在政府眼里，他们造成了城市与国家权威的衰落。

上述所描述的空间实践并不完全是新的。从历史来看，街上小贩们一直备受责难，雅加达的市长们通常针对他们，把他们列为造成城市问题的原因。他们针对小贩采取了各种不同的突袭形式，从禁止他们到提供最小化的道路的决策，直至清除小贩的占领行为¹³。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政治性的，因为小贩们有引发在街道上结集群众的可能性，这一形势被视为对国家所要推动的井然秩序的威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在后苏哈托时代，雅加达的小贩的激增，可以被视为争取城市的权利的斗争的象征，这一斗争是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来的。这已经改变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后1998时代，从批判性的评价到对国家的存在的全然漠视，我们可以轻易地找到诸多前所未有的类似表达。

如果一个国家从来不关注其百姓，我又为何要应该关心这个国家？我不信任他们（那些掌管国家的人）（*Jakarta Post*, 2002a,p.8）

13 Wiyogo 市长在1989年表明，他对于建设更多的人行道没那么大热情的原因之一就是小贩们喜欢占道经营。关于苏哈托统治时期的人行道问题的讨论，可以参见Kota杂志上(1989)所做的一期名为“行人”的特刊里的论文。

同样，一位食品小贩批判地评论说：

我过去认为他们（立法者）代表我们，但是观察他们的表现，现在我已经改变了想法了。他们再也不是人民的代表了。（*Jakarta Post*, 2002a,p.8）。

另外一些人已经失去耐心了：

“每当我们看到他们开着保时捷的时候，我就想知道他们怎么能挣到那么多钱。我都已经多年辛苦打拼，但是我那个时候甚至还买不起一辆自行车……我发誓如果他们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会直接往人民代表们的脸上砸石头过去……他们认识到了绝大多数小贩们感到的惶惶不安了吗？”（*Jakarta Post*, 2002a,p.8）

在后 1998 时代的雅加达，小贩们感到惶惶不安，即便他们已经获得了对他们自身的生存的前所未有的控制程度。在他们感觉到城市的混乱无序之后，他们的利润已经极大下降。从他们的角度而言，失序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的城市管理与规划上的腐败、不公与无能。在这一基础上，虽然他们的骚动没能阻止他们利润的下滑，但至少这一群体认为他们可以一直漠视或抗议试图驱逐他们的当局。他们随意占领几乎城市每个街道上的公共空间，并且经常随意直接占领街道，导致了大规模的交通堵塞。他们似乎不怕治安官员。

因为如今的状况与“热火不熄”之前的状况不同。当今的生意人相比过去胆子更大。如果他们（治安人员）粗暴对待我们，我们将以牙还牙”。（*Suara Pembaharuan*,1999,p.16）

事实上，反抗和骚乱已经改变了警察和小贩之间的接触。先前冲突的记忆不停地让中产阶级感到担忧。（反映中产阶级恐慌的）报纸经常向读者们（可能是当局）提醒过往的事件，比如：“演变为骚乱的小贩们的抵抗已经在 Senen 和 Glodok 和雅加达南部的 Tampuring 发生。”（*Kompas*,2000,p.29）。中产阶级尤其感觉到了城市里的变化。雅加达不再是一个如民族主义的都市主义下所设想的那样有纪律与秩序的城市。也许，鉴于人民行为上的变化，城市当局也变得对小贩们更为宽容。雅加达中心区的市长说：

（如果我们粗暴对待小贩们）我们也担心我们的官员们将会遭到袭击，所以我们只是必须小心谨慎。但愿小贩们会自己离开这个地方”。（*Suara Pembaharuan*,1999,p.16）

中心的“松弛”：社会-政治危机与人们变化的心态

后 1998 时代，印尼见证了中心的前所未有的“松散”。相比以前，新闻有了更大的表达自由，“人民”的批判声音也可以被听到；诸政党们也容许自由地组织（导致了各种不同的群体组成组织，通常是为了党同伐异）¹⁴，公众抗议得到了宽容，从而产生了这一印象：“雅加达如今无法与表达公众情绪的抗议分开”（*Kompas*,2001d）。在后 1998 时代，所有类型的社会运动都浮现出来，复杂化了政治局势。政治精英、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在政治的中心都是清晰可见的，从而变革了政客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在一个具有很长社会等级制、政治压制、不平等与威权主义传统的国家，这一中心的“松弛”对于这个城市的社会环境具有深刻的影响。就好

14 目前在司法与人权部登记注册的政党为 200 个（*Jakarta Post*,2002h,p.4）。这一城市也见证了各种各样的人权组织形式，诸如城市贫民联合会、印尼民主教育中心和雅加达居民论坛。一群三轮车夫也在计划组建一个新的政党（*Harsanto*,2002a,p.8）。

■ 特稿

比曾经很长时间以来把爪哇这个岛固定下来的那颗中心的钉子现在被拔掉了；躁动感在居民中间普遍流行。民众中间有一种感觉，中心不复存在了，不再固定、监视和指示他们的行为。中心的消失创造了一种迷失方向感（disorientation），并创造了彼此之间冲突性共存的诸多较小的中心。国家还是存在的，但是它已经被视为仅仅是诸多中心中的一个而已，每个中心都在寻找获得更多财富与权力的机会。因此，雅加达的居民们越来越感到他们生活在一个腐败、无法无天和暴力行为组成的网络中，你有这一印象一点也不奇怪。即便他们承认存在变得更为强硬、更为富裕和更为灵活、更为广阔的机会，他们依然感觉到不安全、脆弱和不受保护。高官们正在篡夺更大的权力；官员和暴徒们在争夺黑钱。上流中产阶级们通常以武器、防弹衣和私人安保人员来日夜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他们建起了很多更为私人和社区的保卫室来划出领地和身份，通常超越了城市规则所定义的领地和身份。那些没那么富裕的、无力购买保护和决定具体执法状况的人，通常通过群众公审（mass trials）的手段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安保系统。中心的“松弛”产生了一种感觉：“我们看起来是个刚刚开始学习一切的国家”（Media Indonesia,2002,p.1）。

中心正在瓦解，这一感觉同时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民间群体，这些群体或松散或紧密地围绕着诸多‘低于’和‘高于’国家的身份而形成；类似的集群包括阶级、职业、宗教、族裔、政治和道德派别的群体。他们也都因这一感觉而彼此关联起来，即民族 - 国家不再握有任何保护和统治的力量，充其量来说，政治精英们仅仅保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不受侵犯而已，而完全不管那些在日益恶化的都市生活现实中自生自灭的民众。在都市贫民的眼里，市政府从来没有帮助过他们，并且可能永远也无法提供给民众解决问题的举措。城市激进分子马尔科·库苏马维加亚（Marco Kusumawijaya）批判城市漠视民众的福祉，敦促城市贫民创造——如果不是维持的话——他们自己的网络。因为

对贫民社群来说，现在该是寻找对他们自身利益有利的解决办法的时候了，而不是要期待政府政策来帮助他们。（Harsanto,2002c,p.8）

在某种意义上，从草根行动主义者组织到专业性结社，这些“社会运动”既因城市中心的“松弛”而被赋权，同时也因此而迷失方向。虽然几乎总是没有成功，但它们能够形成各种网络来迫使市政府提高其对城市社区的服务。

中心的“松弛”激发了雅加达民众的自主行动，创造每个人可以保护她/他自己空间的条件，但通常没有太关注公共性。一些人使用暴力来显示他们的意愿（aspirations）；另外一些人创造和推出他们自己的城市议程。市政府发现他们在小贩们眼里成了无牙老虎，他们也与民间治安团体和城市流氓形成联盟来维持其自身的权威。

比如，苏迪雅梭市长与地方民兵组织如捍卫回教团体联盟（Front Pembela Islam）合作，该组织在1998年5月骚乱后成立，以抗击“不道德”城市生活（Bertrand,2001）。警察支持这一民兵组织打击被认为是公共场合里的“邪恶的”夫妇，以及支持他们烧毁妓院、赌场和涉嫌卖酒的餐馆。勃兰特（Bertrand, 2001）披露苏迪雅梭市长亲自参与到FPI领导人会议上，这些领导人积极游说市政府关闭城市红灯区。1998年以来，众多民兵团体，有的多达数万人，得以成立，以帮助市长处理“麻烦状况”。

利用民兵来“保护”城市这一传统并不新鲜。苏哈托的新秩序就在所谓的“街坊安全系统”（Siskamling system，一种社区监视系统）下这么干过。这套系统建于1980年代中期，受训于军营民间的安保力量，被分配到政府机关单位、酒店、购物广场、工业园区和私人住宅充当私人安保人员。然而，在新秩序期间，为了形成一种依托军管的都市文化，所有这些民兵是由国家控制的。因此，我们在1980年代看到了很多“神秘尸体”和“神秘枪手”的例子，这些正是国家所主导的对一些民兵成员和一些被认定为

■ 特稿

雅加达街上的“犯罪分子”进行刺杀的结果（Barker,1998;Siegel,1998）。

在后苏哈托时代，这一利用民兵来保卫城市和控制地下犯罪的传统得以延续下来。比如，1998年，通过了一项允许警察动员民众来解决平民纠纷的法律（Suara Pembaharuan,2002,p.1）。然而，这里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如今，民兵似乎能够自主行动而不用获得警察的同意。事实上，警察常常除了只能满足民兵的意愿之外，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

与过去的牢牢控制和监控其臣民行为的新秩序国家不同，后苏哈托时代的国家是在公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在苏迪雅梭当选为雅加达市长5年之后的问责讲话中，他为自己管理雅加达上的失败所做辩护，其中的确有令他痛苦的事实：

多维度的危机，人民行为中的变化，以及更少的就业机会，这些都导致了在维持安全与秩序上的困难”。（*Jakarta Post*,2002c,p.2）

对于一个退役的部队中将来说，要相信这一点也是很不容易的：

1997年到2002年我当市长的第一个任期期间，雅加达人发起了4538场针对我的抗议游行……从小规模的到导致社会动乱的群体集会都有。

（*Jakarta Post*,2002d,p.8）

记住国家：英雄雕像、喷泉与国家纪念塔的围栏

市政府在处理后1998年代的雅加达“人民行为的变化”上，做出了诸多努力，为了阐明市政府所做的这些努力，我现在要转向苏迪雅梭市长的都市话语。自执政以来，苏迪雅梭市长提出过数次城市设计的动议来处理都市生活品质的危机。这些动议是为恢复城市和国家的权威而复兴民族主义都市主义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他要把这一权威作为实力和影响的基

■ 特稿

础之一。具体来说，市长利用城市的历史遗迹来提醒民众城市和国家之间的同源关系（affinity）。他利用了把地方与国家联系起来记忆的符号。在他执政之后，他随即计划在雅加达的每一个街道口树立国家英雄雕塑。这些雕像被安置在以这些国家英雄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上。按照苏迪雅梭的说法，这一工程的目的，就是要使得公众尊重印尼国家领导人们所做的奋斗。

苏迪雅梭也命令给 1960 年代苏加诺所建立的国家纪念塔公园（即 Monas 公园）设立围栏。自从 1997 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一首都最大的公园一直被小贩们树起的帐篷占满。雅加达副市长阿卜杜勒·卡士非（Abdul Kahfi）说 Monas 公园

已经被变成了存储仓库，一个老百姓洗晒衣服和践踏植物的地方。

（*Kompas*,2001a,p.17）

此外，Monas 公园也成了抗议市长和印尼总统而举行街头集会的流行场所，他们的办公室正好对着公园。据报道，苏迪雅梭市长曾经对印尼国家纪念塔发过抱怨和牢骚，“印尼的历史符号现在是废墟一片”（*Kompas*,2001,p.17），因为在他看来，Monas 公园的管理代表了他领导的政府的威望。为恢复这一威望，苏迪雅梭命令给公园铺上人行道，种上植物，养上鹿，然后把所有这些整个围起来，以“创立秩序并让游客感到舒服”，这样做也是为了减少示威游行和赶走那些过去几年一直占着这一空间的小贩和流浪者（*Kompas*,2002c,p.19）。通过公共卫生办，他还命令在这一区域设置 550 个垃圾桶，并且命令卫生办一天 24 小时清倒垃圾¹⁵。为了进一步恢复这一区域，市长还规划在国家纪念塔的四边树立纪念碑，每一个都象征着国家历史上的一个篇章：古代玛迦帕夷王朝（Majapahit）

15 在雅加达，公共垃圾桶一直被偷。一位卫生官员这么解释他的策略：“即便它们是用水泥做成的，被深埋到地里了，垃圾桶还是会被偷走。但是将来，我们将计划把它们埋得更深，以便它们再也拿不走”（Warta Kota,2002）。

■ 特稿

和室利佛逝王朝（Sriwijaya）的辉煌时代、殖民时期的暴动、独立斗争以及发展的光辉时代。（*Kompas*,2002c, p.19）

雅加达人，尤其是那些设立了摊棚并遭到驱逐的人群，带着敌意接受了命令。与后 1998 年代雅加达的心态一致，他们对此进行了回击。小贩子们认识到了“Monas 公园对于城市骄傲的重要意义，以及它应该要整洁有序”，但是他们也认为他们对城市拥有的权利要比国家的荣耀更为重要（*Kompas*,2001b,p.19）。对后 1998 年代的雅加达的小贩们来说，Monas 公园纯粹是一个广阔的开放空间的场所，一个对他们在这个城市讨得生计来说重要的地方。爱国主义是次要的，并且只有居民的福利满足之后才值得去牢记这些。

苏迪雅梭的另一项都市民族主义动议是翻修印尼大酒店（Hotel Indonesia ,HI）交通岛的大喷泉，这个喷泉的一部分是以迎宾雕塑（Welcome Statue）为基础。1960 年代，为欢迎亚运会的运动员们来到这个城市，以及“迎接一个公正和繁荣的未来社会”（*Star Weekly*,1961,p.4），苏加诺总统指示建立了这一迎宾雕塑。印尼大酒店圆环自从被建立以来就一直是个热门景点。它在苏哈托政权倒台之后，也成为了表达社会与政治不满的场所。苏迪雅梭在 2001 年启动了一项叫做“通过照明设备来建构国家自豪感”（*Kompas*,2001c,p.18）的项目，部分原因是为了控制这一区域的抗议。他想要看到的是翻新的迎宾雕塑和灯光，从而通过迎宾雕塑把人民团结起来，让他们再次为国家而振奋¹⁶。因此，他指示为喷泉安装新的水泵和数百个喷嘴，（依据印尼红白组合的国旗）让喷泉的喷雾形成红白相间的组合。他还雇佣安保人员周日和公共假日里在这个区域巡逻。在他看来，看官会欣然接受这一工程，因为这一历史遗迹将提醒他/她雅加达作为国家的中心所拥有的荣耀。

16 这一灯光工程是由通用电气（GE）所制造的，通用给市长打包票说这一灯光工程会让纪念塔看起来绚烂夺目。*Kompas* 报道说，通用还曾经在纽约安装过自由女神像、匈牙利的链桥和在中爪哇安装过巴兰班南古迹（位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印度教建筑——译者注）（*Kompas*,2001c,p.18）。

■ 特稿

有必要保存迎宾雕塑，因为它与这个伟大国家的悠久历史关联在一起。（*Kompas*,2001c,p.18）

然而，虽然市长和他的拥趸们把这一翻新工程看得对雅加达的形象很重要，从而也对国家的形象很重要，但是雅加达的民众却认为这毫无用处，还浪费钱。“市政当局怎么能为这个装饰工程花上这么多的钱（1400万卢比）”（*Nurbianto*,2002,p.8）。他们觉得这个工程太奢华了，虽然一家私人烟草公司为了换取在10个重要位置树立公司广告牌的好处，的确为印尼大酒店地区的翻修出了部分资金。雅加达人认为，雅加达这个城市应该优先搞那些将能解决城市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的项目。一位叫萨丽的下层中产阶级主妇评论道：

市长似乎只专注于驱赶那些生活在河堤边上的穷人，而不是为雅加达人办点实事。印尼大酒店喷泉的开发就是市政府只会浪费老百姓的钱的例子。（*Jakarta Post*,2002e,p.8）

印尼大酒店这项工程，没有产生民族主义精神，而是招来了更多的非议和抗议，并且显露出了政府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式微。

对井然有序的怀旧：巴达维亚与恢复权威

为了进一步显示后1998年代雅加达盛行的危机感有多深，以及市政府在恢复秩序和权威上的所做的诸多努力，我现在要开始讨论围绕雅加达殖民时代城区的恢复的话语问题。起初，这一规划就意在吸引游客，但是更深的考察就能看出，这是市政府在恢复5月动乱中被摧毁的国家形象上所做的（无意识的）努力。这一规划要比印尼大酒店的翻新、国家纪念塔的整修以及雅加达街道上国家英雄雕塑的树立这些工程都要大得多，而且更为乌托邦。这一规划因包括资金匮乏与居民、投资者和政府方面的政治

意愿在内的各种原因，长期无法落实，这一点也很清楚。恢复殖民时期城区这一项目，可以被理解为是一项对旧政权的井然有序的向往，以及收回国家权威和城市的影响力的工程。镶嵌在老城城市结构中的这段殖民史，就被用来给后殖民时期的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提供一种幻觉上的秩序。

1998年5月骚乱期间老建筑的实体毁坏¹⁷，1998年之后的社会解体感，以及城市里违法乱纪事件增多，这些都促使建筑师、规划者和市政府重新确立文化保护工程。过去保存建成环境的目的是要吸引外来游客和向年轻一代教育国家的历史，但是当今市政府的目的则与此不同，它认为保存老建筑的目的是要恢复政府的权威。换句话说，市政府认为其权威在于其保存和恢复雅加达旧古迹的能力上。2000年，一位叫 Dundu 的记者报道说：

政府已经许下坚定承诺，要恢复这个城市旧的部分中的遗留建筑，比如老巴达维亚¹⁸。其目的是要在城市的这一部分中创造出一个漂亮、舒适和干净的地方，这一地方将使其居民受益”。（Dundu,2000:1）

2001年，苏迪雅梭市长颁布了一项保存雅加达旧城的政令（SK Gubernur No.106/2011），以吸引游客和重新创造出雅加达是一个有秩序的城市形象。对市长来说，这一修复将提升印尼政府在公众和全球游客眼里的权威，而迥异的状况是，大小旧城区域中“嘈杂、乱忙、野蛮和交通拥堵”的环境，“这一地方让政府权威荡然无存”（Republika,2001,p.12）；因而，保存旧城旨在“使该区域免于汽车的嘈杂”以实现一种安宁的环境（Republika,2001,p.12）。历史中的城市多年来被忽略，而如今市长宣布，这一过去的城市，要变成雅加达的未来，以“吸引游客、增加安全、保存老建筑和它们的环境，创造一种艺术和欢乐的环境”（Suara

17 在这些骚乱中，中国城大约有 100 栋被建筑师视为很有价值的建筑在两天内遭到纵火并被彻底摧毁。

18 Old Batavia，印尼首都和最大商港雅加达的旧名——译者注。

■ 特稿

Karya,2001,p.10)。

保存雅加达殖民时期的城区的这一规划，是从巽他格拉巴港（Sunda Kelapa harbour）开始的，该港口为帕加加冷（Padjajaran）王朝于15世纪建立，而后分别于1522和1610年被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占领。从这里开始，保护区将延伸到覆盖132个被视为旧城组成部分的场所。“从荷兰政府那里获得极大的支持”，这一港口“将被修缮一新，以便让它将显得漂亮、可爱和充满激情”（Harian Buana,2001,p.12）。就好像这一旧城将为后1998年代的这座城市的混乱状况带来一种方向和稳定感。负责巽他格拉巴港修缮的主任马托诺尤沃诺·苏达尔（Martono Yuwono），也是一位资深环保主义者，他强调说：

雅加达已经迈入了新的篇章。它现在正通过把四个世纪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建立的旧港口修缮一新，来记住旧时代的荣誉与骄傲。它想要通过把殖民时期的遗迹转化为旅游场所，来恢复这个国家的荣誉。

（Yuwono,2002）

在这一“对当下的怀旧”（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中，同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一混乱和失序——后1998年代雅加达的标志——的时代，修缮巽他格拉巴港，其所关乎的是城市设计与规划的权威性。苏沃尔（Yuwono）所采取的做法与1972年取得过一定成功的做法类似，

当时修复了40公顷的基础设施，改善道路，铺设人行道，秩序化小贩和垃圾，建设排水系统、公园、街道和交通灯，以及改道交通流、迁移公交车站、重新整理广告牌、种植街道绿化、提供咨询，以及修复和重刷这一区域老建筑的外观，而荷兰市政大厅（Dutch City Hall）正是随着这些突破性进展而得以修复的。（Yuwono,2002）

在1998年5月动乱中登峰造极的拆除过往时代建筑的记忆、政府业

■ 特稿

已失去的管理城市的权威的感受，以及对旧巴达维亚话语的复原，这三者之间从来就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是怀旧式地记住旧政权的井然有序和忘记嘈杂的当下现状的一部分。我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保存旧巴达维亚的想法并不纯粹是关乎旅游业的重要性，以及为了国民教育而恢复国家的殖民历史的记忆。而是，它源自于城市精英这一方想要重建正在崩溃中的秩序和权威的渴望，同时也是想象一种清晰的历史图景以重新获得实力和影响力的渴求。

展望：世界之屋、音乐购物广场与遗忘当下

与此同时，以官民利益冲突为标志的这一时期前所未有的无政府状态，也带给中产阶级一种异常的不稳定感。作为一种回应，就有了建立甚至更为强悍的堡垒来抵抗贫民、无法无天者和意外状况的紧迫感。在强调“稳定”的苏哈托政权摇篮中成长的中产阶级，对于这个城市人民行为的变化是最为焦虑的。他们对这个城市的安全状况倍感焦虑，并要求更多的警察，这表达出了他们的不安全感；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恰恰也是他们所不信任的¹⁹。1998年以来，中产阶级报纸《Kompas》，在有关公共安全的议题上投入了大量的关注，包括一系列的炸弹威胁、谋杀、绑架、强奸和抢劫。无论在家还是在街上，雅加达的中产阶级居民，都感觉到极度的不安全。在中产阶级的社交空间购物广场中，都能间或发现爆炸性材料；他们的停车也常遭小偷光顾，甚至他们大门紧锁的房子也遭到了非法闯入、抢劫和攻击。

19 中产阶级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雅加达的安全问题作出了反应，其中一项就是要求更多的警力保护。“为了打击这些天一直激增的犯罪，雅加达的市民迫切需要警察。我们需要警察出现在敏感的角落里，尤其出现在晚上死寂的街道上，出现在公交车、集市、公交车站和火车站。似乎，当今雅加达没有一寸地方是安全的”（Kompas,2002b,18）。但是要求警力保护也遭到了中产阶级的反驳，他们有一种对警察的不信任感，因为在他们看来警察是压榨性和唯利是图的。遭盗窃和抢劫的受害者们一直不愿意向警方报告他们的损失状况，就是为了避免惹来更多麻烦。“报警会招来更多麻烦。最起码来说，在他们展开他们的‘调查’之前，我得先给他们‘烟钱’”（Harsanto,2002b,p.8）。

■ 特稿

为了评估中产阶级对于雅加达的公共安全的崩溃所做的空间性回应（spatial response），对雅加达新城（New Town）和购物广场的当前状况进行评估是恰当的，这两个地方也是从苏哈托政权那里继承而来的最为重要的中产阶级集聚区（enclaves）。带有点乌托邦寓意的新城是逻辑起点，对中产阶级来说，这个地方是抑制他们的不安全感和逃离在雅加达的危险生活的场所。随着1998年之后街头犯罪的日益恶化，新城建立起了带有明显尖刺的更高围栏，它被当做一种抵挡大门之外意外状况的堡垒。为确保对访客和路人进行控制，建立起了更为严密的治安检查点。在一些大门，门卫要查验访客的身份证。围栏、保安室和安保人员不仅象征着中产阶级的声望，而且也象征着一种恐惧、失落感和强化防御的感触。

后1998年代的新城的建筑设计，也表达了一种渴望：想呆在不同时空中的某个其他地方。比如，在保卫森严的Lippo Karawaci这一聚集区，开发商就提供了来自不同时期的各种场所的建筑样式：提供了一些叫做大不列颠花园、波士顿花园、大阪花园和芭堤雅花园的大住宅；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较小的、本地化主题的房屋来作为补充，这些房屋暗示着与传说的历史存在关联：比如莱吉安花园、巴达维亚花园、迪波内戈罗花园（Diaponegoro为爪哇王子，他在1825年到1830年代抗击过荷兰统治）以及Parahyangan花园（parahyangan是印度神话中的神的住所）。这里也有叫做“塔里埃森、森林与橡树公园”的草原式住宅，这种草原式建筑是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的建筑想象（Brochure of Lippo Karawachi, 2002）²⁰。

20 类似地，占地2500公顷的Bukit Sentul以“维多利亚购物广场”、“阿姆斯特丹购物广场”、“卡萨布兰卡花园”、“名古屋花园”这些建筑的聚集为特色，同时也一道还有诸如“Bekasih花园”、“Udayana花园”和“巴厘山庄”这类巴厘岛的地方性名字。Bukit Sentul的促销传单上写道：“选择居住在Bukit Sentul真的让我很开心，因为这里每天都是如此漂亮。在这里，生活的动态与和谐完美地平衡，一切都如此令人愉悦。爸爸变得越来越精力旺盛，快乐的小宝贝让我们的日子充满快乐。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直是Bukit Sentul的设计理念，它是基于一种如同度假村一样的自给自足的小镇理念。不是每一块土地上都盖上了房子，而是让自然的美景来主宰这里。这里充满了具备国际水准的生活福利设施。休闲、教育、购物、运动，一切应有尽有。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在Bukit Sentul能找到如此这般的舒适，Bukit Sentul真是我的梦想之城，就像‘生活在一栋花园别墅’里的日子一样。”（Bukit Sentul的宣传单，2002）

如今，当大多数著名房地产公司把它们在1998年之后所开发的大住宅区纷纷命名为诸如漫游镇（tour town）和漫游传奇的时候，这就不只是个意外的比喻。仿佛是要消除掉不安全感，雅加达东南部市郊最大的住宅区Kota Wisata（一个漫游小镇），就提供了能够使得人民不需要护照就能周游世界的住宅和购物设施：

逛逛漂亮的印尼、巴黎的珠宝、德国的杰作、浪漫的意大利、日本的传统、美国的精神和中国的壮丽。（Brochure of Kota Wisata,2002）

主题公园的联想与远离国土去周游世界的那种理念紧密相关，主题公园提供的建筑风格提供了跨越国界之外的范围。它们流露出一种旅行以及生活在这个国家和城市之外的感受。2002年的第一季度，漫游小镇就卖出了200多套上流的房子（价格接近5亿卢比）。这一“最为壮观”的市场表现也促使该公司开发了6个更新的地产项目，这些项目围绕着欧美主题进行：“金斯顿、温莎、奥兰多、三番、比弗利山庄和佛罗里达”（Properiti Indonesia,2002,p.11）

同时，购物广场也变成了居民们所喜爱的空间，这一空间被他们作为一种逃离犯罪猖獗的街道和城市的方法。因此，收费公路也变成了一项重要的交通途径，这一途径把私人住宅区与中心商务区和购物广场连接起来。

从西部回家，沿途的收费公路两边是Mal Ciputra, Mal Taman Anggrek和Slii Jaya Plaza；接着在这条路的前头是Plaza Senayan和Ratu Plaza²¹；在MH Thamrin大街上，我们可以看到Plaza Indonesia 和Sarinah两个购物中心。往卡萨布兰卡区（Casablanca），我们可以看到Mal Ambassador购物中心。往Menteng方向，可以看到Menteng Plaza购物广场；再往东去，就是Senen区的Atrium Plaza购物广场。（Triyanto et

21 这些都是雅加达著名购物广场——译者注。

■ 特稿

al.,2001,p.11)

除了设计精良外，消费者们还因为它们的“战略性位置(沿着天桥)和舒适的内景”而被吸引到这些购物广场（Triyanto et al.,2001,p.11）。完全与外边的喧嚣隔离开来，这些购物广场的内景不仅装了充分覆盖的空调，还为全家配备有娱乐和休闲设施。比如，在Senayan广场，“在特定的时刻，挂在大厅里的钟就将传出歌声，声音美妙甜美，把消费者们撩拨得振奋起来”（Triyanto et al.m2001,p.12）

据报道，还有六个购物广场尚在建设之中，“以满足所有人对这些消遣场所的需求”（Jakarta Post,2002f,p.20）。与漫游小镇的新城没什么两样，后1998年代的购物广场也在增进它们环境的安宁与自足自给的舒适。“没有跑去新加坡、香港、美国或者法国买名牌香水、鞋子和名牌服装的必要了”（Triyanto et al.,2001,p.14）。如果新城给出了出国旅行的希望，可以远离这个国家的时间和空间，那么购物广场就以安全封闭的、保卫森严和充满美景的消费空间，取代了现如今被小贩们塞满的雅加达街道。

人民的生活方式也的确已经改变了。据《雅加达邮报》（Jakarta Post,2002f,p.20）报道，“过去人们在公园或者公共场所中打发空闲时间的时候，现如今蜂拥到分散在城市中的各个购物广场里去了”。在1960、1970和1980年代，位于印度大酒店圆环的迎宾雕塑、Semanggi立交公路和国家独立纪念塔曾经是雅加达的象征，雅加达的居民过去站在这里留影。如今，普遍的情绪就是：“为啥要去那里？还不如去购物广场呢！”（Hantoro et al.,2001,p.72）。不仅购物广场成了这座城市的新的象征，而且在后1998年代的雅加达这一背景下，购物广场的中心性也与中产阶级对于雅加达街头日益恶化的街头犯罪的焦虑紧密相关。

结论：新的主体性？

过去，雅加达是国民生活的中心，是一个城市的居民们把自己与国家 and 他们的政府认同起来的场所。在苏哈托的统治下，通过把威权的官方民族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融混起来，当地实现了产生一种特殊的都市主义，从而沿着“发展”的轨道前进。以这种方式，雅加达曾经把自身打造为一座有实力的城市。在1998年之后，虽然雅加达的人民依然在国家之中定位这座城市，但是他们不再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能与他们的都市生活这一现实相容的话语来接受。

我已经在这篇文章里表明，当前雅加达的实力是通过哪些方式使其居民接触到各种城市话语而被生产出来的，这些都市话语是与当前、过去和未来的诸种记忆关联在一起的。我也展示了苏迪雅梭市长在吸收前苏哈托统治的残余时，是如何试图通过动员民族主义都市主义来恢复历史的记忆，从而产生了实力只属于雅加达而非别的地方这一印象。他利用这一形象，是希望雅加达把自身与先前的文化、经济与政治的网络重新关联起来。然而，为了城市的未来而把历史的记忆与当前的现实关联起来，对这一情形所做的尝试，被公共记忆所组成的各种不同的集合所覆盖（overlaid），这些公共记忆卷入了都市居民以及他们的去中心化的（de-centralised）网络。

如今，雅加达人民已经在见证他们与国家之间，以及与他们的政府之间关系上的史无前例的变化。我认为，这是一种源自于对国家进行批判的意识所带来的变化，这一批判意识是过去五年所发生动荡带来的：集权政府的意识形态的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城市贫困的增加、失业的蔓延、腐败文化的加深、普遍的法律无效感、暴力的激增以及种族冲突的爆发。这些系列性的危机，在那种被想象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整全与这一城市的生活现实之间插入了一把楔子，从而产生了一种记忆和遗忘的政治，这一政治包括对与旧统治联系在一起的那种井然秩序的怀恋。

这一断裂性时刻为更为负责的、多元的和民主的都市主义开启了可能性；但是也为一种更为自私自利的、审慎地无法预知的和更为暴力的新的都市政治的形成创造了空间。这一城市已经从国家框架所强加的统一性（uniformity）中解放出来的，但是其他的德性政治（politics of morality）也正在浮现出来。其中一些是排斥性的，并且同样是威权主义的，而其他的一些是更为世界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的与进步主义的。从这一对记忆与遗忘的争夺中，为了取代旧的民族主义都市主义，也可能是为了回到旧的民族主义都市主义，最终将会有一套被选择出来的德性政治浮现出来充当公共生活的规范。

参考文献

ABKYASEKERE. S. (1987) Jakarta: A History.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JIDARMA. S. G. (2002) Dari Jakarta, Djakarta: The City Life Magazine, 21 July, p. 19.

BARKER, J. (1998) State of fear: controlling the criminal contagion in Sujarto's New Order, Indonesia, 66(October), pp. 7—43.

BHRTRAND, R. (2001) Inhabiting Jakarta: interstitial imaginings in a globalized cityscap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n Globalization, Tokyo, Rikkyo University, June.

Bisnis Indonesia (1999) Arsitektur kedaerahan atasi kesenjangan | Regional architecture overcomes social gaps]. 28 July.

BRESNAN, J. (1999) The United States, the IMF, and the Indone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A. SCHWARTZ and J. PARIS (Eds) The Politics of

Post-Suharto Indonesia, pp. 87-112.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DUNDU, P. (2000) Neraka Kota 'Oud Batavia' [The hell of the Old Batavia]. Kompas. 30 October, p. I,

HANTORO. J. ET AL. (2001) Tambal sulam symbol kota [Fixing the symbols of the city], Segitiga Emas, 2(1), p. 72.

Harian Buana (200!) Wajah Batavia tempo doeloe tersimpan rapih di pelabuhan Sunda Kelapa [The fact of Old Batavia is well kept in the Sunda Kelapa harbour], 28 January, p. 12.

HARSANTO. D, (2002a) Pedicab driver plans to establish new party, Jakarta Post. 5 August, p. 8.

HARSANTO. D, (2002b) Unreliable police data causes failures in fighting crime. Jakarta Post. 29 July. p. 8.

HARSANTO. D . (2002C) Jakarta's poor urged to resolve their own problems, Jakarta Post. 14 September, p. 8

HEUKEN. A . (2000) Historical Sites of Jakarta. Jakarta: Cipta Loka Caraka

Jakarta Post (2002a) Public don't trust leaders, 6 August, p. 8.

Jakarta Post (2002b) Assembly members make me sick. 3 August, p. 8.

Jakarta Post (2002c) Sutiyoso blames public for his failure. 19 July, p. 2.

Jakarta Post (2002d) Sutiyoso: most maligned governor?. 11 November, p. 8.

Jakarta Post (2002e) Sutiyoso has failed to perform well, 16 July, p. 6.

Jakarta Post (2002f) Malls offer everything for everyone, 14 July. p. 20.

Jakarta Post (2(X)2g) Jakarta, city of unemployed and brave, 23 June. p. 1.

Jakarta Post (2002h) RI strives to find ideal number of parties. 9 September, p. 4.

Jakarta Post (2002i) Capital continues to flow out of RI, 18 September, p. 2

JELLINRK. L. (1991) The Wheel of Fortune.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Kompas (2000) Jakarta mirip kota kaki lima [Jakarta resembles city of vendors]. 12 June,

p. 29.

Kompas (2001a) Monas akan miliki penanggung jawab [Monas will have a guarantor]. 21 July, p. 17.

Kompas (2001b) Penertiban Monas. Pedagang siap melawan [The keeping order of Monas, traders ready to fight] .31 July. p. 19.

Kompas (2001c) Rampung. proyek penerangan Monument Selamat Datang [Ready, the project of the lighting of the Welcome Monument], 2 July. p. 18.

Kompas (2001d) Warga tak peduli pada dekrit [Citizens don't . . .], 21 July, p. 18

Kompas (2002a) Jakarta tidak mempunyai rencana strategis. [Jakarta does not have any strategic plan]. 24 June. p. 17.

Kompas (2002b) Patroli polisi, soal lama yang dilupakan [Police patrol, an old forgotten practice]. 30 July. p. 18.

Kompas (2002c) Proyek pemugaran Monas senilai 8.7 milyar rupiah di mulai [The project of fencing Monas which costs 8.7 billion rupiahs has begun]. 25 July. p. 19.

Kota (1989) Pedestrian. Special Issue. 1(2), March-April.

KUSNO, A. (2000) Behind the Postcolonial. London: Routledge.

MATIN, A. (2000) Bintaro Jaya: Kota taman dan kota toko [Bintaro Jaya: Garden city and the town of shops]. Kompas. 29 March, p. 18

Media Indonesia (2002) Editorial: Nyanyian nioralitas para politikus [The morality songs of the politicians], 16 September, p. I.

MOHAMAD. G. (1994) City, in: Sidelines, trans, by J. LINDSEY, pp. 28-29. South Melbourne: Victoria: Hyland House.

MURRAY, A. (1991) No Money. No Honey. Singpa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URBIANTO. B. (2002) HI Circle,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Jakarta Post. 6 July, p. 8.

Properti Indonesia (2002) Duta Pertiwi mulai unjuk prestasi [Duta Pertiwi has begun to show achievements], August, p. 11.

Repihiika (2001) Kota tua perlu dikembalikan fungsinya [Old city needs to be revitalised], 21 May. p. 12.

SADIKIN. A . (1977) GHa Jaya: Catatan H. AH Sadikin. Guhernur Keptila Daerah Khusus Ibit Kohl Jakarta. 1966-1977. Jakarta: Pemdada Khusus Ibu Kota Jakarta.

SiEGEL, J. (1998) A New Criminal Type in Jakart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Star Weekly (1961) Tugu Selamat Datang memperindah kota [The Welcome Monument beautifies the capital city], 9 September, p. 4.

Suara Karya (2001) Cagar budaya menopang wisata [Heritage preservation harnessed tourism]. 25 April, p. 10.

Suara Pemhaharuan (1999) Belum efektif. penanganan pedagang kaki lima [Still ineffective, the handling of vendors]. 12 August, p. 16.

Suara Pemhaharuan (2002) Polisi mendukung pengerahan massa]Police supports the mobilisation of masses]. 31 August, p. 1.

TOER, P. A. (1955/1976) Letter to a friend from the country, reprinted in: H. AVELING (Ed.) From Surabaya to Armageddon, p. 73. Singapore: Heinemann Books.

TRIYANTO. G. KTAL. (2001) Pertarungan seru pusat belanja di CBD,[Sharp competition of shopping centres in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Segitiga Emas, 2(1). pp. 11-14.

Warta Kota (2002) 550 tempat sampah untuk Monas [550 garbage bins for Monas], 15 August, p. 4.

YUWONO. M. (2002) Restorasi Stadhuis and Jakarta Kota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tadhuis' and the old Jakail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Jakarta Historical Museum. 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Jakarta, August.



看见那些青年人¹

黄灯*

教师视角的聚焦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2005年开始直至今天的漫长时光，我一直在广州的一所普通高校当老师。在完成《大地上的亲人》后，职业的便利，总让我设想，我笔下触及到的一个重要人群，我的外甥、侄子、堂弟，那些80后，90后，00后的亲人，如果没有遭遇留守儿童或者外出打工的经历，如果考上了大学，将会面临怎样的生存和命运？生活是否会呈现出另一种可能？这成为我写作《我的二本学生》的隐秘动因。

二十四年前，我毕业于湖南一所地方院校，按今天的划分，也算是二本院校的毕业生。在对学生群体命运的审视过程中，因为起点的相似，我显然更多凸显了自己的“学生身份”。而事实上，本书隐含了一个明显的教师视角，我所有的观察，更多来自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对学生群体的审视。从这个层面而言，《我的二本学生》其实是一本教学札记，类似普通高校教务处要求老师提供的教学反馈，我不过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对多年从教经历的审视，简而言之，本书以教师的身份，在中国高校市场化实践二十年后，以“从教日常”为观照对象，对普通二本院校学生的生存图景，进行了个人化的表达和呈现。在这一漫长、复杂、看似温和实则惊心动魄的过程中，我作为高等教育市场化铺开前的最后一批见证者、亲历者，在这一呈现中，因为各类杂糅经验的冲撞，不可避免

* 黄灯，学者，现居深圳。主要著作有《大地上的亲人》等。

1 原文刊于《天涯》2020年第2期。

地带上了参差、对照的个人视角，尽管因为对象的限定，在不少生命故事的展开中，我不得不承认阶层分化的趋势与命运，已经铁一般地砸中了一个群体，但正是个体丰富的突围，让我意识到教育的功能正是为了反抗这种铁定，并打开、提供新的命运方式。

毫无疑问，这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有时想想，十四年的从教生涯，竟然和几千个学生共处同一时空，并见证了无数年轻生命的蜕变，一种职业的敬畏感，无论如何都难以抑制。扪心自问，在混乱、忙碌的五千多个乱麻日子中，除了必须应对的、因体制身份所带来的种种职业碎片，诸如看得见的教学评价、检查评估、论文数据、项目等级、职称晋升等所产生的悲欢离合，在我真实的生命中，删除掉各类垃圾文件，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附着？我惊讶地发现，一切表象的、数据化的、能兑换为现实利益并能进入评价体系的，这所有被装饰得闪闪发亮、冠冕堂皇的一切，竟然都是我毫不犹豫、迫不及待清除于生命内存的东西，真正充盈我内心的，能让我产生职业尊严和留恋的，竟然是课堂上曾陪伴我的几千个学生。

他们的气息，他们的犹疑，他们的青春，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天真，他们的前途，在时光的悄然流转中，竟然化作我对生命、对社会、对自己工作意义思考的真实依凭。在知识无法祛除我内心困惑时，这些丰富的个体，以他们独有的坦诚和单纯，唤醒了我对世界更为宽广的观照，打开了我生命的另外维度，召唤我内心活力的一点点聚集，并让我切身感受到教师职业的庄重、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成长的同时，时光也在悄然丈量我人生的蜕变，他们的长大，也让我在变幻的岁月中，窥视到自己逝去的青春。在近几十年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我的大学时光，和他们的大学时光，构成了不同时代的生命切片，这种强烈对比中所夹杂的不同代际对国家、集体、社会、价值观、生命去向等层面的认知差异，让我内心震撼和感慨不已。在我的大学时代，我从不曾想象今天时代的样貌，同样，坐在我讲台下的80后、90后、00后，在市场化转型单向度的社会语境中，自然也无法想象，他

■ 殊音

们眼前的老师，有过怎样的青春。这种彼此的遮蔽和隔膜，构成了我教学日常中，最为基本、真实的时代剪影，在我五千多个从教日夜中，从第一天看到那些青春的面孔开始，我和这个群体，就产生了真切的生命关联，这是我最为厚重、确切的日常生存。

在本书的写作中，我将目光更多对准广东学生，这固然和我所在的高校是一所地方院校有关，也和我作为一个内地人，来到广东生活后，所经历的异质性生活经验有关，更和广东复杂维度和我先在的南方想象的落差有关。2006年5月17日，周三，课表上，排着我给计算机系学生的《大学语文》，根据教学进度，当天安排的是作文课。因为天气是少有的大台风，学生在二栋简陋的教室，都能感受到大风在龙洞山脉中的肆虐和威力，我将原本准备好的作文题，临时改为《风》，让学生现场完成。作业收上来后，一个名叫邓桦真的女孩所写的内容，让我久久难以平静，从她简短的叙述中，我还原了一个家庭的基本脉络：多子女、半年没拿到生活费、家庭月收入不足一千，但因为父母年龄不到45岁，导致作为子女的桦真，助学贷款被拒。事实上，相比我后来了解的更多学生，桦真的处境实在不算极端，但她所描述的状况和无奈，还是让入职不久的我极为震撼，以至在一种不安和难以放下的焦虑中，当天就通过校内邮箱，向全校的老师为她发起了募捐。

多年来，浸淫广东经济发达和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目睹珠三角火热的经济势头和对全国吹起的号角，我对南方的理解和想象，始终停留在发达、开放的单一向度，偶然的《风》，让我第一次纠偏了对南方的印象，并通过多年的持续观察，印证了纠偏的必要。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的班上，仅仅通过一次课堂作业，就能窥视到我年轻很多的学生群体，竟然还有不少依旧处于一种前现代的、吃饱穿暖层面的现实困境中。因为顾及学生的自尊，我没有打听这个女孩的更多消息，毕业多年，也不知道她身处何处。

但她的作业，她的《风》，却让我从此对流水线般的课堂，多了一份驻留的聚焦，并清醒地意识到，在就业数据的光鲜中，不少学生的暗处挣

■ 殊音 _

扎无从统计，在晦暗、逼仄的龙洞出租屋中，无数年轻人的身影，在天河区出彩的天际线下，铭记了时代的另一种真实。相比我有过留守经历的亲人而言，我的学生和他们的唯一差异，就是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在走近更多学生隐秘的心灵褶皱后，我意识到对于青年群体的关注，是我职业范围内无法回避的事情。我不否认，在写作过程中，因为不同时代对照所产生的反差、以及诸多个案中一次次确认，学生命运和背后家庭之间牢固的正向关系，我内心陷入了茫然失措的晦暗，在进入他们背后更为真实细致的生存肌理，目睹他们日渐逼仄的上升空间，以及种种难以突围的艰难挣扎的生存场景后，我内心确实有着难以排解的压抑和沉郁。

这种压抑和沉郁，更直接的冲击，来自作为从教者，我亲眼目睹，全社会最应具有活力的青年群体，整体而言来自生命本能的反抗性的日渐丧失。我惊奇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个体回退到更为封闭的世界，在网络的掩饰下，在“丧”、“佛系”、“小确幸”等流行词汇的包装下，彻底放弃了对现实的抵抗和思考。不少学生认定今天的便捷和丰富理所当然，今天的失衡和坚硬也理所当然，他们不怀疑高房价的合理性，难以感知各类存在的差异，无法想象一个没有手机、网络、信用卡的时代，也无法想象一个不用租房、没有房贷、教育成本低廉的时代，他们甚至很少反思，在大学毕业的起跑线上，同样年轻的躯体，去向为何千差万别，他们认定个人奋斗，自动剥离个体与时代的关系，不相信抗争的力量，在原子化、碎片化的具体语境中，个体与时代之间的关系，被轻易转移到了个体的机遇、命运和努力程度上，个体层面学生与命运的惨烈抗争，和整体层面学生无法与命运的抗争，两者构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

——作为见证者和施教者，我想知道他们丧失反抗性的秘密，我不否认，对于年轻群体而言，这是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精神历程，这一切竟然都在无声无息中完成，在市场化、成功学、工具理性明码标价的惯性中完成。

■ 殊音

我想知道，在现代性粗暴进程中，年轻人，尤其是底层年轻人，事实上成为这一进程的直接后果，成为市场化、工具化的直接承载者后，这种后果和当下教育目标及现代化进程，到底呈现出怎样隐秘的关系？我想知道，当一个具有精英观念的老师和毫无精英理念的学生群体相遇，当一个残存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和一群持有现实立场的年轻群体相遇，他们中间是否存在互相看见和唤醒的可能？

在应试教育的巨大笼罩下，个人成功是唯一的牵引目标，小升初、初升高、考名校、上培训班、上大学、找工作，在一系列严密的规定动作中，他们被删削掉个性、血性、活力，以标准答案为突破口，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的课堂，来到我的课堂，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以至彻底沦为面目模糊的一群人。而我，不过和他们一样，成为高校就业指挥棒下的一个程序、环节，成为某个数据的生产者和催生剂。如果说，《大地上的亲人》中年轻群体所处的困境，还能归因到他们与生俱来的底层属性及和教育的匮乏，那么，二本院校学生群体整体出路的逼仄，显然是一个严峻而让人不安的问题。

教育的两个维度

我得承认，通过对学生命运的梳理，作为教学主体，我并未从个案的聚焦和群体的数据统计中，获得圆满答案。在主流话语中，青春被包装为最美丽的图景，但我所感知到的年轻生命，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背后布景的黯淡，其生命的可能，也越来越呈现出斑驳而黯淡的底色。我猛然发现，多年来，我竟然持有这样一种真实的心境：我不羡慕年轻人，不羡慕比我拥有更多青春的学生。当我意识到自己这种非常态的心境后，内心弥漫一阵恐慌。

回望十几年从教经历，我一直面临两个真实的叙事维度：其一，是对应试教育的审视。在当下盲目的教育程序中，直面遭遇应试教育的孩子，

■ 殊音 _

到底该怎样叙述他们的真实面目，反抗性的丧失，只是我从直观层面获得的感知。对不少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而言，让孩子考上大学，是他们教育的终极目标，这其中暗含的前提，对大学和大学毕业前景的正向关系进行了确认，在应试的帽子下，他们竭池而渔、透支榨取式地将孩子送往大学门槛，随后便在门槛外面集体撤退，开始对下一批快递产品的锻造，而我像一个站在门槛内的收货者，完成应试教育最后工序的签收，拿到手的，实际上是一批早被删削干净，形状规整的半成品。

在了解到所教的学生，至少有 60% 来自重点高中，70% 都是超过一本线，才得以拥有机会来到我的课堂后，我对学生资质的怀疑和成见，悄然消解。在我看来，他们和重点大学的孩子相比，只不过多了一次考试的失利。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在高中以前，都被打上“优秀”标签的孩子，在大学的课堂，举止如此规整，面目却如此模糊。我在诸多的公共课堂中，忍不住一次次发问，“为什么读书？”“什么是知识？”“什么东西最重要？”与其说是对自身的清理和审视，不如说是唤醒年轻群体，正视个人内心声音的开始。对我而言，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到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他们压抑自己，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中，早已难以认清真实的个体，难以看清真实的自我，一种深深的茫然，不经意中总会笼罩我的课堂。

是的，应试教育迷雾笼罩下的真实境况，关于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未得到清理。从教育目标而言，将学生培养成为成功的人，还是完善的人，几乎所有的高校，没有任何差别。面对年轻个体的精神成长，近二三十年的高等教育，对“人”这个词，采取了不约而同的回避，密集的知识灌输，成为教育活动的常态，并以剥夺社会教育、生活教育为代价，从而使得学生的成长，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并直接导致学生的认知局限。

多年来，根据自己对学生的观察，我一直深信，针对漫长中学阶段和现实、真实生命体验相脱节的应试教育，如何引导学生在课堂、知识和生

■ 殊音

命体验之间建立可靠的关联，激发他们人文思考的习惯，实在是大学阶段不能回避的基本责任。我在课堂上的有限实践，不过是面临这种困境个人层面施行的细枝末节的修复、努力。在无法通过教育让底层孩子更好抵达上升通道的现实处境中，让他们精神深处多一点对社会的自觉认知，成为我的卑微心愿。

我还得承认，从教经历中，我内心最大的困惑，是不知给学生提供怎样的价值观念。产生这种困惑的因由，和我即将提到的第二个维度有关：教育市场化的后果。在教育的目标被成功学劫持后，价值观的传达，成为高校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高校对就业的空前重视和关注。一次开会，我甚至听到戴锦华老师提到，连北大校方都关注就业，大大增加了专业硕士的比例，作为风向标的北大尚且如此，就更不用提我所在的高校。事实也是如此，为了就业，学校的一切活动，几乎都会无条件让步。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高校，提升就业率的绝招是考研，从一入学就鼓励学生参与另一场竞争，背后的真相，正来自考研被计算为看得见的就业率。我所知道的一些高校，为了不影响就业率，明里暗里都对老师强调放松对学生的考核，以便学生顺利拿到学位。有些家长因为子女成绩不合格拿不到学位，会以就业为借口，公然到学校闹事，逼迫学校妥协。

在市场、就业、家长、学校、学生等组成的庞大系统中，所有的棋子都能和就业产生直接的关系，不能任人摆布，唯独教师这个棋子，可以任人摆布。学校通过职称、聘用、考核、严酷的层级和科研管理控制教师；学生拥有的杀手锏是学生评教，也能逼迫教师为提高分数，做出妥协，暗中放水；部分家长若见孩子的核心利益受到损害，更是以维权的名义，要挟学校，其所蕴含的商业、服务关系得以赤裸裸呈现，而学校往往会迫于家长的压力，对教师提出要求。这所有的要素，教师成为最被动的一方，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去抗衡、争取，而最终的严重后果，却实实在在地落到了学生头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逻辑是，决定学生培养质量的关

■ 殊音

键因素，正来自作为教育主体的教师，来自他们经营的每一个课堂。“就业主导”对教育生态的扭曲，直接将教师逼到了最边缘的地位，一个安全感匮乏、精神压抑的群体，又如何有心思和能力去培养学生群体？很多原本热情澎湃的老师，经过几年的折腾，也逐渐丧失了耐心和力量，只得将注意力转向个人的小天地，将更多精力转移到与体制的考核周旋，以获得更多的名号，确保自己的饭碗万古长青。说到底，教师的边缘化，最后的代价，还是隐秘地转移到了学生头上。

在对学生毕业境况的追踪中，负载在就业层面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我多年来追问最多的问题，也是本书竭力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我想知道，学生背后的社会关系、原生家庭，以及个人实际能力，在就业质量中，到底占据了怎样具体的权重？如果其权重越来越被个人实际能力以外的因素左右，那么，对大学教育的审视，尤其是对彻底市场化后大学教育的审视，将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我所以在本书写作中，给予更多的空间倾听学生冗长的命运叙述，是因为我想通过个体的聚焦，来验证自己多年从教经历的一种直觉：无论我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学生的去向，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已越来越显示出和背后家庭的正向关系。我想起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和062111班初次见面的情景，想起新生报到现场忙忙碌碌的家庭和暗处茫然失措的孩子，我明显感到，分化的加剧，社会即将到来的裂变，其实早在十几年前，就已显露端倪，庆幸的是，从整体而言，062111班学生，在经济状况良好，房价尚能忍受的大形势下，大部分在社会留下的夹缝中，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并或多或少拥有一些小确幸，而仅仅九年后，待我接手1516045班，他们所面对的可能和命运，就已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底色。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学生命运的考察，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教育产业化遮蔽了高等教育事实上早已放弃为社会筛选人才的事实，用人单

■ 殊音 _

位无法通过高校输出的人力资源，获得清晰的辨别，为了降低选人的行政成本，只能盲目追求名校学历的军备竞赛，并导致学历歧视、应试教育进一步加剧。在一种貌似热闹、合理，实则荒谬的教育 GDP 大比拼中，越来越多的底层青年深陷学历的恶性竞争，无法通过教育突围自身的困境，事实上被沦为高校扩招的炮灰，承受着付出与收获的不成比例的后果。

换言之，应试教育无法松动的现实，固然与教育目标的模糊有关，但教育目标的模糊之所以能一直横行，说到底还是来自教育市场化的掩护，“就业主导”不过一种表象的症候，成功学的登陆成为必然。是的，现实就是这样，与就业深入人心相对应的，是现实中畅通无阻的、包装在成功学背后的个人奋斗的价值观，它鼓吹个体努力，鼓吹机遇、运气，将年轻人的未来，简单和个体偶然的命运对接，故意遮蔽一个群体和现实、时代之间的深刻关联。在现实语境中，将个体与社会的基本对抗，轻易转移到个体是否努力这样一种具体维度，这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关于个人出口的最大谎言。尽管阶层固化，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话题，但年轻人对阶层固化的接受，还是让我惊诧不已。我不知道，在撕裂的社会语境中，教育在弥合两者缝隙时，到底该有什么作为？青年人的命运，是否只能任由原生家庭所处的阶层位置，以及并不完善的市场主宰？除了生产一个就业的工具，塑造一个内心拥有坚定价值观的人，是否高等教育的应有之义？在世界早已被工具理性冲得颜面尽失的时代，人类最隐秘的期待、最后的尊严，是否能够在教育的审视中，得以重拾？

说到底，教育的问题，和任何时代的基本命题一样，面临的核心是青年。本书不过一个应试教育后果见证者的冗长反馈，一个教育彻底市场化后参与者的另类图景叙述。面对内心、脾胃早被破坏的群体，面对眼前越来越迷茫、无所适从的年轻人，本书不过从一个大学教师的角度，对一些碎片的教育实践进行诊断、回溯和追问，我不过依凭最粗粝、原始的材料，诸如学生的作业、试卷、日常对话，获得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呈现，也以此

勾勒更为完整的普通高校学生的生存图景，并以此为载体，表达自己对教育的一些直观印象和基本思考，表达对一个群体的关注和描述。

但，仅仅通过文字，对一个群体的描述是否可能？

隐匿的群体

好了，让我回到本书的庞大群体。

在本书的写作中，从龙洞出发，我走进了邓春艳床板狭窄、没有空调的出租房，看到了伟福布置极为雅致的房间。随后，辛追、大顺、区永杰、麦锡章、邓桦真、朱洁韵、何文秀、李正宏、邱丹丹开始进入我的课堂，他们伴随作业或试卷，开始在我的文字中出场。更多的学生，来自潮州的石磊、擅长武侠小说的国伟、温婉恬静的陈倩、会理财的迎欢、父母下岗的胜轩、不愿回到北方的婉丽、在漠视中长大的则良、妈妈是越南新娘的沐光、听音乐长大的子然、自小被妈妈抛弃的芳坤、妈妈远嫁广东的早亮、村庄吸毒横行的秀珊、在父母隐匿中长大的晓瑜、和我认真讨论爱情本质的浩天、在课堂上对命运质疑的培栋、爱做生意的建源、在深圳成家立业的文妍、进入教育机构的陈雪、坚信“行政测试”威力的晚秋、家里铺面被强征的晓霖、爸爸痴迷实业的冰冰、父母从事屠宰奇迹般买下深圳一栋房子的亚康，这长长的一串名单，因为我的班主任身份、因为导师制的聚焦，更因为我对广东学生的特别关注，开始在我的文字中凸显。但我知道，相比我教过的几千学生，出现在我笔下的一百多个名字，以及得以描述的五十多个学生，依然无法构成统计学意义上的学理性。

更重要的是，相比我能够说出的名字，我内心还有一个庞大的隐匿群体，他们像幕后者，安静地站在我记忆的深处，或消失、或疏远、或拒绝。我想起英语系一个在广东工业大学门口，被公交车夹死的女孩，在听到这

■ 殊音

个惨痛的消息时，我正在菜市场心急火燎地为对付儿子的咳嗽，挑选第二天的汤料，我清晰记得，《大学语文》才刚刚开始，她只听了我几次课，记得她总是喜欢坐在前排，笑眯眯的样子，显示出广东女孩特有的安静和柔美，而名单上她留下的稚嫩笔迹，竟然成为我和她今生唯一的真实关联。让我难受的，还有一个跳楼轻生的男孩，前一天我还在课堂上，冠冕堂皇地和他们讨论人生的意义，第二天，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年轻生命的离去。这种种偶然的生命遭遇，总是将我拖入彻底的无力，感受到教育的虚空，并时刻警醒自己，面对眼前的年轻群体，我还有太多的不解、未知。

我还得接受，在和学生交往的过程中，比之多数孩子毕业以后面对我的坦然，也有不少孩子选择疏离。这种疏离，反而让我意识到他们的大学时代，他们和我课堂的偶遇，更像一场无法言说的幻觉。我得承认，很多鲜活的个体，无论我如何努力，貌似和他们很近，但终究无法走进他们的内心。我理解他们对我的拒绝、疏离，理解年轻个体面临现实挑战后，他们面对的真实处境。真正的黑洞，真正的贫穷，真正的无助、迷惘，我依然无法看清，他们也不愿意让我看到。我面前的教育，无论以怎样宏大、光鲜的词汇包装，依然无法揭开贴在脸上的羞耻布，拒绝成了他们保全自尊的最后方式。我不能否认，在我从教的五千多个日子中，他们始终是我生命中最为牵念的影子，是我内心无法填充的黑洞。尽管在本书的结构中，我无法将他们安插在任何地方，但龙洞对年轻生命接纳的现实，让我意识到，隐匿——正是多数孩子最为真实的生存。

让我利用最后的机会，记下几张难以释怀的面孔。

第一个要提到的是江小荣，2016年毕业的一个女孩。一次上讨论课，主题是与萧红有关的电影《黄金时代》。课堂气氛不错，因为事先分了小组，成员轮流发言。轮到小荣时，她稍稍迟疑了一下，在观望中大胆地走上了讲台，扎着马尾，架一副眼镜，穿着并不时髦的淡灰色运动装，非常平实的模样，带着农村孩子特有的淳朴气质。她一上台，就很认真地说了一句，

■ 殊音

“反正我感谢这个时代，让我能够进入大学读书。”在随后的发言中，她讲起自小口吃，持续了十几年，遭受了很多歧视，经过痛苦磨练，终于能够将话讲清。她还讲起自己的生活境况，一进大学就在外面打工，完全不依赖家人的支持。我注意到课堂下面，很多女孩子的泪水在打转，教室寂静无声，尽管她语调平缓，并不流利，但我能明显感到，她积蓄了很多勇气，才得以坦然走向前台。让我惊讶的是，她将个人的成长坦然与时代进行对接，“反正我感谢这个时代”所隐含的倔强和乐观，让我隐隐约约感受到某种危机。

一年以后，我观察到这个女孩越来越沉默，脸上再也看不到课堂上曾绽放的笑容，她拒绝和人说话，甚至同一宿舍的人都不怎么交往，几次课后，我找她交流，她都默默无语，不愿多言。更令我惊讶的是，难度不大的文学史期末考试，竟然只考了十几分，毕业论文期间，无论怎样和她联系，都得不到任何回音，询问宿舍的同伴，也没人知道她太多确切的消息。她还在我的朋友圈，但从不发声，任何契机，都无法激起她分享的冲动，考试、毕业论文、拿学位、找工作，这所有对一个本科生而言极为重要的事件，仿佛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我隐隐的不安终于变为现实，这种底层家庭出生的孩子，一旦从考取大学的喜悦中醒悟过来，回到真实的世界，如何直面现状，便成为她们成长过程中，最难调试的一环。

第二个要提到的是赖俊宇，他是2008级的学生。俊宇引起我的注意，来自辅导员对他缺课的反馈。因为给他上专业课，我得以有更多机会和他交往，他极具文学才华，无论写作还是理解能力，都要高出班上同学太多。他迷恋音乐，听过的碟多达千张（我由此断定他的家境不错），他讨厌无效的课堂，更多时候，窝在宿舍读书、听音乐。2012年3月29日，临近毕业，他找到我，和我聊起了喜欢的作家村上春树，他告诉我，村上春树拯救了很多创作者，别人是用思维推动文字，他则用文字推动思维，在创作以前，一切都处于一种未知状态，在俊宇看来，用文字推动思维，比用思维推动

■ 殊音

文字，要轻松很多。他还和我聊到对音乐的感受，他听过的专辑，他喜欢的音乐人，我闻所未闻，我很惊讶他在我面前的状态，和辅导员描述的状态完全不同。我理解他在一所金融氛围浓厚、管理极为死板的大学的拘束，理解自由和人文，对于他的重要。作为学生，他能怎么办呢？他反抗的方式，只能是逃课。作为老师，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提醒他，面对现实，必须有限地妥协，拿到学位，才能为以后的自由提供前提。

我清楚记得，整个大四，他找我聊得最多的话题，涉及宗教和灵魂。他清亮、透明的眼睛，透着智慧和执拗，他没有临近毕业的慌乱和不安，我每次都想去通过聊天，知道他成长的一些背景，但每次都找不到任何契机，聊一些现实的话题。他真正热爱文学和音乐，对形而上的东西充满激情，这种执拗的偏向，让他在大学的评价体系中，无法跟上流水线般的课堂和管理，我不知道他离校时，是否拿到了学位，更不知他毕业以后去向何方，我只知道，在离开校园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再也没有契机见面。但我见证了他大学时光的心灵挣扎，见证了他丰富的心灵和难得的才华，在咋咋呼呼的大学氛围中，一个男孩，如此寂寥，而又无人理解。

第三个要提到的是天成。我始终记得她的名字，但在大量的公共课学生中，我回忆不起她来自哪个系，读的什么专业，出生什么地方。在几乎两年的时间里，她会弄清我每个学期的课表，在我上课的前一天，都会用同一条短信，约我下课和她见面，“老师，我是天成，你还记得我吗？”每隔两周，我们会在学校七栋附近的面包房坐二十分钟，她会坦然接受我用校园卡给她买面包、买冰棒，甚至叉烧和鸡腿。她很爱笑，牙齿特别白，夏天，她会建议吃雪糕，冬天，则会建议吃热狗，她叽叽喳喳和我说话，我则安心地等待四点四十五分准时发出的校车，这片刻的时光，无论对我、还是对她，都是一种没有任何负累的放松。她零零散散给我讲过很多家里的事，我知道她兄妹多，父母一直在东莞打工，念大学前，她留守在老家，

■ 殊音 _

很少和家人见面。她没有任何底层留守孩子的压抑和沉重，快乐的脸庞，单纯的笑容，洁白的牙齿，永远一副没有烦恼的模样。今天，我忽然想到，在如此频繁的邀约中，她一定有什么更为重要的事情和我说，而我简单地以为，她仅仅是习惯了下课后与我在面包房彩色的餐桌前坐一坐。尽管我的电话从未改变，但她毕业后，再也没有和我有过任何联系，我的手机短信中，再也没有收到那句出现了无数次的话，“老师，我是天成，你还记得我吗？”

时隔多年，我突然想到，无论是江小荣、赖俊宇还是天成，在所教过的学生中，我们其实都曾拥有大量的相处机会。在少有的专业课中，我教了江小荣整整一年，和赖俊宇经常聊天，和天成时时在面包房见面，但毕业像一道神秘的隐身术，一旦时间的关口启动，他们便在我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也许就在龙洞，也许就在我的身边。

只不过，毕业以后的境况，让他们再也产生不了找我说话的愿望。

对一个群体的描述是否可能？我再一次追问自己。

那就让我回到龙洞，再一次去回溯那些生命。

2018年12月28日初稿

2019年11月25日修改



2020 “n 地域” 投稿指南

2020 年，“n 地域”将征集围绕以下话题的稿件：

疫情下的社会与文化

2020 年，中国和全球势必被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在此之前，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在一只蝙蝠的威力之下，看起来坚如磐石的人类社会，竟如此不堪一击，丑态百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那些理所当然的词汇——“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传媒”、“生命”、“自然”、“国家”等，变得不那么确定和令人信服了；由此泛滥而出的情感——“恐惧”、“惊慌”、“不安”、“感动”、“愤怒”、“鄙视”、“悲凉”……一再冲刷着人们的神经，让每个人都成为疫情中的一块小小的漂浮物。在此，仅因中国各地正陆续复工，而疫情在世界其他地区更为汹涌，便将视线从“新冠”上移开，从容谈论一切如常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经验，既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持续观察和思考“疫情下的社会和文化”并不能对在 2020 年头三个月里消逝了的生命、丧失了家园、限制了的自由，受侮辱的尊严有所补偿。希望这样的记录和思考，可以帮助中国人摆脱鱼的属性，向有尊严有记忆的两脚直立的哺乳动物迈进。

“学以致用”

征集在学术体制之外展开文化研究，从而“学以致用”的各色经验。如果说，文化研究不应该局限在大学课堂和学术论文的话，那么，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学习，投入到社会各行各业之中的那些文化研究的“种子”，正在如何发芽、生长和结果？它们如何展开和不同行业的对话和角力？如果说，文化研究不是一味的理论和情怀，而是希望和现实短兵相接的话，那么，散播在各行各业里的这些实战经验，如何被呈现、讨论和思考，并成为文化研究在学院建制之下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和鲜活刺激？当学院体制里的空间日益缩小，变得越来越和其他行业一样的时候，这样的积累，既是对于之前文化研究的正视和修正，也是后续进步必须澄清的现实条件。

《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 1 本刊为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和思想议题的文化研究类刊物。这一立足，不仅是指聚焦于中国的当代性，关注中国问题，解析这一快速变动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更是指，在“亚际”、“第三世界”、“全球”等这一系列既是历史又是虚构的框架的选择和比照之下，重新放置和结构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思想议题。
- 2 为保持文化研究的野气和灵气，本刊对来稿有两个“不在意”。一，不在意是否一定写成论文模样，欢迎以生动、恰当的文体形式，呈现“问题意识”和清晰思考的文字。二，不在意是否一定是首发稿，提倡各个友邻刊物和网站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推广。
- 3 在此共识之上，本刊欢迎各类来稿，来稿请注明是否首发。凡首发稿一经采用，即奉薄酬。其中，“专题”一栏为特约组稿栏目。如有专题的组稿建议和想法，欢迎来信，来信请注明“专题”字样。
- 4 来稿请用 word 文档发送至《热风学术（网刊）》邮箱（refengxueshu2017@163.com）。本刊会在收到稿件的一周内确认收到投稿；并于收稿后一个月内，回复作者是否用稿。
- 5 来稿一经录用，除在本刊刊登之外，也将在当代文化研究网及其微信公共号陆续发布。同时，本刊拥有授权友邻刊物和网站共享的权利。

2020年秋季刊（第18期）封面故事：

晚饭饭桌上，小I向爸妈感叹，中秋节估计还是只有三个人一起过。爸妈则不以为然，虽然是过节，但大家都有自己要忙的事，反正平常也经常视频通话，比起节日里赶场子见面方便多了。说着，I爸就拿起手机，找出大伯的微信名片，发起了视频通话。等待接通的时间有点长，I爸小声嘀咕，非洲那边还是不行，信号不好啊。

接通了，大伯那边刚吃完午饭在休息，太阳照得背景很清楚，人们坐在一间平房的院子里打牌，远处似乎还码着一个种着菜的泡沫箱。寒暄过后，I爸随口问道，中秋节放不放假呀。大伯的回答却比较复杂，“当然想放假，可是这边工程要赶进度，不能给‘黑人’放假”。I爸不解，“那你们放假，让他们继续干不就行了？”大伯的表情严肃起来，补充道，“不行，我们只要不在现场，这帮人就不好好干，而且我们要是单独放假，他们还可能闹事，我在非洲老板群里看过视频，好家伙，又是罢工又是干嘛的，还说我们区别对待……国内就没有这种事。还有当地的黑人抗议我们的援助项目，拿什么社区什么村的情况说事，真是小家子气，不顾大局。别人好心好意来援助，这些人还不乐意，你说这不是有病么？”

大伯在非洲承包了水利工程，帮不少非洲地区接通了自来水。但是在他看来百利而无一害的水利工程，这次却遭到了当地人的阻挠。“这就是愚昧！”大伯抱怨道，“我们工地上的本地人，一大半在家连自来水都用不上。我就搞不懂了，统一供水又干净又方便，他们偏偏不想进步，是不是怕干净水用多了把自己洗白了呀！”听到这句话，大伯身边的牌友们都大笑了起来，手机屏幕前的I爸和小I不知道该说点什么，也只能跟着干笑两声。

和大伯又聊了一会儿，I爸突然脑门一拍，“你不说我还忘了，我们家这两天正停水呢。去年小区里有好多家没交供暖费，物业就想了个招，要把统一供暖改成每户单独交钱单独供暖，方便管理。这阵子正在搞管道改造，不知道怎么整的，把水也弄停了。”大伯叹了口气说，“你们小区那个物业是真不行，不交费的人也是有理由的，但也没办法，水电暖气还是人家负责管理的，该服软还得服软。”I爸很是真诚地表示了认同，又接着聊起了家常。小I则坐在一边沉思起来。

供水供暖供天然气，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全要靠管道，管道看起来简直是便捷、干净又现代的理想生活的基石。但是，管道什么时候通，人们自己往往说了不算。管道里一旦空空荡荡，人们的生活也就停滞了。或许拒绝接受“援助”的非洲人，只是不愿意接受这些弯弯绕绕的管道对他们的限制吧！



主 编 _ 罗小茗

学术编委 _ 包宏伟 Fran Martin (澳) 雷启立 孟登迎 潘家恩 朴姿映 (韩) 王智明 章戈浩

责任编辑 _ 梁成林 美术编辑 _ 刘睿 编辑助理 _ 许诺

《热风学术(网刊)》来稿邮箱 refengxueshu2017@163.com

本刊每年3月、6月、9月、12月15日上线。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 - 非商用 - 非衍生 - 保持署名。



请登陆“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下载《热风学术(网刊)》。



扫描二维码，回顾往期。

